

/01





## 小说

小说家 | P3 万户萧疏鬼唱歌 慢先生 P13 卖燕子的人 顾湘 P17 张口结舌 辽京  
坏品味陈列室 | P25 不是谁都适合在碰碰车上写《战争与和平》 彭浩翔  
故事群岛 | P33 德利马赫伦疑案 威廉·特雷弗 P41 收音机的魔力 蒂姆·高特罗  
P47 关于爱丽丝的一切 丹尼尔·麦克劳克林 P51 新生活 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库巴斯  
长篇连载 | P55 慎余堂 · 壹 李静睿

## 非虚构

重走 | P61 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 / P64 长沙：和平的最后一瞥 杨潇  
到上海去 | P69 杨浦大桥 许佳  
局外人 | P77 2005，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 Christopher St. Cavish  
吉井忍的二次会 | P81 东京歌舞伎町，最后的“妈妈桑专用”发廊 吉井忍  
昨日世界 | P87 想象了一片沙漠 潘尼克  
先睹为快 | P93 纯真物件 奥尔罕·帕慕克 P99 上海快线 保罗·索鲁 P107 和平  
原子的秘密 亚当·希金博特姆  
发现经典 | P115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 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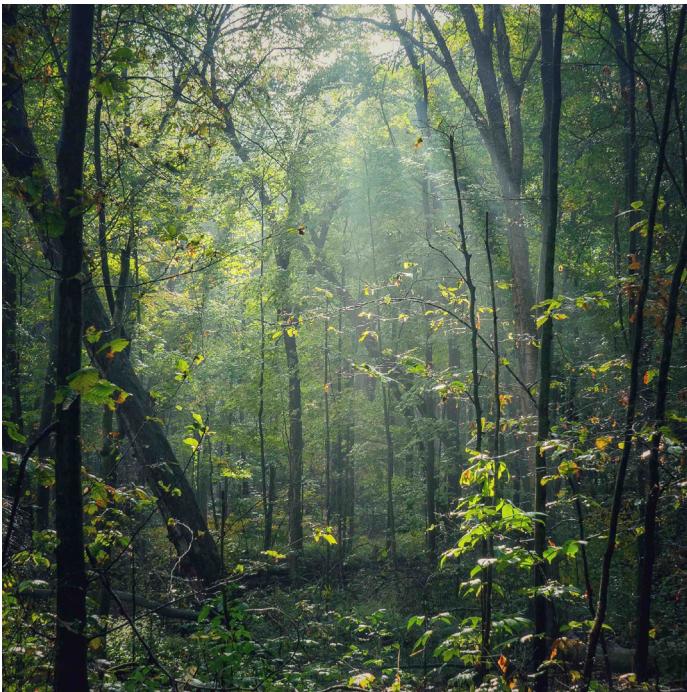
废墟与纪念碑 | P121 在万豪后面 / P126 凭 4 号商品券 伊险峰  
作家笔记 | P131 苏童在威尼斯 王竞  
发现经典 | P137 友好边境线 切斯瓦夫·米沃什

## 诗歌

诗人访谈 | P147 聆听汨罗：我们欠屈原的那笔债 杨炼 戴潍娜  
只有诗 | P157 鹤乡 / 漵浦美人夜歌 / 大夫，我是你身边一滴水 杨炼

## 专栏

存档点 | P163 我不做三明治 / P169 方向盘后面有人 顾天鹂  
展览十书 | P175 展览的展览，和数字 10 唐克扬  
王伯伯脑保健操 | P179 爱去夜总会的中年男人坏不到哪去 王永智  
18 号车间笔记 | P183 2020 留给我们的文化记忆 / P189 你知道这权利不该为  
任何人所有 顾天鹂



图片来自 [Michael Krahm on Unsplash](#)

# 小鸟回答 Vol.1

## 小鸟 | 小鸟回答

第一卷，我们想像了读者有可能提出的问题，  
并回答如下。

i  
这是什么？

《小鸟 Aves》是一款在手机上阅读的文学杂志。世界变得模糊不定。我们在说上面这句话的时候，唯一确定的是“在手机上”，不确定的东西包括“阅读”、“文学”，当然还有“杂志”。这里的文学，指的是以往冠之以“纯文学”或者“严肃文学”的创作，作者以文学为使命，写普世之人性，承继文明之光。阅读。我们认为是私密的、享受文字的过程，参与其中的只有你和作者的大脑。杂志。文学阅读中包含了对介质的追求。版式，设计，疏密得当，愉悦如影随行贯穿始终。互联网吞没所有介质的时代，如果我们对精美文字的热爱没有消逝，那么存在于其中的文学杂志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本杂志的诞生还基于一个很朴实的想法：把更好的读者介绍给更好的作者；把更好的作者介绍给更好的读者。定义什么叫做“好”一方面极为容易，因为万事皆有既定之规，另一方面也极为困难，因为心灵有多少种，“好”的方式就有多少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站在包容和灵活的那一端，我们认为好的文学不应该囿于小圈子里的吹捧，也不应该是对流行的谄媚，它应当来自于自我和这个世界的诚实。文学杂志的价值是在一个崩坏的语言环境里，让人保持对文字的敬意。我们希望读者看到《小鸟 Aves》时候，会说：“真好看啊！”既有文字之美，也有我们对杂志的理解。

ii  
内容都有什么？

《小鸟》每年分为 12 卷。它遵循线上原则，随时更新。全年 12 卷，更新总文章量在 300 篇左右。它由若干板块组成：虚构文学部分，包括小说和诗歌。小说包括每卷一到两篇目前最活跃的本土小说作者的最新作品，最新的引进版权小说，以及有实验性的、有趣的新小说，长篇小说连载等。非虚构文学部分包括观察性特写、驻村调查、旅行文学等。我们所说的观察性特写，是冀望我们的作者与世界保持一个审慎的距离，不是躲避，而是更好地观察它。

它还有档案和专栏两个大栏目，尽可能以各种文本覆盖我们的世界，理论上它属于非虚构文学的一部分。

眼下 App 看着还有点空，过一阵子就会很好看了（我们觉得）。

iii  
为什么叫“小鸟”？

小鸟，有时代表自由，有时代表高度，天空是属于它们的。我们还向往一点天空上的事。算是我们的追求。

iv  
我们是谁？

《小鸟》目前编辑委员会成员包括：

李静睿，本土小说编辑，同时她也是一位作家；

彭伦，中国最好的文学编辑之一，他负责版权引进小说；

杨樱，《小鸟 Aves》主编，主管非虚构部分；

伊险峰，非虚构和档案的编辑；

顾天鹂，专栏编辑；

沈非，版权编辑。

以上几位也都是《小鸟 Aves》的作者。

目前，李海鹏、杨潇、班宇、慢先生、王竞、辽宁、赵松、潘博、戴潍娜、彭浩翔、顾湘、吉井忍、许佳、唐克扬、王五四、六神磊磊、Christopher St. Cavish 等已经成为《小鸟 Aves》的作者。

v  
如何看到《小鸟 Aves》？

首先需要在应用商店下载“小鸟文学”app；

如果想看完整文章，需要付费。

话说我们本来想所有价格统一——看三篇试读和以三篇试读的价格看三百篇，价格相同。不过应用商店偶尔会越俎代庖，比如苹果就要求按它们的定价方式定价，我不知道它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现在的价格是三篇 12 元，全年 12 卷定价，300 篇左右文章，588 元。换算成杂志的话，大约是 50 块钱一本，我们觉得这还算一个公道的价格。

它目前还不支持微信付费。Android 可以支付宝，iOS 只支持 Apple Pay。

vi  
Logo 里的各种组合元素是怎么来的？

那只版画风格的小鸟是顾湘画的，她写小说，也画画，对猫有热情。她也是我们的作者。小鸟这两个字是集鲁迅先生的字。

其中，“小”，取自鲁迅《赠坪井先生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幅字写于 1932 年，目前收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鸟”，取自鲁迅《录夏穗卿诗联》。“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此夏穗卿先生诗也。故用僻典，令人难解可恶之至。鲁迅”。此字目前收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我们还没弄清楚这是否有版权。从我幼时起，集鲁迅字而作为报刊名字，蔚为壮观，前一段有人用鲁迅书法做了字库，不知道是不是被圈地赚钱了。

Aves 是拉丁文小鸟的意思。

vii  
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栏目介绍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 Erik Eastman on Unsplash

## 小说

# 万户萧疏鬼唱歌

慢先生 | 小说家

「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车间的铃声响起，工人们结束手上的活，准备收工。工厂的门口汇聚起一条蓝色武装组成的洪流，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从印着斑驳主席侧脸的门墙两边一齐涌出厂去，连同画像底下的那句“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也一并斑驳了。夏天的喀日县城，目力所及的最远处，雪山仅留着薄薄的一层雪，似乎轻轻的一阵风，就能将它揭去，然而没人见过哪怕是夏季薄雪掩盖下的山顶，别说车床厂的人没见过，怕是没有活物曾经见到过。

火热朝天的大车间不一会就一片安静。徐星武放下手里的活，从角落里拿出之前藏起来的小块钢板和线锯，沿着事先勾勒好的轮廓从钢板上锯下一柄斧子来，这活他已经干了好几天了。他又在火花四溅中用砂轮机将刀口打磨出来，他将斧子揣好，骑上自行车，从空旷巨大的工厂大门里极速地蹬出来，冲向县城东边的河床。

河床边上是少民的黑市，徐星武磨磨蹭蹭地在一爿肉摊前来回地踱步。终于他瞅准了一个自认安全的时间，从怀里亮出这柄斧子来。

管铺子的黑脸大汉仔细端详着斧子，他神情专注，苍蝇可以在他脸上任意地爬，直到接近眼睛的部位，他才眨眼赶走。

“特轴钢，好的！全淬，冷轧，切砍是都灵的，你大可以一把当三五把用。”徐星武解释道，尽管他知道对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也无意于听懂他的推荐。他只是简单地将两把斧头的刃口底部对在一起，轻轻一划，徐星武的眼睛瞪大了，他的斧子竟然被眼前这把脏兮兮的斧子刻动了，他满以为自己拿着这般工业文明的巨大成果在这里是能好好做笔生意的，然而却被轻轻松松地刻出一道划痕来。那汉子紧接着弯下腰，从底下一个筐里够出来几把斧头，从大到小的几把刀，甚至一根荡刀用的荡刀棒，几乎全是这种粗犷的切削风格，一看就是现代工业钢材，而且之前卖他那人比徐星武胆子大，偷的钢比他的强，黑脸汉子平静地看着徐星武，期待他能拿出什么新的东西。然而并没有，落败的老徐，抱着他受伤的特轴钢灰溜溜地走了。

张敏美平躺在床上，屋里的所有家具都紧紧地挤在房间的一侧，而她的床边则是空空荡荡。她听到门口的脚步声就开始轻轻地呼唤：“大宝，是你吗大宝？”脚步声停住了。

“大宝啊，你进来，给你糖吃。”张敏美接着呼唤他，终于，门里闪进来一名男子。他一脸痴傻的样子，憨壮高大。“大宝啊，你帮姐姐个忙，去给姐姐倒杯水，姐姐渴

死了。”大宝颤动着去倒了一杯水来。

“大宝啊，走道拐角的地上，有块砖斜靠着，砖后面有个小纸包，你去给姐姐拿过来好不好？”

大宝困惑了。他当然记得那个小纸包，纸包放在地上，墙上刷着“鼠雀蚊蝇，尽是妖精”之类的字。纸包被放在地上那一日，大宝妈和布药的人一通好吵，最后布药的说：“灭四害是党和国家的政策，你不要不自量力，而且这层有傻子不布药，傻子也得到处走动啊，为了他，全区不都不布了吗？全国都不布了吗？你不要公然站在运动的对立面！”

大宝妈没办法，只能带着大宝来到纸包处，告诉他这东西不可以吃。

“伸手，碰碰。”她冲大宝一努嘴，大宝伸手去够地上的老鼠药。她拿锥子扎了大宝。“伸手。”她又命令大宝。大宝哭丧着脸向药伸出手去，她又给了大宝一锥子。如此往复，有街坊看不下去了就劝她，申宝妈妈，不要这样。可她却不买帐，“伊脑子有毛病，我还有班上，孤儿寡母的我不能时时盯住，要不你养？我晚饭辰光带伊上你们家去？”邻居也只好作罢。大宝妈冲他说，“叫我知道你碰这药，手指头我给你根根剁掉。”

而现在张敏美让大宝去给她够来那包药，他当然是非常犯难的。张敏美伸出手去在大宝的裆部摩挲，大宝鼻翼大开，呼吸急促。张敏美眼神顾盼，温柔地催促道，“去，给姐取来，取来姐再陪你玩，啊。咱们好好地玩。”大宝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到了楼道里，他对着那个藏着鼠药的管道喘着粗气。

张敏美却没有等来大宝，她的门被一脚踹开。大宝妈站在门口，头发根根立起。她知道自己的阴谋破灭了，立刻换了一副面孔，率先眯起眼睛恶形恶色地盯着对方。

“依哪能？”

“吾哪能？！哎呦册那，是吾想哪能哇？！依只瘫子，自家死不脱还要拉上我儿子？”

“我自家死的脱，要麻烦伊？戳你娘逼，我有毛病啊？！”

“依一死，政府寻到他，伊哪能办？就算不找他事体，以后都叫伊杀人胚，伊后半生哪能活了？”

“政府寻牢伊，说明我已经死了，还关我屁事了？打掉他，枪毙他！”

大宝妈非扑上来和张敏美厮打在一起。筒子楼里自争吵伊始就云集在门口的人开始骚动。张敏美和大宝妈开始从耳光口水的殴斗上升到扯头发。大宝妈在埋头的厮打中把张敏美从床上扯到了地上。

张敏美的腿因为肌肉萎缩细如小臂，瘦人的白，毫无生机的在地上摆着，现场一片安静，大宝妈和张敏美停止了厮打，僵持了几秒，大宝妈将手插到张敏美的腋下，而张敏美也环抱住她的脖颈，大宝妈将她抱到了床上，为她拉上了被子，期间两人并没有任何的交流。大宝妈拽起吓得抖抖索索的大宝出门，张敏美听到她怒骂围观的人群，众人并不敢与她对骂，只是低声抱怨几句，就散去了。

她颇有些激动地躺在床上，全身簌簌而抖。很多复杂的情感冲击她虚弱的神经，她觉得自己一个头两个大，整个脑袋随着心脏的搏动，也跟着跳动着。这时徐星武开门进来了，他开门的时候还在看向走廊里，回应着许许多多他不能理解的注视。他疑惑地看向床上的张敏美，虽无交流，可是他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再发问了。楼道里家家生起煤炉开始烹炒，锅铲碰撞欢声笑语，并纷纷在楼道里布下饭桌，张罗着晚饭，而徐星武并没有胃口，他也断定他的媳妇不会有。

半睡半醒间，张敏美又来到了厂里。巨大的厂房空无一人，但在梦中的她并不感到疑惑，她轻盈地骑到礼堂后门，直进入更衣间内。更衣间是密密麻麻的衣柜，张敏美坐在衣柜间的长条凳上换上练功服，她非常焦急，觉得自己一刻都不能耽误。连滚带爬冲向舞台的张敏美在上场处扫了一眼空空的礼堂，光柱直插这个尘土飞扬的巨大空间。巨大静谧，乃至古老与神秘。这时景片子忽然立了起来，几乎要撞到她一般。景片子散发着浓烈的松油味，这是多么好的一张景片子，连天接地的巨大，上面椰林树影，栩栩如生，涂抹在画面上的保护性的明油泛着清亮的光彩。没有这么好的景片子了，纵整个西北你都无法找到与之媲美的手艺，张敏美太激动了，她提起一把锃亮的大刀，预备冲上舞台，加入到演出里，这刀也是如此的好，轻若无物，又散发着金属光泽，威风凛凛。伴舞的歌也不像是大唱盘里出来的那般朦胧，那些她根本叫不上名字的乐器，正和谐有力地演奏着那些她早就烂熟于心的旋律。她直到群舞从她面前过的时候才冲进去，这是老演员才有的本事，她们即使是误了场也能抽个冷子混进演出。舞群里的其他演员冲着张敏美笑，似乎要在散场后好好揶揄她的误场，她在得意和轻微的自责里跟着演出起来。她瞟了一眼领舞，领舞姚长竿对她怒目而视。

太自在了，这种起跳的失重感和大腿肌肉发力后愉悦的疲惫对张敏美来说都太亲切又陌生了，她惊讶于自己的感官是如此的敏锐。她感受着每一次的起跳，每一次自己脚尖略过自己后脑发梢的感觉。她怀着一种虽然没有对象但是巨大的感激和委屈，奋力地跳跃和舞蹈起来。她张开双臂保持旋转的平衡，在手臂落下的时候，她感受到了手打在被子上的触感。

张敏美醒了。

她盯着洋灰的天花板，已经汗湿的身体立刻将寒意传到每一条骨缝里。她感觉自己

己被一只大手用力攥住，那些欣快的情绪像是从她身体的无数伤口里向外喷涌，如同余烬的最后一点热乎气儿也被大风扯散，她开始剧烈地颤抖，在屈辱和愤怒中，断断续续地喘息。

徐星武早就醒了，但是他并不睁眼。炉灶的火四五点一灭，他就逐渐地清醒过来，到了这时他的鼻头已经冻得非常疼了。他捂了一会自己的口鼻，心一横，出了被窝，弄亮了炉子又将水坐上去，才犹犹豫豫地去招呼张敏美。

“起来啊？我给你倒倒便盆。”他将张敏美扶了起来，从床板底下拖出便盆来。张敏美透过窗户看着远处的雪山，朝阳下，雪山一片金红。

徐星武从门里进来，他刚在公共厕所洗净了便盆。

“你今天把我放在外面吧。我想在外面坐坐。”

“……好啊，好！我把你把藤椅搬出来。”徐星武略一思考就同意了这个决定。“这藤靠老没用了，都以为用不上了，我下趟回上海，再去编把新的来。你怎么想起来要出去坐坐的，早应该……”

“好了呀，烦不烦。”

徐星武不言语，他讪笑着收拾出去晒太阳要用的东西。他把床上的被子卷好，预备一起抬出去给张敏美盖。

“换一床，这床太灰。换气。”

“换！换那床？你讲。”

“还我讲，一共两床，你把结婚那套红的拿出来。”

“那个，那个在柜子最底下……”

“算了算了，你走吧。”

“拿的呀！没说不拿。”

徐星武气喘吁吁地从立柜里拖出那条从没盖过的红锦面的被子。浓烈的樟脑味弥漫在不大的宿舍里。这条红被子被很妥善地折叠过，除了几条大的折痕，它基本还是当年的平顺和光滑，徐星武的脸无法不微笑起来，被面映红了他的脸，他像是又听见了鞭炮，又闻见了酒席。

“笑你个死人骷髅头啊。”张敏美被有些呆傻的徐星武逗乐。

“哎呀，好，灵的，偶尔也该拿出来盖盖，你讲呢，一点新头都没蹭上就放旧了。”

“要弄脏的，我不方便……”

“哎，这个嘛，呵。”徐星武并不敢赞同这个说法，也不敢反驳，他怕刺激张敏美，很多时候他只下意识地维持着谈话。

徐星武为她擦洗，将层层叠叠的衣服套在她的身上，端出自家的新民炉来，又将搪瓷水缸满满地倒上水坐在上面，才把张敏美背出来放在藤靠椅上。给她围上头巾之后他还站在原地想，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

“快走吧，这么麻烦，再也不出来了。”

“不麻烦的呀，有什么麻烦的，那我中午回来，你自己多小心。”

“走廊里，又不是野地，有什么好小心的，赶紧走吧。”

徐星武忧心忡忡地上路了，走廊里赶去上班的人都瞥一眼裹得严严实实的张敏美，但是鲜有人跟她搭话。张敏美看着自己脚尖位置的那道光，她觉得再过个把钟，太阳再升一点，这道光将蔓延至她的头部，她想象着一会她将沐浴在一片壮烈的金光里。

那时候，没有比张敏美更标致的人了。

张敏美常将车蹬得飞快，她站起来蹬，风呼呼地吹过她的脸颊，即使是宽大的衬衫也在风的吹拂下，紧贴着，将她的线条暴露出来。她的辫子在风中上下悦动，她不时地回头看着来路。好几个男同学追着她的自行车，他们什么也不为，什么也不要，他们只是奋力地跟随着她。直到她骑到楼下，从高大的自行车上跳下来，回头看一眼气喘吁吁的他们，他们就嚷叫着，一哄而散，各自回家。

她小时候走在路上，或在公交车里，见到她的大人常常按捺不住好奇，将她截停，或越过座椅前来问她：“捺屋里相，亲眷，阿是有外国人啊？”她就笑笑回答道，“没有的。”“哦，小姑娘，嘎漂亮，嘎标志喏，啧啧。”

她来到喀日县的第一天，踏进宿舍的时候，姑娘们纷纷从自己的铺卧里钻出来，或从上铺爬下来，密密麻将她围住，继而开始薅着头发将她拖到地上痛打。然而没过几天，这屋的女的就围着她前进，一同享受男轻工的注视，姑娘们中的几个不时爆发出“看什么看？！”质问。直到有男轻工大胆反诘，“不要排噪，没看你。”男工们便和其他女工一齐偷笑。张敏美也跟着笑，此时她脸上因为殴打留下的淤青，还没有彻底消退下去。

虽然是早晚的事，但是当文工队来找张敏美的时候大家还是围了好几层。文工队的同志们高大干净，透露着不可置疑的自信。文工队的男同志在门口用丹田气朗声问道：“张敏美同志在吗？我们找张敏美同志。”张敏美就被众人推给他们，带着，去

礼堂排练去了。那时礼堂刚刚落成，几层楼高的巨大的墙面上，主席的侧像正在绘制。张敏美完全无法想象这么巨大的画像竟然是用刷子一点一点刷出来的。红黑配色的主席像后面，万道金光正在喷射出来，主席穿着军装戴着八角帽，工厂的剪影在主席像的底部排列开来，虽然还远远没有完工，但是张敏美可以想见它的壮观，想着每天上下班，都能看到如此振奋人心的作品，张敏美感到由衷的高兴。车从画像脚下过的时候，突然跳下来一个年轻人。文工队的组长“丹田气”立刻一把刹住尖叫道“册那，要死啊！”他定一定神看清了人，就又恢复了丹田气的声音：“老徐，不要搞空降，下来前也要看看车。”

所谓的老徐，一叠声地赔不是。

“张敏美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徐星武同志。徐星武同志是我们厂的文艺骨干。我们叫他徐工。”

张敏美并不看他，她沉浸在这幅巨大作品带给她的冲击里。“这样大的画，是你画的吗？这么画才能不走样呢？”她真诚地看着徐工。

“熟能生巧，没什么特别的。”徐工不敢盯着张敏美的眼睛看，但是又不想显得躲闪，他索性将目光聚集于她的额头。

“我们徐工能画这样大的宣传画，做小的东西也是一门灵，这个年纪四级工，工作之余，还帮文工队做道具，以后啊你常会看见他的。”

“哎！革命要不得半点虚情假意，你有事直说，不要给我带高帽子。”徐工厉色道。

“哈哈哈。”丹田气朗声笑道，他的笑声又假又正，“管道具的同志反映，有些道具啊开胶严重，徐工一定给我们看看。”

“没问题。”

“你下来干嘛来了？”

“主席像底下的话还没有想好，我回去再思考思考。”

“我有一句。”张敏美仰着头痴痴地看着宣传画，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好！就这句。”徐星武抬头冲着其他工人喊：“写！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往上传。”

这句话被工人向上传递，一声高过一声，直到脚手架下的人群也跟着喊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厂区的合诵，人们不知疲倦地呼喊着，像是他们能把这句话送去更远的地方一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张敏美内心哼唱着，直到她的意识被一阵遥远的滚雷打断。家属楼里歇班的人开始到处奔走，给煤堆挡上木板，往楼里灌的风一阵凉过一阵，愈发的带有潮湿的意味。大家匆忙跑过张敏美的身边，但是没有人管她，他们只是大呼小叫，一股脑地忙乱。这是她早已预料到了的情况，大家都巴着他俩要是死了就好了，这楼上楼下，几乎没有没整过他俩，没打过他俩的，只是大家想不到还有1977年，大家还得把这日子过下去，这时候就显出他们的多余和不知趣来了，别人怎么都死了，就你俩活着。张敏美并不着急，她看着大团黑沉沉带着闪电的雨云扑过来甚至有些痛快，她任由大雨泼在身上，从快灭的炉子上拿过茶缸喝了一口，雨滴一开始落在棉被上的声音还是沉闷的，湿透之后就变得清亮。她有些兴奋，甚至在摇头晃脑哼完一段激昂的过门后唱了起来，“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都给它冲了，给它冲个透亮。

青年徐星武和工友们回到宿舍，他们身上油漆点点，他刚把那副主席像的小样挂到门口，门就被顶开了。

“要死了？谁人啦？”徐星武质问。

“我，师傅！”

“马晓军同志，依弗要跑，好好较，好哇？”

他并不比马晓军大多少，但是马晓军来厂那天就开始跟着他干。马晓军异常崇拜他，似乎他徐星武什么都灵，放屁都比别人大点声。

“冰棍，要化了！快点吃。”

“你拿壶装它肯定要化，你为什么不用胆瓶呢。”

“哎！你有时候夏天要喝口热的发发汗的呀，我拿暖壶去打了，你想喝口热的哪能办？”

“马晓军同志，不要搞个人崇拜。”丹田气看不下去，揶揄他。

“这叫什么个人崇拜，这叫对同志春风化雨。”

“你化雨我一个，裤头给我洗了。”丹田气说。

“你去找你的那些女观众，不要讲裤头，裤头里面的都给你洗干净了。”

大家似乎很买帐地笑了。

“阿宁困着了？”丹田气在漆黑的宿舍里发问。

大家表示没有。

“各么来讲鬼故事吧。”丹田气建议。

“听都不要听的，不要讲了。马晓军的劝阻没什么意义，大家似乎对这个活动很感兴趣。

“知道喀日县我们这厂怎么来的吧？劳改团过来平的地。”

“各有啥吓人的？”

“你们晓得死特几乎人？”

“不晓得。”对方明显含糊了。

“我也不晓得。”丹田气说。

众人大骂。

“没人知道的呀。一开始病死饿死了，还用牛车往外拉，后来呢，挖个坑就地埋，地上摆块砖，就算了。”

“再然后呢？”

“再往后不让这么埋了，死得太多，这样用砖头，厂子哪里还盖的起来。挖大坑往里扔，十天半个月烧一烧。”

众人倒吸凉气。

“你都怎么晓得的呢？”

“我一个车间的普工，以前是个劳改，伊讲的这些，他还说，那个坑，就在宿舍后山！”  
“不要再讲了呀。”马晓军哭告。

“好了，不要再讲了，今天就这样吧，我睡他下铺，尿了你负责？明天还要上工，睡吧。”徐星武感觉到马晓军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了。

到了后半夜，徐星武迷迷糊糊醒来。他听到上铺依然没有传来熟悉而粗壮的呼吸声，就索性起来。

“马晓军，陪我去上趟厕所。”

徐星武带着马晓军穿过黑漆漆的走廊，听着他决堤一般地尿了很久，困得直打摆的他带着马晓军回来。他一爬上床铺，徐星武就听见他传出了均匀平稳的呼吸声来，而他自己却越来越清醒，他想起今天下午看见的那个姑娘张敏美，但是那张脸又不甚清晰，他责怪自己胆子小，没敢好好看几眼。

浴盆摆在客厅，氤氲的热气缓缓地升向那盏灯，徐星武仔仔细细地擦拭着张敏美的身体。



图片来自 Jomny Liu@flickr

“冻坏了吧。”徐星武问道，他摘下被水汽遮盖的眼镜放到一旁。

“还行。”

“早上出去，我就觉得今朝要下雨，我全身伤都疼，我觉得就要下雨，但是你难得要出去呀。”

“好了呀，烦不拉，淋点雨怎么呢？你不是也赶回来了。”

徐星武立刻闭嘴，他从来让着张敏美。

“你也进来泡泡吧，回来也淋雨了吧。”

“我进来谁烧水？你想的出的。”

“进来。”

“好好好。”徐星武站在床边，将他的衣服一件件脱下，在灯光的照射下，他身上的各式伤疤在他弯腰的时候，依次变得显眼起来。

“徐工，说两句。”车间主任建议。“你刚来，给我们换换脑子。”

“合适吧？”徐星武推辞道。

“哎！”主任大手一挥，“主席说了，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学，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徐工是上海总厂主动请缨过来的专精，专家！你一定要讲讲。”

“那我就说两句，我来这几个月，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太不容易了，这样的条件大家还坚持生产，这是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要是只看见光明的一面，看不到黑暗的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那徐工讲讲，困难在哪里！”

“好！我们零件厂地处高原，各种物料运输困难，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有时候一年只能开工几个月。而且很多零件还要添加稀有金属，我们没条件生产，这都是用外汇买来的。但是生产任务重，有时候不等条件达成，就要开工，那样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不合格的，完全是在浪费材料，比如发动机汽缸体，强度完全达不到。废料堆成山，我很痛心。这些物料，在上海总厂，大可以变成成品，耗时耗力地运到我们这里反而效率很低，我觉得我们应该生产一些简单的，工艺没有那么复杂的零件，不是所有地方都要生产高精度的零件的。”

徐星武兴高采烈地说完，回过头发现车间主任的脸僵住了。

厂房里人山人海，治保队的人押着徐星武在台上站着。

厂革委会主任缓步走进人群中。

“组织上给我们定的调子，马步芳有的我们都要有，还要好！本着这个精神，我们流血流汗办了这个厂。为的就是要打破高原不能做热土的无稽之谈。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这里不但能办出成绩还要办出成果，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人们在几声稀稀拉拉地叫好后，立刻跟上开始鼓掌。

“毛主席说：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还要更好！然而有的坏分子，要唱革命的反调，传播革命无用的思想！说什么高原办厂不如不办的好！要我说，高原已经是波澜壮阔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斗智批修的火热战场，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声势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在全国都是名列前矛的！然而！然而！徐星武之流，不自量力，妄图给革命泼冷水，煽阴风点鬼火，造谣言放暗箭，制造反革命言论，企图利用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思想，把一些糊涂蛋也一起引上绝路！徐星武，今天就要扒了他的画皮，让他的反革命嘴脸曝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徐星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众人怒吼起来。

“敌人不会自己灭亡！”革委会主任又添了一把火。

雨点一般的拳头落在徐星武的全身，他被打得不辨南北，继而跌倒在地上。大家开始踹他，就在这时一个怪声喊停了大家。

“徐星武！我砸烂你的狗头！”马晓军将一条绞车链在头顶舞得呼呼生风，众人立刻闪开，唯恐被误伤。那条车链不断地抽打在徐星武身上腿上。他很快因为剧痛而跪了下来，但是马晓军并没有停下的意思，车链不断地抽在他身上，他挣扎着爬动，后来干脆就没有了反应。马晓军并没有停，他接着咬牙切齿地打。

一条空空荡荡的走廊，夕阳斜插进破损的窗户，走道两旁堆了各种杂物和道具，张敏美狂奔于其间，越过眼前的障碍物，她通过窗户看见那辆破军卡上不断地跳下当地的政府政工队队员，嘴里喊着什么。她撞开了那个苏联式的砖砌天台门冲上了房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屋顶的边缘。

一个礼拜前，厂里找文工队的领舞谈话，这领舞和张敏美关系很一般。她非常严格，丢三落四的张敏美常要被她教训。人们叫她“长竿”，她姓姚，便是姚长竿了。她终日挺得板板的，哪怕下了排练在车间里干活，也从来看不到她懒散懈怠的样子。县里的干部看了她们的一场演出，便有县革委会主任的主任来保媒，要把姑娘娘说给县里的一位干部。

自打高原办厂开始，从沈阳，济南，上海，整建制的拉厂过来，当地干部似乎就非城市女工不娶了，还有别的州县也来，各厂宣传说，嫁给当地人，就是嫁政策，嫁给当地人，婆家就是伟光正的党。然而姚长竿的那次见面似乎很不愉快。县革委会的人，骂骂咧咧地走了。姚长竿回了舞台，姑娘们围上来问她怎么了，被她一声厉吓，统统归位了。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指导动作。“头抬起来！胳膊架高，向上看！眼里要有希望。”姚长竿没过几天就出事了。她在县里空场地上演出时，亮相的时候没有刹住车，往前冲了几步。有人喊她这是暗讽文化大革命过了头，要栽跟头，全是县里的人。他们直扑上舞台去，将姚长竿扭上卡车。张敏美他们演出服都没脱，跳下舞台就往厂里跑，要去求救。他们几乎崩溃，姑娘们差不多是哭喊着往里跑，然而大家只是偷偷地笑。因为他们一齐往台下跑，穿着日军服的男演员跑得快。看着像是日军让一群老百姓撵得到处跑。

厂里一个屁都没放，哪怕是把人要回来我们厂里自己教育自己斗的要求都没敢提。张敏美她们混进过大会，姚长竿不是主要斗争对象，但是回回陪斗，她的腰杆早就没那么挺了，张敏美记得人们把她往下拽的时候，就有人打她的腰来着。

“张敏美同志，组织上来关心你的个人生活了！”主任兴致高昂地说。张敏美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实在不知道来得这么快，她大脑一片空白地跟着去了。那个干部坐在对面，他并没有显得讨厌，他几乎没有显示出自己是个活物来，主任只是一再地呼喊：张敏美同志，你看看这两手的老茧……

张敏美出于极度的恐惧与紧张，当场吐了。

当那辆县革委会破军卡开进场院时，队员跳下车快步冲进厂房，为首的大喊：“借个厕所！他们正呲牙咧嘴地解裤子的时候，就听见一身巨响，随之而来的是女工的尖叫。

张敏美在床上看着浴盆里的徐星武，那些伤口虽然已经不那么鲜嫩了，不过还是能看出和周围皮肤的区别。

“你说马晓军当时不来那么一出，就让人乱拳给你打死了，怎么样？”

“嘿，我觉得也蛮好。鞭子疼，拳头没那么疼。”

“他是真狠，旁人都不敢再打了。”

“他演得像。”

“他后来还托他爹给你求情是吧。他爹做啥事体的来着？”

“教育局的什么吧，记不得了。”

“他怎么就再不回来了？”

“出去了谁想回来啊……”

“也是。”

“看架势以为你俩能好一辈子。”

“我也以为。”

省城汽车站附近，寒冬中总有不知哪里喷涌来的白烟遮挡着马晓军的视线。他要去赶到喀日的长途车，一只巨大的铁皮喇叭发出通电瞬间的尖锐噪音，一种他从未听过的欢快急促的旋律传了出来，这不是样板戏中的任何一段，那种圆舞曲的律动掀起一阵狂喜，将他裹挟，他的手掌和小腹都因为兴奋而发痒。他左顾右盼，想与人一起分享他现在的困惑，他几乎要舞蹈。

“美酒飘香啊，歌声美，朋友啊请你干一杯。”

他被那个歌声提起又放下，他的心弦随着旋律的起伏而起伏。所有人都驻足，抬头看着那个喇叭，似乎它之后还将播放出画面一样。他被强烈的兴奋冲昏了头脑，一句歌词都没记住。他只是记住了那几句快活的“来来来”。他原地上下蹦跳，臃肿沉重的冬衣几乎要喘开扣子。

大家笑着看着这个州县上上来的老乡，但是马晓军无所谓，他向所有捂嘴嬉笑的人投去极为真诚的笑容。

短短的歌曲结束之后他满头大汗怅然若失地站了很久，然后他扑向一个炸湟鱼的摊子。他急切地问道，“同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反正啊昨天才开始放。买炸湟鱼吗？三公一母，打倒四人帮。”

“保证三公一母吗？”

“去去去，捣乱。”

“多少钱？”

“一块”。

“这么贵？！”

“你不打倒四人帮？”

马晓军吓了一跳，这样的帽子他担不起，他立刻掏钱。“我打倒我打倒……”

货车在公路上暴土扬尘地行驶着，马晓军探出半个身子在唱“来来来”，他不断拍打着车身，司机探出头来咒骂他，但是他完全不以为意。

大家正在埋头干活的时候，走廊里远远的传来一阵脚步，响亮的声音踢踢踏踏地回荡着，马晓军进了车间，目不斜视，向里面走去。当他走到最后一个人时，那人并不敢抬头，他委缩在一角，默默地干着一些杂活。

“师傅！”

徐星武并不敢应，像是很多年没有人这样直接地跟他说过话了。他眼神闪烁地抬起头来看着马晓军。歇工的铃声想起来，马晓军不得不大喊。

“马晓军同志？”

“吃鱼吗师傅，三公一母！打倒四人帮。”

“多少钱啊……”

“一块！！”

“这么贵啊！你自己留着吃吧！谢谢你的关心。”

马晓军板着脸。

“你敢不打倒四人帮？”他说完后没绷住，乐了。

徐星武长出一口气，苦脸告诉马晓军：“哎呀，你不要这样吓我，不作兴的呀。”

马晓军嘴一歪，哭了。

火车过桥的声音与平常路段的声音可太不同了。徐星武仔细琢磨着，他自平反后第一次能有高原假。旅程中的每一种声音他都仔细琢磨，会车，过桥，钻山洞，简直妙不可言。他在朦胧的睡意中，就能感受到，过桥的频率越来越高，他应该是到了江南了，他挣扎着醒过来，看见大片平整的水田，在稻陇的间隙，水田反射着清亮的月光，他将脸紧紧地贴在窗户上，在自己呼出的白气里，看着这些常常入梦的情景。徐星武担着扁担下了车，他自火车减速时就开始寻找马晓军，然而未果。他现在只能傻傻地站着。

“师傅……”

徐星武回头，正是马晓军，徐星武当然知道，自打考回上海，他应当有些变化，只是没想到，变化如此之大。他穿着笔挺的白色新化工布衬衫，头发梳得也精神。徐星武则风尘仆仆，他那套簇新的压箱底中山装，这时候显得又新又旧。他俩都尽可能地咧嘴笑着，但是都说不出话来。这种既亲切又疏离的感觉，让徐星武心里很不好受。

他总记得马晓军自回到上海，就几乎和他断了联络，他几次准备放弃和他的联系，但是他终究是舍不得。这是他的小兄弟，他在那座近乎荒野的城市里，不多的朋友。他之前怀疑马晓军是不是因为在那几年里打过他，心里过不去，又觉得不可能，那天批斗大会要是一人一脚，他徐星武当场就给踢死了，好多人都是这么死的，鞭子

打，虽然皮开肉绽，但是全是皮外伤，马晓军是在救他，这是双方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于是他打消犹豫，接着一封又一封地给马晓军写信。

在他的一再来信下，马晓军终于答应去车站接他。尽管这个接站是要来的，但是徐星武顾不得了，他必须见马晓军。然而他未曾想到，这次见面，两人竟然这样生份了，他搞不清到底是什么东西横亘在两人之间了。

他在公交车上，将扁担立在自己身前，尽可能少的占据空间，不慎和马晓军对上视线，双方也是略略一笑就错开。

弄堂口几位坐着闲聊的老太太看见徐星武远远地就站了起来，带上红袖箍。

“你是谁，啥事体？”

“我是徐星汉的弟弟，我叫徐星武。我回来探亲。”徐星武拿出了介绍信和工作证。

“青海来的？”此话一出，遍引起了周围人的警惕。“临时户口阿宁办了？”

“弗宁呢，这不是准备放下行李，就回转去办嘛。”

“那不行的，没有临时户口不好进去的。你是青海来的，青海来的又没有临时户口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责的。”

“青海来的么怎么呢？”徐星汉问，马晓军已经预备拉着他往后走了。

“青海么，都是劳改犯劳改的地方呀。”为首那位用一种好言相劝的温柔语气说道。

“青海一百万人来，个个都是劳改犯的吗？”

“行了师傅走吧，说不清楚的。这边就是这样的。”马晓军拉着徐星武往派出所走去。

接受完检查之后，徐星武将临时户口插在胸前的袋子里迈进弄堂。迎面走来一个男子。

“临时户口看一下。”徐星武将户口给了他。

“你是街道的？”马晓军问他。

“不是的。”

“那你是？”

“我什么也不是。”

“你是没见过临时户口吗？”马晓军问他。

“见过，防盗防流窜人人有责。你们要不犯罪，我看一眼怕什么。”

马晓军预备扑上去，被徐星武一把扯住。

那男子高呼：“青海人要打人了！”

“星武，你进来！”天井门口站着的，是徐星武的哥哥，徐星汉。

“对不住对不住，自家兄弟。”直到徐星武和马晓军进了天井，还能听到哥哥在门外不住地道歉。看起来应该是嫂子的那位，站在远处，并没有上前来的意思。显然她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徐星武来。

马晓军帮着把行李抬上去，就气鼓鼓地走了，约好了周末再说。徐星武一人在八仙桌旁坐下，他很久没有这样紧张和不自在的感觉了。他急忙拿出带来的一些礼物以期能让哥哥开心一些。

“哥，这是虫草和蕨麻。”他打开一个袋子。

“这么脏？”哥哥看着上头的泥问。

“不敢洗，怕生霉，这是好的，利肺的。”

“你放去门口吧。”

“还有这两瓶互助头曲”

“五十八度？阿是要拿来消毒哦？”

徐星武赶紧收拾起酒瓶往柜子里摆去，他一抬头就看见了父母的遗像，便愣住了，就这么痴痴傻傻地攥着两瓶酒站着。他十八岁离家，再次见到父母，他们都成了相片了。

“你刚去没几年，就听说你被戴帽了，爹死的时候都不敢跟你联系。”哥哥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后来姆妈死的前几天，一直喊你的名字。阿武啊，阿武，我册那，端屎端尿，伊喊了你两天才死的，我不服啊。”

徐星武来不及放下手里的两瓶酒，抱住了星汉，他太需要拥抱谁了。哥哥的眼睛也湿润了，之前的那种多年未见的距离感正在飞速缩小。他们如同未曾分别一般亲近，如同孩童一般感到纯粹的委屈，他们嚎哭起来。

“阿弟啊，你不容易啊，你苦啦。”星汉放声悲哭。

星汉一家和星武在八仙桌前坐下，他们几乎无法转身。

“叫叔叔，这是你叔叔。”星汉催促自己孩子。

“青海叔叔。”

“啧，叔叔就叔叔，什么青海叔叔，啊难听的啦。”

“蛮好，青海叔叔就青海叔叔。”徐星武拿出他在工厂车出来的一把驳壳枪给孩子。他又突然想起什么来似的。

“嫂子，这是开火仓的钱。”

“不要不要。”徐星汉坚决地往回挡。

嫂子接过钱一点：“你这是要待多久？”

“两周，来回路上还要两周呢。”

“两周哪要这许多钱？！”嫂子拆出几张。

“给你你就收着！”徐星汉使个眼色。

嫂子看看桌上几碟小菜，让人不敢动筷，便重新系上围裙出去了。

“炒两个荤菜来！”徐星汉冲着嫂子的背影喊，他继而又降低了声音嘀咕道。“各个女人，拎不清的。”

徐星汉浑身湿黏地躺在席子上，这就是他熟悉的夏天，屋里屋外一样热，甚至白天和黑夜都一样热的夏天。蚊帐随着偶然的微风抖动一下，侄子在他身边平静地躺着。他本是要和徐星汉睡的，无奈那张床一男一女睡正合适，两个男的就躺不下了。这两张床成直角头挨头地摆放着，下床就是餐桌，十步能从床上走到走廊里。但即使如此徐星汉也依旧感到幸福，充实，他享受着每一秒，迟迟不愿睡去。

徐星武不知疲倦地在上海的街头游荡，从南到北，他大步流星地跟在匆忙的人流之间仿佛自己也和他们一样有明确的去处。他远远地看见似乎是马晓军的背影，正要去喊他，马路对面来了一队年轻人冲马晓军呼喊，马晓军没听见，他们便反复呼喊。徐星武愣了。

来的人都年轻都俊美，与马晓军一样的时髦和自信，他们谁的眼神都不避讳，不像徐星武，他几乎不和别人对视，而且他随身揣着临时户口，准备接受任何人的检查。他有些不知所措，连忙向后转身，匆匆离开这条路。

那些零零碎碎的记忆扑面而来。高考前，他大病一场，是马晓军架着他去的考场。他昏头昏脑地答完卷子，甚至不确定自己答完没有，考试就结束了。而后是漫长的等待，身边人纷纷拿到录取通知。他每天步行三次去邮局查看有无自己的信件，马晓军一直陪着，他看上去比徐星武还难受，然而终究是音信全无。他终于是站在了上海阔大的十字路口上，犹豫又困惑，不能像之前那样精神百倍地疾行。

徐星武将侄子架在自己脖子上，在弄堂里到处奔跑。

侄子问他：喀日县阿有公共汽车？

徐星武答：有的。

侄子问：有自来水吗？

回答自然也是有的，侄子继而问那么电呢？那里的人是不是吃得饱？是不是住在山洞里？总之他将一切大人不敢问的话统统抛向徐星武，他并不恼，一一作答。

侄子已百无聊赖，索性问：那么喀日县有太阳吗？

徐星武愣了一下告诉侄子：太阳是没有的，黑极了。

侄子便大笑：哈哈哈，没有太阳，痴子讲话吗？

火车即将驶离车站，徐星武面前的窗户不断地爬进人来，火车缓缓行动，站台上乱成一片。他看到马晓军最终还是来了，他在站台上焦急地环顾。徐星武突然喉头干痒了，他不知到自己该不该叫他。他最终还是没忍住，他深吸一口气，大喊。“徐星武！”马晓军听见了，开始疑惑地环顾。他最终发现了徐星武。徐星武继而向他呼喊：“徐星武！你好好的。”

列车开始加速，马晓军也没有追，他又咧着嘴哭了。这个鼻涕包，回回都是他先委屈起来，让人不好责怪，徐星武很无奈，那天他听见马晓军被同学们叫作徐星武来着。他也明白了，自己当年考上了，是马晓军顶替了他。

“这个安眠药可厉害，你要临睡前，躺在床上吃。吃完就尽量不要再起来了，我怕你摔跤。”医生这样告诉徐星武，“看你也不是个小同志了，有什么事情能想不开呢，还要吃药。多结合运动，就能睡着了。”

徐星武连连称是，拿着药退出了房门。他在走廊里看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

“张敏美同志。”徐星武记得她。

“徐工。”

徐星武看着张敏美手腕上缠着的纱布有些不自在，而她却坦荡得很，她看了看徐星武手里的药，立刻明白了他的计划。

“要不，咱们再试试，再凑活两年？”

“怎么个凑活两年？”

“买床红被子，结婚吧”

徐星武乐了，他觉得张敏美可是大不同了。

“你变了，我觉得，是泼辣了些。”

“阿滑稽？石头不变。”

他们彼此注视着，在对方的眼睛里依稀找到自己。

这些年，日子过得又快又慢，长的时候觉得一天都过不下去，死了都行。短的时候一眨眼，已经是今天走廊里碰头的局面。

说不得，说不得，万户萧疏鬼唱歌。

徐星武站在空荡雄伟的广场上。他退休有一阵了，搬去了州府，这里修了巨大的广场，据说比北京的那个还要大出许多倍，在戈壁城市独有的毒辣阳光反射下，很难睁开眼睛。人们像牛羊散落在群山上一样，散落在广场上，什么也不做，动也不动，直到穷极无聊，才转向别处。喀日县已经荒废了，当年拼死拼活建立起来厂子，镇子，都荒了，废墟成了进藏的探险热土。徐星武总在手机上看见，他最腻歪这个，一个年轻人大呼小叫，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大呼有鬼屁滚尿流，他容不得别人这样妖魔化他熟悉的厂镇，他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可怕的。

张敏美的遗像悬在客厅的餐桌上，她倒好了，肺癌了，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厂里很多人得这病，属她自在，回光反照那天，不光自己穿戴了，还哼了几句，什么猛听得金鼓响，什么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新来的家属直问她是要出院啦？

徐星武自觉不如她，差远了，还是舍不得死。活着好，新鲜东西这么多，原来哪敢想。他在短视频软件上跟着一个老师学呼麦，这是他从“附近的人”里发现的，总也学不会，那老师普通话一般，唱得好但是说不清，而且蒙古观众一多他索性开蒙语了，他已经跟着学了半年有余，仍然不得要领。

这天他还是照样打开视频，还是那一套，沉下气，锁一点喉咙但不锁死，放松舌头，顶住上颚，通常是没有用的，他自己干呕似地弄出点噪音来，就笑场了。但是今天不一样，他觉得喉头一痒，舌头也自然地震颤起来。徐星武唱出了一个音，毫不婉转没有修饰，但是确确实实是呼麦。两个声音各自蔓延开去，原始庄重，徐星武想起很多瞬间，他第一次在弄堂里大撒把，他第一次在翻过日月山的瞬间见到雪原。他手忙脚乱地试图打开录音。但是太激动了，到处都没有看见图标。他在不间断的呼喊与紧张中，感到眩晕，最终栽倒在地。

戈壁城市毒烈的日光照在他的身上，白亮，明黄，到红金。他都没有起，静静地，臃肿地，躺在那里。



慢先生

男，90年生人，于2014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多见于网络，多为短篇小说。

小说家

这里是华语作家的首发原创小说。我们尽力挑选出最好的作者，也等待最好的读者。



图片来自 [Vincent van Zalinge](#) on Unsplash

## 小说

# 卖燕子的人

顾湘 | 小说家

「你家燕子开了吗？」

春天里的一天，我听见外面响起一种音乐声，就像垃圾车或雪糕车或洒水车会放的那种音乐，是一支很熟悉的曲子，它好像停在外面了，一直唱着。我就到阳台上去看是什么车，结果也没有看到垃圾车或雪糕车或洒水车，是有一辆小车，像是一个货郎在卖东西。好多邻居在那里，有猫的女人也去了。于是我也下了楼，去看那是什么。

“卖燕子。”一个邻居跟我说。

“啊，买燕子干什么啊。”我问。

“吃蚊子啊，”邻居说，“我们每年都买几只。”

小货车上放着一扎一扎捆起来的黑乎乎的东西，还有一点儿白霜，有点像干海带、海藻之类的东西，又像锡箔元宝叠在一起，不过是黑色的。

我看大家都买了。卖甘蔗的车来的时候，大家也都会买甘蔗。卖杂货的小推车来的时候，大家也会纷纷买点纽扣、橡皮筋、练习簿之类的东西。

我凑到跟前问：“这是燕子啊？”

“对啊。”卖燕子的人说。

“这买回去怎么用啊？”我问。

“挂在屋檐下面，它吸了空气里的潮气就会变成燕子了。”旁边的热心邻居对我说。

我听见了“十块钱一个，十五块钱两个”。我对卖燕子的人说：“十五块钱两个对吗？”他说对。我就用手机扫了他的付款码，付了十五元。他正好散的都卖完了，又拆了一捆，从那些叠在一起的燕子里拿出两个给我。

“你要给它弄个细绳子，挂起来。”邻居对我说。

我仔细一看，从那扁扁黑黑干干的东西上可以用指甲掀起来两条东西，像掀干紫菜那样，弯一弯就可以勾在什么地方。我把它们挂在阳台上。

今年雨下得特别多，每天都在下雨，还很大，到处都传来了洪水的消息。我时常到阳台上去看燕子，它没过几天就有点儿鼓起来了，两片黑色的像花萼似的东西微微并拢，露出里面缩着一个浅色的芯子，再往后皱缩的花萼舒展开来，芯子长成一个

花苞那样的东西，上端露出了一点红色。偶尔不下雨的时候，我到外面散步，也会留意别人屋檐下的燕子，碰到邻居，就问：“你家燕子开了吗？”“快了，今年燕子开起来快了。”邻居说。“一个燕子能用多久啊？”我又问，“能用一个夏天吗？”“一般到秋天就谢掉了，”邻居说，“还会有人来收的。你丢掉也可以，收也没两块。”“收去做啥呀？”我问。“大概做药吧，我也搞不清楚。”邻居说。

我想，这里的人春天时买燕子，就像有些人春节的时候会买几个水仙花头回家养起来一样。

有天我的燕子开了，它们叽叽叫着，撑开了翅膀，翅膀下面一道道褶子像折扇子一样，怪好看的。飞出去的时候，我有点儿担心会不回来。但是它们过一会儿就回来了，用爪子抓住晾衣绳，倒吊着休息、聊天。我听不懂它们聊什么，但也为燕子开了而感到高兴，还对着它们拍了好几张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

每天我看着我的燕子，都感到很高兴，蚊子好像也确实少了。我还想再买两只。我问邻居：“卖燕子的人还会来吗？”邻居说：“这讲不定呢。有可能来，有可能不来。”卖瓜的人也是，爆米花的人也是，这些人都是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来的，所以他们来的时候，这里的人都很高兴似的，都会围上去买一点儿。爆米花的人来的时候，大家都从家里拿出玉米粒和米去请他爆，空地上“膨”啊“膨”啊地响了一下午，空中一直充满了甜香，像过节一样。

过了些天，好不容易有一天当中雨少许停了一歇，那个音乐声又来了，我跑下楼又买了两个燕子。

这次的燕子长得比之前的还快，但是花萼伸出来以后，怎么里面好像也是黑黑的。最后，竟然长成了全身黑乎乎、长着毛的东西。

混蛋，这不是蝙蝠吗？买的时候那一坨就有点儿像茶饼。“你是沐阳来的吗？”心里对着卖燕子的人说。听说从沐阳卖出来、说好是什么的花籽和花苗，结果总是开出莫名其妙、完全不对的花来。

卖燕子的人又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去责怪他：“你第二次卖给我的是蝙蝠啊！”可是他坚持说，那是因为今年的雨下得实在太多了，所以他的燕子有点儿发霉而已。“米也发霉了，被子也馊了，太多雨了啊。发霉了，但也是燕子啊。”说着，他还塞给我



绘 / 顾湘

一个小小的黑色圆球，说是蝉：“给你个这个拿去听！天热了就开了！”

明明是蝙蝠。这个奸滑的人。我心想，扔掉了那个蝉球。万一长出来不是蝉呢！

不过蝙蝠也吃蚊子。也吱吱叫。我听不出来和燕子有什么区别。自从有了燕子，又有了蝙蝠，我每天都睡得很安稳，没有蚊子来打扰，听到它们吱吱叫，我也分不出来有什么区别，谁是谁，是白天还是晚上。



绘 / 顾湘

### 留下的狗

很多人走的时候，都留下了狗。“都不容易，”狗说，表示谅解。它们说完全这一句之后，通常就闭嘴不再说什么了，然后做出不怎么在意的样子。看着它们的眼睛，你能看到它们就是那么善良、体贴、同情人。

这些狗们很守规矩，懂事，彬彬有礼，从不在夜里乱叫，不在硬地面上留下排泄物，不追逐野猫和同类，避让儿童和老人，绿灯时才过马路，堪称狗中楷模，使居民们没人想到要去向有关部门反映野狗的问题，仿佛下了决心，要努力留下来。白天它们很少在显眼的地方晃来晃去，就躺在绿化带的树篱后睡觉，它们就挨着树篱，躺在影子里，就像影子一样。正午，它们把身体抻到最长，变成尽可能细的一条，太阳渐渐下去，它们也慢慢放松开来；没影子的阴天，它们就是涣散的灰蒙蒙的一团。很多人甚至没发现这些狗的存在，他们走在路上，不会注意到天空、树和狗，对在眼前发生的事都熟视无睹，他们只能留意到跟自己最近接、有最直接联系的那些事，自打出生就是这样。

那些人离开以前，大家也没怎么见过他们，因为他们大都早出晚归，天黑的时候看不清他们的脸，分不出谁是谁。他们搬走的时候，你也分不出在搬东西的人，谁是他们，谁是帮忙的。

不过住在我隔壁院子里的青年搬家那天我在家，我站在阳台上，看见那些搬东西的人把电视啊洗衣机啊搬上卡车，但他们一个也不是住在我隔壁院子里的青年。我突然想：他在哪？他们不会是贼吧？

于是我下了楼，问他们这是要把东西搬去哪儿。

他们说，搬去他们自己家用，这是住在我隔壁院子里的青年卖给他们的，他把他所有东西都卖啦。

“啊，”我心想。“那他人呢？”

“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

这时候我看不见我家隔壁院子里有只狗，小小的黑狗。

原来他也是会把狗留下的人，我心想，从夜里橘黄色亮灯的窗口看他裸着上身刷牙的时候看不出来这种事。

我说：“这狗也是他的吗？也卖给你们了吗？”

他们说狗不是，他们没有买狗。

狗看看我。

我不知道住在我隔壁院子里的青年之前养狗。

不过我可不想养它，谁想平白无故添个这样的负累呢，“我不要狗，”我心里对狗说，“别看着我。”

狗转开了头。

后来，这只曾经住在我隔壁院子里的青年之狗也加入了白天在绿化带的树篱阴影里睡觉的行列，它也很守规矩，懂事，彬彬有礼，不在夜里乱叫，不在硬地面上留下排泄物，不追逐野猫和同类，避让儿童和老人，绿灯时才过马路。夜里，我看不见黑洞洞的绿化带树林里草地上有星星点点的光亮，我走下路肩，跨进绿化带，看见那是狗们在绿化带的草地上看手机，看短视频、看电视剧、刷社交媒体、打游戏、搜索附近的狗，有时它们甚至会叫一份外卖，备注放在一个地方。我看不见曾经住在我隔壁院子里的青年之狗，在看脱口秀节目，它抬头看我，我想没错就是它，我看它正在看的脱口秀，那个说脱口秀的人跟曾经住在我隔壁院子里的青年好像有点像，好像又不是。它用狗的善良、体贴、同情人的眼睛看着我，好像说了一句“来当狗吗？”我没有听清楚，因为这时候一团蚊子在黑暗中朝我头脸团团围来，我双手往空中挥舞，驱赶它们，虽然我看不见它们。我来不及想什么，说：“哎呀蚊子好多”，忙不迭爬上路肩，回到路上，走回了家。



顾湘

有两个猫，一个美一个胖，著有《为不高兴的欢乐》《好小猫》《赵桥村》《在俄国》等。



图片来自 [zhang kaiyv](#) on Unsplash

小说  
张口结舌  
辽宁 | 小说家

从前她只是听说，  
现在她知道永别是怎么回事了。

傍晚，擎天柱死了，他的朋友们围在他身边，他艰难地说完几句话，胸前的灯就暗下来，变成两块死灰色的玻璃。只有等着电视台重播，他才能活过来。琳琳站在邻居家的窗外，看到这一幕，忍住泪水不让自己哭出来。隔壁是琳琳奶奶的家，电视里正在踢足球。

奶奶在厨房炒菜，油锅滋啦作响，厨房和客厅卧室之间隔着一条露天的过道，这条过道连接了十来户人家，西边的尽头有一棵粗大的槐树，是琳琳爷爷种下的槐树，那棵树长了三十多年，爷爷已经去世七年。因为是这一排的最后一户，槐树下天然就是自家的小院。琳琳搬起一个圆形粉色的塑料板凳，坐在树底下怔怔地发呆，鼻子酸堵。擎天柱。

奶奶用炒菜的铁铲刮擦锅底，一道菜完成的信号。琳琳站起来，去厨房门口等着，第一道热菜端了出来，蒜苔炒肉，是琳琳最爱吃的。她小心地端着热盘子，走到挂着帘子的门前——那门帘还是奶奶自己卷的。有段时间，整个大院都流行手工卷门帘，用曲别针、胶水和裁成小块的彩色挂历纸，卷成小而硬的纺锤形，首尾相连，几十年后琳琳还记得那个数字，一百八十，一百八十个曲别针的长度，刚好从门框垂到地面，每次有人出入，挑起来，它们就摇荡着发出清脆的响声。夏天，大门敞开，帘子放下来，内外影影绰绰。

此刻，门帘里头，解说员又一次兴奋地叫嚷，和着观众席上卷起的海啸般的轰鸣，他的声音又尖又快，像一支利箭，穿过五颜六色的门帘和树影斑驳的小院，刺进琳琳的耳朵。

“二比一！”解说员高喊着，夹杂着兴奋和紧张过后的释然，接着又回归正常的语气，和身边的同事谈论起这场比赛的精彩之处，总结球员的表现。琳琳拨开门帘，钻进屋里，把那盘菜小心地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球踢完了，该轮到她了。要看看还有什么好节目。

电视里闪现广告画面。室内残留着淡淡的烟味，玻璃茶几上的烟灰缸里有几截烟头，长条形的皮革沙发上，侧躺着一个人，脸朝着茶几，鼻息均匀，睡着了。

琳琳拿起包了一层透明塑料的遥控器，前前后后地跳台。擎天柱死了，说不定就是最后一集。她按下柔软的按键，体会到一种控制感，画面随着手指的动作不断变换，一下子欢快活泼，一下子沉郁悲凉，一下子庄严肃穆，一下子又娓娓道来，大部分

节目都没什么意思，枯燥无聊。琳琳觉得，擎天柱死后，生活顿时空虚了一大块，少了盼头。厨房那边，再次传来刮锅底的声响，第二个炒菜也出锅了。

琳琳的爸爸睡得很熟。昨天晚上他去邻居家喝了不少酒，深夜才回来。琳琳听见他拉开防震棚的门，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他们管与厨房相接的那间小屋叫“防震棚”，78年之后建起来的新房子。长大后的琳琳曾经仔细观察过这间小屋，发现它从结构和材料上都对应不上“防震”二字，但是叫法依然延续下来。

直到菜都摆上茶几，奶奶才对琳琳说：“去叫你爸爸。”琳琳走过去，轻轻地推他，闭着眼睛下面有明显的浮肿，嘴巴微张，琳琳叫了几声，他猛地张开双眼。

“该吃饭了。”琳琳说完，就去里屋的碗柜里拿碗筷。里屋放着一张双人床，琳琳跟着奶奶就睡在这儿，家里的水龙头装在靠窗的角落，紧挨着洗衣机和老式的立式冰箱。碗柜上挂着琳琳爷爷的黑白照片，寸头，面容严肃，几个儿女的长相都能在他脸上寻出痕迹，特别是那种不容分说的严厉目光，如出一辙。

到晚上，躺下了，琳琳爸爸还在看电视，光在门缝里闪烁，琳琳对奶奶抱怨说：“我爸爸要看球赛，跟我抢电视，结果他睡着了，根本就没看。今天是最后一集。”

“他昨天喝多了。”奶奶说。

琳琳翻身对着墙。奶奶也躺下了，悄声问：“你妈跟你爸还打架吗？”

“有时候打，有时候不打。”

“你妈脾气也不好。”

琳琳“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奶奶睡着了。平常她不会这么早睡，有两集电视剧是天天不落的，今天破了例。这是在暑假里，屋后是菜地，每家每户都分到一小块，蝈蝈有节奏地唱着，这声音在夏夜里本来是催人入眠的，今天琳琳却睡不着，她用指甲去抠墙上的绿漆，绿色涂到比床高一点的位置就停止了——是那个时代的装饰风格，墙漆只涂一半。上个学期，琳琳的新家装修好了，两屋一厅，琳琳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卫生间的瓷砖依然只贴一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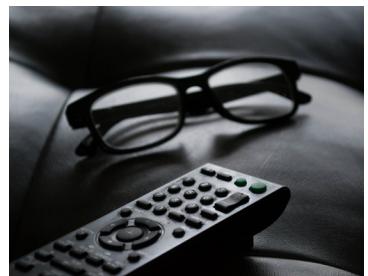
“搬了新家，你爸妈还打架吗？”奶奶问，琳琳说：“比以前少点。”八岁，她已经懂得含糊其辞，不太明白搬家和吵架之间有什么关联。

抠墙会上瘾。灰屑在黑暗中纷纷飘落，像下着一场微缩的雪。奶奶去世的那天，从火葬场回来，按照儿女们的主张，去世当天就匆匆火化了。琳琳坐在这张床上，看见当年小孩的手指抠出的小洞，圆圆的，白白的，内里还很光滑均匀。

与变形金刚有关的愤愤不平，很快就过去了。无论什么样的矛盾，比这激烈一万倍的冲突与争吵，不需要解释与道歉，最后总能平息，泪水被抹去或者风干，皮肤上的淤青褪去，不留下任何痕迹。琳琳一边抠着墙，一边朦胧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琳琳把院子里的落叶扫干净，扫帚靠在砖墙上，吃一块桃酥当早饭，桃酥是爸爸昨天买来的，还买了熏鸡和酱牛肉。防震棚的门紧紧关着，不到十点他不会起床。奶奶站在槐树底下，跟邻居聊着天，嚼别的邻居的舌根。这是老工厂的家属院，大家都互相熟识，各种家庭琐事像嚼不烂的口香糖一样说起来没完，琳琳知道，大家都是当面一套话，背后一套话。不过，嚼所有人的舌根，也就等于完全没嚼。

扫完院子，扫帚靠在砖墙上。琳琳进屋打开电视，一放假她就变成电视动物，从早看到晚，只要没有别人回来就行。无论是她爸爸，或者二叔，进了门就会拿起遥控器，接管电视机的使用权，不会跟琳琳打个招呼。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或者不自然，电视总得开着，总得有人看，总得换台。傍晚，琳琳气呼呼地挑开门帘，来到院子里，听见邻居家的电视声音，那家的孙子叫李子齐，跟她同岁，她就站在人家的窗前，悄悄地，隔着玻璃，看见擎天柱之死。



图片来自 [Steve Johnson](#) on Unsplash

她不能进去，是因为人家正在吃晚饭。一家人四五口，坐在电视机前，陪着李子齐看动画片。这个情景让琳琳有点羡慕，当时她并没意识到这种感觉就叫羡慕，从这种微末小事开始，她一点点地学会羡慕别人，一点点地建立观察的习惯，比较的习惯，这个我也有，那个我没有。渐渐地，没有的越来越多。

奶奶对现状很满意，她是从吃不饱的年代过来的人。现在，她有退休金，有医保，几个孩子都上班挣工资，以为晚年无忧。眼下，她要去大院外面看看卖菜的今天有什么菜，卖肉的来了没有。琳琳没跟着去，她想趁着爸爸起床之前，抱紧电视多看一会儿。

爸爸起来了，对着槐树下的月季花刷牙，漱口水吐在花根子底下，家里的每个人都这么干，那几棵月季生机勃勃，丝毫不受影响，夏天开得茂盛。后来，二叔把奶奶的那块菜地改成停车场，水泥富余了些，就把那一畦种花的土地也抹上水泥，花根子都埋在下头。奶奶坐在院子里瞧着，当时她已经不能走路，一句话也没说。

琳琳回来，咕哝了一句：“月季花多好，为什么填平了？”

奶奶说：“你二叔弄的水泥，富余了，没地方使。”

琳琳没再说什么，把买来的东西拿进厨房。她开的车也停在新修的停车场上。

所有频道转了一圈，回到最初，一个年轻的台湾歌手在台上又唱又跳，五六年后琳琳疯狂地、后知后觉地迷上他，现在她还觉得这歌舞太吵闹了，毫无意思，一门心思找动画片，西游记也行，总比没的看要强。

防震棚的门被推开了，哐啷哐啷，多年后犹有余音。有些东西回荡着，徘徊着，就是不走。琳琳发现，记忆中某个时刻会被拉长，绵延到无限，某个时刻又会塌缩成黑洞，像墙上那个用指甲挖出来的圆坑，永远填不回来。

接着，门帘被挑开了，爸爸走进来，遥控器不在茶几上，不在沙发上，不在电视柜上。“遥控器呢？”在琳琳手里，握着，放在双腿上。

“给我。”爸爸说，探身过来取，来不及等琳琳递给他，就拿过去了，这动作像是硬抢，这态度又像是理所应当。

“我在看呢。”

“西游记，看多少遍了。”一边说，一边调台，爸爸的头发支楞着，光着上半身，穿着短裤和拖鞋。

“我想看！”琳琳毫无道理地叫起来，“你给我换回来！”

“出去！”爸爸的声调高起来，“出去待着！”喊完这一句，嘴唇继续滚动着，琳琳猜那是脏话。

琳琳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忽然又转过身，拿起刚放在茶几上的遥控器，死命按了几下，爸爸走过来，劈手夺去，挨没挨打，她不记得了，大人的影子罩过头顶，又缩回去，爸爸再次稳稳地坐回沙发上，电视遥控器握在他手里。琳琳转身，用力地挑开门帘，挂历纸卷成的几千个小纺锤砸在木门上，发出巨响。琳琳走出院子，下台阶。奶奶在院子里择韭菜，一根一根抽出来，去掉根部的浮土，掐掉尖上的黄叶，她戴着老花镜，也许没戴，记不清了。槐树叶零零星星地掉落，奶奶说：“过来跟我择韭菜。”琳琳脸上有泪，想说什么，舌头却是僵的，转不起来，说不出话，憋了几秒钟，随后那句话就被吞下去，舌头放松下来。她搬过板凳，坐下，这一坐就是二十年滑过去了。她抱怨一句月季花的事，就把买来的蔬菜、肉和水果拿进厨房，她爸爸依旧横躺在沙发上，奶奶坐在旁边的一只旧木椅上，靠着暖气，烘着僵直的腿，一动不动，仿佛一座石像。电视机声音开得很大，伦敦奥运会的篮球比赛回放。

“让我奶奶看会儿吧。”琳琳说。

“我不看。现在的电视没什么好看的。”奶奶说。她爸爸只扭头看了她一眼，一言不发。琳琳每周都回来看望他们。父亲失业多年，奶奶有退休金，需要人照顾，母子俩就凑在一起住。去年，她父母刚办完离婚手续，爸爸就搬过来，把原来的保姆辞掉了，保姆在这里干了两年，早就想走，琳琳苦留不住，工资涨过两次，再高她也给不起了。为难之际，爸爸搬回来住，就把保姆的工资付给他，他推辞一次，就收下了。

这笔钱，说是给爸爸的赡养费也好，替奶奶出的保姆工资也好，反正两个人一起花。起初琳琳觉得这个安排很好，各得其所，反正房子判给妈妈，他正没地方住。对奶奶呢，亲儿子来照顾，再怎么样也强过外人。琳琳跟奶奶这么说，奶奶也点头同意，她对原来的保姆并不满意，嫌做饭不好吃，面食都不会做。

“你爸做饭比她强。”奶奶说，“他也没地方去。唉，真是，你们家的房子还是你爸单位分的呢，让你妈占了去。”

这里头的事，琳琳不想跟奶奶多说。这些年她爸爸每况愈下，他这个年龄的人，没工作往往是时代的原因，光荣下岗，偏他不是，他自己提的离职，单位的同事当时苦劝不住，不让他走，他不听，非要辞职下海。谁知那不是海，是没放水的游泳池，磕得头破血流。赔了几次之后，妈妈不肯再拿钱给他，说我们娘儿俩还要过日子，再逼问，就吵起来，打起来了。

跟他商量着一起做石油生意的，是几个东北人，东北虎，琳琳经常听见爸爸提到这个外号，妈妈半信半疑地看着他，反正到最后也是没钱，没钱给他，存款都是定期的，拿不出来，两个人吵架都是为了钱，一个想要，一个死守，有一次爸爸说，哪儿有

男人出去创业，投点资，不给钱的？琳琳不说话，在家她总是沉默，父母都想不到琳琳长大之后居然去做记者，这孩子说话还闹结巴呢。

在父母和亲戚的中间，结巴不是需要关注的病症，而是一道景观。琳琳记得，总有人说这件事，维妙维肖地模仿她，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当时只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的丑，被人捏住了，只能怪自己。

长大后，琳琳上网搜索过这种阶段性的、童年期的口吃，有时候很久不发作，有时候一天发生好几次，前一句话还很流利，后一句话就噎在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好像点了暂停键，周围的一切还在清晰地流动，电视声、脚步声、油锅下菜的爆响，树上的蝉鸣，门帘的搅动，只有她身上的时间不再流动，卡在那个说不出来的字眼上，心里扑腾扑腾地，像有只不驯服的鸟在挣扎着撞笼子，突然间，鸟儿冲了出来，接下来的一串像连珠炮密集地发射，既畅快，又挫败，一句话说完，背上毛毛地一层凉汗。跟她聊天的人，转眼就在饭桌上议论，琳琳这个结巴呀……

她在各个网络链接之间跳来跳去，自己诊断自己，口吃、家庭问题、压抑、失调，这个毛病早已好了，但是琳琳很想知道病因，直到现在还有人议论，琳琳小时候是个结巴，没想到她能当记者。琳琳就低头吃菜。

她把买来的菜、肉放进厨房，另有一只厚纸袋，装着一件羽绒马甲，奶奶让买的，来暖气之前，屋里冷，她穿长袖毛衣很困难，伸胳膊吃力，马甲穿脱方便；靴子上次买的不合适，这次琳琳拿走去换，带拉链、带扣的都不行，只要一脚蹬。还有，家里没牛奶了，琳琳立刻到院里的小卖部去买。初冬的冷风吹得硬邦邦，琳琳把双手插进羽绒服的口袋里。奶奶死活不肯穿羽绒服，因为拉链也嫌麻烦，眼花看不清，两边对不上，还是系扣的棉衣好，要扣子又圆又大的那种。

琳琳想到一个问题，盘旋着没问出口，不是因为结巴，“这些小事，为什么不叫我爸爸帮忙？”

她提着一箱牛奶走回家，跟遇见的街坊邻居打招呼，笑咪咪地，好像一切都是老样子，但是她清楚地意识有些东西悄悄地改变，话语，神情，一句话也不说的死寂，冰冷的好像从不开火的厨房，冰箱里的冻肉塞得满满当当。听奶奶说，你爸要做肉，就炖一大锅，上顿吃，下顿吃，吃一个礼拜。

有一次跟琳琳说，别买青菜了，青菜都放烂了扔掉，白花钱。

琳琳就买胡萝卜、土豆和大白菜这些存得住的蔬菜。除了加班，她每个星期都来，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后备厢里放着食品和日常用品，有时候是洗发液，有时候是夏天用的蚊香和驱蚊水，奶奶让她买的。她知道院里的小商店有这些东西卖，而爸爸就待在家里。

牛奶放在沙发旁边的地面上，奶奶整天坐在一只旧单人沙发上，伸手就够得着，还有保质期很长的小面包或者饼干，早上奶奶就吃这些当早饭，很多年来的习惯，一天喝一盒牛奶。奶奶说，牛奶早就喝完了。上周琳琳加班没赶回来。

快十一点了，爸爸终于起了床。失业以来，他天天睡到快中午。琳琳在厨房做午饭，把电饭锅的盖子拿下来清洗，灶台先擦一遍，再淘米煮饭，她打算做三道菜。拿出酱油的时候，发现不对，只有黑沉沉的老抽，又去买了生抽。吃饭的时候奶奶说，我还纳闷炒出来的菜怎么老是糊苦糊苦的。

“老抽不能炒菜用。”琳琳说，“放一点菜就黑了。”

爸爸吃着饭，照例有一瓶二锅头在桌上，琳琳照例劝他少喝点，他也照例不听。奶奶正在看一出河北梆子，秦香莲一身孝衣，正凄凄惨惨，忽然画面一转，跳到一个围棋节目，有名的九段国手在讲解一场比赛，琳琳说：“啊，我奶奶没看完呢。”

爸爸没说话，奶奶说：“我不看了。”

琳琳觉得，得找个时间跟爸爸谈谈，让他知道他在这里是有工作的，照顾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很多事情，很多细节要注意。她把这些话在心里组织起来，排列组合，一会儿把指责放在最前面，一会儿又打算以温情动人。与小时候相比，她变得更会说话了，各色人等都能应付，会没话找话，假装谈得很热络，也会适时地截住对方的滔滔不绝，把话题引向她需要的方向。十几年来，她没有再犯过结巴。

饭吃完了，这局棋还没完。奶奶拄着助行器站起来，挪到里屋去睡午觉。琳琳替她关上门，对爸爸说：“让你来这儿是什么？要不你还是走吧，我们请保姆。”

完了，话一出口她就后悔，没打算争吵，但是情绪和话语就这么自然地，不由她掌控地冒了出来。假如心里有一把小火炖着恨意，是不可能散出甜香的。

爸爸还是看着电视里的棋盘，像没听见她说话。琳琳稳住自己，想了想，这沉默特别漫长，像犯结巴时，舌头僵住了，那个字就吐不出来，像熄了火的火车头，带着后面那一串车厢停在荒凉的夜半郊野，过去说不出的现在还是说不出。

缺少对话的习惯，她想，为什么她同陌生人可以相谈甚欢，面对自己的爸爸却结结巴巴呢，一结巴，就想掩饰，一掩饰，就忘了原本要说的话。后来，她终于想起来了，想起来也不必再说。

现在，聂卫平很少出来做节目了，也许是因为琳琳从来不开电视。清理爸爸的遗物时，她从防震棚的床底下翻出一箱子围棋杂志，多年的积攒，有一期封面是常昊，当时还是少年呢。她拿出几本，和别的几样遗物都放进一只尼龙袋，家里的衣柜里有一只牛皮纸盒，放着奶奶的一点遗物。现在，她需要摆上第二只纸盒，里面就装这些东西，除了杂志，还有一个核桃手串，一只假得不能再假的蓝宝石戒指。关于那戒指，她记得清楚，是一个朋友拿给他抵债的，据说欠了一万多块，还不起，爸爸带着两个朋友上门去找他，听说还动了手，最后要来这只戒指。他喜滋滋地拿给妈妈看，妈妈说是假货，也就骗你，便丢在一边，两人为此大吵一架，没多久就办好了离婚手续。

琳琳结婚的时候，爸爸非要把这戒指给她，说很值钱，商场里卖三万多，琳琳坚辞不受，说已经有戒指了。父女之间推来推去，奶奶坐在一旁笑着看。过后，她悄悄对琳琳说：“你爸想给你点东西，你应该拿着。”

“我知道，我不缺。”奶奶又笑，那两年，她的表情减少，笑容却比从前更多，一笑，额头上的皱纹就浅了，皮肤薄而光滑，反射着微微的光。琳琳说：“他在家，有事就找他，缺东西让他买，缺钱了跟我说，什么都指望我回来再办，我工作忙起来怎么办？”“唉，你爸身体也不好，你看他这些年……”

还有一件极其微小的事，琳琳说不出口，它就是生活中的一道细小褶皱，伸手抚也抚不平，不理会也没关系——遥控器，他总是拿着电视遥控器，从早到晚，看什么电视永远由他决定。

随着膝关节炎的加重，奶奶的世界缩回这两间小屋，院子都不去了。从前她还看书，现在戴着老花镜也看不清了，电视里播什么她就看什么，爸爸看什么她就跟着看什么，体育节目她一点不懂。

有一次，琳琳回来，发现电视坏了，屏幕闪着雪花，人影模模糊糊的，立刻开车去附近的县城里，买了新电视，下午就装好了，借机跟爸爸说：“别老占着电视，让我奶奶看看，她一天也没别的事做。”

“她什么也瞧不懂！”爸爸说，当着奶奶和装电视的师傅，琳琳觉得脸上像挨了一耳光。奶奶还是笑：“那些体育节目，我是看不懂。”

很久以后，琳琳有次听姑姑说：“那两年，你奶奶很怕你爸爸呢。”

“怕什么？”

“就这么说吧，”姑姑说，“你爸爸没打过你奶奶，没有明着骂过你奶奶。”

琳琳骤然嗅到一丝冷气，“当时，还是应该请保姆。你爸走之后，存折里有多少钱？你给他的钱都去哪儿了？”

琳琳摇头，随后说：“当初，让我爸回去照顾奶奶，你们都同意的呀。”

“你出的主意嘛。”姑姑笑道，“你出的这个好主意，你爸没地方住，你奶奶没人照顾，这不两全其美？”

琳琳竟无话可说。回想起来，并不是她要求爸爸去照顾奶奶，而是离婚后，他就搬去了奶奶家，没多久，保姆大姐就提出要走，琳琳怀疑有别的原因。后来才知道，他回来之后，奶奶让保姆睡在外屋的沙发上，把防震棚给了爸爸，人家不愿意长年睡沙发，抱怨几句，奶奶就跟她吵起来了。

“有什么办法，她的亲儿子，她就受着呗。”姑姑说，因为奶奶偏心儿子，她经常说着说着就忿忿不平起来，即便人都死了这么些年。

琳琳猛地意识到，这个故事绝不应该从孙女的视角来讲，她把它变成了一个令人愤怒的不孝子的故事，而这个家庭的图景，从奶奶的视角望去，也许有着迥异的面貌。奶奶曾经对琳琳说：“我跟你爸也说了，将来我死了，他就接着住这屋子。这是公房，不用交回厂里。”

琳琳不想听见“死”字，要去哄她，奶奶却少见地不开玩笑，当一件正经事说，这个家里很少进行有用而认真的谈话，有什么事一两句话就含混带过去了，聊天说的全是别人家的八卦，眼前的问题一个字不提。

“先让他好好照顾您。”琳琳说，“他还拿工资呢。”

“他身体也不好。”

琳琳发现，她理想的母慈子孝的图景总也实现不了，就像爸爸当年说要下海做生意，那些豪言壮语也实现不了一样。他的计划总是在变，餐馆、超市、游艺厅、麻将室、老虎机，这些街面上常见的地方，跟他这个人联系不起来，她想像不出爸爸当个老板的样子。那些想法停留在口头上、酒桌上、电话里，斗志满满，得意洋洋，好像宏图伟业没开始就已经完成。前些年，他对奶奶说的那些话，吹的牛皮，琳琳听见都替他脸红，好像羞耻心全部遗传给女儿，自己一点没留。

有一次，妈妈对他说：“你不如去找个看大门的工作，一个月也有一千多块钱。”他大怒不止，在家摔了两个玻璃杯，出门扬长而去，随后赌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来。然后，海鲜超市又变成游艺厅，说来说去，还是要钱。

奶奶问琳琳：“听说你爸要创业，你妈不肯给他钱？他们俩还打架吗？”

琳琳摇头不知，装傻习惯了，好像一切都无所谓，爱怎么闹怎么闹去，奶奶说：“唉，我还能活几年呢。”

之后，她又活了好几年，最后两年多跟爸爸生活一起，她叹的气更深、更长了。琳琳想过在奶奶睡觉的那间屋子，想办法拉线过来，墙上再装一个电视，奶奶也同意了，爸爸在一旁听见，说：“再装个电视，你奶奶就连里屋都不出来了，人一点儿运动没有，那可不成。”

琳琳不理他，坚持要买，过两天奶奶打电话给她，让她别买了，又是那句话：“别瞎花钱了，我还活几天呢。”

琳琳又打电话给爸爸，他含糊地说：“你奶奶自个儿不想要了。”

当然可以不理他们，直接安装就行，可是她没这么干。很多次，她坚持一下，就有另一个较好的结果，最后都退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琳琳想，算了吧。

唯一的电视遥控器永远拿在爸爸手里，声音和画面填满他的眼睛、耳朵以至整个大脑，仿佛遥控器成了他的身体器官，手边常摆着一小杯白酒，有菜要喝酒，没菜也要喝。

奶奶就枯坐一旁，没事可做，过了一天又一天。自从那次电视没买成，琳琳莫名其妙得灰心，想说的话，时常到嘴边又咽下去，好像不合时宜，琳琳的叔叔姑姑们都认为这安排挺合理，两个人各取所需，亲母子住在一起，再合适不过了。琳琳有次跟二叔打电话抱怨，说爸爸太懒了，奶奶有事总叫不动他，二叔说了一句至理名言：记住，永远不要说老人身边照顾的人不好。

放下电话，琳琳想，没人想给自己添麻烦，甚至连她自己也觉得这样凑合下去也行，不就是不能看喜欢的电视节目，怎样呢？一周的剩饭也吃不死人。隐隐约约地，她觉得这些细小的问题昭示着某种可怕的将来，以小见大，可想而知。除了担心，她更害怕那些未知的影子。有时候，正端着碗吃饭，米粒咀嚼出甜味，就突然想起一些曾经发现却忽略的细节。

琳琳每次回去，都帮奶奶洗澡，用一条搓澡巾擦遍她的全身。奶奶扶着卫生间的水池，或者坐在马桶上，湿淋淋的，水汽蒸腾，奶奶低着头，琳琳从她的脖子开始向下，到背，到腰，然后回到肩头，再顺着胳膊向下，胳膊上有一块青，琳琳问：“哪儿磕的？”“那天夜里，从床上掉下来，在地上躺了半宿。”

“怎么不叫我爹！”

“他睡在外头，听不见啊。”

“那就让他在这儿睡，放一张行军床，夜里有事好叫他起来。”

“算啦。”奶奶说，“他身体也不好。”

奶奶去世后，琳琳觉得她睡了半辈子的那间屋子，余音绕梁，好像五十多年说过的话都在里面挤压着，堆叠着，吵闹着，最后化为一片无声的混沌，言语腐败成泥。琳琳坐在床沿，望着空空的枕头，枕巾倒是一块清洁干爽的毛巾，像是新换的，揭开枕巾，底下的白地绣花的枕套一片漆黑，很久没洗过了。奶奶是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琳琳忍不住哭起来。

奶奶去世那天，爸爸发短信给她，说你奶奶咽气了。当时她正在开例会，手机调成静音，偏偏那天领导的废话特别多，东拉西扯，她习惯性地走神，望着会议室窗外两棵光秃秃的大杨树，一夜北风过后，早晨的天空是少见的碧蓝清透，阳光暗淡，带来一层轻薄的温暖，杨树枝上跳着几只麻雀。同事们忽然哄笑起来，琳琳没听清领导说了什么，他讲的笑话一向很拙劣。

散会之后——琳琳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所有细节，散会之后，她捧着保温杯去茶水间接热水，翻翻手机，在两三条广告信息之后，看见爸爸发的短信，竟然就这样通知了她。

立刻打电话，座机没人接，又打爸爸的手机，姑姑的手机，打了一圈，最后二叔接了，说他正要去买寿衣，开着车呢，不方便说话。琳琳又给爸爸打，这次他接听了，说话的速度非常快，平常他说话不是这么快的，甚至因为喝酒，总是有点大舌头。那天他说话得非常多，每一句都流利清楚，明白晓畅，不像平常的他。

“早上我起来，”他开始了，“看看表，六点十分。你奶奶那屋没动静，我就上厨房，把昨天剩的小米粥坐在火上，再煮俩鸡蛋，早上老太太要喝牛奶，我拿那个小奶锅，还是琳琳小时候喝奶，用的那个长把儿小奶锅，也给她热一碗。”

撒谎，琳琳想。纸盒装的牛奶，奶奶喜欢用吸管喝。虽然年纪大了，她并不爱喝热牛奶。继续听他说。

“牛奶热完了，吃的都摆上桌，叫老太太起床。门外叫两声，没答应，我就推门进去，一看床上没人，在地上躺着。被子在身上裹着，脸就朝下。又叫两声，还不答应。我一摸，已经没气了。”

“没叫大夫吗？”

“叫了。卫生室的刘大夫来了。”琳琳知道那位退休的刘大夫，在厂里的卫生室干了

一辈子，琳琳小时候，找他打过白喉疫苗。

“他都多大岁数了？”

“多大岁数也是大夫。”爸爸有些不耐烦，“刘大夫来了，说人不行了，我就找居委会开了死亡证明。”

“奶奶还在地上？”

“我跟刘大夫一起搭上床的，他还帮我把防震棚的门板卸下来。”

琳琳才知道过世的人要躺在门板上，等殡仪馆的车来。她开车赶回家，闻了所有红灯，和买寿衣的二叔同时进门，见到奶奶，一起帮奶奶换了寿衣。

又看见胳膊上的淤青。

琳琳说：“这不是她第一次摔下来了。你们看这块青。”她指给二叔和爸爸看，告诉他们洗澡时的发现。

“嘿，她老想自杀！”爸爸说。

琳琳震惊地看着爸爸，没想到他会这么说。寿衣换好了，是奶奶最不喜欢的大红色，琳琳低声说：“她喜欢蓝色，硫酸铜的那种蓝。”死者的两个儿子已经出去了，外面来了人，是听见消息的街坊邻居。

琳琳坐在沙发上，那条走形的旧门板搭在沙发和茶几之间，奶奶的头朝着门口，一块黄布覆着脸。揭开布，皱缩的皮肤依然柔软，甚至有几分温暖，这是余温吗？她摸着奶奶的脸。爸爸说，她想自杀。

原来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明白。

接下来，琳琳作出了这辈子最叛逆的事，她拿出手机，拨120，接线员再三确认情况，“是说人已经死了吗？”

“他们说是死了。我觉得人还有温度。”

挂断电话之后，她看见院子里抽着烟聊天的几个人，阳光透过树枝落在他们的头、脸颊、肩膀，光影驳杂散碎。消息送出去，一会儿就会源源不断地有人来，到时候，琳琳想着，我要当着这些街坊邻居的面，把话问清楚。

然而，殡仪馆的车先到了，比急救车来得快。琳琳看着他们把奶奶装进纸棺，门板被立起来靠在外墙上。那纸棺一头大一头小，窄得不像能睡下一个人，可她不仅睡下了，身子两边还堆了许多红黄色的碎纸条，黄绸布衬着一张不动不动的睡脸。琳琳又打电话给急救中心，车已经派出来了，转到司机的手机，告诉他，人马上要送到火葬场去，司机在那头，像没听懂：“火葬场？”

“对，火葬场。”

“你让我开着急救车去火葬场，是这个意思吗？”

“是，”琳琳说，“麻烦您快点来。”她有预感，任何仪式和流程都不会有的，他们只想快点了结此事。

对方挂断了电话，琳琳跟着上了灵车。两个姑姑只到了一个，另一个直接去火葬场跟大家会合。这辆车后面的座椅都拆掉了，装了两排长凳，琳琳和她二叔对坐着，小姑娘和二婶也坐在琳琳的对面。琳琳的目光从他们脸上扫来扫去，试图看出一点端倪，关于奶奶，关于自杀。

其实他们是什么都明白的，琳琳想。“永远不要说老人身边的人不好。”二叔耐心地开导琳琳，“再不好，也是亲儿子嘛。”

纸棺就放在两条凳子的中间，随着汽车行驶，微微地摇晃。

车厢里一片沉寂。谁也不看琳琳的眼睛，琳琳再一次说：“这寿衣颜色不好，我奶奶喜欢蓝色。”可是，她想说的并不是这句。

“寿衣都是这个色。”二叔说。“这套两千多呢。”

琳琳不说话了。爸爸坐在前头副驾驶的位子上，手伸出去，向外洒白色纸钱。

过了半晌，车子拐了个弯，棺材稍微跟着滑动了一下，二婶低低地叫了一声，伸手去扶棺材的一角，带着哭音说：“妈，妈，没事，车拐弯呢，马上就到。”

琳琳又把他们挨个看了一遍，缓慢滞涩的目光，好像用的是奶奶的眼睛，她不敢出声了，怕一出声就是衰老嘶哑的嗓音。抛出去的白纸钱随风飘舞，像一群翩然的鸽子，从车窗外飞过。

到了地方，车停下来，殡仪馆有人来接。琳琳糊里糊涂地跟着下了车，下一个镜头就到了火葬场的等候区，中间剪去了多少画面浑然记不清了，关于那天的记忆是一段一段的，一些声音，几个画面，几张人脸。

有那么一刻她以为人已经送去烧了，看见一个红灯亮起，迷迷糊糊地就要迎过去，被姑姑一把拉住，说：“不是你奶奶！”果然，另一群人走上前，抱遗像的女人被周围的人搀扶着，哀哀地哭不出声。黑相框里是个十几岁的男孩。

“黄泉路上无老少呀。”二叔说，他坐在椅子上，探身向前，点起一支烟。这儿不许抽烟。爸爸不见了。

琳琳茫然地站着，姑姑一直抽泣。手机响了，她接起来，对方说了几句才想起来，是急救车。

奇怪，一到这里，她就不再怀疑奶奶还活着。在那间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里，琳琳不相信奶奶就这么死了，但是在这儿，她又不能想象奶奶只是睡得太沉，假如人真的还在，那么眼前这个场景，将有另一番解释，异常可怕的解释。

她不敢多想，接着电话走出去，急救车停在台阶前，医生下了车，问人在哪里。

又卡住了，遥远而熟悉的张口结舌又回来了，话到嘴边说不出，嘴唇颤动，对方盯着她，“在里面！”终于进来了。医生随身带着一只手提箱，随她走上火葬场的高台阶。爸爸去办火化的手续，琳琳和医生找到了奶奶，二叔和姑姑也围过来了，没人责怪她。

纸缩的纸盖子打开，拉下黄色口袋的拉链，露出来的脸静静地被鲜艳的纸条簇拥着，不打算化妆了，也不做任何仪式，琳琳猜爸爸一定选择了价格最低的流程和最便宜的骨灰盒。在这件事情上，孙女没有发言权，甚至连她掏出钱包的空间也没有。个个都爱面子。

医生打开随身的箱子，拿出设备，一头挂在自己的耳朵上，解开大红色的寿衣，露出惨白的胸脯，那胸脯曾为所有的孩子哺乳，琳琳小时候也曾扑向她的怀中，此刻他们正在围观，琳琳屏住呼吸。

几个红色的圆片贴了上去，连着线，调换位置再听，再测，两三分钟过后，医生收起设备，竖起箱子咔嚓咔嚓扣好，说：“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老人已经走了。”

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二叔送医生出去，付了急救车的费用。几只手伸过来拿起棺材盖，琳琳说，等等，等等，让我再看一眼，手又纷纷缩了回去。待她看完，盖子徐徐落下。这下是永别了，琳琳痛哭出声。从前她只是听说，现在她知道永别是怎么回事了。

好像是忍了许多年的泪水，从擎天柱死掉的那一刻起，终于流了出来。她不知道这个又长又短的故事还有没有另一种讲法，有没有人愿意讲给她听。家人之间照例是不说实话的，有时候，借酒蒙了脸，有人在饭桌上指桑骂槐。有一次姑姑跟琳琳说，半是责备，半是安慰，其实，家里的好多事你不知道呀。

叫救护车去火葬场，闹给谁看。

琳琳挑开门帘，帘子拍在打开的门上，哗啦啦的脆响，摇动不止，她穿过槐树的荫凉，像从前和以后的无数次那样，经过那丛开得正艳的月季花，关于死亡的描述她只在童话书里看过，坏人死了，魔鬼死了，巫婆死了，令人快慰的完满结局，她还没见过别样的死亡。那个傍晚，擎天柱之死让琳琳体会到另一种死亡。她站在邻居的窗外，听不清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她很想知道那些遗言，那些说出来却没听见的话，一定是真心话，即使现在很容易就找到那一集，看一千遍，也补不回那一天的遗憾，种下一粒结结实巴的种子。后来，又一枚红灯亮起来，这次是了，她随着家人一道，朝终点走去。



辽京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著有小说集《新婚之夜》，长篇小说《晚婚》。



图片来自 [Markus Spiske](#) on Unsplash

## 小说

# 不是谁都适合在碰碰车上写《战争与和平》

彭浩翔 | 坏品味陈列室

张小姐，你知道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甚么吗？

张珏恩从来精于快问快答游戏，要是你问她喜欢山竹还是火龙果，她毫不犹疑就答红肉火龙果；问最喜欢城市，她会说翡冷翠（她不介意你追问，然后微笑解释，那是徐志摩给佛罗伦萨的旧译名，她觉得用翡冷翠这版本较贴近意大利文 Firenze 的发音）；即使你问最喜欢的床上体位，她都能大方告诉你你是背向男生的观音坐莲。这句以金色楷书体字样压印在信封上的问题，让珏恩感觉这信有点像她小时候替祖母从信箱拿到的《读者文摘》宣传信。

日后忆起此事，她觉得自己为何当时没兴趣去猜这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因为问题过于复杂，而是她根本没意识到，这信会对她往后人生竟有着如此颠覆，在拆开后再也无法回到原来面貌。但到底甚么才是原来面貌？珏恩自己也猜不透。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从电影学院毕业，到真正成为导演。

请容许我稍作介绍，我们是一个比电影更古老的行业，却和电影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类似。电影是创造人物，我们则负责清除。

恍如米开朗基罗在大理石上削去不属于戴维像的部分一样，我们削去不应该存活于世上的人类。大众对我们有着许多误解，当中有不少负面称谓，较普遍的，是杀手。

因为习惯保持低调，我们行业长期存在新人加盟上的青黄不接问题。毕竟杀手这工作（为方便理解，暂且先沿用这个世俗的普遍称呼），存在着招聘上的两难。任何新人都需透过实践来获得经验，从而渐趋成熟地掌握个中技巧。但杀手这工种，一旦执行多次，技巧确是成熟了，却也引来不必要的注目，让警方从先前累积的案件中跟上他们。结果一位经验丰富的雇员，反而容易成为组织的负累。

或许阁下曾被众多流行文化所误导，总认为有些专业杀手存在于社会暗角，不停杀戮又顺利脱身。但让我坦白告诉你，这只是极罕见之例子。据组织统计，雇员平均在执行超过四宗案件后，即使没被逮捕，但被盯上或通缉的机率，已超过百分之七十。

上世纪七十年代，组织中一位杰出领导人——罗便臣爵士（亲爱的，这当然是个化名，所以你可先停下不用 Google 了），提出一个极具前瞻性和划时代的构思。

他指出，我们需要的新手，必须具备执行复杂计划的组织力，面对危险的抗压力，事后能绝对保密。更重要的，是无犯罪纪录又有杀人决心。

而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正好符合上述条件。于是他说服了董事会，每年向各地不同电影学院导演系最优秀毕业生，发出宛如《教父》般让同学无法拒绝的条件：只要愿意为组织完成一次任务，我们将投资你的首部剧情长片。

为了表扬他为组织奠下了往后辉煌基业的贡献，董事会特别破例在罗便臣代号后加上了“爵士”之专称。

这是一个双赢方案，许多任务都被完美执行，其中过程之创意更让我们惊叹不已。但由于保密是通往成功的钥匙，因此我们不能跟你详细分享个中细节，但这美妙配对，为我们行业打开了一道意外的后门。组织投资的电影，不但在国际影展上屡夺奖项，亦深受观众爱戴，逐渐成为我们年度财政结算表上的一项重要收益。

今天很荣幸地告知，阁下已被选定为组织年度新导演扶持计划的对象。我们对阁下的能力充满信心，诚邀与阁下携手展开一段美妙的旅程，要是阁下与我们想法一致，烦请于四十八小时内，致电以下手机号码确认，从而展开更深入的细节讨论。

若阁下决定放弃此珍贵机会，我们将深表遗憾，同时亦能体谅，并希望阁下马上将此函件烧毁，切勿尝试联络警方或于社交媒体上公开此函。我们选定你，表示已对你有足够的观察和研究，你亦不会想惹上与我们有关的麻烦。

期待收到阁下联系，祝毕业作顺利。



《教父》电影剧照

珏恩在饭堂一口灌下整杯特浓咖啡，她需要心力去思索这会不会是某同学的恶作剧。

邀请函用上优质刚古纸印刷，纸和信封有一定厚度，无法从门缝塞进储物柜，即使有人勉强塞进去，信封肯定会被挤出皱痕或刮破，也该东歪西倒掉在柜里。但刚才打开储物柜，邀请函是丝毫无损，平稳地以竖立式搁在书本前面，意味着有人在这两个半小时电影欣赏课期间，潜进学院走廊，在不被其他同学发现下，用后备锁匙或开锁工具打开柜门放进去。

按推理电影的逻辑，莲莲最有犯案动机。因为在筹组毕业作品时，珏恩就夺走了她首选的摄影师阿辉，美术团队也有好几个是从她那组挖过来。

莲莲就是那种会在 B 级惊栗片中经常出现，但又活不过三十分钟的骚女生。虽然一开始从男生们私下流传中听到，有人在傍晚到教授房间交功课时，意外撞破莲莲在马教授的办公桌下。珏恩初时还不大相信，直至去年波兰电影学院来交流，教授选了莲莲在会上介绍自家学院作品时，她就难免有所动摇。

马教授会是这样的人吗？珏恩记得一年级时，自己还在图书馆里读完了马教授的影评结集，那时候珏恩就认定，他是众多老师中最懂电影的一位。

难道莲莲已经放弃了她原来那个结他手找母亲的故事，将毕业作改成一个作弄自己的仿纪录片？珏恩听同学说过，莲莲迷恋《死亡习作》(The Blair Witch Project) 和《午夜灵异录像》(Paranormal Activity) 这类仿纪录片，加上她一直看自己不顺眼，所以故意捉弄也不奇怪。

不过珏恩片刻又推翻了这可能。莲莲经常说想以毕业作品参加海外影展，所以该不会冒险以偷拍形式摄制，万一完成后自己不肯给她签授权书，那岂不全片主角都要打上马赛克？这等如放弃了参展机会啊。

难道这信是真的？

一想到这，珏恩的兴奋感盖过了怀疑与恐惧。正如邀请函所说，他们选定每年系中最优秀的学生，那意味着旁人也清楚，一九年的毕业导演系班上，自己是最出色的。其实珏恩对此素来颇有自信。论创意，十二个同学中，自问必在三甲之列，虽然同学间的亲和力，自问不及莲莲这种说话时经常拉长尾音的女孩，但毕竟自

己不是走那一路。珏恩心想，要是这么爱装模作样和拉关系，干吗不直接去念表演系？

下午的剪接课，珏恩完全听不进去，她一直挣扎着该如何处理。如果杀手集团真是存在，那是否意味着他们早已监控自己，甚至连手机也在监听？珏恩拿着夹了邀请函的笔记本溜出课堂，向马教授办公室走去。课堂还有四十五分钟，她本可等下课后才过去，但她想确定莲莲是坐在课堂中，而不是在教授桌下。

\*\*\*



《罗斯玛丽的婴儿》电影剧照

“许多年前就听过这传闻，没想到是真的哟。”马教授边说边仔细品味着邀请函。“有机会是摆乌龙吗？因为封面只写给张小姐，也可能是给张慧玲吧。”珏恩说。“信中说了给最优秀学生。我想，这个出错机会应该比较微。”马教授说着摆出一个上课时常展露的狡猾笑容。

珏恩低头，回避了教授的目光。她不知道他是真心话，还是故意在逗她高兴。她知道不少师妹视他为偶像，即使去年拿了康城最佳导演的张导回校作大师班时，也盛赞过去为同班同学的马教授是当年班上高材生，要不是选择了执教，肯定比自己更早拿到金棕榈。当时在台上的马教授，只是谦虚笑了一下响应。

“但你认为，他们所指的优秀，是否有艺术手法上的考虑呢？”

“你指哪方面？”马教授有点不明所意。

“譬喻说，他们选个像波兰斯基或 Paul Verhoeven 那一类，我还能理解，但万一那年优秀学生都像李安或小津安二郎，那该怎么办？他们虽然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但实际执行杀人时，节奏会不会慢了点？”

“小津我可不敢说，但李安也不见得一定慢啊，他也拍过武侠片和战争片，动作场面处理得很好。但我认为，你现在在无须纠缠于李安或小津安二郎是否适合，还是应该先聚焦在自己的问题上吧。”教授说着再次挤出那招牌笑容。

珏恩怀疑，难道教授在暗示自己该和他更进一步？万一他真的要求自己钻进办公桌下，那该怎么办？有女生朋友曾告诉珏恩，多吃菠萝的男人，精液会比较甜，抽烟就苦涩。根据对这个女生的认识。珏恩觉得可信，事关该是她第一身掌握的大数据。“怎么了？”马教授察觉她走了神。

“菠萝吃吗教授？”珏恩不单为自己在思考教授精液味道而感尴尬，更因自己竟想得太入神，冲口说了这句话而感到无地自容。珏恩骂自己是个白痴，这个蠢问题都害她血涌到头上，满脸通红了。她心里辩解，一定是因为邀请函的冲击，才让思绪如此混乱。

“干吗问这个？你喜欢吃？”

“我……OK 的。就想知道你喜欢吃哪种水果。”珏恩说着顾左右而言他。

“你是班上最有趣的女孩，我比较喜欢抽烟。”马教授说着，在桌上拿起香烟，然后用眼神示意，问珏恩是否介意。珏恩连忙摇摇头，伸手示意他可随便抽。于是马教授点起了一根烟。

“你打算怎样？”马教授呼出一口白烟之后问。

“总不能把它揉成一团掉进废纸回收箱吧？”珏恩终于调整好心情冷静下来。

“想过报警吗？当导演固然重要，但总不该排在人命之前吧？”

“报警有甚么证据呢？他们选了我，可能已在监听我手机，所以我把手机和背包都搁在课堂，才跑出来找你聊。电影都看过了，要是我去找警方，他们定要我打这电话，直接跟组织联络，结果风险都押到我身上。但明显它应该是一张太空电话卡，最后线索断了，警方无法界定是否恶作剧，没抓上任何人，我只会被遗弃。如果是假的，我就是自以为是的傻瓜，成为校内学生一代传一代的笑点；如果是真的，我就终身

惹上这组织，随时被报复，将来某天遇上个交通意外或被弄成自杀身亡。我真看不到该跑去找警方的理由。”珏恩说完才发现，自己回避了那个有关人命和当导演之间的排名问题。

“这些我从没想过，你倒分析得很仔细。”马教授说着调整了一下语气：“这样吧，一时间我也没答案，先让我好好想一下。但重要是你别仓卒去回那电话，反正还有两天。你可以晚一点到我家继续聊？你知道我家地址吗？”

“西贡蚝涌村对吧？上次大伙到你家玩，我也有来。”珏恩说。

“我记得。”教授再摆出那微笑。“今晚我们一起把所有可能性都想通透，才决定是否真打那电话。这事虽然吸引，但万一做错决定，恐怕要终生后悔啊。”

\*\*\*

珏恩跟男友说，晚上有个毕业作的制作会议，得推掉二人原定的约会。她选择独个儿在快餐店吃汉堡。

假设接受组织邀约，自己很可能在执行时需要马教授提供协助和掩护，甚至自己的首部剧情长片，他也能提供制作和创意上的意见，毕竟他是自己认识的人中，最了解电影的。记得教授曾在课堂上提过，要成为导演，就像攀登喜马拉雅山的探险家，



波兰版的《午夜牛郎》电影海报  
设计师：Waldemar Swierzy

必须有一定程度上的疯狂，才有胆量攻顶，但攻顶不是最艰难，真正困难是如何有命下山。够疯狂就能攻顶，但只有控制得了自己疯狂的人，才能安全下山。珏恩了解自己疯狂是够了，但还是得像所有攻顶的登山者一样，也得给自己找个可靠的雪巴人作挑夫才成。所以在去马教授住所之前，珏恩在便利店买了排口香糖放进背包。

马教授的独立村屋位于蚝涌村内最深的角落，但珏恩不想致电给教授问路，深怕会显得自己太急着过来，结果到达时已比约定时间晚了二十分钟。

“我都快要出村口找你了。”马教授开门给珏恩时说：“晚上好难找是吧？”

“跟上次来时有点不一样。”

“村屋就是麻烦，路灯不多。”马教授说着回到厨房。

珏恩在玄关脱掉凉鞋，走进屋内。教授家客厅比上次来时混乱了一点，书架塞满了各式小说和电影书籍，墙上挂着波兰版的《午夜牛郎》电影海报。

“我切了些水果。你吃过饭了吗？”马教授从厨房捧出水果盘。

“嗯，刚和朋友吃过了。你太太在吗？”虽然是明知故问，但珏恩还是想听一下当事人的自辩。

“我们刚才吃过饭，太太要出去买东西，不会太早回来了。”

珏恩终于明白，为甚么马教授没约她先吃晚饭调情，大概就是要先应酬打发太太。她知道一般会用“太太”这样第三身称呼自己妻子的男人，都不是甚么好东西，她父亲就是这一路。看着水果盘上那嫩黄的菠萝，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教授，有个问题，不知该不该问。”

“随便。”马教授呷了一口咖啡后想起说：“来，这是东帝汶的豆，我刚磨的，味特浓，先别加奶，尝尝看。”

“哦，好的，谢谢。”珏恩拿起杯子喝了口，苦涩，于是吞了吞口水，调整一下声线说：“我听到你最近在开发你自己的剧本，找了莲莲和 Jason 去帮忙。但下午你说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为甚么却不找我呢？”

“寇比力克说过，拍电影就像在碰碰车上创作《战争与和平》。你啊，当然有驾驭电影的能力，我一点也不怀疑，就像不用怀疑 Sony 公司会每隔几年就重启一遍《蜘蛛侠》电影一样……唔，这比喻好像有点不准确。但我想说的是，你能写自己的《战争与和平》，跟你配合别人去写人家的《战争与和平》是两件事。”马教授说。

“所以我不能配合别人？”珏恩十分怀疑，这是骗小女生的激将小把戏。  
“要怎么说呢？你是比较倾向全力发展自己计划，但在配合别人的计划上，反而可能不太灵活。这两年里你交来的剧本，概念都新颖，只是每当同学开会讨论，有同学向你反馈一些新方向时，想法明明是好，但你就倾向抗拒，不能把新想法融入当中。有时候我们出发是一个原因，但走着走着，不见得那个计划是不会变的。我们创作，永远要给自己灵感留下一扇开放的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上帝会把你带往什么方向。”“莲莲肯定是最会配合人。”珏恩试着模仿马教授的暧昧微笑。

“邀请函的事，你有决定吗？”  
“我在想，打个电话过去也无妨，反正先看看他们任务对象是谁，要是能够做就做，万一真的太困难，对方有保镳之类，就装行动失败好了，这样也没甚么风险……”  
珏恩没料到，马教授会从对面的座椅那边坐到沙发来，当她打算稍微坐开一点时，自己双腿竟不听使唤地跪在马教授面前。她有想象过这处境，但究竟自己在干甚么，难道不能先等一下，为自己保留一点尊严吗？

珏恩的脸向教授两腿之间靠过去，一切来得不能自控，她越想站起来，身体就越像泥胶般往下倒。马教授一面站起来，一面双手托住了她，顺势用腿把茶几推开，腾出空间来让珏恩躺于地毡上。

“年轻可以因为无知而犯错，老了就不能再做错决定。”珏恩不大肯定马教授说的这句话，到底是告诉她，还是在喃喃自语。



《血迷宫》电影剧照

四肢无法活动的珏恩，用她那发麻嘴唇发出微弱得像在水中说话一样的音量说：“为甚么……”

“张珏恩，你怎么可以这样呢？”马教授叹了一口气说：“我们都是搞创作的，你怎可以有这种蠢对白？你问完了，我又得像所有电影反派一样，把犯罪动机从头解释一遍。“你真以为我读上四年导演系，拿个全级第一名，只为了回来当保母，给你们一届又一届屁小孩上导演椅？每月拿那一点点薪酬，然后看着同班废人拿了奖，厚着脸皮回来母校跟我对谈？”

“只有你们才有资格拿奖吗？我当年也收过组织他妈的邀请函啊！就怪当年无知，心高气傲，以为自己一毕业就理所当然会成为导演，所以懒得去杀人，直接就把信撕掉。没想到等呀等，一年又一年，结果同级那帮废物不是拍马屁找到了老板开戏，就是去片场当副导演，等到某天原来导演被炒就顶上。

“我呢，就一直呆等，最后为了糊口，只好跑回学校混个教席，然后像在无间地狱中煎熬，看着你们一代一代成为导演。

“寇比力克心肠不好，只说了后半段。对，电影当然是在碰碰车上创作《战争与和平》，但托尔斯泰是他妈的在克里米亚杀了一堆人后生还回来，才够料去写《战争与和平》呀！管你在哪写《战争与和平》之前，都得先发动一场战争呀。

“今天下午你敲门进来，我在想，终于走中年鼻运了，这是上天给我人生第二次机会，你可不能怪马教授啊。”

“信都给你……我不要了……”珏恩耗尽力气说。

“你要真是真有留心听我的课，会记得这就是我曾说过，库伯勒罗丝的哀伤五个阶段。‘为甚么’是第二阶段的愤怒。现在呢，是第三阶段的讨价还价，这都是正常的。但我会劝告你，不如早点进入最后阶段，接受。我拿走邀请函，我俩又如何能彼此忘记这事呢？所以你我也知道，这是没出路的。

“嗯？怎么又像在讲课？说得太长篇了。毕竟要一个人彻底消失，还有许多任务序要做呢。别浪费时间在这类形而上学的讨论了，还是赶紧回到实事上。”说毕，马教授就抱着一大卷透明胶走向二楼。

珏恩尝试控制身体，她发现除了右手手指能轻微屈曲外，就只有眼球可以四处游动。她看到书架上靠边的是那本《电影一百年》全集，记得上次来教授家联谊时，自己也翻过这本大硬皮书。

珏恩在想，到底在这一百年历史里，有多少人为了自己的电影梦而横死？这书有特定章节来记载吗？珏恩不记得。要是真有这样的章节，下次出版重新修订时，会把自己和玛丽莲梦露一样并列在其中吗？但她想了想，好像又不对，玛丽莲梦露好像因为美国国家安全而死，不是因为电影。

珏恩突然发现自己想得太远了，她这种连正式片场都未去过的人，即使再修订多少遍，《电影一百年》还是不会把她列入其中。

不能睡啊！珏恩告诉自己。

将自己收录在《电影一百年》这个欲望，驱使了珏恩努力挣扎起来，尝试由动手指转为握拳，再到撑起半边身，慢慢用手肘向大门爬过去。

客厅窗帘缝间一道强光横扫而过，有一辆车慢驶到门外空地停下。是住在隔壁的村民回来吗？珏恩伸手抓着放在玄关、一只属于马太的蓝色高跟鞋，用鞋跟敲向大门，渴望吸引司机的注意。

听到司机下车走向大门，珏恩舒一口气。大门打开，戴着鸭舌帽、穿着运动服的马太，正扛着多个大购物袋进来。看到半躺在玄关上的珏恩，马太吓了一跳，赶忙放下东西，蹲下拿走珏恩握着的高跟鞋，放回到鞋架的原来位置。

“老公！”马太赶紧关上大门，向屋内大喊：“怎么她还会动啊？”教授从楼上冲下来，跟太太合力把珏恩拖回客厅。

“干吗药不下重点？”马太埋怨。

“她就是不吃那菠萝，我有甚么办法？”

珏恩感到药力稍微减退，于是尝试再撑起来。马太从购物袋中拿出索带，把珏恩双手双脚都绑起来。

“买不到你说的那种，老板推荐这一款。”马太从巨型环保袋中拿出电链锯。“他说这个切割也很利落。”

“老板推荐是因为他不知道你要分尸呀！你知道室内开这个有多吵吗？”

“可以放张 DVD 来盖住，像《High School Musical》或《孤星泪》之类唱歌的。”

马教授试着压住情绪：“调多大声才掩得住？你又想邓生他们过来拍门投诉吗？”

“都怪我了吗？”马太激动起来。“老板说没那一种嘛，又不是我买错！”

“我没说买错，只是你那提议的方向行不通。”

“你总这么负面！明天等邓生一家上班后动手就可以了。”马太反驳他。

“早上我有课，不出席很古怪。”

“那我清一下冰箱，把她搁进去，晚上你回来再搞吧。”

“还是今晚搞定吧。我明天晚上都有课。”

“晚上没课！”珏恩大喊出来。

“甚么？”马太看着在地上的珏恩：“你说甚么？”

“他骗你而已，他晚上都在办公室操我的好朋友。”珏恩告诉马太。

马教授拿胶带想封住珏恩的嘴，珏恩扭动躲避大喊：“我同学叫萧玉莲，我见过马 Sir 在学校叫她含。”

“胡扯！”教授揪着珏恩的头发，把她撞向地板，然后转向马太：“宝宝猪，别信她！她骗你。”

“她说的姓萧那女生，是上次来烧烤，穿白色背心长头发，一直坐你旁那个？”

马太轻声地问。

教授刹那失去上课时的自信，一时间答不上话来。

“对对对！就是萧玉莲！白色吊带，牛仔短裤，薄薄的 bra 飞钉那个。他们年半前就搞上了。”珏恩大喊。

“收声！”马教授喝骂。

“年半前……是我去美国探我爸妈的时候吗？你答应过我甚么？你怎对得住我？”马太拉动电锯。教授果然没说错，电锯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宝宝猪，你先放下来，我可以解释。”马教授试着安抚太太。

“你答应过我，我会是你最后一个睡的学生！你怎对得住我？”马太哭着大喊。

珏恩趁着教授夫妻纠缠时，用尽气力把双手从索带中挣脱，她庆幸刚才马太索带拉得不够紧。

马教授看到珏恩连双腿的索带也解开时，跑过去阻止，但一分心，背后被电锯一划，瞬间衣服上现出一道血河，血向客厅四溅，但他没停下来，继续扑向珏恩。珏恩走向书架，抽出那本硬皮的《电影一百年》，双手举起一个转身就打过去，书角正中马教授的太阳穴。

珏恩不是丽思卡尔顿的住客，因此需要酒店大堂经理带领着，才能来到 116 楼的行政酒廊。珏恩走向角落处，那里坐着一位穿着优质黑色西装的中年混血男人，感觉



《教父》电影剧照

像阿尔帕仙奴和渡边谦的混合体。

“想喝甚么？”混血男问。

珏恩点了个咖啡，还特地问了侍应他们用哪里的豆。其实她对口味都不关心，只想肯定咖啡豆不是来自东帝汶就好。

侍应走远后，混血男问：“你不害怕吗？”

“组织要杀我，才不用叫我来 Ritz-Carlton，许多地方更方便。”珏恩摇摇头说。

“管理层希望招来的对象保持低调，对于你杀了教授和他太太一事，坦白说，是有点微言。”

“你没看新闻吗？可不要乱说啊！电视上明明说是马教授因为被妻子发现了出轨，于是二人争执，结果他被妻子用书砸至重伤，在负伤期间，也反击干掉了妻子啊。”珏恩告诉混血男，她逐渐掌握到马教授那种暧昧微笑的要诀。“嗯，对了，今天该不是来讨论新闻吧？”

“是的。混血男微微点头，等待应把咖啡放下后继续说“虽然你违反了我们计划的原则，但管理层不少人对你仍然感兴趣，所以让我来多了解一下，介意我问几个问题吗？”

“随便。”珏恩说着喝了口咖啡。

“你认为那天晚上你能生还，最主要原因是甚么？”混血男问她。

“行业历史够长。”

“嗯哼？”

“电影要是没有一百年，就不可挡住他老婆那电锯，也不够份量让我砸碎他俩的头骨。”

珏恩思考了一下后继续说：“如果，我只是说如果，你们行业愿意出书的话，一定也是件不错的凶器。”

“哦，但你干吗逃过了一劫后，仍选择致电我们呢？”混血男显得好奇。

“本来有想过，就当发场梦，直接把邀请函烧掉算了。但冷静又想，都因为你们的信才惹上教授，要是就此打住，不就白白吃了亏？而且在这事情上，其实也不是完全没得着。”

“可以多解释一下吗？”混血男更好奇了。

“在解决了他们后，我想了很久该如何脱身，我终于明白，教授不只会睡女生，也确实点出了我的缺陷，我确实一直在创作中，无法融入别人的方向。这次事件让我学到，要永远给自己留一扇门，把现场的突变融入其中。

“所以我重新布置，马太是无意中在教授手机发现，他和莲莲的奸情，于是计划把他杀掉后分尸，工具都买好了，还想下药弄晕他。但被教授发现了，于是二人扭打起来，结果大家都伤重死亡。虽然要是真的深究的话，可能是有些 bug，但在同学间流传教授与莲莲的那些传闻，会让这个情杀故事更有说服力。

“我这例子较特殊，既拿到了实际经验，但同时也没案底和嫌疑。在整个事件上，我根本没有任何犯罪动机。这事不单不该影响组织对我的信任，还藉此证明了我有能力处理突发枝节。虽然是有点混乱，但故事总算是可以拼凑起来。杀人就如拍电影一样，是在碰碰车上创作《战争与和平》。”珏恩说。

“罗便臣爵士在生前，也常常讲这个比喻。”混血男说着喝了一口红茶。

“罗便臣爵士……不会正好就是史丹利·寇比力克吧？”珏恩试探性地问，虽然她觉得是有点匪夷所思，但毕竟有传闻说寇比力克协助美国拍 1969 年的假登月片，所以很难猜到寇比力克的各种可能性。

“保密是成功的钥匙。”混血男平静地回应她。

其实珏恩也预计了会得到类似回复，因此也放弃了追问波兰斯基的《水中刀》和高安兄弟的《血迷宫》是否组织的出品。

“你有为这次的事感到内疚吗？”混血男的问题打断了她的思考。

“没怎么内疚。”珏恩告诉他：“反而是莲莲因为这事而退学，我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但听男生说她家人把她接回美国后，定期见医生与吃药，抑郁症已经稳定下来了。我没加她的 in-stagram，所以详细情况也不太清楚。”

“我明白了。混血男告诉她：“我就不妨跟你坦白，管理层是有继续和你合作下去的意愿，所以才约你出来当面了解。”

“我很荣幸。但也很好奇，要是当晚教授真的把我干掉，抢了这信，组织会接受他去进行任务吗？”

“这个现在很难说，得看他如何处理关于你这个烂摊子。”混血男说着思考片刻：“组织虽然历史悠久，但处事上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如果他处理妥当，说不定也会考虑。”

“这个倒也是，毕竟永远要给自己留道半掩的门，谁知道上帝会把我们带到哪里。”

“对了，还有个事，虽然你还未执行任务，但因为管理层对你特别有信心，加上税务年度也快结束了，所以会计部门想请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请说。”

“你可先好好想，不用马上回复。因为税务方面的安排，我们会计部想先了解，你任务完成后，有想过电影要在甚么地方拍摄吗？”

“翡冷翠。”珏恩马上就能回答。



彭浩翔

作家、编剧、监制、导演、演员、主持、广告文案、书籍编辑。至今执导十五部电影；出版著作数十部。文字作品曾获釜山 PPP 奖项、香港文学双年奖及时报文学奖等。

### 坏品味陈列室

这是电影导演彭浩翔的小说专栏，他曾经认真讨论我们应该选择屎味的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味的屎，这个专栏将带你走得更远。



图片来自 [Gemma Evans](#) on Unsplash

## 小说

# 德利马赫伦疑案

威廉·特雷弗 | 故事群岛

「我们都应该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

德利马赫伦从未发生过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人们从未如此震惊。与别处的居民一样，他们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苦难与悲伤，也不乏奇闻逸事，抑或从遥远的过去流传下来的故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个被称为“船长夫人”的女人和一个驼背小贩私奔了。一七九八年，起义军在德利马赫伦和郊区山间展开了抵抗斗争。北爱纷争期间，一个本地人被黑棕部队在田野里处死。然而，没有哪个故事，或是哪段记忆，比得上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清晨降临的那一场惨剧。

清晨，麦克多德一家照常在农舍里醒来。麦克多德穿上衬衣裤子，从厨房门边的挂钩上取下黑色外套。他抽出衣服口袋里的绳子当作腰带系上，又从胶鞋里掏出袜子。他带着两只牧羊犬出了门，把奶牛赶回牛棚挤奶。妻子洗漱完毕，把水壶放在炉子上，随后敲响女儿的房门。“莫琳！”她说。“起床了，莫琳！”

莫琳没有应声，麦克多德太太并不意外。她回到房间穿好衣服。“该起床了，莫琳！”她喊道，一边猛敲女儿的房门，但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你是不是病了？”她略带疑惑地问。平时这个时候，莫琳要么打着呵欠，要么会答句话。“莫琳！”她又喊了一声，推开房门。

麦克多德把牛赶进了棚。穿过院子的时候，他隐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但清早的倦意让他的脑子有些迟钝。妻子隔着田地朝他大喊，他听不清她在喊什么，但不止一次听见了女儿的名字。他忽然意识到院子里到底哪里不对劲：莫琳的自行车没有靠在厨房的窗外。“莫琳昨晚没回家，”当他走近时，妻子反复说。“她不在床上。”

他们给牛挤了奶，因为无论莫琳出于什么原因没回家，奶总是要挤的。早饭也端上了桌，不吃早饭对谁都没好处。麦克多德一言不发地吃着，胃口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而妻子吃得比平时少些。“我们开车过去看看，”饭后他说，声音里充满了火气。

她点了点头。当她第一眼看见那张整洁的床，她就知道他们必须做点什么。他们不能坐等着一封信或者电报送上门，或是女儿计划的别的什么。他们要开车去兰西·巴特勒家——他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昨晚莫琳就是骑车去了他家。夫妻俩嘴上虽然没说，心里担心的却是同一件事：女儿竟然擅自主张，和兰西·巴特勒那个娇生惯养的窝囊废私奔了。

麦克多德今年六十二岁，瘦高个儿，面部肌肉深陷，一头参差的花白头发。妻子比他小两岁，身材同样瘦削，面容粗糙，长着一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手。他们之间很

少说话，婚后一直如此，但他们也不争吵。农场上的事鲜有争执，因为他们认为争执毫无价值，只是自然而然地靠天吃饭。夫妻俩生养了五个孩子，莫琳是最小的，也是唯一留在家里的。上个月她刚度过二十五岁生日，但他们并没有庆祝——麦克多德家没有这种习惯。

“穿条体面裤子，”麦克多德太太提醒道。  
“你不能就这么去。”

“这样挺好。”

她知道劝不动他，也就不再坚持，转身回房换了双鞋。至少他不会穿着那件用绳子当腰带的外套——他只有冷天早晨赶牛时才穿。早饭前他已经把那件衣服脱了，应该不会再穿上。她在自己的旧裙子和针织衫外面套上一件防水外衣。

“小姨子，”他在车里说。她没有吭声。

两人此刻是同样的心情：不安，恼火，依然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女儿居然不知羞耻地欺骗了他们——在去往巴特勒家的四英里路上，这个念头萦绕在两人的脑海里。他们下了柏油公路，拐上巴特勒家的田间小路，这时传来一阵狗叫。副驾那一侧的车窗一个月前就关不严了，尖厉的狗叫声盖过了引擎的轰鸣。

看来果真如此，他们听见狗叫声想。莫琳和兰西昨晚私奔了，巴特勒太太一个人吆喝不了一群奶牛。难怪那条老狗像疯了一样叫唤。麦克多德在心里又狠狠地骂了一句“小姨子”。兰西·巴特勒，他想，天啊！兰西·巴特勒会牵着她的手走进婚礼的舞池，然后带她走上一条不归路，最终流落在某个鬼地方的阴沟里。他警告过她上千遍：兰西·巴特勒是个无可救药的白痴。

“他的父亲是个本分人，”最终他打破了沉默。“从没沾过一滴酒。”  
“那个老女人毁了他。”

他们不会私奔太久的，两人各自心想。兰西·巴特勒或许会娶她，或许会临阵脱逃。无论哪种情况，她都会在半年内——最长一年内——回家。那时候她也许已经有了身孕。

他们把车开进院子，两人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躺在水泵旁的女儿。他们的注意力仍旧被狂吠的狗所吸引——那是一条黑白条纹的牧羊犬，和他们家里那两条一样。下车时，车轮扬起的灰尘依然弥漫在他们的眼前。狗在院子的角落里疯狂地转圈，一刻也不停歇。那条狗疯了，麦克多德太太想，估计被什么吓着了。然后她看见水泵旁边女儿的尸体。她的自行车倒在一米之外，仿佛她刚从车上跌落。自行车旁还有两只死兔子。

“上帝啊，”麦克多德说。妻子从他的声音里能听出，他还没有看见女儿，而是发现了别的什么。他去了狗的那边。他只是本能地过去，想让狗安静下来。

她跪在地上对着莫琳低语，心里默念着：女儿只是刚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然而莫琳的脸像石头一样冰冷，身体也僵硬了。麦克多德太太一声哀嚎。下一刻她发现自己倒在地上，紧紧抱住莫琳的尸身。没多久她听见丈夫也泣不成声。他跪在地上，双手抓住女儿的身躯。

麦克多德太太记不得自己是如何站起来的，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也不知为何要站起来。“别过去，”她听见丈夫说。他正用外衣袖子拭泪。当她朝狗走去时，他并没有阻拦她，而是跪在女儿面前，抽泣着呼喊她的名字，哀求她不要死去。

狗趴在门前，不再叫唤。一米之外巴特勒太太躺在地上，一条腿蜷在身下，地上的血是褐色的，中间一滩依然殷红。望着她的尸身，麦克多德太太猛然醒悟：莫琳并非从自行车上跌落。她回到女儿的尸身前。在水泵旁的两只铁桶后面，她看见了兰西·巴特勒的尸体。地上不远处有一把猎枪，正是那把枪打烂了巴特勒太太的脸。

\*

警长奥凯利迅速得出结论。和麦克多德夫妇一样，巴特勒太太也极力反对儿子与莫琳的婚事。但她的反对比麦克多德夫妇还多出一层原因：她极度依恋自己的儿子，坚信任何女人都不配将他夺走——这一点无人不知。兰西是她唯一的孩子，也是多次流产之后仅存的硕果。兰西的父亲在他两岁那年就过世了，留下孤儿寡母生活在偏远的农场。奥凯利听说巴特勒太太脑子本就有点不正常，在兰西的事上更容易因妒生恨。一定是她为了避免儿子被恋人抢走，盛怒之下枪杀了莫琳。兰西试图夺下猎枪，没想到猎枪走火打中了她。兰西这个软弱的年轻人，在自杀与面对现实之间选择了前者。这个基于凶案现场的推理让奥莱利警长很满意，德利马赫伦的居民们也纷纷赞同。“悲剧早已注定，”麦克多德在葬礼上说。“从可怜的莫琳和兰西·巴特勒开始约会的那一天起，悲剧就已经注定。”

德利马赫伦是一个普通的乡，除了名为“德利马赫伦路口”的十字路口外，再没

有其它地标。村子由中等大小的农场组成，每个农场三十英亩上下，分散在沼泽之间。农场彼此相距几英里，正如麦克多德家和巴特勒家。村民们去附近的吉尔莫纳村参加弥撒或向萨林斯神父忏悔。农场的孩子们去蒙特克罗镇上学，每天早晨一辆黄色校车在各个农场的路口接上他们，下午放学再原路送回。乳品厂的卡车每天沿同样的路线去各家收牛奶。村里可以买到面包和杂货，但要买鲜肉的话就要去蒙特克罗。男人们会在村里杂货铺的小吧台前喝上几杯，但真要买醉也得去蒙特克罗。蒙特克罗还有五金店、服装店，以及一间名为“安比”的电影院——直到六十年代电视的兴起将其淘汰。德利马赫伦、吉尔莫纳和蒙特克罗构成了德利马赫伦村民日常生活的一方天地。他们极少外出，除非去大城市找工作或者永久地离开。

麦克多德家的孩子们属于远走高飞的那一群，他们得知噩耗后纷纷赶回来。葬礼上四个孩子都到齐了：两个带着丈夫，一个带着妻子，还有一个单身的女儿。他们各自的婚礼也是麦克多德家前几次的团聚，两场在吉尔莫纳，一场在遥远的斯基贝林——一年前麦克多德的儿子在未婚妻的家乡成婚。在莫琳的葬礼上，去年那次婚礼依然历历在目：开着大众汽车的长途旅行，在提耶尼酒店度过的一晚，次日的依依惜别。谁也想不到下一次团聚竟是因为如此的悲剧。

葬礼之后一家人回到农场。几个孩子早就知道莫琳与兰西·巴特勒的关系，也知道双方家长的极力反对。他们从小就了解巴特勒太太对儿子近乎病态的爱，也听说过这位古怪母亲的各种轶事，并亲眼见识过兰西在孩提时代受到的溺爱。

“哦，别着急，兰西，晚点再做，”类似的话她一个小时可以说上十几遍，似乎所有农活儿都无关紧要。“啊，没关系，今天不用上学，”兰西小时候她曾这么说，起因只是兰西抱怨乘法表或是《马丁兄弟》周末拼字表太难了。德利马赫伦村民不知道最终倒霉的是农场还是兰西自己。

“她到底看上了他什么？”麦克多德太太在餐桌前伤心地回想。“有谁知道她到底看上了他什么？”

他们都摇了摇头。葬礼上的泪痕还挂在每个人脸上。没有人说话。

“这件事我们永远也忘不了，”父亲凝重地说。这是他们唯一能说的话，也是唯一确定的事。麦克多德夫妇将终老于此，在那之前，这件惨绝人寰的悲剧将令他们寝食难安。他们知道，假如莫琳骑车时被一辆汽车撞倒，她的死会更容易接受；或是死于疾病，某种无法治愈的绝症。巴特勒家的院子、来回疯跑的咆哮的狗、三具僵硬的尸体——这些画面将长久地印在他们的记忆里，像刀子一样剜他们的心。一条生命就这样白白浪费，如此残忍的命运为何会落在莫琳身上，为何要让一个纯真美丽的少女枯萎在一对怪异的母子之间？村里还有别的姑娘——卑贱、放荡的姑娘——她们看上去和巴特勒一家更配，所有人都会这么说。

“开车去我家住几天吧。”一个女儿邀请道。“好吗？”

父亲盯着桌面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只有婚礼或是葬礼才值得出一趟远门。或许莫琳活着的时候还有商量——她可以留下来照管农场；如今莫琳不在了，这个话题压根没必要提起。麦克多德太太想挤出一个微笑，表示对女儿的谢意，但她的嘴角纹丝未动。

\*

离奇的死亡自然会吸引猎奇的目光。这件事登上了本地报纸，在广播和电视上均有报道。之后德利马赫伦和附近的村镇渐渐恢复了平静。人们给麦克多德夫妇写信表达同情。还有人亲自上门探望，但也待不了太久。“假如需要我的话，”萨林斯神父说。“来吉尔莫纳村 23 号。你们可以托人带话，也可以直接去教堂。”

麦克多德夫妇从没去找他。夏季在眼前流过，他们在六月的晴天里割好过冬的草料，照料着地里的土豆和即将成熟的大麦。秋天的雨水比往年多，他们开始担心大麦的收成。



图片来自 Mika Baumeister on Unsplash

“您好，”十月的一天下午，一个男子走进院子。“您是麦克多德先生吗？”

麦克多德点点头，吆喝几条牧羊犬安静下来。这个陌生人大概是接替退休的老多诺格的肥料推销员。然后他想到多诺格从不在这个时节到访。

“可以和您说话吗，麦克多德先生？”

麦克多德瘦脸上的皱纹渐渐聚拢，眉头也皱了起来。他抬手挠了挠花白蓬乱的头发，下意识地掩饰心中的困惑。作为一个多疑的乡下人，他总是不愿外人知晓或是猜出他脑子里的想法。

“说句话？”他说。

“可以进屋谈吗，先生？”

麦克多德找不到任何让这个人进屋的理由。陌生人长了一张红润的脸，穿着黑色灯芯绒裤子和工装外衣，显得很邋遢。他的头发又黑又长，耷拉到脸颊两侧形成刷子一样的鬓角。他一副城里人口音，不难猜测，他一定来自都柏林。

“你想和我谈什么？”

“我听说了您女儿的事，我很抱歉，麦克多德先生。真是太不幸了。”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是的，先生。已经过去了。”

一辆红色轿车缓缓驶进院子，引擎的声音低得让人难以察觉。它让麦克多德联想到某种警觉、迟缓的爬行动物。轿车在牛棚边停下，没有人下车，但麦克多德看见方向盘后面坐着一个戴墨镜的人影。那是一个女人，也是黑头发，嘴里叼着烟。

“或许能给您带来好处，麦克多德先生。”

“能有什么好处？那是你的车吗？”

“我们专程开车来见您，先生。那位女士是我的同事，海蒂·福琼。”

女人下了车。她比男人高一些，一张阴沉的脸，穿着蓝色衬衣和同色的裤子。她把烟头扔到地上，小心地用鞋跟踩灭。

她像开车时那样不紧不慢地穿过院子，来到两人面前。狗冲着她狂吠，但她不为所动。“我叫海蒂·福琼，”她用英国口音说。

“我还没告诉您我的名字，麦克多德先生，”那个男人说。“我叫杰里米·泰勒。”

“我希望杰里米已经向您表达了我们的慰唁，麦克多德先生。我希望您和太太能接受我们最深切的同情。”

“你想要什么？”

“我们过去巴特勒农场了，麦克多德先生。我们在那儿待了很久。我们和一些人聊过。我们可以也和您聊一聊吗？”

“你们是报社的？”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代表媒体。我可以肯定，”女人补充道，“您已经见过不少记者。您会发现我们很不一样，麦克多德先生。”

“我和我老婆对记者没什么可说的。当时我们没说，之后也不会说。我还有农活儿要干。”

“麦克多德先生，能给我们五分钟吗？在您的厨房里聊五分钟，与您和太太。给我们一个解释的机会，可以吗？”

麦克多德太太闻声走出来。她站在门内，比丈夫更警觉地打量着两个陌生人。陌生女人迎上前，她默默地握住了对方伸出的手。

“很抱歉打搅你们，麦克多德太太。泰勒先生和我希望您的丈夫也能谅解。”

麦克多德太太没有应声。她不喜欢这个女人阴沉的脸和她的邋遢同伴。他的身上透着一种猥琐，是那种不修边幅的城里人时常流露出的气质。那个女人虽不猥琐，但你从她嘴角的形状就能看出她不是一个真诚的人。她一开口就是假惺惺的语气。

“一切还未真相大白，麦克多德太太。这是我们想告诉您的。”

“我已经拒绝你们了，”麦克多德说。“我叫他们赶快走，”他对妻子说。

麦克多德太太盯着女人的墨镜。她依然伫立在原地，没有走进院子。

男人说：“要不我先给你们拍张照？您不会介意吧，先生？我给您和太太拍张照？”女人被抢了话头，脸上现出一丝不悦。她左手的手指不耐烦地扭动着。

她迅速打断道：“现在还没这个必要。”

“我们需要照片，海蒂，”男人嘟哝着。他压低声音，不想让麦克多德夫妇听到。但他们从他粉红色的脸上看出了他的抱怨。女人不耐烦地对他说了句什么。

“你们再不走的话，我们就报警了，”麦克多德说。“这是私闯民宅。”

“如果真相被隐瞒的话，您女儿的在天之灵也无法安息，您说是吗，麦克多德先生？”  
“我还想告诉你们，我们的狗凶起来是很厉害的。”

“真相没有被隐瞒，”麦克多德太太说。“我们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侦探勘查了现场，每个人都能看出发生了什么。”

“并非如此，麦克多德太太，真相还未水落石出。这就是我想告诉您的。那些人甚至还没有接近真相。表象并非真相。”

麦克多德叫妻子锁上门。他们会开车去蒙特克罗报警。“我们不想和你们打交道，”他愤怒地对两个访客说。“如果狗咬断你们的胳膊，可别怪我没打过招呼。”

女人不为所动，声音也毫不慌乱。她提到三千英镑左右的报酬。“如果你们同意聊一聊，我们愿意支付高额的报酬。耽误你们的工作时间，我们对此十分抱歉。泰勒先生提到的照片也会有相应的报酬。总数大概是三千英镑。”

后来当麦克多德夫妇回想起这一幕时，他们依然记得当时两人共同的反应：这不是个骗局，承诺的报酬会悉数兑现。他们被那个数目所震惊，三十英镑已经能派上大用场，更别说三千英镑。秋雨毁了大麦，女儿的死让他们少了个帮手，再加上悲剧对他们身心的双重打击。如果这件事真能带来三千英镑，他们或许可以卖掉农场，换一间镇上的平房。

“让他们进屋，”麦克多德说。妻子领着他们进了厨房。

\*

疑案发生的村庄在爱尔兰乡间随处可见。从科克到卡文，从罗斯康芒到罗斯莱尔，你常会见到与巴特勒家和麦克多德家相似的偏僻农舍。莫琳·麦克多德是个天性善良，人见人爱的姑娘。懒惰与贪婪与她无关；父母说她是个完美的女儿，近乎圣女。在一张老照片上，五岁的莫琳是个长着雀斑、面带微笑的孩子；另一张照片上她穿着初领圣餐的裙子；第三张摄于哥哥的婚礼，她已出落成一个健康的女孩，脸上绽放



图片来自 Antoine Antoine on Unsplash

出灿烂的笑容，右手端着一只茶杯。旁边还有一张父母在厨房的照片，下面用斜体注明拍摄者为耶利米·泰勒。德利马赫伦的圣女，海蒂·福琼写道，在二十五年的生命中从未缺席过弥撒。

这则报道搭配了富有年代感的褪色照片。“你们听说过我们的周日增刊吗？”海蒂·福琼在厨房里问麦克多德夫妇。后者摇了摇头，他们从没读过英国报纸。他们平时只读爱尔兰《星期日独立报》。

在周日增刊的页面上，巴特勒家的院子呈现出荒凉的灰褐色，水泵也显现出平日难以觉察的质感。一辆与莫琳的自行车相仿的替代品放倒在地上，一条与巴特勒家的狗相似的牧羊犬正在嗅牛棚的门。然而，照片上三具尸体的缺席、倒伏的自行车激起的灰尘、以及嗅门的狗——这些元素在画面上营造出诡异的气氛，虽然并非血淋淋的现场，却依然传递出恐怖的气息。“你找的是本地摄影师吗？”增刊的助理编辑问。当被告知耶利米·泰勒来自都柏林时，他要求加入一条摄影师的简介。

警方——具体说是奥凯利警长——只看见了案件的表相。在那三具倒在五月晨光下的尸体中，他们选择了兰西·巴特勒作为他们贫瘠想象力的替罪羊。巴特勒太太出于臭名昭著的恋子情结，为了避免莫琳夺走儿子，开枪杀死了她。她的儿子——据奥凯利警长的个人推断——把猎枪从母亲的手里夺下来，慌乱中走火击中了她。几秒钟之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在那支猎枪上发现了全部三名死者的指纹，这是奥凯利警长无法解释的。为什么巴特勒的猎枪上会出现莫琳·麦克多德的指纹？奥凯利宣称，莫琳·麦克多德作为农场的常客，“自然而然”会摸过那支猎枪。按照我们的日常经验，一位常客不会“自然而然”地摆弄你家的枪械。警长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因为他自己也心存困惑。那支猎枪是用来打兔子的，他说。其实他也知道猎枪平常的用途与案件本身并不相干。他提到兔子只是因为他无法提供莫琳·麦克多德碰过那支致命武器的合理解释。三名死者的指纹已经变得模糊、“难以辨认”，并在枪身多处出现。警长的说辞基本上是：信不信由你。随后他不耐烦地补充道：这重要吗？

我们想说：这很重要。我们必须指出，继臭名昭著的凯里郡婴儿疑案和弗林案之后，

又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被束之高阁。

德利马赫伦的村民告诉你的故事与奥凯利警长炮制的报告如出一辙。每个人都知道兰西·巴特勒的母亲是个言语刻薄、占有欲强烈的女人。每个人都知道兰西是个废物。每个人都知道莫琳·麦克多德是个虔诚的女孩。自然是那位母亲无法忍受女孩的入侵，因而痛下狠手。接下来，自然是愚蠢迟钝的兰西一时糊涂，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母亲。最终头脑简单的他自然别无选择，唯有追随两个主导了自己生命的的女人。还有一种可能，无论是奥凯利还是巴特勒的邻居都没有想到。一封信在兰西·巴特勒卧室的抽屉里被找到了（惨剧之后，向巴特勒家贷款的爱尔兰联合银行接管了土地、农舍及家具，并将其拍卖）。警方居然忽略了如此重要的线索，实在令人瞠目。这封信来自莫琳·麦克多德，写于惨剧发生前的一周：

亲爱的兰西，除非她收敛一点，否则我看不到一丝嫁给你的希望。我想嫁给你，兰西，但她从不让我们独处。如果我继续待在你家，结果只能是这样，而你也知道，我的父亲是不会让你踏进我家一步的。你的母亲毁掉了我们最后的希望，兰西，她永远不会放手。我每次骑车过来，总要面对她言语的侮辱和怨毒的目光。我想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

既然莫琳已经明确表示恋情走到了尽头，为什么巴特勒太太——一个据称“能比你先读出你的心思”的女人——还要杀死莫琳？你揣摩那个老女人的心理，就越觉得她不可能无谓地摧毁她要保护的一切。巴特勒太太不是那种冲动行事的人。她的嫉妒和愤怒压抑在内心深处，如同闷烧的火苗，从未熄灭过。

然而莫琳·麦克多德——年轻、冲动、爱情岌岌可危——拥有圣女的天性和虔诚，却在那个宿命般的傍晚犯下了一生中从未触碰的所有罪过。地狱的烈焰也抵不上被愚弄的女人的怒火——一个受到命运非难的女人或许也是如此。老女人知道自己胜利在望，越发地得意。她言语的侮辱和怨毒的目光也越发地肆无忌惮。巴特勒太太希望莫琳·麦克多德消失，永远从她的农场上消失，再也不敢回来。

据说那晚兰西·巴特勒在陷阱里发现了两只野兔。每次莫琳来找兰西的时候，两人常去检查陷阱。他会骑着她的自行车，莫琳侧坐在后座。兰西自己没有车。据我们推测，猎枪上之所以会沾莫琳的指纹，是因为两人顺路打了猎。当他们返回农场时，莫琳手里拿着猎枪和野兔。据说莫琳死前不久曾哭过。兰西在打猎的路上或许安慰过她，但莫琳深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外出，她再也不会在傍晚与他约会。他的母亲对她的怨恨，加上兰西的软弱，一同摧毁了她的希望。巴特勒太太一如既往地站在院子里咒骂她，于是莫琳朝她开了枪。她跳下自行车后座，兔子掉了下来，兰西也和车一起倒在地上。他叫她住手，但为时已晚。她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拥有他。她怪他从未站在自己这一边，从未为她做出任何牺牲。如果她无法拥有这个自己深爱的软弱男人，别人也休想拥有他。于是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恋人。几秒钟后，心如死灰的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后面还有更多关于莫琳的文字。增刊的彩页上引用了麦克多德太太的话，说女儿是个乐于助人的孩子。她的父亲说她是自己最疼爱的孩子。在她小时候，她会跟着他下地，看着他把土豆块茎种进土里。后来，她会给他送茶；再大一点，她会帮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萨林斯神父说她是一个“神选”的孩子。教会女校的一位修女满怀怜爱地回忆起她。

奥凯利正是屈从于本地村民的这种情感。德利马赫伦的村民有意无意地保护着关于莫琳·麦克多德的记忆，警长也顺水推舟。她是当地人心中完美的女儿，一个“神选”的姑娘。假如奥凯利警长擅自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一定无法再走进德利马赫伦，或是吉尔莫纳村，或是蒙特克罗镇。爱尔兰人不会轻易原谅抹黑他们的现世圣徒的人。

\*

“我想告诉你这篇东西里写了什么，”萨林斯神父说。“我想亲自告诉你，免得你从别处听到这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图片来自 Ilyza Mingazova on Unsplash

他是专程开车来的。当他注意到报纸上的报道时，他觉得有必要立刻找麦克多德夫妇谈谈。在他看来，这则报道几乎和惨剧本身一样糟糕，他的整个教区都遭到了诋毁，一位警长被说得与他每日追逐的罪犯无异。他把这篇东西读了两遍，惊讶于文中的照片。海蒂·福琼和耶利米·泰勒也找过他，但他告诉他们，事情已尘埃落定，不必多此一举。他解释说，人们只想尽快忘记在他们中间爆发的罪恶，而他自己依然在为巴特勒母子和莫琳·麦克多德祈祷。那个女人点了点头，似乎被他说服了。“可以给您拍张照吗，神父，”那个男人在离开前说。“就一张照片？”萨林斯神父站在金钟花丛旁，心想拍张照片也无伤大雅。“照片洗出来我会给您寄一张，”男人说。但照片从未寄来。他第一次见到它是在周日报纸上，他几乎认不出自己——眼皮酒醉似的耷拉着，下巴上满是青色胡茬。

“这件事太可怕了，”他在麦克多德家的厨房里说。厨房的摆设让他想起报道里的另一张照片：乳白色搪瓷电炉、绿色橱柜上的圣婴雕像、铺了地毯的地板、闹钟和衣服挂钩、蓝色塑料贴面的餐桌、收音机、电视。和巴特勒家的院子一样，厨房在照片里同样透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氛围。晦暗、平淡的色彩，肮脏的窗帘边缘，剥落的油漆——这一切俨然一副精心的构图，让观者疑窦丛生。

“我们从没想到她会把莫琳说成那个样子，”麦克多德太太说。“全是谎言，神父。”

“显然如此，麦克多德太太。”

“我们都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

“显然如此。”

麦克多德一句话也没说。他们收了对方的钱。是他让那两个人走进他们的家。那个女人开了一张三千一百五十英镑的支票，并坚持要加上那额外的一百五十英镑。

“您从没说过她是神选的吧，神父？”

“当然没说过，麦克多德太太。”

他听说奥凯利警长已经找过律师，咨询那篇文章是否构成了诽谤，但律师告诉他，诉讼花费不菲，更别说还有败诉的风险。对于德利马赫伦的村民和警察来说，对于案件的简单解释是最容易接受的，因为每个人都了解巴特勒母子。并不存在所谓的“疑案”，也没有人心生异意。

“让我们一起祈祷吧。”神父说。

他们跪下祈祷，起身时麦克多德太太哭了起来。每个人都会读到，她说，仿佛忘记了神父刚才的话和祷词。每个人都会读到这篇报道，每个人都会相信那个故事。“底层民众，”她重复着报纸上的话，哽咽着皱了皱眉。“他们说巴特勒一家是底层民众。他们说我们都是底层民众。”

“那只是那个女人的一面之辞，麦克多德太太。请你不要在意。”

“那些生活在欧洲最西边孤岛上的头脑简单的农民，”麦克多德太太念道，“在偏远闭塞的村庄里，人们常常陷入自我蒙蔽之中。”

“别在意他们怎么写，”萨林斯神父安慰她。

“‘底层’是说我们很穷吗？”

“那个女人是这么看的，麦克多德太太。”

现在疑云笼罩在德利马赫伦上方，吉尔莫纳和蒙特克罗也如此。在萨林斯神父看来，疑云的背后暗藏着恶毒。人们不再相信自己的直觉，其他报纸也会争相报道。更多陌生人会蜂拥而至。萨林斯神父预感会有人拍一部莫琳·麦克多德的电影，疑案将成为传奇。人们会乐此不疲地谈论莫琳·麦克多德的性格，甚至会有人为此写书。莫琳的父母会终生责备自己由于贫困而未能抵御金钱的诱惑，直至离世的那一天。

“孩子们会看到这些照片的。”

“别担心，麦克多德太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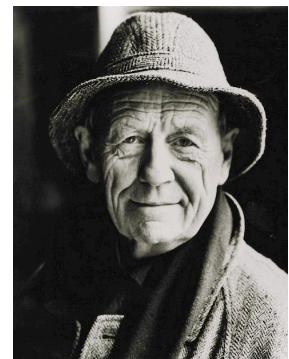
“从没人说过她近乎圣女。从没人说过，神父。”

“我知道，我知道。”

麦克多德太太捂住脸。她瘦削的肩膀痛苦地起伏，呜咽震颤着她的身体。作为一个母亲，她实在承受了太多，神父想。为了取悦读者，报纸竟然把她惨死的女儿说成杀人凶手。她的丈夫从桌前站起身，背对着妻子，望向空荡荡的院子。他用低沉疲惫的声音说：

“那都是些什么人啊？”

神父默默摇了摇头。在这间被耶利米·泰勒的镜头扭曲的厨房里，麦克多德太太尖叫起来。她坐在蓝色餐桌前，嘴唇紧缩，声嘶力竭地尖叫，一声惨似一声。这一次萨林斯神父没有试图安慰她，麦克多德依然凝立在窗前。



威廉·特雷弗（1928–2016）

爱尔兰作家，尤以短篇小说著称，被《纽约客》称为“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他先后三次获得英国惠特布雷德图书奖，五次入围布克奖。

译者：亚可

《德利马赫伦疑案》  
(Events at Drimagheen)  
选自 *Family Sins and Other Stories* (Copyright © William Trevor,  
译文由群岛图书授权发表)

故事群岛

[1] 全名为“联合爱尔兰人社会”的爱国团体，起义的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爱尔兰王国。

[2] 英国皇家爱尔兰警队部署的一支准军事部队，用以镇压爱尔兰共和军发动的革命。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matthew Feeney on Unsplash](#)

## 小说

# 收音机的魔力

蒂姆·高特罗 | 故事群岛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出名的，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

克利夫最大的愿望就是出名，哪怕只是个小小的名声。那些普通的芸芸众生，他们唯一的遗产就是一块墓碑，他觉得他能胜过他们。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要想成名的渴望就越发强烈，到了五十二岁，当他最小的孩子离家加入海军之后，他开始去上钢琴课。他的老师，一位荷兰小姐，说他不是一块可造之材，他的节奏感是全俄亥俄最糟糕的。他问，是否有适合他的其他乐器，她建议：去学陶笛吧。

克利夫尝试去上美术课，但是他画的畸形裸体，看上去就像长期放牧在核试验场的白牛。接下来他去上创意写作课，试图花两年时间写出一些东西拿去发表，但是，就连他在写给当地报纸的信中插进去的一首有关收集垃圾的五行打油诗，也被编辑删掉了。直到又经历了多次探索之后，他才认识到不如着手把他那间双料的大睡房改成一个男人的洞穴，让它成为一个全县最有名的“男人洞穴”，一个充满珍稀怪异之物的空间，足以让水厂的朋友们惊愕不已，或许还会引起当地新闻媒体的注意。

他安顿在里面的第一件珍品是一个破碎的麋鹿头，足有一辆大众汽车的一半那么大。他是听了当地广播电台“以物易物商店”节目的一则广告之后买下的，要购买有男人品味和奇异风格的东西，那是最便宜的途径。每天早晨七点钟，他和妻子吃早餐时他就听广播。他妻子塔米是一个默默忍受他购买这类东西的善良女人，她相信她那生性甜美而又孩子气的丈夫很可能有更糟糕的习性。继麋鹿头之后，他又买了一台电动老虎机，它的玻璃上画着几个半裸的亚洲女牛仔；接下来是一辆 1947 年产普利茅斯汽车的车尾行李箱部分，被制成了一张蔚绿色的沙发；然后是一张罩着桃红毛毡的破桌子；再后来是两只上了红釉、牛粪状的烟灰缸，虽然他的熟人中没谁抽烟。收藏品在不断增加，他的朋友来访，在一只巨大的、中央画有一面立陶宛旗的电缆绕线盘上打扑克。没有人对这些物品多说什么，尽管有两个来自化工部门的人对两具体型像超重女人的服装人体模型投以疑虑的一瞥。克利夫喜欢他的收藏，虽然他感觉到他的绝大多数牌友或多或少被它们搞得有点心神不宁，特别是吊在牌桌上面的那具山羊骨架，有两只眩目的灯泡从它的胸部悬荡下来。

一天早晨，在“以物易物商店”，一个男子以含糊不清的口音打电话进来，说能提供五只染成绿色的小鸡。那个地方在西弗吉尼亚的布卢沙弗特，是一个荒芜的煤炭小镇，当地居民会打电话来出售他们的任何东西，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有钱让晚上亮灯。下一个卖主是一名妇女，她想要出让妓院里一台遭到雷击的坏钢琴。克利夫想，这是一个好兆头，接踵而来的将是些不寻常的珍奇，这时，一个年幼的男孩来到广播中，想要卖掉他仅有的一条裤子，因为他的身体已经长得穿不进了，克利夫伸手去把音

量调大。当这个孩子描述他的牛仔裤时，克利夫想起他年轻时的一次远足，那是他唯一负担得起的一种旅行，因为他的妻子是俄亥俄州林肯镇富特村的助理公共图书管理员，而他只是一个在水厂估算水量进出的人。

在这个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塔米从桌子边站起来。“再见，亲爱的，”说着，她擦身而过，“别再去买一个马蜂窝了。”

克利夫闭上眼睛。“你不必老提那件事。”他早期从“以物易物商店”买的一件东西是一只价格十美元的大黄蜂窝，是一个男子在路边交的货。那是一个初秋的日子，这个农夫认为黄蜂已经死了很久，它们确实是死了。克利夫把这个大黄蜂窝吊在他的“男人洞穴”里，继续给水厂写那些报告，却浑然不知里面留有好几十个活的蜂卵。当中央暖气开始运行时，它们突然或多或少地被孵化了，于是那些袭击在克利夫头上的嫩刺就像是微型的毒药注射器。当他的眼睛肿得睁不开之后，他觉得最好还是赶紧上医疗急救中心，但是他从车边的踏脚上跌下来，把一件新运动衫给毁了，当他坐进车子，却不能睁眼开车，所以就打电话叫救护车，他摸索着电话上的号码却按错了键，他打给了西尔斯洗衣机的修理工。等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鼻子竟有一个没熟的小南瓜那么大。救护车服务、急诊室治疗、药物注射，这种种费用贵得惊人，不过，让他足足一个星期愤懑不平的是来自西尔斯的一百零九美元的服务费账单。

这天，“以物易物商店”的节目比平时要略微长一点，最后报出的物品是一台老式的木匣收音机。他记起他祖父的克罗斯利 669 型收音机，儿时他得到许可可以摆弄它。那时候的广播很老式，音乐声朦朦胧胧，流行的是软绵绵的乐曲，夹杂着渺渺的静电干扰，就像木匣子里起火了，广播员的声音模糊不清，好比爱德华·R·默罗，甚至在做彩电广告时也是如此。祖父让他很晚睡觉，十点钟之后他会把收音机调到警用波段，自从 1940 年代之后这档节目不再广播，但是再往左边一直旋转下去，他可以在一个澳大利亚业余无线播音员的语音中取乐，那人总是谈论钓鱼。他按下另一个按钮，整个装置会进入弃而不用的短波波段，而有时候他能够听到像是说中文的声音，收音机里的吟唱带着遥远而神秘的朦胧感，像是某种在支离破碎的梦境中来来去去的意识。

他匆匆记下卖主的电话号码，在铃声响了很多遍之后，他和一个声音嘶哑、名叫塞尔玛·麦基森的妇女通了话，她住在布卢沙弗特附近。她对收音机目前的状态不清楚，只知道她已死的儿子开过一家电子修理铺，几年前曾把它修好了。她开价五十美元。克利夫打电话给水厂，请了一天假。

西弗吉尼亚的布卢沙弗特离克利夫的家只有二十英里。在过去六十年里，这地方在慢慢走向衰亡，每年有一个公司倒闭，每年秋天会新增十幢用木板封死的屋子，与此同时，五十个工人搬离此地，直到这座城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座大农舍，被它那群长大成人的孩子遗弃了。收音机里，声音咆哮的老播音员在宣读庭院旧货和二手车的出售地点，好像他几乎看不清打印好的稿子。

克利夫开车经过很多落满灰尘、里头空荡荡的店面。它们后面，袒露泥土颜色的山脉在远处连绵起伏，山上分布着带状的缝隙，里面是劣等的煤炭。麦基森太太住在一座二层结构的大木屋里，四周被宽大、斑驳的走廊围合着。他敲了敲门，等了很长时间，他以为自己被忘记了，或者因为那台收音机已经卖掉，所以她不来应门。但是敲了门并等了六七分钟之后，他听到缓慢的、伴有喘气的脚步声，并看见白色的陶瓷门把手像时钟的秒针在慢慢转动。

麦基森太太的背部笔挺，两眼像青柳瓷器那般清澈，但是有点岁数了。她为迟迟开门而抱歉，一边示意他进来，一边解释着，她刚过了九十八岁。关上门之后，她上下打量着他。“你的中段有点粗厚，是吗？”

对此他有点语塞。

麦基森太太举起一只手说：“我的父亲过去常说，一只肥胖、快乐的狗不会快乐太久的。”他们踩在发出嘎吱嘎吱响的地板上，她把他引入到后卧室，指着那台收音机。“这是我大儿子的，他叫弗农。”一台硕大的落地式红木匣收音机竖立在高窗的旁边，他得知，一根铜质天线蜿蜒地从窗框下面穿出，一直通到屋顶，然后系在两根棍子中间，一根在屋前，一根在屋后。

“它比我想象中要大。它把它靠墙的一面转出来，看出它是飞歌 41-290 型，带有调频、调谐、调幅，短波和警用波段。“它能用吗？”

她突然用手指着墙。“把它插上去，我的孩子。你知道，它是靠电来运转的。”

“我不这么认为。它可能会冒烟烧起来的。”

“哦，胡说什么！你不敢是吗？它会播放得很好的。”

克利夫向她投以怀疑的一瞥。“还是小心点为好。”

“哦，看在老天爷的份上。”麦基森太太慢慢弯下身子捡起插头。

“别。让我们商量一下，四十美元你肯卖吗？”

她挺直身子说，“你在口袋里留下十美元想做什么呀？不会是买一艘游艇吧？”

他低头看着那蒙有灰尘的收音机外匣，由于它上面的家具蜡，他应该能看到自己的映像。“哎，好吧，就五十美元了。”

她伸出手，手掌宽大，一点也不颤抖。“我丈夫说，或者是说过吧，弗农在这灰尘蒙蒙的旧东西里装了很多新的电子元件呢。在他心脏出问题之前，他真的过着很好的生活。”

克利夫掏出皮夹子，蹙着眉往里看。“哦，你的丈夫已经过世了？”

她摇摇灰白的头。“没有，我们只是去年离婚了。”

“真的？你们结婚有多久？”

她摸了摸下巴，闭上眼睛。“七十三年。”

克利夫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你们为什么在七十三年后离婚？”

她耸耸肩。“哎，我们想等到孩子们死后再分手。”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克利夫用一辆手推车把硕大的飞歌收音机推进屋子后端的“男人洞穴”，在那里和它为伍的是，一直只被老鼠啃过的食蚁兽，一个B24型螺旋桨的残余部分，一个巨大的火车头活塞，一台玻璃上有两个弹孔的自动唱机，一件染有血迹的紧身衣，一幅用二十个红色热水袋组成的抽象拼贴画，还有很多其他怪异之物，全是通过“以物易物商店”购买的，要不就是他朋友——那些坏品味的优秀裁判者——送的。一位工作上的熟人送了他一只塑料驴子，它的背褡里放满了卷烟。当克利夫第一次提起驴子尾巴时，从动物的臀部弹出一支发霉的“好彩”牌卷烟。

那天深夜，克利夫把飞歌收音机的后板抽出，发现里面非常干净。几乎每一个电子管、电容器、电阻器都被更换过，好像还增添了一些现代电子元件。插头线也恢复了安全等级，是一根裹着青铜色织物的电线。克利夫决定绕着房间布一条临时天线，让这个装置投入运行。

随着“咔哒”一声和“嗡”的一声，他开始在收音机的调频、调谐、调幅装置中巡游，然后是一阵像锯琴奏出的高亢哀鸣声，所以他转动转换开关，进入当地的乡村音乐电台。那声音就像他祖父的收音机，但是声音更清楚——泰勒·斯威夫特那种大而柔软无刃的声音。当他为县里写一份实验室报告的时候，他把收音机调到广播一首老歌的波段，边写边听。然后他又试验警用波段，那是空的。克利夫简直不相信地球上竟有什么空的东西，更不用说无线电频段了。他以爬行的速度转动旋钮，最终在刻度盘的左侧停住，他听到一艘船在呼叫一名引航员从密西西比河河口出来，赶往墨西哥海湾。谈话全是有关水位，流向，和方位，持续了二三分钟，好像引航员正在夜色中漂游。然后是卡吕普索音乐飘荡了一会儿就马上消失了，那旋律就像一头敏捷的鹿从车头灯前经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然后一位老者唱“给你两支栀子花”，是声音轻柔的独唱，接下来是更长久的死寂，然后这沉寂被悦耳的手风琴声打破，然后又是哑然无声。克利夫呷了一口威士忌酸酒，将一把椅子拖到收音机旁边，然后转动一个按钮进入短波。得克萨斯州德尔里奥的一个业余电台宣布成立，开始广播了一大串斯佩德·库利的西部摇摆舞音乐。很晚以后，他进一步转动刻度盘，一点东西也收



图片来自 [Christian Lue on Unsplash](#)

不到，直至他听到源源不断来自象牙海岸的英语新闻，他移身到沙发上。克利夫和妻子几乎从没离开过他们住的州，一年两周的假期并没有让他们有多大的活动范围，但是在这个夜里，他第一次领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巨大和丰富多彩，他听到很晚，直到倦得躺倒，在1947型的普利茅斯行李箱里睡着了。

在淋浴和修面的时间，塔米叫醒了他。她提出收音机有过热的迹象，如果不把屋子烧毁，他该把它拿到布卢门撒尔老头的电子修理行去作个安全检查。在上班的途中他把这个大家伙丢到修理行里，下班时带回它，布卢门撒尔先生告诉他收音机安全无虞。

在帮忙把这个庞然大物装上车的时候，修理工人说，“你可知道，这个老姑娘已被重新设计过。我的意思是，不仅元件被更换了，而且每样东西都作了改进。好像有人试图让它在一个特殊的电台更加强劲有力。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电路，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匣子里。”

克利夫关上车子的舱盖式后背，吸了一口气。“我只是想知道它是否会着火。”

“不会，不会，”布卢门撒尔先生说，“这些元件很容易发热，这是正常的。希望你能收听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那天夜里，克利夫和塔米一起坐在“男人洞穴”里看橄榄球赛，比分达到48比18之后，他妻子站了起来。“在这只火鸡上浪费时间毫无意义。你的收音机怎么样？”

“布卢门撒尔先生说没问题。”克利夫打开短波，立刻听到一条达美航空的航线要求

改变飞行高度的消息。但这就是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一颗飞快而过的语言流星而已，再没有其他的了。旋转刻度盘，他发现了另一个从船上发到岸上的无线电广播，一艘拖船的引航员在俄亥俄河的一个水闸上要求排队依次过闸。然后寂静无声。“在深夜里，”他告诉她，“又有几件事情发生。”

她交叉着双腿，身子靠在收音机上。“真有点儿恐怖，好像我们在做间谍之类的事情。我是说，这很有趣。”

喝过两巡酒后，他们发现一个来自土耳其的肚皮舞音乐节目。塔米跳起来，摆动双臂，扭动臀部，直到跌倒在那张普利茅斯沙发上。十一点三十分左右，音乐渐渐减弱，他们便不再收听。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克利夫养成了在就寝之前搜索电台的习惯，周末有时候会晚到凌晨一点。他听到马林巴琴音乐、古巴俱乐部音乐、阿拉斯加人的恶骂、三个大陆边远地区的布道、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用口音很怪的英语对新几内亚的广播，全都是微弱的信号，除了所罗门群岛上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广播点，来自一个城镇，播音员说，就在吉佐附近。

在十二月的一个早晨，克利夫接到上司的电话，说实验室阁楼上的水管结冰并爆裂，要他不用来上班，因为那地方被水淹了。他在客厅里看了一会儿新闻，然后进入他的洞穴看看短波里有什么可听的东西。他的运气一直不好，直到他在电台调节器上找到了那个点，那个所罗门群岛上的广播站，传来的信号非常强。在九点钟，有人正在播放一位女喜剧演员的老唱片，是最初在卡茨基尔山区的一个夜总会里录制的，播音员解释，录制时间是在四十年代初。克利夫查他的笔记本电脑，发现此刻吉佐的时间已是凌晨一点钟以后。这台老飞歌有八个预调按钮，他用手指一个一个地使劲按；四个按钮传递出像WWL和WSM等老牌广播电台，有三个什么也听不到，但是那第八个按钮让收音机回到所罗门群岛，他听到同一个语速很快的女子在讲述一系列经典的酒吧故事。她那明亮的女低音本身就是一种能量，压过了俱乐部的噪音。

一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一个顾客走进一个酒吧，一条金色的猎犬跟着他。酒保抱怨：‘我们这里不允许狗进来。’顾客说，‘但是我的狗，它叫简，能讲话。’这我不管，酒保说。‘我在这里每星期能遇到两条会说话的狗。’[听众爆出笑声。]是的，但是这条狗能做其他狗不能做的。”能做什么？他问。“它能购物。我将给它一个美元，我敢和你赌十块钱，它会带回你让它买的东西。”我接受这个赌注，’酒保说，‘要它去外面，买一份城市的《晚报》版。’[更多的笑声。]该顾客给了这条狗一美元，把它送到门外。一分钟之后，它回来了，嘴上叼着的正是要买的报纸，并且说，清楚无疑，‘给你。’好，不错，酒保说，给了狗的主人十美元。但是让我们看看它是否能做更复杂一点的事情。”那只狗竟然大声回应，它说，‘好，伙伴，让我试试。’[又是一阵笑声。]酒保给了狗十美元，他说，‘赌一百美元。街的那边是吉姆餐厅，给我去买一只大汉堡包，不要芥菜或泡菜，多点蛋黄酱和一大份薯条。’好，’狗说，蹿出门去。十五分钟之后它回来了，口中叼了一个袋子，里面是那份正确无误的订餐。酒保愤怒地说，‘我给它一百美元，我们把赌注增加到一千美元。这是交易，听着婊子：从这里往南四条街，有一家天堂酒店，我想要一夸脱黑牌杰克丹尼威士忌和一瓶1926年酿造的、产于卢瓦尔河谷的法国葡萄酒。’简嘴里叼着一百美元纸币慢跑着离开。二十分钟之后还没回来，两个人着急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跑到街上去寻找这条狗。最后，这位顾客从一家美容院的窗子看进去，看到他的狗背靠在一把可调节的椅子上，它的外套被刷得干干净净，染了色，一个饰有珠宝的领子绕着它的脖子，它的耳朵正被烫成波浪型的，一个亚洲女孩在费力地为它涂亮粉红色的爪子。它的主人跑进店并且喊叫，‘你到底在做什么？’狗说，‘我从没有过一百美元。’”[笑声雷动。]

喜剧女演员又讲了两个故事，然后在夜总会管弦乐队奏出的一阵狂响音乐中，在此起彼伏的喝彩浪潮中，她悄然淡出。不管她是谁，这漫长的搞笑是她惯用的手法。

那广播员带有一种怪异的英国口音，要求听众在星期四和星期六的凌晨一点整进入电台，听更多沙莉·格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演出的喜剧录音。克利夫关掉收音机，但是那个喜剧女演员活泼的声音在他耳畔挥之不去。她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快乐。夜总会的群众爱她，她肯定非常有名。

到了下一个星期六，他收听了全部节目，他调整了他的工作时间，这样他还能听星期四的节目，那节目持续了十五分钟多一点。互联网对如此一个喜剧女演员竟然一无所知。就这样他听着笑着进入了新的一年，被那声音，被那节奏迷醉了。弗农·麦基森可能很欣赏这位喜剧女演员的表演，因为他重新为这台老飞歌接了线路，把焦点放在电台调节器的这个点上。他对沙莉·格伦充满怀想，想知道她死于何时？她来自何地？但是，为什么这些录音带竟是从地球的另一头播送过来的？这同样是一个令他思虑的谜。

他从他的便携式电脑里查到，吉佐地区仅有一个短波电台。在那里，他联系到的那个人用僵硬的英语说，他的电台不广播喜剧节目，但是有一个住在附近岛上的日本老绅士，作为业余爱好，在政府的微薄资助下，一天二十四小时管理一台修整过的、二次大战留下的装备。克利夫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联系到松本先生，他是第三个轮班的播音员及电台业主，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详细地谈了他对老式广播设备的热爱。

最后克利夫找到一个机会，问了他们凌晨一点钟广播的喜剧节目。

松本先生笑着说，“那是因为我们有最便宜的广播成本。”

“我不懂你说的。”

“你提到的节目是一个系列，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喜剧女演员的丈夫用四十八盘磁带，在纽约、芝加哥、洛山矶等地录制的。我们收到来自世界各地谈论它们的电话，大概每周四到五个。我们一遍一遍地播放它们，至今已有二十三年了。”

“人们没听厌它们？”

那人再一次笑了起来。“我们有广泛的听众，多半是偶然而来。再说，笑话好比是傻乎乎的朋友，你每年至少可以见上两次面而不会觉得太多。”

当克利夫问松本先生是怎样得到这些录音带的，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

“说起这事还真有点奇怪。大约在二十年前，我去看望住在西弗吉尼亚的姐姐。她有一台老旧的真力时收音机，想修复它，于是我找到一个在当地经营商店、名叫弗农的人。他是个瘦骨嶙峋的金发小伙子，个子非常高，和我一样，对无线电历史非常感兴趣。在我客居我姐姐家的两个星期中，我们天天见面。几年之后，弗农以股票基金的形式寄给我一万美金，用以广播他母亲的喜剧节目，最终我们数字化了她的旧磁带。两年前我试图联系他，发现他已经去世了。”

在继续问下去之前，克利夫先得坐下来，“真的？他母亲是喜剧演员？”

“是的，我们将永远广播这些节目。我的儿子正在接手电台。谁知道这些出自纽约的科帕、蓝天使以及芝加哥的切兹帕里[1]的笑话能够流传多久。甚至还有来自康科德的。”

克利夫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听到的广播中没有提到这位喜剧女演员的真名，她不叫塞尔玛，是吗？”

“当然。她的艺名是莎莉·格伦，但是她是弗农·麦基森的母亲塞尔玛。顺便问一下，你从哪里打电话来？”

“俄亥俄，离莎莉住的地方不远。最近，在我买下弗农的一台收音机时，我见到过她。”

“不。那不可能是同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生于一九一七年。”

“正是她！”

松本先生激动起来，当他用日语向电台里的其他人呼喊时，他的声音抑扬起伏。“她的头脑还清楚吗？你觉得她能够接受一个采访吗？我将乐意和她作电话交谈。也许会有几场长谈，如果她能胜任的话。我们需要规划一个明年开始启动的超高频电台。”

“我认为她行，但是我不能保证她是不是想这样做。”

“你是她的熟人。如果你为我们安排好这事，在采访中我会谈到你是谁，谈论一点点你，你是怎样遇见她的。我将每年播放两次。”

“我没把握。”

“你确定？我能使你出名。”松本先生开玩笑地说了这句话，但是克利夫从椅子上站起来，兜了一个圈子。

好几天，他试着打电话给塞尔玛·麦基森。在接下来的星期六，他驱车去了布卢沙弗特，早晨十点钟他在那幢老屋前面停了车。草地该割了，这地方似乎没有任何变化，除了屋子的护墙板上有更多的油漆剥落。他敲门期间，没人来开门。于是他在车里坐了很久，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方向盘，显得越来越焦虑不安，他决定绕到后面去，他步入一个挂着烂拖把和锈镀锌铁桶的门廊。此刻，他觉得自己简直在犯傻，这妇女九十八岁，说不定已经死了。当他想起在他姥姥的丧礼上他母亲对他说——不管什么时候，一个老人的死，意味着一座图书馆烧毁了——一阵令人沮丧的失落感，使他从头到脚打了个寒颤。

但是当他再次转回这幢屋子，只见一辆大轿车停在他的车后，一位年龄大约六十五岁的妇女扶着塞尔玛·麦基森走下车，进入阳光之中。那老妪向他挥手，“喂，你好，”她说。“但愿你来不是为了要回买收音机的钱，我赛马输得精光了。”

“不，夫人。我只是想耽搁你几分钟，问你一些有关的问题。收音机性能很好，正如你说的那样。”

当车的后门砰地打开的时候，塞尔玛·麦基森用一只布满斑点的手拉住克利夫的手臂。“看看你能否帮一下比尔先生，让他从那个低座位上出来。那是我丈夫。他曾经身体挺拔，他能够自己移动。”

他走到路边，从车里直直地拉出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身穿蓝斜纹布裤和一件厚毛线衣。他没来得及阻止自己，就回头脱口而出，“你不是告诉我你们离婚了吗？”

老头看着他妻子，摇起了头。“你跟他讲了那个老人和亡故孩子的故事？”

“这是个玩笑，孩子，”塞尔玛对他说，“你不知道一个玩笑是什么吧？莫莉是我的女儿，我另外还有两个活着的孩子，弗农是我们唯一失去的，他生前一直心脏衰弱。”

一进屋子，比尔先生就坐进一把摇椅，好像立刻睡着了。当莫莉去厨房的时候，塞尔玛和克利夫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后来，他边喝咖啡，边解释他是怎样发现她的喜剧节目，它们又是怎么被广播的。他猜想，知道自己的节目还在被人们聆听，她一定会十分惊异。他告诉她，松本先生不知有多么兴奋和激动，因为有可能就她的演艺作采访。

克利夫说话的时候，塞尔玛的蓝眼睛和他对视着，但是她的表情没有变化。她摇摇头说，“孩子，这些节目，我们在弗农那台特殊的收音机里听了十年。他花了整整一年修整这台收音机，再花两年时间找到某个人，让我上了广播，所花的时间比我做

节目的时间还长。听他的收音机很有趣，但后来变老了。弗农去世后，我不想再听任何东西。我和比尔先生还能背出这些节目，而弗农，他是如此爱我，他深夜里播放这些磁带，我们能够听到他一个人自个儿在楼上大笑。他活着的时候，总是爱问我为什么要退出这个节目，他会告诉我，我本可以很有钱，很出名，等等。最后我告诉他真相：他降生以后，我是多么爱他，于是决定再生安妮、查克和莫莉。”

克利夫背靠在有花饰的沙发上。“他想让你出名。”

“我猜是这样。”然后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有一次他告诉我，无线电信号如何在空中到处蹦跳，我的声音正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登陆。他说这会持续好多年，哦，有一天夜晚他是那么一本正经，倚在我身上，像小时候那样。”说到这里，她把头转向克利夫，靠得更近了，她苍白而布满皱纹的脸和她年轻的眼睛是那样的不相称。“他告诉我，一些信号会怎样直上太空，奔向各个星球。某天我的一个笑话会擦过冥王星，继续穿越到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地方，远远超过我们视线所及。有时我会想，我们发出的声音怎么永远不会真正停止，然后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出名的，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

“你希望我对那个电台广播员怎么说呢？”他问。

塞尔玛转身面向她的丈夫，他睁开眼，对她使了个眼色。“你可以告诉松本先生，”她说，“他已经掌握了够多的，尽管不是最好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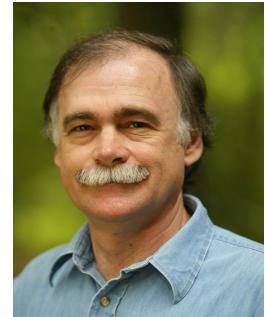
克利夫的脸沉了下来，他注视着地板。“他说他会在采访中提到我的名字。他会讲述我怎样发现你并和你取得联系。”

塞尔玛向后缩起身子，轻拍着他的肩膀。“克利夫先生，如果你想众所周知，那么到你自己的院子里去，对着天空喊叫你的名字。”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很生气。桌子上有他妻子留下的便条，说她去邻镇一个生病的姨妈家过夜。他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一阵子，感觉像是得了流感，所以他走进“男人洞穴”，想打一个盹。但是这个他曾经耗以大量时间的空间，此刻似乎在谴责他，他不忍去看它一眼。突然，他用拳头把那个麋鹿头猛击到地板上，把它推出后门，摔倒阶梯下面的院子里，它落地的时候，腾起一股鹿的头屑和松散毛发的烟雾。向立陶宛表示致敬的牌桌是下一个，接着是令人讨厌的驴子，被他扬臂抛入黑暗之中，然后是可怕的人体模特和其他所有的东西，到一个小时之后，房间里除了那台收音机，什么都没有了。他在厨房里找到一瓶家具蜡，把收音机的外匣全部擦了一遍，然后把它调到一个庆祝法国手风琴节的电台，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听着，一直站到双腿发酸。调高音量之后，他转身出了后门，经过令他尴尬的废物小丘，一直走到篱笆，然后在树丛边缘的漆黑阴影中止步，从这里听，收音机里传来的只是一阵晃动的鸣响。他仰望夜空，星星像是涌聚的鱼群，一股银色的信号之流。

“喂，”他大声叫喊，“我的名字是克利夫。”

[1] 科帕、蓝天使、切兹帕里都是当时著名的夜总会。



蒂姆·高特罗（1947-）

美国南方小说家，在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教授写作30年，退休后任驻校作家。高特罗熟悉南方蓝领阶层和路易斯安那州法国人后裔的生活和文化，作品主要讲述这些人的故事。

译者：程应铸

《收音机的魔力》(Radio Magic)，选自Signals: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 (Copyright © Tim Gautreaux, 译文由群岛图书授权发表)



来自 [Eduardo Garcia-Nieto](#) on Unsplash

## 小说

# 关于爱丽丝的一切

丹尼尔·麦克劳克林 | 故事群岛

## 她想要像离开露天游乐场的气球一般离开她的生活。

八月总是有很多垂死的绿头苍蝇。它们聚集在窗格上，犹如一块蓝绿色的丝绒，薄纱般的翅膀拍打着窗玻璃。它们懒洋洋地停在窗沿上，乌压压的一片。爱丽丝慵懒地陷在厨房的一只扶手椅里，注视着她父亲的奇怪芭蕾。他的裤脚管高高卷起，露出脚踝，每次踉跄地抬腿跨出一步，裤脚管就会掉下里一点。他追着苍蝇乱拍，手中的报纸在半空中疯狂地扇来扇去。

“蠢货，”他大喊，“贱人。”

发狂的绿头苍蝇像喷火战斗机一般打圈飞舞。它们在灯罩上跳来跳去，在摆着爱丽丝的爱尔兰舞蹈奖牌的柜子周围嗡嗡地飞。一只乌黑发亮的苍蝇停在电视机上休息。啪！一只苍蝇掉到地上。爱丽丝凝视着窗外，因为厨房里充斥着苍蝇被拍死在油毡上的声音。

外面的院子里，周日卫生间扩建工程停工，没人在镀锌钢板屋顶上干活，也没有货车摇晃经过的动静，屋脊上倒是积起了一些早早落下的树叶。一只被人丢掉的塑料袋在大门内的灌木丛中飘扬。爱丽丝的父亲跌坐在他的椅子上，面色潮红，脸上写满了凯旋之喜。他拂去报纸体育版封面上一只半透明的苍蝇翅膀，开始翻看。

“还要茶吗？”爱丽丝都没试图伸手去拿茶壶。她的父亲从来没有要加茶。他身边的桌子上摆着他五颜六色的药片。爱丽丝撇了一眼钟。十点半。她的父亲要坐四点的巴士去西科克<sup>[1]</sup>跟他的亲戚奥丽芙一起度假一周。他的行李箱已经在前厅里摆了三天了。爱丽丝也在算着时间，倒数日子，想到即将独自一人呆在家里，让她很开心。她今年四十五岁。

周一早上，她在天花板上挂起了粘苍蝇的诱纸，这是父亲出门后，她的第一个为所欲为的行为。她的父亲讨厌苍蝇纸。很快在爱丽丝喝茶时，就有一只苍蝇粘在她脑袋上方螺旋打转的苍蝇纸上死掉了。吃完早饭，她把盘子放在水池里，浸在一只平底锅漂着浮渣的脏水里。水池上方的架子上摆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神情苛刻的女人六十多岁将近七十岁的样子，头发全部往后梳，紧紧地盘成一个发髻。她的眼睛，跟爱丽丝的一样，灰中带点绿。一个男人曾对爱丽丝说她的眼睛是海上暴风雨的颜色，但照片上那双直视前方的眼睛却是沉郁消极的。可怜的妈咪。

爱丽丝拿了一杯茶走到外面的会客室里。她审视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形象。不在家的

日子在她脸上留下了皱纹和阴影，它们每年都在加深。她坐在沙发上，灰尘和阳光让沙发的花朵图案有点褪色，她思考着自己要做什么。她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自由犹如狂野的西部，任由爱丽丝肆意驰骋。她回忆起一段往事，很多年前的一个早上：巴塞罗那，阳光透过白色窗帘的缝隙斜斜地照进来，黄色玛德琳蛋糕的碎屑洒在她的早餐盘子上。然后是城市，硕大瑰丽，在她的眼前闪烁。

爱丽丝感觉胃里涌起一股希冀，感觉它和茶水一起轻柔地晃动。她想要像离开露天游乐场的气球一般离开她的生活。从生活津津的手里溜走，漂浮而去。她看看手表。想象她的父亲正跟奥丽芙一起踩着深色的海草泡沫，听着泡沫裂开的声音，走在海滩上。时间正一分一秒地过去。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大街上散布的灰色楼房，再度思考着自己今天该做什么，直到她终于有了主意。她要做一炉女王蛋糕<sup>[2]</sup>，然后带着它们去玛丽安家。

“生活并非全是浪漫，你懂的，爱丽丝。你在想，这里是玛丽安和她十全十美的房子，她十全十美的老公，门外挺着一辆簇新的菲亚特。好了，我跟你直说吧，爱丽丝，既然你问了：生活并非都是月光和玫瑰。”

爱丽丝肯定自己没有问。之前玛丽安开门时，怀里抱着一个新出生的婴儿，脚边跟着另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现在她脚踩一块茶巾，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用脚擦拭地砖上的婴儿呕吐物，犹如在跳一曲慢步华尔兹。她每次转身，就会有更多的婴儿呕吐物滴在她的肩膀上。

透过通往花园的玻璃门，爱丽丝能看到阳光在烧烤台银色罩子的反射下舞动，把油漆过的橡木露台照得暖洋洋的。阳光突显出露台家具有品位的奶褐色，流连在赤陶花盆里绽放的夏末花朵中间。自从玛丽安嫁给尤金后，她的生活主题就是“烧烤”、“晚饭”和不锈钢露台取暖器。爱丽丝抚平她新买的闪片上衣，等着玛丽安夸它美。但今天玛丽安没有会意，忘说了她本该说的话。孩子们的各种需求，让她比平时更加心事重重。

“是不是乖宝宝呀？是的呀！”玛丽安俯身把婴儿放在沙发上，给他换尿布。“脚趾头，啃啃脚趾头。”她一边说，一边用嘴唇含住婴儿的粉色脚丫，假装要吃它。婴儿开心地扭来扭去，发出咯咯声，玛丽安轻轻地啜啜他的脚趾，也对他笑。爱丽丝烧了一壶开水，在橱柜里找了一个干净的盘子放女王蛋糕。她开始把它们整齐地摆成一圈。

“你把茶包放在哪里？”

玛丽安把婴儿的脚丫从嘴里拿出来，茫然地四处看看。仿佛她完全忘记了爱丽丝的存在。“尤金不许家里有它们。”她说，“它们致癌。”

“茶包？”

“是的，连有机茶包也不许。你能相信吗？”

玛丽安把扭来扭去的婴儿仰面放在游戏围栏里，然后从地上抱起小孩，把他放在婴儿身边。她泡了一壶散叶茶，在爱丽丝对面坐下。

“谢谢你的小蛋糕。”这些日子，玛丽安总是说小蛋糕。玛丽安嫁给尤金后，就再也不把它们叫做女王蛋糕了。

“爸爸这周不在家。”

“我听说了。”

“我想我不如做点什么。”

玛丽安拿起一盒牛奶，往自己的茶里倒了一些。“比如？”

爱丽丝耸耸肩。“我不知道。认识个什么人。”

玛丽安叹了一口气，用手指沾起蛋糕的碎屑，放进嘴里。“你是指男人？”

爱丽丝点点头。

“麻烦的是，爱丽丝，这里周围的男人都认识你。”

“我想我可能会去一趟都柏林。”爱丽丝说。

玛丽安摇摇头。“太危险了。”

“速配约会？”

“太多不认真浪费时间的人。”

爱丽丝感觉早晨的希望开始在她的胃里凝固。她再度努力解释自己的计划。“我可以去夜店玩。”

“你自己一个人？”

玛丽安说话时嘴里塞满了蛋糕。“现今女孩子被期待做很多事的。”她意味深长地看了爱丽丝一眼，“你从来都没听说过的那些事。”

玛丽安说起话来仿佛她是这小城里唯一一个跟男人睡过觉的女人一样，爱丽丝想。她说起来，仿佛她知道关于爱丽丝的一切。爱丽丝想告诉玛丽安，昨晚她在市政厅后面跟一个非常棒的工程师做爱来着，他是从外国来的，浑身上下布满文身。当然，她并没有做这事。昨晚爱丽丝在一把扶手椅里睡着了，下半夜醒来时又冷又不舒服，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杯泡了很久的冷茶。事实是，爱丽丝四年没有跟男人睡过觉了。玛丽安，则跟这座小城里的其他所有人一样，确实知道关于爱丽丝的一切。

爱丽丝的茶杯见底了。她害怕看杯子里面，以防杯底的树叶花纹里显现出什么图案。她害怕自己可能有这种天赋。可怜的妈咪有这种天赋，这没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她转而看着桌子对面的玛丽安，看着她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油腻腻的头发，开襟毛衣上的婴儿呕吐物。她突然清楚地看到了她朋友的生活是一片荒凉孤寂的废墟，就像她能清楚地看到她自己的日子也是一样。她感觉到日光渐退，感觉到傍晚和厨房慢慢逼近她。

一整天从她身边溜走了。“尤金有朋友吗？”提到尤金，这个毫无特色的乏味男人，爱丽丝觉得有一块女王蛋糕卡在了她的喉咙口。这时孩子们哭起来，玛丽安回到游戏围栏边，抱起闹腾的小婴儿。刚会走路的小孩开始呛住了，玛丽安弯腰从他嘴里扣出一只塑料奶牛玩具。当她再度直起身子时，她说：“足球队里有几个新人。他们明天晚上过来搞烧烤。你可以过来玩一会儿，看看情况。”

她再度在爱丽丝对面坐下，把婴儿抱在膝盖上。她把依然黏着小孩口水的塑料奶牛放在她俩之间的桌上。“这些小伙子是从利默里克来的。”她说。她把目光从婴儿毛茸茸的脑袋上移开了一会儿，注视着爱丽丝。“他们在这儿一个人都不认识。”接着她别过头，透过玻璃门，望着外面的花园，一阵微风正把赤陶花盆里的花朵吹得摇来摇去。“我要说的就是，”她说，“你要把握住机会。不需要告诉他们你的年龄。不需要告诉他们任何事情。”

不算小孩，玛丽安的派对上有六个人。玛丽安和尤金在露台上，为没有烤熟的香肠吵来吵去。足球队的这些年轻男人里，有一个带来了女朋友，她瘦得像惠比特犬，大约十八岁，嘴唇上穿着一个环。爱丽丝跟一个名叫贾拉斯的男人一起坐在露台的桌子边，看着一只黄蜂淹死在一个果酱瓶里。贾拉斯二十多岁，最多三十岁。他的发际线已经早早地从太阳穴那里开始后退。他没有负担，至少没有任何爱丽丝能想到的负担。正如可怜的妈咪会说的那样，他几乎不可能会太着急。他不是世上最帅的男人，也不是最会讲话的那种。但他肩宽，个高，而且爱丽丝喜欢他跟她讲话时脸红的样子。

“那么，”贾拉斯说，“玛丽安告诉我你以前是一名教爱尔兰舞蹈的老师。”

玛丽安一点也没脑子，爱丽丝想。这话似乎无伤大雅，但过去的经验让爱丽丝明白，只需一些原音和辅音，这句话就能很快演变成她为什么不再是一名舞蹈老师了。爱丽丝明白并没有一道闩着的门阻挡人们探求她的过去。过去是一道敞开的门，最好的办法是在走廊上加快脚步，走过那道门。她叹了一口气，拖着椅子凑近贾拉斯，这样他们的大腿就能互相擦到。“不聊我了。”她说。

这天下午的早些时候，爱丽丝的父亲从西科克打来电话，提醒爱丽丝把垃圾桶拿出去，提醒她去就业中心，虽然至今爱丽丝已经去就业中心好几年了。这晚结束时，贾拉斯没有问她要电话号码，但爱丽丝还是把它写在一张餐巾纸上，递给了他。

接下来的两天里，爱丽丝坐在厨房里，喝茶，等待。苍蝇纸上积累起了更多的苍蝇尸体。她用一块抹布擦拭她母亲的照片。可怜的妈咪。爱丽丝不在家的日子里，她的身体状况极速恶化，每个人都这么说。爱丽丝回来时，她形容枯槁。肺炎，死亡证明上写着。或许还不如直接写“爱丽丝”。

周四下午，电话响了。是爱丽丝的父亲打来电话，要她去肉店为周日预定一块猪背肉培根，不要太大，也不要太肥。依然没有贾拉斯的消息。周四晚上，爱丽丝抹上腮红、唇膏，穿着最低胸的亮片上衣，等在足球场外面。贾拉斯看到她时，呆住了。在折磨人的那个瞬间，他似乎要继续往前走，但他却朝她走来，默默地站在她的面前，爱丽丝尽力了。

在贾拉斯昏暗的卧室里，爱丽丝仰面躺着。她看见天花板上有一块阿米巴虫形状的污渍，衣柜上有一个橙色的交通锥。楼下，跟贾拉斯同住一个房子的两个男人把音乐放得更响了。贾拉斯躺在她的旁边，牛仔裤依然套在脚踝上。楼下的音乐停了，一度周遭一片安静，唯有外面街上一辆汽车驶过的聲音。爱丽丝忍不住一股想要说话的致命冲动。

“我离开过一阶段。”

贾拉斯在她身体上往下游走的手指停住了，抬起来静止在她的肚脐眼上方。“度假？”爱丽丝转身侧躺着面对他。“贾拉斯，”她说，“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真正后悔的事情？”贾拉斯耸耸肩，没说话。

“曾经，”爱丽丝说，“当我还是一名舞蹈老师时，我爱上了一个学生的父亲。他住在河对岸那些大房子中的一栋里。他的老婆依然住在那里。”

夏末闷闷的动静透过窗帘传进来：小狗的尖叫，草坪修剪器的嗡嗡声，青少年做爱时刺耳的叫床声。

“我以为那是爱。”爱丽丝说。她大笑起来，但笑声在卧室四壁上的回响让气氛显得越发尴尬。“他曾带我去巴塞罗那度过一个周末。”她用一只手肘支起身子。“你去过巴塞罗那吗？”

贾拉斯摇摇头。他几乎已经不知不觉地躲到床上远离她的地方，并开始穿裤子。

“你应该去看看。”爱丽丝说，“它很美。”她看着贾拉斯费劲地套上牛仔裤，笨手笨脚地拉着拉链。先前，做爱时，她的活力令他吃惊。玛丽安看到的话，也会佩服她。“当他试图结束关系时，”爱丽丝说，“我惊慌失措。我跟他说我会告诉他的老婆。”天色渐晚，房间快变黑了。贾拉斯坐在床上，系上靴子的鞋带。从爱丽丝嘴里冒出来的每一个字似乎都在进一步吞噬所剩无几的光线，但她忍不住。

“当然我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他老婆的。”她的目光跟随着贾拉斯，看着他从地上捡起衬衫。“但他以为我会说。他给了我一万块封口费。”

贾拉斯停下扣衬衫纽扣的动作。“一万块？”

爱丽丝点点头。“我带我妈去伦敦看望了她的哥哥，换了一辆车，还给厨房买了新的油地毡。然后我又问他要钱。”

“他给了吗？”

“他一直给钱给了两年，然后他去了警局。”

贾拉斯站在床脚边。他身后的墙上贴着一张电台司令乐队的海报，四角破破烂烂的，人脸都被乱涂乱画掉了。爱丽丝注意到置身于这个卧室里，脸颊泛红、头发汗津津的他看上去比在烧烤派对上要年轻许多。

“那么发生什么了？”

“我去蹲了监狱。”爱丽丝说，“各种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案子的报道。可怜的妈咪非常受不了；可怜的妈咪以为我还是处女。”

贾拉斯的脚在地毯上动来动去，他移开视线。爱丽丝为他感到难过。

“他还是离开了他的老婆。她说，‘我去蹲监狱的第一个夏天，他就跟一个从葡萄牙来的、在宾馆工作的女人一起消失了。’

“他们去哪里了？”

爱丽丝耸耸肩。“某个很遥远的地方。”

贾拉斯走到床的另一边，停下来拥抱她。那是一个安全、同情的拥抱，是那种她的亲戚奥丽芙周日早上送爱丽丝的父亲坐上回程的巴士时会给他拥抱。他摸摸她光着的肩膀。“照顾好你自己。”他说。

爱丽丝看着贾拉斯套上夹克，准备离开他自己的住所。她明白她说太多了，明白玛丽安会翻着白眼大为光火，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停下了。她抓着被单遮住胸口，从床上坐起来。“我四十五岁。”她说。

她父亲的行李箱重新出现在门厅里，等东西拿出来后，它会在楼梯下面放一年，也可能一放就是好几年。爱丽丝已经取下了所有的苍蝇纸。“喝茶吗，爸爸？”她给父亲倒了一杯茶，放在他摆着一把五彩药片的茶碟上。但她的父亲已经站在厨房里，手持一卷报纸搜寻苍蝇了。“蠢货，”他大喊，“贱人。”窗帘的褶皱之间有些动静，沉默的空气里也有些轻响。窗格上，黑得泛光的绿头苍蝇们，疯狂地一飞而起，最后一次对生命和夏季致敬。它们嗡嗡地飞来飞去，薄纱般的翅膀拍打着窗玻璃。

[1] 西科克（West Cork）是爱尔兰科克郡的一片地区，是传统的旅游胜地，以景色粗犷的半岛和各种海滩而闻名。

[2] 女王蛋糕（queen cakes）是一种用面粉、糖、枣子、鸡蛋和黄油做成的小蛋糕，上面撒有椰丝，又名“伊丽莎白女王蛋糕”，因为最初制作这种蛋糕是为了庆祝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



丹妮尔·麦克劳克林

爱尔兰小说家。曾是律师，40岁开始发表小说。以2015年出版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异星恐龙》一举成名。2021年1月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坠落的艺术》。

译者：程应铸

《关于爱丽丝的一切》（All About Alice），选自Dinosaurs on Other Planets (Copyright © Danielle McLaughlin, 译文由群岛图书授权发表)



图片来自 [Ralph \(Ravi\) Kayden](#) on Unsplash

小说

# 新生活

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库巴斯 | 故事群岛

她拥护的爱因斯坦的话变成了一道咒语。  
「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

她决定开始新生活。她不得不开始新生活。当她走进这间她托巴塞罗那的旅行社随意选订的小小的公寓酒店，立即感到这是个让她停止追问自己“怎么开始？”“从哪儿开始？”“开始新生活的方式是什么？”的理想之地。房间宽敞明亮。美式厨房，大床，设施完备的浴室，沙发，扶手椅，紧靠着墙壁的梳妆台，以及一面朝向格兰大道的大窗户。事实上，她通常入住的酒店——那间位于普拉多大道的历史悠久的酒店——没有空房对她来说其实是件好事。其他几间酒店——那些每当她的御用酒店的前台在电话里说：“对不起，客房都订满了”的时候她会选择入住的酒店——也都订满了。初春的马德里一定在举行什么大活动，但没人跟她解释其中的原因。一场会议，博览会，或是规模空前的大会。此刻，她靠在窗边，躲在深色墨镜里，入迷地看着热闹的街道，仿佛在观看一部大制作的默片。成千上万的群众演员，缤纷鲜艳的色彩，开始！其中一些龙套演员想要抢风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她看见一个穿着讲究的人在街道上横穿了四五次。那个男人究竟要去哪儿——假如他确实有目的地的话？她离开窗户，打开行李箱。两晚，只住两晚。然而，也许在别的情况下，她会在这里住得更久一些。一个星期，一个月……她打开电视机、音响和空调。在某个瞬间，她以为那就是她通常入住的那间酒店。并且找回了很久都未曾有过的感觉。她渴望阅读和写作，渴望把紧靠着墙壁的梳妆台变成书桌，渴望烹饪，渴望把冰箱塞满，渴望看话剧、看电影……然而，最重要的是，渴望回来。在每个夜晚回到那个让人愉悦的房间，那个她哪怕是一个细节也不会更改的房间。那房间是她的。她被分到了一间属于她的房间里。

她看了看钥匙。404。她从一开始就很喜欢这个数字。四加四，等于八。无穷——她想到——即是一个平躺的八。孤立在中间的零——她自言自语道——原则上是没什么价值的，一点儿也不重要。也许并非如此。也许那并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字母。比如，可能是代表氧气的 O。她深深呼吸。关掉电视机、音响和空调。思绪再次回到八。回到仍被她握在手中的钥匙。四加四，等于八。他离开已经快八个月了。日子被打乱的八个月。有时候，她觉得那段日子像永恒一样漫长，犹如平躺的八。有时候，又像一口一口被吐出的烟圈，不经意地在空气里漂浮。那就是她的八个月。永无终止，空虚乏味。

她来到街上。此刻她也加入到了电影之中。又一名群众演员。成千上万的群众演员之一。也许在那一刻，某个人也正在某扇双层玻璃窗后面、在某间酒店的隔音客房里观察着人群中的她。她希望那个观察者——无论是男是女——会突然间感到意外的轻松和快乐。和此刻的她一样。她沿着格兰大道往下走，再一次感叹自己多么幸运。

那个房间。如此非常美好的一天。对工作和开始新生活的渴望……她刚走过一个街区，就在一个广场站住了脚。她惊讶于这个在她看来是广场的地方却被称作街道——矮花街。但那个早上与其他早上不一样。她下定决心要让那个早上与众不同。于是她在一个露台坐下，打开日程本，写下：“矮花”。

她要了啤酒。决定以后再也不去住普拉多大道的那间酒店了。“矮花”完全可以作为新路线的地标。新爱好，新习惯，也许就迫使她从那一刻开始新的生活。她看了一下日程本。晚上约了一个朋友一起吃晚饭，第二天需要去某个办公室办一些手续。然而，晚餐的念头突然让她备受折磨，而那些文件和手续不过是她给自己来马德里待两天、换换空气的借口罢了。她写下：“取消晚餐，把文件邮寄过去”。她看了看前几天的笔记——格言、建议、乐观主义的召唤、行为准则——发现自己在狂怒之下将这些没用的东西划掉了，于是微笑起来。只有两句话逃脱了杀戮。一句坚定的口号——“活在当下！”——以及爱因斯坦哀悼朋友遗孀的话。“你丈夫比我早一点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对相信物理的我们来说，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她不记得他朋友的名字，也不记得其遗孀的名字。然而却记得多少次带着惊愕重读那句话，仿佛那句话是专门为她而写的。过去、现在……过去当然存在过！唯一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是过去。尽管有时候它穿上了现在的伪装。声音、笑声和整句整句的话语常常让她在电影院或在街上充满希望地回头，抑或让从梦中惊醒的她感到不安和焦虑。然而此刻……她叫来服务员，匆忙地付了啤酒的钱，也没等对方找钱。发生了什么？

她刚刚看见了他。看见了他。那个差不多已经离开这世界八个月的男人。那个曾和她一起生活的男人……他穿着一件焦黄色的旧西装——那件焦黄色的灯芯绒西装！——漫不经心地穿过矮花街的广场。她小心翼翼地跟着他。她没有自欺欺人。即使两者令人惊骇地相似，她也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场幻觉。然而她下定了决心让那个早上与其他日子不一样。她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当她走进 404 房间，立即感到那是她的房间。在那个特殊的早上，他，此刻正沿着格兰大道往下走，而她，则像一个影子，保持着安全距离，跟随他的脚步。几秒种后，他在报亭停了下来。她见他拿出几枚硬币，接过一盒香烟，然后继续往前走。不，她对自己说道。不可能。他很多年前就戒了烟。尽管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她想起这句话，也是在那一刻，她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在某天把这句如此让人震撼的话记了下来，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它。也许，在新生活中，她唯一做的事不过是跟踪任何一个看起来像他的人罢了……她没时间来同情自己、倒回去，甚至没时间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荒唐。他——不管他究竟是谁——仿佛感后颈上的目光，突然转过头，于是她只能躲进路边的门房里。她动作很快；没被发现。但看门人惊讶的面孔告诉她自己的行为荒谬可笑。不是吗？她告诉自己事实并非如此。跟踪心爱的人有什么不妥吗？一个男人违背自然规律地出现在马德里阳光明媚的早上，欣然地将他自身的过去否定。

她回到街道上，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第二次感到自己正参与一场电影的演出。唯一不同的是此刻她不再是一名群众演员，不再是一个被雇来凑人数的女人。她的脚步罕见地轻快，并且带有目的性。旧西装一直在她的视线中；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某一瞬间，她感觉到周围的人们都知道她在做什么，以及她的目标。正因如此，人们都看着她，聚在她的周围，为她加油打气……然而，那些话真的是为她加油打气吗？她已经不年轻了，很早前开始就使用那道隐形的门穿梭往来；在那里她可以随意行动而没人会注意到她。而此刻，在她最需要低调和匿名的时候，却成为了评论、观察、违心的恭维话、厚颜无耻的提议……的靶心。那个早在格兰大道上发生了什么？她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间，他迈起了大步，于是她不得不小跑起来。她不再在乎人们的目光，也不为某个开玩笑挡住她的去路的傻瓜所动。她不能跟丢了。他的大步伐……那正是他走路的方式：迈着大步伐。此刻，他突然停了下来。他常常这样做。当他想起某件急事的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她喘了口气，站在一间香水店的橱窗前。就几秒钟，她心想。直到他再次走起来，我就能继续跟着他而不被发现。然而，她从一面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模样，并站住了脚。目瞪口呆。一动不动。神魂颠倒。

因为那是她。谁知道是多少年前，但那是她。她穿着短裙，头发披着，长发。一头发亮的暗褐色头发。她看起来很漂亮。非常漂亮。但她曾经那么漂亮过吗？她希望自己是在梦里。在别人的梦里。心爱的男人——无论他在哪儿——正在梦着她，而此刻她正从他的眼睛里看着她自己。在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在他的眼里应该就是那副模样。在那个遥远的过去，一切仿佛都有可能。她吸了一口气，感觉自己曾经历过那一刻的场景。橱窗，镜子，她少女时代的模样，格兰大道阳光明媚的早上……海市蜃楼。也许只是一个光学现象罢了。阳光，她的映像，镜子的花招，橱窗里的物品和海报与她的影像混在一起……

“你跑哪儿去了？”她突然听见有人问。

她用手寻找支撑物，避免倒下。他在那儿。很高，很瘦……像他们刚认识时那么年轻。此刻她深信不疑。那个穿着焦黄色西装的男孩站在那儿，在她身后，刚刚把手放在了她的肩上。

“走吧，我们要迟到了。你忘了我们约了特特吗？”

他揽过她的腰，而她则任他摆布。特特·波奇。特特·波奇已经去世许多年了。特特是朋友里面第一个消失、第一个离开这世界的人。然而，这一切在此刻应该还没发生。特特还活着，他还没去往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地方，而她则还是个穿着迷你超短裙、

披着长发的女孩。她深呼吸，再一次担心自己会昏倒过去。她咬了咬嘴唇，直到嘴唇出血。那不是一个梦，那是正在发生的事。渐渐地，她认出了街道、商场、酒吧。他们走进其中一间，她竟觉得非常熟悉。她认得那个地方，她在某段时期经常去那里，尽管此刻她想不起名字来了。她再次在一面有污渍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模样。她依然漂亮。在她身旁是他，非常年轻，穿着那件他从不愿脱下来的、而她至今依旧保存在衣柜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的很好看的灯芯绒西装。

“特特借到了一辆车。我们可以去塞哥维亚玩儿一天……”

“太好了。”

他有些担忧地看着她。

“你怎么了？一整个早上都一言不发。”

她摇了摇头。

“你走得那么快……”

特特还没到。这样最好。她需要时间来消化正在发生的事。他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来。“我昨天在一间旧书店看到的。是个宝贝。”

她看了看封面。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她傻乎乎地为自己没戴眼镜也能看见书名而感到惊讶。那个时候，她还没近视。又或者她已经近视了，只不过一下子认出了那本书。那本书也还在家里。在书房的柜子上——书房里的东西她一件都不敢动。虽然他早已不在了。

“三语的版本，”他继续自豪地说，“古希腊语，现代希腊语和英语。”

“噢。”

他拉起她的手。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还是说你在担心考试？”

“考试？你说什么考试？”

“你一定能及格啦，不要担心。”

突然间，她记起来了。特特，一辆破旧的老车，三个人去塞哥维亚，新闻学考试……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去了马德里。她得参加新闻学的考试，他陪她一起去。从他们在巴塞罗那的法律系相识的那天起，他们无论去哪儿都一起行动。但他们从没成为男女朋友。他们不喜欢“男女朋友”这个词。他们憎恶那个词。他们是朋友。他们是这样说的。大写的朋友。没有人因为他们的友情在多年后变成一场婚礼而惊讶。尽管他们也不喜欢“婚姻”一词。更不要说“丈夫”或“妻子”了。听起来太庄重，太庸俗。在那个时期，那个属于特特、属于马德里的出游、属于新闻学考试的时期，如果有人问到，他们会回答说：朋友。

“我去一下洗手间。”她说道，摸了摸他的脸颊。

脸颊……天呐！他脸颊的温度！她怕自己会忍不住哭起来，怕自己太过激动，怕自己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而破坏掉这一场奇妙的重逢。她站起身来，补充道：“我马上回来。”她根本不需要询问，也不需要停下来查看指示箭头（“卫生间—电话”），因为就在刚刚，她已经认出了这个地方，仿佛在前一天刚来过似的。她走下两级台阶，转身看向桌子。特特来了。在那个时期，人们以拥抱的方式打招呼。他和特特相互拥抱。这时候的她是真的哭了。幸福的眼泪，早已被遗忘掉的幸福的眼泪。她眼睛里掉进了一根睫毛，只能探索着下楼梯。她走进洗手间，用水溅湿了脸。她需要保持清醒，并且恢复仪态。假装出不担忧、快乐的样子。想着前方还有一辈子在等着他们……如果他们因她的样子而惊讶，或者猜到她哭过，她只需要对他们说：“该死的睫毛。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化妆。”事实上就是那样，她突然记起了全部细节，每一字，每一句。“该死的睫毛。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化妆……”她也清晰地记起，在那个奇迹般重现的早晨，她的眼睛难受了好一阵，他们一起去药店，买了眼药水（Mirazul 牌还是 Visadrón 牌的？），坐上借来的车，在整个旅程一直唱着歌——在那个年代，去塞哥维亚的确算得上一场旅行——战争歌曲、颂歌、被禁的诗歌……同样被禁止的还有那时候二十岁的她，与特特和他像小鸟般自由地、无忧无虑地、兴高采烈地开着车，而她在巴塞罗那的父母却以为她正在参加考试或复习。多么幸福的没有手机的年代啊！她拿毛巾擦干了脸（那时候卷筒卫生纸还未侵占卫生间），两级一步地走上楼梯。她准备好了。记熟了剧本。她很幸福。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尽管她依然流着黑色的眼泪，并且在某一瞬间，当她揉搓眼睛时，只看见一大朵乌云。该死的睫毛！

在某一瞬间，她以为自己搞错了。也许酒吧有另一个厅，或者卫生间是两间酒吧公用的。然而那里只有一个楼梯和一个乏味的酒吧，酒吧有一个巨大的吧台，几位客人，以及随意堆积在一角的十几张桌子。她小声问一位服务员：“那两个男孩……刚才还在这里的两个男孩……”那个男人不太明白地耸了耸肩。她靠在墙上。他们跑哪儿去了？他们怎么能把她给忘了呢？一位年轻女孩起身把座位让给她。“女士，您还好吗？”她摇了摇头。“她好像有点犯糊涂。”服务员说道。“她刚才走进来……然后直接去了洗手间。”女孩再一次温柔地对她说，提高了嗓门并且放慢语速，仿佛她是个语言不灵光的外国人似的：“您知道自己住哪儿吗？需要我们叫一辆出租车吗？”她没有回答。她打开包，拿出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照了几秒钟。她一点儿也不惊讶。在远处，她听见人们好奇询问发生了什么的嗡嗡声，女孩索要餐巾纸和冰块的声音，以及她安抚好奇者的声音。

“没什么……这位女士她不太舒服。”

她回到酒店，那间当天早上非常喜欢的公寓酒店。“过去，现在，”她想起来了，“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今天，现在溜进了过去。或者相反，过去的片段在现在浮出水面……她打开行李箱。他们，在这个时刻，应该已经启程前往塞哥维亚了。她再次提出同一个问题：他们怎么把她给忘了？然而，搭高铁可以追上他们，甚至比他们更早抵达目的地。现在的时问与过去的时间赛跑。还没有丧失殆尽。因为在此刻，她再一次清晰记起了所有细节。饭馆，随意畅饮的葡萄酒，寻找便宜的旅馆过夜。确切的名字和位置都不重要了。她将一间一间餐厅、饭馆、旅馆、客栈地找过去，直到找到他们。最好把行李箱寄存在酒店前台，不带行李，一秒钟也不浪费，搭出租车直接去查马丁火车站……一定追得上他们！她将再次回到很久以前那美妙的一天。特特，他和她……前方还有一辈子在等着他们。

钥匙从她手中滑落，那个数字在地面乱舞了几秒钟。她微笑起来：“八个月，氧气，四加四，无穷……”她弯下腰，捡起钥匙，立即听见她自言自语，说起之前脑子里晃过的念头，伴随着那个问题的失望和难过：“他们怎么把我给忘了？”然而，她在扶着床边站起来的同时，也从心里感激时间旅行的奇迹：如果它——无论它是什么——真的发生过，那么也就有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她拥护的爱因斯坦的话变成了一道咒语。“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把某个很重要的东西搞错了。因为他们并没把她给忘了。她怎么会生出那么蠢的念头？他们当然没忘记她！他们三人在一起。在公路上，坐在一辆借来的破车里，唱着歌，欢笑着。自由自在！那个许多许多年前的日子，那个突然重现的日子，还没有结束。她捏紧了钥匙，仿佛那是她的护身符。404。氧气。四加四等于八。无穷是一个平躺的八……她不自觉地张开手掌；钥匙再次滑落，在地板上跳起了舞。然而这一次她却听见嘲笑的声音。“新生活，新生活……”

她坐在梳妆台前，看着镜子。她哪儿也不去。过去的剧本早已写好；不允许加入任何即兴的成分。并且，不管爱因斯坦说什么，过去和现在都是势不两立的两个空间。她差点儿就干了件疯狂的事：整个早上都荒谬至极。直到此刻，她一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他们，听见他们。歌声，汽车，公路……但当她睁开眼，她再次看见自己疲惫的面庞。那就是新生活带给她的东西：对时钟做手脚、将早已不属于她的时间据为己有对她而言毫无益处。在某一瞬间，她看见自己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地终于找到了那间酒吧，看见三个好朋友在热闹地聊天，小心谨慎地坐在靠近他们的一张桌边，观察他们，并且等待奇迹第二次发生。然而此刻她确实感到自己滑稽可笑。感到自己是一个闯入者。一个小偷。一个真真正正扫兴的人。因为他们，他们仨，二十出头，正在享受青春，活在当下……而且还有更明显的一点：他们根本不需要她。不需要她。一个年过七旬的女人，站在镜子前，身体还时不时地感到不太舒服。



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库巴斯

西班牙著名作家，1945 年生于巴塞罗那，自 1980 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以来，已成为当代西班牙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家，2015 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诺娜的房间》（La habitación de Nona）荣获西班牙国家图书奖和西班牙评论家奖。

译者：欧阳石晓

《新生活》（La nueva vida），选自 La habitación de Nona (Copyright © Cristina Fernández Cubas, 译文由群岛图书授权发表



© 2012 Charles Poolton  
Images courtesy of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Bristol](#)

小说

# 慎余堂 · 壹

李静睿 | 长篇连载

本书化于历史，却只属幻影，  
不可与世事一一对应。

小皇帝退位那日，已是腊月二十五。

辛亥年是个冷冬，整个腊月刮不定方向的风，慎余堂占地八顷，植有斑竹数百，夜风簌簌穿过竹林，又拂动残荷，其声呜咽。余立心睡了又醒，只觉越睡越寒，疑心城中有哪家出殡，故有切切丝竹之声。

从腊月二十起连下五日大雨，孜溪河蓄水漫岸，终于又可行船。余立心卯时即起，草草吃了一碗生椒牛肉粉，冒雨乘轿前往艾叶码头，察看今年最后一批运往楚地的盐船。天色苍黑，冻雨未停，义子胡松执一盏煤油汽灯，让余立心能在轿内读报，《大公报》从天津发到省城再快马送到孜城，已是五日之后，因中途几次转手，有些小字被油墨糊掉，余立心怕消息遗漏，索性订了十份，无论如何能凑出一张完整报纸，算上马钱人钱，这报纸一年花掉他五十两白银。

余立心虚岁不过四十二，掌管慎余堂已有十年。庚戌年末点账，堂下共有火水两旺的盐井二十一眼，火圈五百余口，推牛六百余头，骡马百匹，当年盈余十二万两，主宅前两年扩修，仿的是《石头记》里的大观园，余立心所住小院绿窗油壁，抄手游廊两旁牵藤引蔓，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薛宝钗的蘅芜苑。

孜城中能像余立心这般及时读报的人，不过十人上下。哥老会的袍哥们依然照两百五十年来的习惯，往孜溪河中丢掷刻字竹板传递信息，竹板由孜溪入沱江，再进长江，沿途自有袍哥弟兄拣起，此谓之“水电报”。辛亥年八月，孜城哥老会和同志军以保路为引联合起义，正是用水电报告知省城，竹板上用红漆草书写哥老会切口“大水已冲龙王庙”。待到武昌举事之时，因楚地为长江下游，水电报无法逆流而上，虽说孜城月前已号称独立，但孝义会舵把子陈俊山也是在余立心这里读了《大公报》，方知天下已变。报纸照例延迟五日，不管陈俊山还是余立心，都立于庭中，良久无言，面前各摆一杯茉莉花茶，茶汤冷透，无人续水。院中种有秋菊，开碗大花朵，色白如玉，过了几天，余立心让人将菊花全连根拔起，换成杂色月季，因他觉得菊花兆头不好，让整个院子仿似大清朝的灵堂。

起义之前五日，孜城一切如旧，秋色渐深，孜溪两岸银杏尽染金黄，落叶凋零，漂于水上，煎盐灶房内火光灼灼，工人上身赤裸，向盐锅内点下豆浆，让盐卤澄清杂质，凝固成晶，待到夜色四合，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漕、司锅、司火、司饭、司草的盐场工人各自成团，围住一盆水煮牛肉，每人均能吃下三大海碗白米饭。盐

场用牛夏喂青草，冬喂谷草，每日还有升把胡豆，不能服役之后方送往汤锅铺宰杀，肉片得极薄，在滚油中一烫即熟，汤色鲜红，重麻重辣，半明半暗中，青花椒香气四散，盖过灶房中天然气的硫磺味。

倘若站在孜城最高点龙贯山顶，可见楠竹制成的输卤和输气笕密匝匝，纵横交错，这才是孜城经脉所在。乾隆朝间慎余堂斥五万两白银之资，筹建了孜城第一根笕管，长达二十里，在此之前，盐卤唯有靠挑夫扁担供应给灶房，彼时每天运输的三千担卤水，不过今天一条笕管的运量。笕管为中空楠竹，接连处用细麻油灰层层缠绕，大部分匍匐地面，过河时在河底挖沟，深埋沟中，谓之渡河笕。有路之处，工人在半空中搭起承重竹架，孜城人就从那竹架下慢悠悠走过，头顶即是盐卤奔流。城中除了大户盐商，没人家中置有钟表，他们浑然不知自己的时间，相较于历史已晚点五日，至少五日。余立心翻到《大公报》头版，上称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逊位诏书，已将草案交袁世凯审阅。虽说两三月间各地陆续独立，小皇帝退位已成定局，余立心反复读完那四版报纸，却依觉茫然，挑开轿帘暗中四顾，孜城不辨轮廓，只孜溪河上隐约有光，那是歪尾船船舱中的灯火。从孜城至沱江口的邓井关，是盐运的必经之路，沿途狭岸束江，河道折曲，时有险滩，船工们设计的歪尾船船头左歪，船尾右歪，方能顺利入江。这种船长四丈二尺，却配有一根四丈八尺的船橹，故又称“橹船”。丰水季节远远望去，孜溪河上竖密密船橹，歪尾船们歪头歪脑，顺水而下，像是急匆匆追赶在孜城中落下的时间。

今日河上只有慎余堂的二十艘船，共载盐十万斤，余立心到时，船工们已将盐包全部装好，胡松略清点了盐包总数，又划开一包，给余立心看了看这一批巴盐成色。巴盐色黑质粗，却凝结成块，便于运输，向来是孜城外运的主要品种。但这次专有一艘船，是运至下江的花盐，花盐色白质纯，粒粒分明，是下江殷实家庭方会使用的体面物。船舱深处更有一大包雪白鱼籽盐，颗粒滚圆，每粒均有指尖珍珠大小，盐包上用水墨画有鱼形，以示区别。这是慎余堂独创技艺，最为费时费工，灶房里能熬这种盐的老人已不过十个。鱼籽盐谈不上市价，因为慎余堂每年也不过自制自销，厨房里大师傅也只有或清明端午中秋春节，或家中宴客，用此盐专做一桌子盐帮菜。这一包重百斤，说是专供下江军政要人，船上两名盐警配有步枪，连余立心也不得上船。

冻雨渐停，胡松收起长柄黑洋伞，扶余立心走上岸边青石台阶，问道：“父亲，去了这包鱼籽盐，我们自己厨房今年可也没有余货，大少爷二少爷都说是回来，这年夜饭到底怎么安排？哪个的面子大？”余立心摇摇头，说：“不晓得，陈俊山安排的，



图片来自 [Steve Johnson](#) on Unsplash

他也不说。年夜饭随便弄一桌便是，济之怕是过了正月才回得来，达之已来了信，说要先去北京几日。”

陈俊山现在得叫陈军长。孜城盐税丰盈，向来是清廷重点布防之地，城中进驻军队名目繁多，有团练乡兵和州县驻军，也有盐场官运局辖下的治安军。各省先后独立之后，清廷渐不能控，大批失去头衔的官兵趁乱抢劫商铺钱庄。盐是和白银一般的硬通货，慎余堂名下最大的盐仓东岳庙仓在十月底的某个深夜被抢，存货损失过半。余立心清晨方赶到现场，十个守仓库门卫跑了一半，死了一半，身体被长枪穿过，尸身上布满窟窿，稠血尚温，让仓库地面盐花渐融，数百只蚂蚁列队踩过血液，又踩上盐粒，留下米大的血红脚印，像这个城市一般满目狼藉，前路不明。如此大乱月余，最后是陈俊山用自己掌舵的孝义会联合孜城哥老会中仁字号的聚贤会和同仁社，方才勉强控制住城中局面。他和余立心是总角之交，特意派了五百精兵，驻扎在慎余堂各大仓库门口。明面上他要的酬劳，不过是这一船花盐加这一包鱼籽盐，私下里其他哥老会的头面人物都知道，陈俊山已经入股慎余堂名下的天海井。

同治十年，这口井凿铿两年，久不见卤，慎余堂耗干现银，余立心的父亲余朗云无奈之下，已经决定将其股份卖给另外几个陕帮商人。两边谈判数十日，正在八街店的陕帮商号里订契，家中忽然来人急报，说夫人难产，余朗云急赶回府，甫一进门，已闻啼哭，母子双全。刚出生的余立心浑身粉白，心口却有淡红胎记，细看形状极像盐场天车，余朗云那时尚不知道，这将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待到他收拾妥当重新出门，已有师爷来报：井下已出卤，且水高近十尺。生意当然即刻取消，余朗云让师爷赶去商号，承诺赔偿毁契损失一万两白银，他自己连轿子亦来不及坐，骑了快马前往井上，二里外已闻卤水苦咸味。晴空朗朗，见黄黑卤水半悬空中，状如涌泉，等走到近处，才知道井下喷力太猛，难以控制，后来井户只能将竹制平盘置于井口，让卤水沿边缘流入存卤的惶桶。余朗云将这口井命名“天海”，传至余立心中，

四十年来它始终一月出卤三万担，有这口井傍身，陈俊山旗下军队这一两年，应是不愁军饷了。

陈俊山和随从的马都拴在河边黄桷树下，看来是冒雨骑马前来。天色微亮，余立心见二十米外的陈俊山着灰蓝色德式军服，长筒枣红皮靴，脱了军帽，腰间皮带上别一把驳壳枪。为了向革命军示决心，陈俊山早在起义前已剃须剪辫，过了三个多月，脑门上长出茸茸新发，这么隔着河上水雾看去，余立心只觉得这相识三四十年的旧友辨不清面容。陈俊山笑着走过来，道：“立心兄好早，吃过没有？我那边倒是有几个笋干肉包，只是隔了一两个时辰，怕是已凉了心。”

余立心理理长辫，示意胡松递上竹编保温杯中的热茶，他吹掉茶沫，漫不经心答道：“俊山兄客气，这批盐数量不多，你何必亲自前来，有我看两眼也就是了。”

陈俊山道：“兄弟我初涉盐场，多来看看是应该的，何况那船花盐……多少还是不放心。”他故意一顿，并不明说那船花盐究竟怎样，就转了话锋，“立心兄等会儿可是要往井神庙去？”

余立心笑笑，说：“议事会开这会，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我等下去井上转转，就去听个曲，俊山兄可要同去？”

孜城宫庙众多，南粤商人修南华宫，闽南商人修天后宫，陕帮商人修西秦会馆，烧盐工人自立帮派修炎帝宫，而但凡是在盐井上讨生活的人，都要进井神庙拜一拜井神梅泽。梅泽本是晋太康年间猎人，据说他狩猎时因鹿发现咸土，在该地凿井取卤，又将卤水熬制成盐。孜城现今的井神庙整修于道光年间，慎余堂余家之外，孜城另外几大盐商，如三畏堂李家、四友堂林家、桂馨堂严家也均有出资。井神庙坐落在艾叶码头后的观音山半山间，起义后盐商乡绅正是在此宣布孜城独立。

独立那日余立心开始并没有去。他清晨即起，叫周围侍奉的人都退散下去，自己用炭炉烧罐中雨水，泡一壶香片，摆一碟孜城特有的火边子牛肉，然后坐在院中梧桐树下的藤椅上，读两卷梁任公，“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请言其理。夫既以革命之力，一扫古来相传之国宪，取国家最高之目的，而置诸人民之仔肩矣。而承此大暴动之后，以激烈之竞争，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会势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

彼时天光极亮，院内有小池，植有粉紫睡莲，肿眼金鱼躲在墨绿莲叶下，似是怕这灼灼秋日。火边子牛肉上有一层白芝麻，余立心一一拣起，撒至水中，看那些金鱼犹犹豫豫浮出水面夺食，又胆怯地复沉下去。火边子牛肉其薄如纸，洒上好熟油，向来是余立心最爱的小食，但那日他吃了一片就放下了，只觉有一股连香片也不能抵消的膻腥油腻。陈俊山在晌午前赶到，连日混战，身上军装尚有血迹，一进门就道：“立心兄，赶紧出门，那边未时就要投票选议员了，今日你是不去也必须去。”

余立心正研墨展纸，想写一张行草，他顿了顿，道：“我不去会如何？”

“革命就是革命，保皇就是保皇，到了今天，你还不晓得应该选哪边？”

“俊山兄，你我相识数十年，你还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想过保皇？我不过是保平安……选什么选？我哪边都不想选，我只想慎余堂好好做几斤盐。俊山兄，要不要尝一点牛肉，这可是真正用牛屎粑小火熏出来的火边子牛肉。”

“立心兄，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大乱之世，非此即彼，你以为中间能有地方让你舒舒服服藏起来？做你的盐吃你的牛屎粑火边子牛肉？哪怕你一人能藏，恁大一个慎余堂，又能藏在哪里？你今日不去，明日慎余堂怕是就不归你们余家，虽说我们有几十年交情，但你要是今天不去公开表个态，我可也没法一直护着你！”

余立心当然知道，陈俊山说得没错，他只觉得自己像池中金鱼，想在厚厚莲叶下躲避天光，却又不得不浮出水面，啄食那点点芝麻。他换好长衫布鞋，搭陈俊山的轿子前往井神庙，到山脚时他停下轿子，和陈俊山步行上山，走了两步才想起来自己没吃午饭，路旁有野苹果树，结红色小果，他摘了一个，口感酸涩，让人更饿意。前几日下了一场透雨，观音山上泥地未干，沿途秒椤树高近二十尺，树底阴湿处长出蘑菇和木耳，又走到半山腰上，见孜溪河翻动金光，密密匝匝停满了歪尾船。

起义至今，盐运一直没有恢复，仓库里盐包一路堆上天花板，一切都暂停下来，井上不产卤，灶房不煎盐，天然气只能空烧。余立心端坐家中，每时每刻，都从自己的瞳孔中看见蓝色火苗，整个孜城像他数年前花大价钱买来的西式座钟，原本整点时有十二个小铃轮流出来报时，现在却莫名其妙，死死停摆。长子余济之留学美利坚七年，中间回来过一次。济之说，那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十二点那人裹黑色头巾，满脸蓄须，眼神阴鸷，济之又说，那是加略人犹大，因三十个银币背叛主耶稣，那座座钟就一直停在犹大报时的辰光。

余立心知道犹大和耶稣。咸丰十年孜城已有教堂，身处孜城闹市的独门独院，灰瓦白墙，青石铺地，进门就是偌大鱼池，庭中那株金桂已有三十年，深秋花香扰人，四周仆妇告诉传教士们怎样摘下花朵酿酒，余朗云偶尔携余立心前去，就一人喝下一杯澄黄的桂花酒。教堂那块地租自慎余堂，租金一直是半免，传教士大都懂医，余家等于多了西式医生。拳乱时整栋房子被烧，余立心前往探视，见祷告室内桌椅皆毁，地上铜质十字架似融非融，耶稣只剩一张脸，灼热的铜液覆面，更显神情痛楚，法兰西传教士马埃尔伫立堂中，见余立心前来，在胸前画出十字，面色平静，道：“主的日子将近到了，好比强盗，赶夜里来的一般。那时候听得个大声音，天就崩开了，

有形状的、统总烧个干净，连土地和制造的器具，没一件不被烧掉……上帝有旨，把天地再换一个新的，有义的人，就住在当中，这是我们所指望的。”[1]过了一年，教堂原地重建，新天新地中，余立心送去一个更大的铜质十字架为贺，马埃尔分给余立心一块圣饼，无油无盐，余立心扔在归家途中，又见路旁摊贩馋人，就让胡松去买了两个锅盔。后来马埃尔去了印度，一时间没有新的传教士再来孜城，余立心就将那房子收了回来，川地潮湿，那个铜十字架覆了绿锈，不知哪一次家中重做厨具家什，大概是拿去融了一个汤锅。

孜溪河上万物静止，连风都穿不过层层船橹，却突然有一艘小船箭一般飞离艾叶码头。漫山秒椤沉沉墨绿，透过锯齿树叶，陈俊山指着船上乌篷，说：“看到没有，船中是孟中元。”孟中元为当任孜城县丞，专司盐务，他是光绪二十年的举人，这么些年一直在蜀地各县中来回挪动，始终未能升迁，年过四十，性子平和，财也是敛的，却不穷凶极恶。他和余立心投缘，都喜梁任公，不喜康南海，二人时常去云想阁喝茶听曲，云想阁的头牌楼心月本为扬州瘦马，十四岁辗转入川，一早可嫁作官宦妻室，但她一直未嫁，宁愿每日在云想阁中抛头露面，这些年凡来孜城的官胄商贾，都要去听她弹一曲《春江花月夜》。

孜城的盐商和官府两百年来固有默契，官府让盐商取卤熬盐，但除层层盐税，每逢动乱，盐商们得各自认捐。嘉庆时川楚教乱，慎余堂认捐四十万两，几乎十年都喘不过气。余家的女人生数年不置新衣，当然不是置办不起，而是千头万绪之下，总应有个上得了台面的省俭姿态。余立心总听父亲讲起祖母，早年守寡，整个冬天穿一件藏青色大袄，下系黑裙，唯一装饰是胸前一串杂色玛瑙珠子，祖母整整戴了四十年，她下葬的时候，余朗云已有了大海井，他在金丝楠木棺材中放了一挂新置下的翡翠，那串玛瑙从祖母脖子上取下来，至今挂在书房笔筒上。

今次孜城起义第三晚，孟中元也是把余立心请至云想阁的雅房中，让楼心月在旁抚《夕阳箫鼓》，自己则亲手给他倒了一杯白毫银针，道：“立心兄，别家是别家，慎余堂是慎余堂，你万万不可糊涂，你们余家世代可都是官府的人，此时不出力，更待何时？”说的是余家世代捐官，余朗云在同治初年因反对清廷抽收水厘，被孜城知县下了狱，余朗云狱中传话出来，让家人连夜捐七万两现银赈灾，银子像盐一样，用歪尾船运到省城，一时间凑不够那么多船，每条都吃水半个船身。过了两日，朝廷立赏他二品顶戴和三代一品封典，那知县不过七品小官，接旨之后不知何以处之，只能于监房搭天桥于狱墙之上，跪等余朗云戴红顶花翎，踱步而出。

到了余立心这里，他却始终未捐，但除他之外，城中盐商哪家无官？同知五千两，道台三万两，这都是写在人心上的明价，四友堂林家据说捐官花了几十万两，连云南一家分号上的掌柜，也用几万两捐了个道台。那又如何？林家此次最早公开支持革命军，李家和严家第二日在井上挂了军旗，唯有慎余堂看似置身事外，始终未有表态。余立心吹吹茶沫，不答孟中元，反而推心置腹问他：“孟大人，你自己有何打算这两日下来，你也看得清楚，革命军已占大势，难道你当真心甘情愿为朝廷去死？”孟中元愣了一愣，良久方说：“我们这种人，岂有他选？”

余立心看楼心月穿莲紫色褂子，系月白褶裙，素手拨弦，琵琶中自有忧声，他叹口气说：“孟大人，你不妨跟我学，没得选，就不要选。”他开始真的没有选，既没有再为清廷出兵马钱，也没有像另外几家那样设流水宴款待革命军，只是每日枯坐家中。局势渐不可控，他私下里让陈俊山护着一点孟中元，余立心说：“一个小小县丞，坏不了你们的大业，看在我的薄面上，不如留他一命。”清廷撤兵于省城那日，孟中元登门拜谢，余立心请他在院中喝酒，是家中自酿高粱，窖藏时间不够，酒味辣舌，孟中元微醺后突然显了老态，问：“立心兄，这革命军真的是要废了皇帝？”

余立心摇摇头：“他们是要废了现在这个皇帝……”

“然后？”

“他们自己哪里想过什么然后。”余立心又倒上一杯，细细捻去花生米红衣，又引了一句梁任公，“‘革命之始，必立军政府，此军政府既有军事专权，复秉政权’……孟大人，我们这些做盐的人，以前伺候你们的朝廷，以后……以后还不知道要伺候多少个朝廷。”他干掉那杯酒，过了一会儿才道，“不过谁都没有别的办法，朝廷，革命军，都是如此……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就像我们挖山打井，不出卤嘛，就得一直打下去，不然之前扔进井的钱，就真的扔进去了。”

余立心那日从井神庙归家已是傍晚，上轿前最后往山上望了望，孜城临时议事会的蓝底白日旗展在井神庙顶上。就这几日时间，催工人连夜染出来的布，那靛蓝略微偏色，白日周围又晕出蓝边，让这面旗新到令人不安，井神庙黄墙蓝瓦，墙上用襁褓贴了几张白纸红字，“方兴孜城”“歼除首恶”“张大民权”。说得不错，他来的时候是慎余堂余立心，走时已是临时议事会副议长。议长是四友堂的林湘涛，林家在革命军身上花了大价钱，这个议长理应归他。

在井神庙中林湘涛穿西服戴礼帽，帽子压得很低，余立心知道，那是因为刚剪辫不久，额头尚未生出新发，那套灰色西装不知何处定制，并非不合身，看起来却总有怪相。林湘涛已过了五十，家中有四房妾室，除了长子林恩溥已成年，其他子女皆幼。也就一年之前，他尚是大清朝分部郎中，赏戴花翎二品衔。林家十年前分家闹得厉害，他这一支争到了实利，几口出卤最多的井都稳稳拿在手里，灶房里熬出的白花花物品，是盐，也是流水般的银钱。林恩溥前年从东洋归来，接了家中生意，林湘涛从此更是连井上都少有去，据说整日整日卧在家中吃鸦片烟，每月初一十五必去云想阁捧场。余立心偶尔和他遇上，林湘涛听曲时也歪在卧榻上，有穿水红绸褂的侍女拿着烟斗等候在旁，另有侍女打扮成女学生样，蓝竹布褂，黑布百褶裙，白袜上歪歪曲曲缝

有黑线，戴一副鹅黄镜架的平光眼镜。女学生跪在床前，从老银鸦片盒子里挑出黑色生鸦片膏，置于铁丝架上用炭火烤出金黄色烟泡。那水红侍女用银长针挑起一个烟泡，抹在烟斗上，递给林湘涛，他猛吸两口，看那烟泡渐渐瘪下去，这才和余立心寒暄：“立心兄，要不要试两口，我这是真正的派脱那土，这劲头……前几日才从京城过来的新货。”

余立心笑回道：“有恩溥辅助，湘涛兄真是安心享福，我哪里有这个命。”说完还是喝酒，夹一块卤肝片。云想阁的肝片用的是兔肝，口感滑腻，只是人喉后略有膻腥，他又吃了一口麻辣三丝压味。

林湘涛又抽了几口烟，半坐起来，问起余济之和余达之：“我那两个侄子看着就要回来了吧？”

余立心答道：“哪个晓得，他们哪里有恩溥懂事，出去这么些年，怕是学也没学到个什么，余家是指望不上他们。”

两个人都没有提起余家的幺女余令之，好像两家的婚约从来没有存在过。这婚约只因小儿女彼此有意，却并未正式下聘，后来两家又都各有疑虑，渐不再提。林恩溥虽是留洋归来，据说却像他父亲，早早就抽上鸦片烟，又日常狎妓游玩，虽不敢带回家宅四友堂，但林家公子在孜城里有多处私宅，也是半公开的秘密。余令之则在省城上新式学堂，回孜城后在余家的私塾树人堂里当女先生，一年前这尚引人非议，但如今既已“张大民权”，连整日卧在烟榻上的林湘涛也革了命，割掉辫子当上议长，女先生又能算得上什么事情。

林恩溥和余令之这两年也见过几面，城中大盐商每年固定几个节日，轮流设宴，都是齐家出席，林家这两年自认势头盖过余家，做东的时候多些。去年中秋更是在四友堂摆了两日流水席，林恩溥穿一身银色绸缎长褂在门口迎客，辫子尾上压一颗指头大小的珍珠，下面却是一双欧罗巴进口皮鞋，面容尚算俊秀，一双桃花眼眼角上挑，只是脸色惨白，大概是吃多了鸦片。林湘涛倒是满面红润，越发显出福相，宴席上有人私下说，他又收了一个刚刚及笄的丫鬟。又有人故意压低声音：“大公子也不差，你们听说没有，他带回来一个东洋女人，就养在林家凤凰山上那个新修的院子里……东洋女人，说是软得不得了……哪里软？哪里都软嚜……大公子有福气，怪不得一直没有成家……”

余令之前来赴宴已是勉强，听了这些更觉恶心，嘴中那一勺子雪豆蹄花无论如何咽不下去。她平日都穿棉布褂子，这日被父亲逼迫，打扮齐整，穿一件滚边碧色湖绉短袍，系同色湖绉百褶裙，环佩叮当，发梳双髻，嘴上又抹胭脂，正是几年前余家三小姐的模样。她进屋时正遇到林恩溥和客人笑论省城的烟花名所，二人眼角余光分明都瞥到对方，却都镇定自若移开。她还是余令之，他却已不是林恩溥，但他辫上那颗珠子，本是去东洋前她拆了一根发簪，两颗东珠一人一颗，她那颗三个月前从半山扔进孜溪河。正是盛夏，雨后河水漫至山脚，桫椤宛似长于水中，白雾缭绕，往事尽散。

表回腊月二十五这日，余立心别了陈俊山，终究还是去了井神庙。议事会这几日都在热论盐引，事关慎余堂生死，他不得不去。议事会之外，孜城日常管理有三股四科，三股为察审股、文牍股、庶务股，四科是教育科、财政科、盐政科、交通科，林恩溥本可做议员乃至副议长，林湘涛却宁可让他主管盐政科，余立心知道，派脱那土劲头虽足，但并未真的让林家昏头。

井神庙里六十位议员齐了一大半，副议长只缺桂馨堂严家的严筱坡，严家虽一早看清大势支持革命军，后来却态度突转暧昧，严筱坡和侄儿严余淮议事会开会时常缺席。上一次会在五日之前，足足开了三个时辰，会后胡松在轿中给余立心递上热茶，又附上一碟子放在食盒中的酒米蒸黄粑，说：“老爷先吃点，垫个肚子，我刚走路去城里买的……这回路怕是得走上一阵，陈军长说是要清城，车轿都得在城门外等着。”

“又清城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革命后陈俊山几次清城，清廷逃离的官员在孜城颇有产业，一店一铺看起来不过零散银子，但细细清理之后，也能值几个月军饷。陈俊山在孝义会中就以擅长营生闻名，现在旗下有五万军队，更是需精心规划，余立心虽觉旧友越发陌生，却也知道，这也怪不得陈俊山。

胡松又说：“刚才去买黄粑，遇到严家老爷，坐在边上喝牛肉汤。”

井神庙四处漏风，到最后其寒如冰，三个时辰下来，不啻为半场酷刑。余立心一口热茶半个黄粑下去，方觉回了魂魄，说：“严家今日又没有去议事会。”

“老爷，他们到底是要怎么样？”

余立心摇摇头：“不管想要怎么样……都不能怎么样了，不过做个姿态……盐引迟早要废，他们当时在井上挂军旗，应该就想到有这日。”自管仲之下，盐商想要贩盐，都需先向官府购得盐引，一引一号，盖印后从中分为两卷，盐商留有引纸，官府留有引根。革命之后，官运局已然撤销，盐引被废本应是城中盐商皆大欢喜之事，严家却是半官半商，盐政司背后站着严家，这是孜城公开的秘密，往年盐引的收入虽说应当全部上缴户部，但严家到底从中分得多少，自是难以细算，怪不得严筱坡每逢议事会聚齐议事，就坐在路边喝牛肉汤。

腊月二十五正午，在严筱坡喝下又一碗滚烫牛肉汤时，孜城议事会一致通过，废除

盐引，代之以单一盐税。午后暴雨终停，众人走出井神庙，看见日光穿过重重云层，照于孜溪之上，水面耀金，乌黑色歪尾船中无间隙，连接开出口岸。多日未有出船，各家都着急在年前多运几万斤盐，船身沉重，吃水颇深，远远看过去仿似将渐没于水中，但船工们多有经验，知道如何在尽可能载重与不可倾翻之间寻找微妙而确切的平衡。余立心整整身上的狐裘大氅的风领，上一次议事冻僵之后，胡松今日特意为他备好了这件，大氅扣好后密不透风，余立心怀中一直有暖意，他看到自家和别人家的歪尾船渐次行远，突然生出莫名乐观：谁知道呢？虽是看来凶险，但或许运势到了，就真的不会翻船，既定之地说远不远，只要不翻，迟早能到，晚一日不过一日，晚半年不过半年。

他当然并不知道，凡是歪尾船消失于天际的同一时刻，隆裕太后在养心殿中颁布了小皇帝的退位诏书，“……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五日之后，余立心在年夜饭上读到《大公报》，饭桌清冷，只有他与幺女余令之，胡松平日里虽和他们一起吃饭，今日却不肯上桌，自己在厨房和下人们吃了汤圆。碗碗盏盏铺满一桌，二人也只是略略动筷，各自紧紧捏住一份报纸，报上说，太后在宣读诏书之前号啕大哭，口呼“祖宗啊祖宗”，直至旁人提醒，如今日不退，南方革命党将收回皇室优待条件，她方勉强读完那三百余字。余立心一口干掉杯中烈酒，伸手舀了一碗半凉鸭汤，对余令之道：“快吃，吃完我们去祠堂给祖宗上香。”

余家祠堂地处半山，雾深露重，屋中未燃炭盆，他们点上的六支线香闪出微弱火光，又旋而熄灭，更显四处黑暗阴冷，然而这就是辛亥年的最后一个夜晚。

[1] 见《新约》彼得后书 3: 10—13。文中涉及《圣经》的翻译，《新约》部分使用 1857 年《南京官话译本》，《旧约》部分使用 1874 年《北京官话译本》，如有不符历史之处，请读者谅解。



封面

此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公司）出版，  
已经上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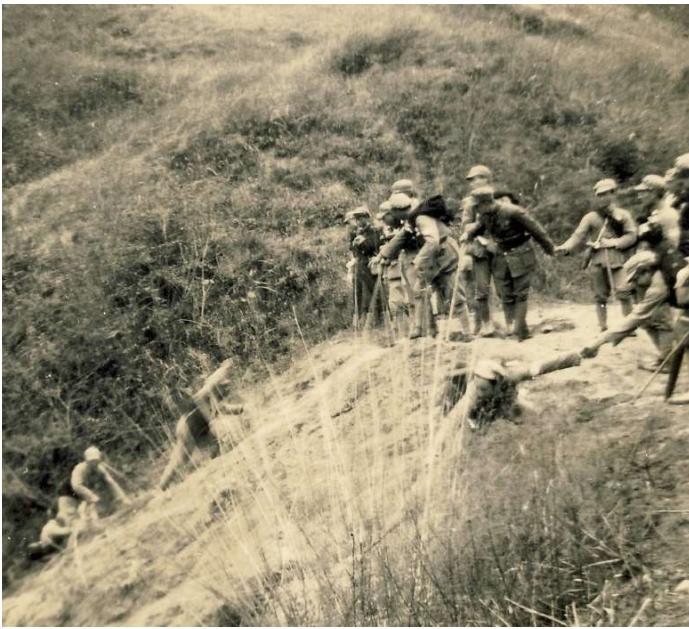


李静睿

以前是法律记者，现在写小说。出版有《北方大道》、《微小的命运》、《小城：十二种人生》等，长篇历史小说《慎余堂》现已上市。

长篇连载

这里是作家李静睿长篇历史小说《慎余堂》的节选，一个百年之前的故事，希望百年之后的人愿意去读。



图片来自[联合报](#)

非虚构

# 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

杨潇 | 重走

那种感觉我再也不会忘记：  
茫茫中和某个巨大的东西握了一下手。

2017 年年末到 2018 年年初，我被一种不大不小的茫然笼罩着。职业记者生涯结束年余，但我并没有获得之前忙成一颗陀螺时幻想的自由生活。确实不用每天一睁眼就查看和回应各种工作群了，但这快乐只持续了一个月，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轻飘飘的感觉。我一开始认为是 ego 作怪，这个常年为新闻界“成名的梦想”所喂养的家伙，嚷嚷着要被工作带来的认可与成就填满。后来我意识到不只这么简单。职业生涯连同它所带来的这一切摩擦、琐碎、撞击、ddl 和 kpi，自有强大势能，它们帮你校准方向（且不论好坏），确认步履，再摒弃犹疑，当你摆脱这一切（也不论好坏）时，就难免进入某种失重状态。总而言之，当时的我明白自由绝非免费，但对其收费标准所知甚少。

那几个月我四处游荡，寻找写作题材，但不知道要记下什么或者略过什么，2017 年最后一天，半是研究选题（某种程度，研究自己），半是应对未来财务的不确定性，我在微博立了一个“No Shopping”新年计划，“如非必要，绝不购物”，还给自己找了科学依据，“我们每天做出的大部分选择似乎都是精心考虑的决策结果，其实不然。这些选择都是习惯的结果……杜克大学 2006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人每天有 40% 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由决定促成的，而是出于习惯。”

现在回看，种种茫然无措，或因没有找到自己写作的“母题”。作为一名厂矿子弟，我曾以为自己的母题是厂矿故事，还一度在专栏里发出“灯光球场见”的邀约，等进入实操，才意识到近乡情怯，而自己虽葆有厂子弟的情感结构，却早已在精神上远离了它。我也一度想写下在美国的日子，料想“哈佛一年”有些卖点，但回头梳理日记，里头过的多半是拓展知识外延的智识生活，少了由心而发的关照，且所记常常语焉不详——试想你明明记得和一位爱沙尼亚博士热烈地讨论了一个下午“歌唱革命”与后共产主义转型，日记里却只有“聊得特别好”五字。再后来想要写成昆铁路，乃是我庞大铁路旅行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对幻想中自由的再一次寻找：在金沙江畔的干热河谷徒步，然后乘坐慢车，在大渡河畔绿意盎然的小站想下就下，住上一晚，一定别有风味吧？

偶然性就是在此时接管生活的。我已经决定要从头到尾走一遍成昆铁路了，每一个五等小站我都做了功课，资料记满硬皮小本，我甚至已经安排好了时间，3 月底回湖南老家，清明扫墓后即前往昆明，就在查看长沙飞昆明机票时，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慢一点，也乘绿皮火车前往，顺道看看沿途风景？随之而来的念头是（受当时正在读的罗新老师《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的启发），有谁也曾走过这条路？是不是就此可以写点儿什么？我记不起是怎么翻开湘黔滇旅

行团的资料了——应该是张寄谦先生所编的《联大长征》，印象很深的是一个河北学生在沅水旁发出天问：“水为什么会这样绿呢？”另一个学生则忍不住要跳下水来，来一个二百米自由式，因为，“北方是没有这样美丽的水的。”

我的心好像在哪里被撩动了一下。细读 80 年前学生们们的日记，跟着他们从长沙出发，在湘西先遇匪情，又遭雪阻，横越罂粟花遍野的贵州内陆，在火牛洞秉烛出演“诗人游地狱”，在盘江赤褐色的激流上闭眼舟渡，再穿过胜境关进入云南，松林翠绿，野草清香，在一场急雨中全身淋漓，又在雨后的太阳下烘干身体，把这经历浪漫化为一曲“田园交响乐”。就连公路本身也教人好奇，“土的胶性很大，上面铺着石子下雨也还能走……两旁峭壁直立，切得很整齐，也是红色。经过风化以后，两壁匀匀的铺上了一层红土，胶在一起，也分不出土是石了。红的路，红的墙，配上绿的树木，再加上广漠的池沼，美丽极了。”我是后来才意识到，他们为什么一路描写了那么多风景，而这风景为什么那么吸引我，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师生们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大，这中间有着官能与心灵的大变化，发生在抗战初年的此种变化最终影响了中国的未来——可回到当初，更吸引我的是他们的失重状态。一个叫董奋的清华大学化学系大二学生在日记里写，“上课不知在哪日，冷得要命，图书馆一会就把脚冻麻了。早晨迟迟的起，假如不上街，立刻两脚向被筒中一伸，优哉半日半日的过去，等着吃饭。假如不把脚伸进被中，那么就非上街不可。Bridge（桥牌）……早打腻了……上街就是流浪。流浪！流浪！整天价在长沙流浪……”

这和之前西南联大给人的印象挺不一样。

彼时，电影《无问西东》正在热映，我知道影片有瑕疵，尤其是假装传统没有断裂的努力几乎称得上尴尬，但它还是勾起了我的许多情感。一层情感来自怀旧，来自 1980 年代对 1920—1930 年代的打捞，以及 20 世纪初对这两个时代的再次打捞，人们借助各自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对当下发言或寻找精神家园。一层情感来自忘却。之前的联大热衷于智识圈层，电影是走向大众的第一次尝试，我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原来有那么多人从未听闻这所大学，依此语境，或许反倒要感谢那些一夜之间“重新发现”这所“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大学”的惊诧的公众号们，哪怕他们在媚俗与自我审查中抽空了联大的精神内涵。

但不论怀旧还是遗忘，都有明确指向，彷彿历史一定会往什么方向发展（再由此展开悲歌或者称快），可是，回到当年的长沙临时大学，一切远未落定，一切都有可能，甚至，一切混混沌沌，我好奇，失重的人们是怎样一个求解过程呢？

进一步研读史料是在 2018 年 2 月底，离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整整 80 年。我打电话给《西南联大行思录》作者、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制片人张曼菱，她是北大 78 级毕业生，一位可爱的性情长辈（后来我抵达昆明，她请我吃饭，听说我全程负重，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又不是红军长征，背那么重干什么？带上脑子就够了嘛！”），她告诉我，西南联大研究历来偏重在昆明的八年，但对长沙临大的半年和西迁都研究不够，新材料也有限。阴差阳错，除了长沙和昆明，湘黔滇旅行团经过的那些市镇（包括贵阳）我恰好一个也没去过，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自己走一趟呢？

就这样，查看机票时的一个偶发想法引发一连串反应，最终我决定暂别成昆线，徒步重走湘黔滇旅行团西迁之路，然后去写一本书。好像是 Lonely Planet 的创始人说的，旅行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决定出发，回到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会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甚至不知道它能不能变成一本书，只知道我很想走上这么一遭，而今我已完成 40 万字书稿，在电脑敲下这一行字，想到的是人生充满偶然，有时简直神秘，你能做的，往往也只有下个决心，不再回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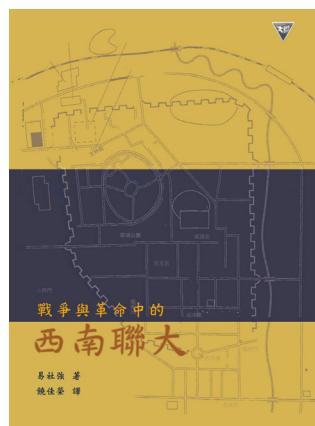
真正走在路上的快乐无与伦比。我记得在湘西沿溪而上，迈开双腿就是两三公里的快感，也记得在贵州西部的大山里，一个人走到天荒地老时间尽头的错觉，还有云南，一入胜境关就是无穷无尽的阳光、大风、红色的土地和金色的麦田，感到自己和 80 年前的人们一样心头满满，充满渴盼。《浪游之歌》的作者丽贝卡·索尔尼说，“只有在行走时，一个人可以活在整个世界中，而不只是分割出的一个个小世界中。”按理说，步行使人的活动半径变窄，可是在西南腹地徒步 40 日，我的“心理半径”却得到了极大拓展——记得完成行走从昆明飞回北京，在首都机场落地，下意识做的一件事，是打开手机地图，看从我的位置步行回家有多远，发现“也不过就是 25.4 公里”，一日抵达绰绰有余。当然，我并没有真的走回家，可摆脱（交通）工具依赖后，确实对距离、身体、人之可能性以及最重要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眼光。

远足帮助旅人摆脱现实，不时进入某种微醺，倘若你怀揣书本去“重走”，更有机会短暂栖居于不同时空。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在文章里讨论过那些热衷于一生读书的人，要么就是有爱读书的父母，要么多多少少有点“社交孤立”——倒未必是不善交际，而是总是有一个无法与身边人分享的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里与所读的书的作者进行对话，并形成独属于他 / 她的想象社群。湘黔滇道上，我也有这么一个想象的社群，或者说神交的朋友——清华的杨式德、林振述、蔡孝敏，北大的钱能欣、余道南，南开的刘兆吉，等等——和他们一起上路，打尖，休息，听他们给你描述 80 年前的风物，偶尔毒舌两句，又或者我们的目光汇聚同一景致久久凝神，真是愉快。等到临近昆明，他们唱着“It'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To the finest school I know (迢迢长路到联合大学，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向城内进发，我的心里也回响着它的旋律——旋律取自英国军歌，由赵元任先生填词，再由其妻杨步伟油印出来，带给在昆明东郊歇脚的旅行团师生。80 年后，我从长沙出发前专程去拜访他们的女儿赵新那，95 岁的老人还会哼唱，“It's a long way to go...it's a long long way to Kunming City (迢迢长路……迢迢长路去昆明城)”。

2018年9月我开始写作，每天上午9-10点去咖啡馆，一直坐到傍晚，把各种资料——我的徒步日记，沿途拍下的各种照片，采访录音，学生当年的日记，散落在各种专著、回忆录、民国报章、遗稿、校友录、地方文史资料、档案中的历史细节一一转化成叙事。多数时候这是一个物理过程——非虚构作家往往自比泥瓦匠或者织衣工，你所要做的是不断按捺住想要加速前进的念头，避免房子或者织品出现质量问题。但有时也有化学反应，比如当你在历史与现实中反复切换，又或者在历史不同阶段跳跃，某个立面或者某尺纱布突然焕发出全新的光泽，你听到叮的一声，然后知道这一节或者这一章成了。

写的过程穿插着一次又一次采访，感谢《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作者易社强先生的引荐，我陆续接触了不少联大二代或者三代，但印象最深的还是联大老人吴大昌先生。他1918年出生，1938年春天作为清华大学机械系大二学生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被分在第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第一次采访老先生是2018年，去之前朋友提醒，百岁老人体力有限，可以分几次聊，每次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没想到第一次就聊了四个小时，最后反而是当天早起的我撑不住了。80年过去，吴大昌对许多细节已经印象模糊，但是“人很奇怪，（在清华的）房间号还记得，明斋208，好多事情忘了，这个事情还记得，学号3404我也还记得”，他记得闻一多总是含着烟在画画，而黄钰生每天忙着给大家找房子，“每天都有新情况”，他还记得有一两次住在棺材旁边，但是“人一多就好像什么也不怕了”，他也记得同一小分队的诗人穆旦，觉得单单走路浪费时间，就一边走路一边背英语字典，声音不大，“这个形象（脑海里）还有。”最初，我想得最多的是叙事，同时以最严格非虚构的标准，确保每一个字都有出处。在写的过程中不断诞生新的问题意识，并循此寻找新的素材，于是这本书的主题也随之不断演化。某个时刻我觉得自己在写西南联大前传（在变成一个明星符号之前它都经历了什么？），某个时刻我觉得自己在写非常规的旅行文学（在没有游客的国道上重新发现中国？），还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做抗战初年社会史的考据（甚至要研究一场暴风雪到底席卷了南方多少地区），但最终我写的还是在路上的人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汇聚成了那个不应该被忘却的大时代。

从2018年秋天到2019年冬天，我在咖啡馆里写，在老家开着油汀的小书房里写，在大理客栈的露天走廊里写，现在回看，那可能接近传说中的“心流”状态，我几乎不需要动用什么意志力，惯性带着强大势能，一举解决了我的失重问题——我度过了好些年来挣得最少，但对自己最满意的15个月。我的“No shopping”计划最终破产，但我好像重新理解了“惯性”一词——不是杜克研究报告说的“购物无意识”，也不是佛教提醒世人警惕的“习气”，而是确认方向后的那种“势”，它大概包含了行动、笃信和另一种自由。当我重新理解了“惯性”后，我好像也更加理解了80年前走在路上的人们。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就活在1938年，那是比非虚构文本化学反应更大的化学反应，来自我自己情感结构的悄悄位移。我不算是历史发烧友，对抗战也兴趣一般，还曾被抗日神剧搞坏过胃口，可是这本书的写作帮助我摸到了某种东西，它是如此壮阔，又是如此悲切，以至于90岁的许倬云先生在谈到抗战时期的流亡时，会痛哭流涕不能自己，而我看到此景，眼泪在眼眶里转个不停，过去两年郁积在身体里巨大乡愁似乎获得遥远的理解。



或许这也和年龄有关。在更年轻的时候，我做了大量的国际报道，从后革命时代的埃及，到解冻之初的缅甸，再到满是灰烬之味的东欧，年岁渐长，回过头来关注家族、乡土和这个国家的过去——同心圆的波纹震荡开来，又折返回去，这不是简单的“回归”或者“寻根”，而是某种关乎心灵的东西：究竟什么是好的生活，我需要听听哈维尔、米奇尼克和昂山素季怎么说，我也需要听听沈从文、林同济、吴宓、任继愈、穆旦怎么说。抗战时期造访中国的美国记者格雷厄姆·贝克在Two Kinds of Time里形容中国人在时间中所处的位置“犹如一个静坐河边面朝下游的人”。背后是看不见的上游，即未来。当上游的波涛经过我们身边流向下游，成为过去时，才能被观察到。未来和现在都是不确定的，也许更多的真相就藏在过去里头，诚不我欺。

我不知道“重走”会不会就是我的母题，但几乎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重走下一条路了。因为那种感觉我再也不会忘记：茫茫中和某个巨大的东西握了一下手。怀着一颗忐忑之心，我试着把这种感觉变成文字，并邀请你和我一起，开始这趟旅程。



图片为清华大礼堂，摄于1925年，图片来自 [nAweofGod'sCreation](#) @flickr

## 非虚构

# 长沙：和平的最后一瞥

杨潇 | 重走

「最低限度可以做到的事，是自己对自己真实。」

背着这个45升沉重的背包，我从地铁站出来，往一公里外的酒店走去。这是一条舒适的林荫道，走起来却有点心事重重：这是一公里，接下来每天我要背着这家伙走上至少25个一公里，可能有时候要走上40个……也许走起来就好了呢……可要是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吃不消呢……路过一些共享单车时我开始琢磨，下一站益阳有没有共享单车？下一站常德有没有？要是实在走不动了，我要不要把背包放在车上驮着推着走？这算不算自欺？用手机搜索“益阳有没有共享单车”时，我看到一条新闻，一女子把共享单车放在奔驰车后备箱里从长沙运回益阳，媒体曝光了此事：“一辆摩拜单车正以110公里的时速离开长沙……摩拜不是土特产，请不要带回老家啊！”

酒店在长沙烈士公园附近，非常自豪地于各处提醒你，他们提供“一百项免费物品”，我看了下清单，里面包括卷发棒、微波炉和泡脚盆。我试着找前台要个针线包，结果直到出门还没送来，下楼时提醒服务员，她想起来了，“我等一下放你房间撒，（反正）你现在也去发财了。”在长沙人的敬语里，出门大约等于发财？再好不过了。旁边是另一家快捷连锁酒店，门口贴着标语：做谦恭有礼的（中国）长沙人。我想起北大校长蒋梦麟1937年夏天第一次来到长沙，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筹建临时大学时，对湖南人的急脾气印象深刻，“公路车站上我们常常看到‘不要开口骂人，不要动手打人’的标语。”[1]

打车去湘江对岸、岳麓山下的中南大学，看梁思成林徽因当年设计的和平楼和民主楼。那是两栋红砖建筑，和平楼现在是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的教学楼，方正宽广，楼前还有一个广场，民主楼是机电楼，小一些，雨水在墙壁上留下道道痕迹，白色窗户油漆剥落，下面的砖体见证了人类与刻章办证小广告永无止尽的战斗。1935年，清华大学未雨绸缪，停建文法学院大楼，把40万元款项转投长沙岳麓山，筹建新校舍，作为华北战事爆发的退路。[2]至于为何选择长沙，时任政治系主任浦薛凤曾回忆，在教授评议会中，蒋廷黻力主迁湘，其余的人都附和。[3]蒋廷黻是湖南邵阳人，时为历史系主任，他的理由是，“有些人认为西安很适当。我提议迁往湖南，因为我认为日本的侵略决不会远及湖南。尤有进者，湖南生产稻谷，即使日本想要封锁中国，清华教职员和学生也不致挨饿。”[4]1936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拨岳麓山空地100余亩赠与清华，清华开始在湖南筹设分校，为稳妥起见，拟先设立农业研究所，然后逐步改为农学院。到抗战爆发，六所校舍尚未全部落成，后又遭到轰炸，和平楼与民主楼就是在当年两栋教学楼的基础上修缮建成的。[5]

正是长沙的仲春，城中满是女贞花的香气，校园里的池塘也因为藻类生长泛出春水

应有的样子。校园处处草木深，但院士楼附近却没有樟树也没有杉树，就像立在红土地之上的云南高原。上楼，按门铃，屋里小狗狂吠，推开门时，95岁的赵新那把轮椅往前一溜，迎上前来。

我所拜访的这位老人是“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二女儿，1923年出生于麻省剑桥，当时赵元任任教于哈佛大学哲学系，两年后赵元任回国执教，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三年后他参与筹备创立中央研究院，任语言组组长，此后几年辗转北平、华盛顿、上海，赵新那从小学习语言的折腾见证了那段漂泊岁月：幼儿园在清华，小学一二年级在北平孔德学校，三年级就到了华盛顿，“（学语言）我父亲主张‘直接法’，就把我们往学校里一扔，就这么听来的”，就这么学会了英文，不到两年，又跟着父亲回国了，在上海继续读小学，中文又跟不上了，“我还记得那个入学考题，是‘学生应有的态度’。‘态度’两个字我不认识，但是考试谁能问呢？所以我就是就‘学生应有的……’胡说一阵子的。”赵新那笑。

1934年，赵元任一家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定居首都南京，其妻杨步伟回忆，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给赵元任安排的语音研究室非常讲究，隔音地毯都是北平定制的，照全房间的大小，是一色儿灰白色的厚地毯，各种仪器也都是从外国定购的，因为他想这些以后是大家终身的事业，学者可以安心发展他们的专长了。学者的家属们也都做好了在南京永久居住的打算，纷纷筹划着盖房子，“真是一时之盛”。也是这一年，赵元任考察徽州方言，杨步伟跟着去皖南玩要，经过胡适老家绩溪，有感于当地山清水秀，就给胡适写信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难怪出了你这个人。胡适给她回信：“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6]

好景都不长久，中日局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南京街头出现越来越多的抗战标语（赵元任没忘记记下一些标语的古怪文法，譬如大家要提心吊胆的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新街口还放了一个大炸弹的模型，提醒市民挖防空壕，多备食粮。1937年“七七事变”前几日，杨步伟接到蒋梦麟、胡适和梅贻琦的太太们发来的电报，说请留下他们在南方多玩几日，杨起初觉得莫名其妙，后来又想其中必有说不出的缘故。后来蒋胡梅三人离开庐山（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16日开始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邀请各界著名人物分批前往共商国是），来到南京，在赵元任家对面的吴之椿家讨论是否应当北上，“适之主张急回北平以安人心，梦麟一边吃花生一边想理由，月涵（梅贻琦）则仰面看墙上的字画，不定可否”，心直口快的杨步伟只好大开话匣子，说她无缘无故接到联名特电要她留住他们，绝不是一个玩笑，必是别人不方便打电话借用三位太太之名，一定有不可回去的理由。在座众人意见不一，四五个小时后，还是蒋梦麟站起来说，如此我们暂停两三天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好了。[7]

同样在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原计划搭乘津浦铁路列车回校，也是在南京被友人劝阻，决定多逗留一些时日。战争7月爆发，8月，国民政府开始高校内迁计划，临时大学第一区设在湖南长沙，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为核心，第二区设在陕西西安，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为核心。同月，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教育部任命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杨振声、胡适、顾毓秀、何廉、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这其中，蒋、胡来自北大、梅、顾来自清华，张、何来自南开，傅来自中研院，杨代表教育部，朱经农和皮宗石分别是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和湖南大学校长，代表地方。8月28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谕梅贻琦，“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长。”[8] 南迁已成定局，梅蒋张三位校长再回北方，要等到8年以后的1945年了。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是“七七事变”后最早一批南下的学者。他中等身材，面庞瘦削，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头长发整年不梳，这位曾经的新诗诗人、新文化运动干将，在清华讲授的却是《诗经》与《楚辞》，“专门在（故）纸堆里打滚”，但讲法“决不和那些腐儒一样”，如学生云，“诗经虽老，一经闻先生解过，就会肥白粉嫩地跳舞了。”[9] 清华教授每服务满五年有一年休假，1937年夏天恰逢闻一多休假伊始，他计划回湖北老家安心读书。7月15日，他给先行回鄂省亲的妻子写信，说计划在三日内动身，“……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只好满处找人打听消息，结果你一嘴，我一嘴，好消息和坏消息抵消了，等于没有打听……”“反正时局在一个月内必见分晓，如果太平，一个月内我们必回来，否则发生大战，大家和天倒，一切都谈不到了。”[10] 同日，为应不测，清华提前发薪。7月19日，闻一多带着子女和女佣赵妈赴天津，走津浦铁路赴南京（平汉铁路已不通），再转武汉。在正阳门火车站，闻一多遇到了曾经的学生臧克家，臧问他：“闻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答：“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后来臧克家在文章中写，“他很感慨。我很难过。在天津换车，人向车上挤，像沉在水里争一个把手。”[11]

闻一多的清华同事、地学系教授袁复礼也是这一年轮休。因为轰动全国的西北科考，“发现恐龙的袁先生”在清华相当有名，对学生他毫无架子，只是系务所累，他时常来不及备课，更来不及整理西北带回来的珍贵采集品。[12] 这一年他准备去美国考察，“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他的几个箱子都已经托运了”，袁复礼的女儿袁刚告诉我，“七七事变以后，我父亲赶快跑到天津把箱子截回来，说我不去美国了。”七七事变这年袁刚4岁，刚刚有记忆，她还记着几个画面。画面一：天黑黑的，下雨，她躺在床上，听到爸妈起来了，在那儿叨叨：这是打雷还是打炮？画面二：日本飞机在清华园上空飞，大家都疏散到科学馆地下室，说是地下室，其实是半地下室，高高的有窗户，

上面都用报纸条打了叉，据说这样被炸后不会爆裂，晚上不许开灯，大家都拿棉被铺在地上睡觉，袁刚挺开心，她可以在地上翻跟头了。画面三：有一天白天她出去玩，科学馆过去几步路就是荷花池，她找了个棍儿，打水玩儿，后来姐姐来了，说，快回来，老余（当时袁家的厨子）送饭来了，快来吃饭！”

避难时袁刚已经不记得有父亲在了，都是母亲在管他们，“为什么呢，他得跟学校走啊，学校里有些该收拾的东西他也得整理”，当时她的大弟弟一岁半，小弟弟一个月不到，全靠母亲和保姆两个人，事变后不久袁家搬到北平城内南横街祖宅，袁复礼离开北平之前给家人拍了张合影，后来袁刚母亲带孩子南下奔赴联大，途径越南，就是用这张照片办的集体护照。

7月28日夜，日军炮击南开，留守学校的南开大学秘书长、哲教系教授黄钰生带领留守人员乘小船行驶到王顶堤一带的稻田中躲避。黄钰生毕业于清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学，成绩不算好，因为社会活动太多。他外形俊朗，是学校的风流人物，年年夏令营都参加，连续两届演讲比赛第一[13]，后来也到芝加哥留学的闻一多说他这位湖北老乡“是个 cynic（愤世嫉俗者）”，闻一多说的是对生命的看法（闻说自己是“冲动的奴隶”，“生命的肯定者”），其实，cynic 形容闻一多自己可能更合适：他在美国换了三所学校，总是带着愤懑，“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14] 当时的闻一多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后来著名的《七子之歌》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完成的。

回到国立清华大学后，闻一多钻进故书堆，不再关心政治，而曾经倜傥的黄钰生则被私立南开大学改造成了兢兢业业的老黄牛。7月29日一早，黄钰生带教职工三人，学生五人，冒险回校巡视，不料炮火上午又至，师生避入秀山堂地下室，一枚炮弹从屋顶直穿入地窖，幸未爆炸。躲过一劫的他们冒着炮火从思源堂后上船，出八里台，经吴家窑、马场道抵达南开大学位于租界的临时办事处，此时黄钰生浑身泥水，一脸烟尘，满头乱发，眼镜架只剩下一条腿拖在耳际，手中提着24串钥匙，其中一串是他自己的，其余都是各科室的。[15] 日军的炮击夷平了南开大学，日本众议院议员山本实彦在《天津通信录》中记录了他的所见：“有一个词是归于死灰，我觉得完全可以形容这里。有名的图书馆是卢木斋捐款修建的，但是我看到在这个图书馆的屋外被弹出的珍本碎片，已经被风吹散了，我在想应该带回去吗？但是我害怕报应，便将这些碎片拾起来，从破玻璃窗子投了进去。”[16]

7月30日，《中央日报》记者在南京专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的那句名言就是这时广布天下的：“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南开被毁后，黄钰生写信给太太梅美德，告知家中什物已荡然无存，这位黄钰生在芝大的同学，出身于美国华侨家庭的女子回信：“论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于心无愧。若校产毁而私产存，就可耻了。现在你有我，我有你，还要什么？”[17] 8月中，黄钰生经海路赶赴南京，把那些钥匙——现在它们仅具象征意义了——交到张伯苓手中。

黄钰生在南开的前同事李继侗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第一位林学博士。这是一位与野地、植物为友的学者，还在南开时，他就常在八里台河塘边捞取各种水草，拿回来做实验，后来去了清华，衣着“与当时清华园的洋气不甚协调”[18]，他自己当然毫不在乎，每年带学生野外考察，只许带极少的东西，极少的钱，除非万不得已，一律自己行李标本，吃粗粮干粮。他有个说法，每年总要过若干天最简单的生活，试试一个人最低生活究竟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19] 1937年夏天，李继侗正在淮河流域桐柏山一带考察植树造林工作，抗战爆发后，他没回北平，辗转去了苏州，因为他的父亲退休在那儿。在苏州没待多久，他就动身前往长沙，李继侗之孙李应平告诉我，祖父去长沙是为了清华与湖南省正在合建的农业研究所和农学院，他当时还不知道要合组临时大学。

拿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是湖南人，曾国藩的曾侄孙，总穿大褂，不修边幅。他热爱旅行和写作，1936年6月自筹经费率领“北大化学系赴日参观团”对日本科学考察，并应《大公报》之约写了《东行日记》，彼时他已经注意到了“民治主义在日本的没落”，他写到，日本一般民众对军部统制一切的现象似乎很满足。在京都、大阪等城市，从中国东北调回的日本侵略部队受到民众满街欢迎。1936年年底，他又赴绥远考察，在寒冷颠簸的火车厢里，读完了范长江于当年8月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后来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旅行文学，“最低限度可以做到的事，是自己对自己真实。”[20] 1937年7月，曾昭抡也受邀前往庐山，参加国是谈话会，随后沿江而下，到上海迎接留英归来的夫人俞大鹏，住在虹口。8月12日半夜，朋友打电话来，说日本人马上就要登陆打仗，虹口是战争区，不能呆下去，第二天曾昭抡就和夫人搭火车去了南京。[21]

曾昭抡抵达南京当天，“八一三事变”爆发，惨烈的淞沪会战由此拉开帷幕。也是8月13日这一天，杨步伟把抱病的赵元任和大女儿赵如兰送上了南京开往汉口的“太古号”客轮——因为船票紧张，杨步伟只能和三个小女儿留在南京，继续等票。赵元任走之前和妻子商量，家这么大，带什么东西走是好？想来想去，结论是钱买不到的东西最要紧。杨步伟把丈夫记了31年的日记，还有从相册上撕下的4000多张照片，包了七小包，第二天在邮局排了七小时的队，寄给赵元任在纽约的朋友 Robert W King，她不知道 Robert 的住址，只知道他是贝尔电话公司的高级职员，就用那个地址寄了出去——80年后，赵新那之子，也就是杨步伟的外孙黄家林给我看了好几本影集，照片来源都是杨步伟寄出去的那七小包，它们顺利地抵达美国，逃过了中国此后的系列战争与革命，完完整整地保留了一段历史。我尤其留意到赵元任和家人友人们在沃克街27号（27 Walker Street）那栋米黄色两层小楼——这栋房子

离我 2013 年访美期间租住的公寓相隔只有数十米，在阳台上就能望见——前的几张合影，有一张是胡适，他穿着黑色的大衣，左手提皮包，右手拿帽子，两腿笔直地站在雪地里，表情有点拘谨。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雪后初晴的波士顿，几乎可以嗅到空气里融雪剂的气味。

回忆往事时，赵新那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我猜那是因为调动记忆需要格外的能量。有时你感觉她睡着了，可是她还一直在用那口漂亮的京片子缓缓说着。送走父亲没两天空袭来了，飞机从赵新那头上飞过去，能看见日本飞机上的大红花，她特别记得妹妹把脑袋躲到冰箱里，屁股翘在外面。我好奇为什么孩子要躲在冰箱里，杨步伟的回忆录给出了部分答案：许多南京人的防空壕都盖在地面上，用结实木头压着，找不到木头就用冰箱横在中间。这种防空壕防不了炸弹，仅能防流弹而已。

从 8 月 15 日到 17 日，南京天天都有日机来袭。政府强制购买民众存储的汽油，杨步伟卖掉家中汽油，半送半卖剩下的米面，连同中研院发给赵元任的部分薪水等等，凑了 900 元，8 月 19 日带着女儿们登上了去汉口的轮船。走前一天，胡适来了，说他的太太也许不久会到南京，到时可否借住？杨步伟说，自然没有问题，就把被单全部换了，床前桌上还插了一朵玫瑰花才走，几十年后杨步伟写回忆录，“至今闭眼还觉得家中还是那样的。”[22]

8 月 19 日那天南京下午大雨，雨后有云，杨步伟她们的船人还没上齐，空袭警报就响了，船匆匆开出，驶往上游。赵新那年 14 岁，“说起来都是逃难的人”，她回忆起她们母女的船票一度被住在对门的吴之椿骗走，脸上挂着无奈又理解的笑。第二天中午船到九江，很多小贩挑着篮子上船来卖瓷器，“我母亲挑选了一个观音，白的，讲价钱讲到了一块钱，还没来得及给钱，响警报了，那个小贩，一个女孩子，挑着她的网篮就上岸跑了，所以我们拿了一个没给钱的观音。这个观音，跟着我父亲到夏威夷，到纽黑文，一直带着。传开来一直跟到现在，现在还在我大姐女儿华盛顿的家里。”

船到汉口，转火车到长沙已是 8 月 24 日，一家重新团聚。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用杨步伟的话说，“凡有熟人去，无有不帮忙的，找房子的事更是出尽全力”。朱经农此前已经给清华和中研院租了圣经学院，大部队未到，杨步伟和赵元任一家就暂住了几天，后来又转到警察厅长的楼上居住。不多久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们陆续抵达，大家在长沙又热闹起来了，赵元任家是聚餐地之一，有一天大家合买了一只火腿，正准备煮来吃，从南京来的新华银行经理徐振东来了，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赵元任杨步伟家的两栋房子都中弹烧了。晚上赵元任到半夜睡不着，说他什么都不在乎，就是那么多藏书没了，杨安慰他，不要急那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目前过到哪儿是哪儿。将来我一个钱不乱用，有钱先买你的书好了。把赵元任给说笑了。[23] 1937 年盛夏的长沙，虽然本地报纸上满是沪上抗战与本地防空计划的消息，但本地居民还未充分感受到战争的冲击，从《力报》的记者专栏里可以瞥见这和平的最后一瞬，“在日间，人们多是躺在屋子间里，嘴里不住喘着‘热啊热’的……一到黄昏，赤铁般的阳光给暮色吞息了……大家都赶着换了衣服，预备尽欢尽逸地去领略夏夜的赐予。晚饭后，成群结伴潮流一般地从屋子间里走出来，宛如下了总动员一般的踊跃。有的坐在晒楼或者坪台上，无系统零乱地畅谈着，也有集伙跑到附近避暑娱乐场合去逛逛圈子，或者花几毛钱要一杯咖啡，一杯冰淇淋，坐到深夜作兴尽而返。……傍沿河马路的一旁，坐满着劳役进汗了整天的人儿，真像蚂蚁出洞似地沾满了这修长的马路。人呢？摇着大团扇，嘴里含着古老的旱烟杆，尽情地畅叙着日间的一切及其他轶事。……马路另旁，摆着一些卖香烟凉茶的、测字算命的摊……形成了一个大的夜市，于是喊声、叫声、谈笑声、儿女的哭闹声、大人的咒骂声，拉杂成一片，冲破了湘江水面的沉寂。”[24] “长而且宽的中山路……到了夜里，尤其是夏天的夜里，可就大大不同了！百货店，洋货商，都把玻璃橱中，装满了夏季男女应用的花品，像一九三七年式的浴衣，各色的毛扇，精绘团的花伞，胡椒孔的乳罩，轻薄柔软的衣料，裸足着的皮鞋，巴黎的香水，脂粉……摆设得新奇生动，富丽堂皇，令人目眩，又加上利用各式各样的广告灯，收音机里的迷人节奏，更衬托得使人停步，留恋，心痒，进一步的使你身不由己想走到里面，选他几种，拿回家去，或者送到别的地方去，献给爱人。”[25]

与杨步伟一行差不多时间抵达长沙的还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陈序经，一位以倡导“全盘西化”闻名的学者。“七七事变”发生时，陈正在广东顺德考察那里的蚕丝工业[26]，7 月底，陈序经由广东北上，但行至南京已无法继续前进，8 月 20 日，他离开南京经汉口赴长沙，按照陈序经的说法，他是临大诸多同人中第一个到长沙的，初到长沙时，陈序经也去省教育厅找了朱经农，谈及临时大学的事，朱很坦白地说：“临时大学，犹如空中楼阁，能否成立，很成问题，你实在来得太早了。”[27] 而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在 10 月 4 日抵达长沙当天也在日记里写：“联合大学太复杂，很难取得成功。”[28] 虽然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常委 9 月间已陆续抵长，但直到 11 月以前，来到长沙的三校师生仍然不多[29]，为此，原定的“双十节”开学不得不延后至 11 月 1 日。三校能否联合成功？许多留在平津的人仍在观望。

\* 本文摘自杨潇新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全书逾 40 万字，单读出版，将于 2021 年春季上市。

- [1] 蒋梦麟《西湖·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 年 9 月，p211
- [2] 金富军《1937 年前后的清华大学》，《文史春秋》2009 年第 11 期
- [3]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合肥：黄山书社，2009 年 6 月，p42
- [4]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年，p172
- [5] 曹素平《岁月沧桑历史见证——“民主楼”“和平楼”的变迁》，中南大学档案馆官网：<http://dag.csu.edu.cn/info/1033/1337.htm>
- [6] 杨步伟《杂记赵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3 月，p91、97
- [7] 杨步伟《杂记赵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3 月，p102、105、106
- [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0 月，p54
- [9] 佚名《教授印象记》，《走近清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 月，p6
- [10] 致高孝贞，《闻一多全集 12 书信·日记·附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p283
- [11] 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修订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2 月，p441、442
- [12] 佚名《教授印象记》，《走近清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 月，p58
- [13] 《黄钰生自传》，《黄钰生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年 10 月，p150
- [14] 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修订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2 月，p202、207
- [15] 陈珍、邢公畹《黄子坚先生》，《黄钰生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年 10 月，p349
- [16] 《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 9 月，p134
- [17] 黄燕生、黄明信、黄书琴《黄钰生小传》，《黄钰生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年，p425
- [18] 曹宗巽《怀念先师继侗先生》，《李继侗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年 3 月，p413
- [19] 殷宗章《怀念李继侗师》，《李继侗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年 3 月，p410
- [20] 曾昭抡《谈游记文学》，戴美政编《曾昭抡西康科考旅行记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 11 月
- [21] 戴美政《曾昭抡》，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 年 12 月，p113、122、155
- [22] 杨步伟《杂记赵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3 月，p112
- [23] 杨步伟《杂记赵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3 月，p118、119
- [24] 《老报刊中的长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年 8 月，p152
- [25] 《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p544
- [26] 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1 月，p106
- [27] 陈序经《我是怎样研究文化学》，《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2 月，p71、76
- [28] 《朱自清全集 第 9 卷 日记编 日记上》，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年 3 月，p488
- [29] 《吴宓日记 1936-193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3 月，p218



杨潇

记者，作家，哈佛尼曼学者。特稿写作从业十余年，获奖若干，出版有作品集《子弟》，非虚构新作《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即将问世。

## 重走

作家杨潇新作《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将于 2021 年春问世。此栏目为节选，又名《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



图片来自 [Dubhe Zhang](#) on Unsplash

非虚构

# 杨浦大桥

许佳 | 到上海去

小孩子是浓厚的一小点，  
老年人是稀薄的一大片。

2020年1月20日，我乘坐高铁，从北京回到上海。

在车厢里一路戴着口罩，只有吃饭喝水时短暂取下。邻座的年轻姑娘也戴口罩。为了擤鼻涕，她频繁地把口罩拉到下巴颈上。很快地，她座位上那个卫生袋就让用过的纸巾装满了。

“坐我旁边的人好像感冒很重。”我在要好朋友的微信群里说。有人回复了一串省略号。“你口罩戴好。”一个人说。  
“应该随身携带测温枪。”另一个人说。

武汉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人数在增加。群里大家贴出了钟南山采访内容的微博截图。“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来源很大可能是野生动物。”一边讨论疫情，他们一边互相询问着各自的位置。他们约在珮姐吃火锅，有人下午四点多就前去拿号排队。“现在叫到C11。”他报告说。“我还有两站就到。”另一人说。

高铁预计晚上八点多抵达上海。换做别的时候，我可以赶过去跟他们碰面，吃个收尾。但今天不行。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奶奶过世，我今天也不会返回上海。

## 01. 医院

奶奶住进医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最后一次去探望，其实就在前天。三人病房里，暖气开得很足，空气中有一股肉汤泡饭的味道。三个病人的病势都已沉重，床帘半合，没人说话，气氛沉闷。奶奶睡着，看样子是已经睡了很久，而且一时半会儿没有醒来的打算。

事后回想，其实当时她已接近弥留。只不过，那几天来，她始终是这样时而昏睡，时而清醒，醒来时，也能坐起身子，喝上半碗汤水，因此我们认为，她兴许尚能支撑过这个年关。年一过，名义上她就满九十岁了。对一个人而言，这似乎意味着某种成就的达成，我们大家都隐隐觉得是有其可喜可贺之处的。然而，每每醒来时，她总是说着：我要死了。

奶奶虽然病了，在好几年间，看上去倒是跟健康的老人毫无二致。她刚查出癌症那阵，我联系了在医院相关科室工作的同学，带她去看门诊。长大成人之后，没有了寒暑假，同她见面就不如小时候频繁，也没有小时候那种长时间朝夕相处的机会——那一次见面，也可算小别后的重逢。在徐家汇地铁站口，她一看见我便说：“现在怎么办？我要死了！”我当然作出轻松的，甚至是快乐的表情，笑着说：“不会的，你怎么会死？”她还是我熟悉的老样子，只不过神色严峻些。她的白净的圆脸，眼角分布着松软、柔和的皱纹，有点像羊绒衫的那种褶皱。她的脸颊还是饱满的，带点粉色，上面稍有几道丝线般的浅纹。

病程进行得很缓慢，有一度，她自己也认为，生病就是这么回事，只需要忍耐些小小的、足可忍耐的不便而已。但若是站在今天往回看，便可发现，原本面色红润、身材微胖的奶奶，是不可逃避地渐渐变成了一把骨头的，昏睡不醒的奶奶。在病床上，她的脸色长时间地保持严峻，睡眠时依然严峻。醒来时，她就反复追问着：“现在怎么办？我要死了！”或是：“为什么我还不死？”不知道是追问我们，还是追问自己。

在内心，我们是同意她的。但表面上，我们依旧轻松地，甚至快乐地说：“不会的，你怎么会死？你不会死的。”

写到这里，我敢说奶奶当时面临必然而未知的前景，应该是希望有人跟她谈谈即将发生的事情。可是，不论她的子女，抑或她的孙辈，对此都无从谈起，因为一旦细想，大家都同她一样，感到未知而恐惧。“我要死了！”“你不会死的。”这样回答尽管草率，多少也算表达了美好的心愿，同时避免了过于严肃的谈话。照料病人，已然耗费精力，有时甚至需要调动起才智，于是头脑本能地避免思考生死大事。加之在那样空气不流通、光线不明亮的环境里，三个几乎不曾照面的病人，和四五个萍水相逢的家属身处同一病房，大家都沒有谈话的兴致，也羞于作情感的表达。病房里的人声，只限于“你要吃点东西吗？”，和“你睡一会儿。”，纯乎实用。以及：“我要死了！”“你不会死的。”

我是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动身离开上海的。

车票早就买好。每年春节一起回北京，跟小不的父母一块儿待上一个多星期，是我们结婚以来养成的惯例。在出发前一天，我特地安排一个空档，去医院再看奶奶一次。暗地里，我想过这也许是最后一次。

我爸说，你们不用来了，亲婆在睡觉。

我爸说，你不用退票，有什么事再说吧。

这一天天气非常好，车里暖洋洋的，早早在后座熟睡，一边脸被太阳晒红了。我对小不说：那么我自己上楼看看，你们在车里等我吧。

晚些时候，早早从睡眠中醒来，发现我害她错过了对太太的探望，大发了一通脾气，流着眼泪，叽叽咕咕地抱怨。元旦假期里，她去探望过太太一次。太太是喜欢看到她的。但是在那病房里，太太只在她走进门的前五分钟表示欢迎。我让她站在床边的小凳上。太太躺着，脸转向她那一侧，手伸出去，抓住她的小手，摩挲了片刻。她穿着红色的中式小褂，头上佩戴一对绢花，丁零当啷地垂下小珠子串成的流苏。太太说：“你真漂亮！”五分钟之后，太太就叫她走。就连病房最里头那个病床的家属也说：“小孩子不要来这种地方。”

如果临终的气息具有辐射性，小孩子的耐受期可能是五分钟吧。

就连奶奶自己，也不愿意长期忍受这种辐射。入冬之后，她在家里喘不上气，提出希望住院。住进医院一两周，她开始盘算回家。我问她：“你哪里难受？”“说不出的难受。”她说。身体既有的问题不会改变，究竟回家舒服一些，还是住院舒服一些？每一天，在清醒时，她可能思考和选择了无数次。

回去吧。奶奶说。

别来了。奶奶说。

我跟我爸商量，是否把火车票退掉。他说，不用了，到时候再说吧。

也好，只有几天而已，不知不觉，奶奶就把这个年过了。

到北京，睡了一觉。第二天清晨醒来，看到了爸爸发来的微信消息。奶奶去世了。

他说，算了，你别特地回来一次了，没关系的。

## 02.

张杨路

我冒着寒冷，从北京赶回上海，去送奶奶最后一程。

走出地铁口时，脑海中浮现出鲁迅《故乡》的开头。此时的上海虽称不上严寒，亦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北风从楼梯口往地下灌。我扯下口罩，让清冽的空气穿过鼻孔，打咽喉后头出去。

这条路，多年来早已走熟，但我一直不喜欢走。张杨路，宽阔的六车道，中间隔着比车道还宽的绿化带。一路之上，除了两家4S店、一座公共厕所、一两块公交站牌

之外，就没有其他可看的风景，有的只是空阔、喧闹的马路，机动车的路。路两边的房屋，本来就不高，一隔得远，就显出低矮。夏季的日头、冬季的寒风，在这条路上，和机动车享受同样待遇，都是畅行无阻。

算起来，其实直到在地铁通车之后，才常在这条张杨路上往来。此前到奶奶家，都是到人民广场坐隧道六线。再往前回溯，则是到十六铺坐轮渡，再在东昌路码头转乘81路。奶奶家在那个时候搬到浦东，在隧道六线都还没开通的时候。当时我几岁呢？可能九岁，可能十岁。

再从前呢？再从前，奶奶家是住在城隍庙附近的。

但是越往前想，回忆越是零散，譬如打开一个旧抽屉，里头一堆五花八门的纽扣，各有各的好看，但你不记得是哪件衣服上的。越近的回忆，尤其是在我上大学之后的，自然可以连接起来，譬如地铁线路图，前一站，后一站，起始终点，哪里换乘，哪怕有点混乱看不清楚，到底是可以理清的。在张杨路这里，我的终点站，总是这一站，下来走十分钟，到奶奶家。过几个钟头出来，起始站也总是这一站，照样走十分钟，从同一个入口走到车站里去。在家里，我们常说：“到浦东去。”到浦东去不可能有别的事情，就是上奶奶家。

在罗山路口一拐，走到高架下面——几分钟之后，将会看到一个和往日都不同的奶奶家。

### 03. 白粥

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同。

厨房是既空且冷，不再传出干煎带鱼的香味，不再有人影晃动。小饭厅里的饭桌是撤走了，平日里用来吃饭的地方，而今用一张小几，供奉着奶奶的遗照、灵位。但日光灯照旧给这小房间投下黯淡的白光，玻璃柜里陈列的杂物、酒水，照旧是往日的样子，大门也照旧洞开。

据说离世的亲人这一晚会回家，所以要为她留门。无论如何，奶奶在世时，除去出门和夜里睡觉，这门总是敞开着。楼上楼下的邻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慢步踅进来。“吃了吗？”他们高声问。或者：“吃了啥？”

爷爷在世时，他们每次也连带着问：“老头呢？”老头，是全楼的成年人，包括我奶奶，对我爷爷的通用称呼。其实老头能去哪儿呢，就在前面坐着，后来变成躺着。纵然如此，问候还是要问候的。从前爷爷脑子清爽、口齿清晰时，常常反驳大家的意见，指出他们觉悟太低。所以邻居们哈哈大笑，又给他一个爱称叫做“老革命”。因此，“老革命呢？”偶尔也这样问。

爷爷在这种笑声中，孤独地坐在“前面”一张藤椅里，有点笑，有点嗔。

我一度有点困惑，不知为什么，在这前后套的房子里，奶奶把靠里的房间称作“前面”，反把进门这个房间称作“后面”。难道先踏入的不该在前？比如坐公交车时，车头处上车，那不就是前门？家里的大门，却叫做后门不成？后来顺着她的思路去想，向阳而舒适体面的房间，在重要性上应该占先；进门处，连接灶披间，当然居后。其实，从前在城隍庙的老房子，倒确实进大门一转就是正房，去公共厨房，则要一路走到尽头。搬了新居，出入格局颠倒过来，奶奶的认识方法却没有变。

此刻，大家照旧聚在“前面”——我爸妈、姑姑姑父一家，还有奶奶生前关系最好的邻居——401、503。

邻里间统一以门牌号相称。

“吃过饭吗？”首先自然问这个。

还没来得及吃。

“粥吃吗？阿要吃点我烧的粥？”姑父问，一如以往邀请我喝点黄酒的表情，站起来两手一揣，微微地弯腰，脸带笑意。

此刻自然什么都好，白粥好的。那么酱瓜吃吗？酱瓜吃的。于是三分钟后，我便坐在南窗边的小方桌上，面前摆着一碗烫嘴的白粥，一小碟酱黄瓜。

不知是不是赶了远路的缘故，白粥吃起来格外绵软稠滑，用甜津津的酱瓜来过，一碗粥没几口就吃光了。

别的人指着我一迭连声地说：“看，她吃得倒快。”这个粥真是很好吃的。”姑父又走过来，脸上带着从前请我喝剑南春的得意神色说：“怎么样，我烧的粥好不好吃？”

我一路上并未设想家中的气氛。奶奶病得久了，大家早有心理准备，想来应能平静接受。但如此轻松，有如往日的普通家庭聚会，是我所始料未及的。

然而，这气氛反而和谐，反而合理。这是几十年来我已经习惯的奶奶家的气氛。

### 04. 祭祖

小的时候，除去节假日，还有几个日子，一定会上爷爷奶奶家去：清明、七月半、冬至、年三十。当天的流程是这样：

上午抵达，在家里玩一会儿。小时候没有手机，小孩这时也没什么可玩，无非是坐在那里玩外套上的拉链或扣子，听大人聊天。大人聊天是很有意味的，尽管他们说的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听起来，就觉得这人有万般的不好，或者可怜。奶奶会从一个小橱里翻出蜜饯、坚果，特意款待小孩。于是就一边吃零食，一边听大人掰扯那些不知道是谁的人。大人的注意力间或也落在我的头上，这时就停下嘴，脸上做出一种充耳不闻的样子，接受他们的夸奖。

在“前面”房间玩了一会儿，忽然“后面”房间里一阵乱，大家都往后跑。席开出来了。一桌子菜——白斩鸡、盐水鸭、白煮肉、蒸鱼……总共七个菜，鸡鸭鱼肉都完整不切开。桌子四边，饭碗、筷子、酒盅，也整齐地摆好。碗里有饭，杯中有酒。所不同于平时的，桌面上还设了香烛、摆了几张过世亲人的照片。当然这不是玩情调，而应是发给老祖先的某种信号。

房间窄小，大家背贴墙壁站着，小孩子挤在门边。面前地上，正对饭桌摆着一个蒲团——后来蒲团找不到了，就拿个坐垫代替。于是从辈份最高的开始，逐一磕头。若有个把人不能到场，就由旁人代磕。我表妹出国留学那几年，我就常代表她磕头。代磕头时，双手合十，嘴巴里先说：现在我代某某磕头，请老祖宗保佑……

我常想，不知来吃饭的老祖宗，都有些谁，他们看见我，是个什么感想。但我知道，其中有我英年早逝的叔叔，那是我熟悉的人。

想是这么想，但老祖宗们真坐在桌边吃喝吗？说吃了吧，菜肴却不见减少。说没吃吧，宴席是已经郑重地设下了。

好在我对此也不十分纠结。我受到了大人们的影响。他们的态度，是顺其自然的。主要顺着奶奶。奶奶召集大家，操办一切。大家就赶来，照奶奶的安排去做。烧菜，磕头，祝祷。在烧菜、磕头、祝祷的间隙，大家就聊天、看电视，有时候，还下楼去逛一圈，买点炒货。

一轮头磕完，奶奶把准备好的元宝拿到门口楼道里去化。风一吹，满屋子灌烟，烟里头还飞着纸灰。于是大家跑进跑出，都把手放在面前挥动，说：烟煞了！

这元宝，我一直以来感到有点神秘。似乎一年四季，家里总是在静悄悄地准备。妇女们一得了空，如果不是织绒线，就是折锡箔。而且织绒线的事情，往往要让位于折锡箔。锡箔是在黄裱纸的一面涂上银粉，那质地，就像儿时家里用的一种很粗的卫生纸。而锡箔这种商品，就像馄饨皮、春卷皮那样，是有难以言表的品质之分的。常听家里人议论说，这个人卖的锡箔好，那个人卖的不好。好的锡箔，似乎是“很厚，掂在手上重墩墩的”。但我去拿起来看，也还是一张薄纸。

优质锡箔的购买，也是不易。听奶奶、姑姑、妈妈她们说起来，似乎那卖好锡箔的人，有种云游四方的感觉，往往来得出其不意。有时奶奶在楼上做饭，忽然一个邻居说，卖锡箔的“那个人”来了！于是饭也顾不上了，汤锅在煤气灶上坐着，她就一手攥着小钱包跑下楼去。过了十分钟，提上几捆锡箔来。

也有过受骗上当的事。买来的锡箔，只有上下两张是真的，中间都是草纸。

总之，锡箔准备好之后，就在午后清静静静地折起来。锡箔本来是一刀一刀，用红色纤维绳，像扎蛋糕盒子那样妥善地扎得很紧。一旦折成元宝，就蓬蓬松松地堆在一个纸盒里，绝对不去压它们。我们家每个人都会折锡箔，小孩子也会折的。从前的孩子，可能就靠这类手工活来锻炼手眼协调。折了一会儿，手指就变成金属色。

元宝化完，再等一会儿，等老祖宗们吃好喝好。期间大家并不拘束，仍旧回到“前面”房间去聊天、看电视、嗑瓜子。接着奶奶召集大家再磕一轮头，等香烧尽，便吹灭蜡烛，收起碗筷。桌面上的菜肴，拿到厨房，或者切一切，或者下锅加入油盐酱醋烧一烧，就轮到我们大家上桌吃饭。

这天晚上的气氛，恰如往日祭祖的日子。小饭厅里的饭桌被挪到了大房间，大家围坐桌前折锡箔。肢体在认真地忙碌，精神上却三心二意。爸爸妈妈向我介绍了料理奶奶后世的进展：如何的彻夜不睡，忙前忙后，通知亲友；如何的咨询家里较有经验的亲属，定下“热葬”的做法——即是在火化当天便将骨灰入土，据说时下正在流行；如何的通知亲友，谁会赶来同我们一起出发；如何的筹划明天的日程，几辆车去乡下，多少人跟车；如何的回到家中，设下灵台，总算一切就绪。明天又会是漫长的一天，今晚则要守夜。这守夜的任务，看样子得交给我和表妹。

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奶奶召集我们聚在一起，在这所一室半的小房子里。

爷爷奶奶的乔迁，是在初夏，天气还没正经热起来的时节。搭轮渡过江，转 81 路公交车，终点站下来，穿过马路，就到了他们的新家。前后套的房子，一间有窗户，一间没有。若说结构，跟城隍庙的老房子是差不多的。不过楼房到底是楼房，前面是个幼儿园，开阔没有遮挡，大房间还带阳台，显得很响亮。大家都说，窗户打开，夏天风是很大的，只会觉得风太大！似乎为了印证这个观点，朝南的窗户都打开了，门，是对着楼梯的，也打开。这样就形成对流，很风凉的。

大家说，这可好了，住楼房了，还有卫生间，有抽水马桶，还有煤气。大家说，这搬得是很舒服的。

远是比以前远了点。但门口就有直达轮渡的始发公交车，坐上轮渡，十几分钟就从浦东到了浦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市中心迁往浦东的居民，或者是早年的动迁户，或者是为改善居住条件而置换房屋。当时拆迁致富的故事还没在上海发生，一般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炒房。来到这块新的居住地，大家带着一种开疆拓土的心情，以乐观的精神互相鼓劲，是要把以人民广场为中心，以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为精神家园的过去彻底推倒，重新来过。这种劲头，今天坐在驶往嘉定、青浦的地铁上，还常能从一些结伴前去看房的老年人身上看到。

因而大家就说着这个地方的好话：夏天风凉，晚上又清净；买菜走几步路就到，交通也是方便的。延安东路隧道当时已经通车，有一部隧道六线，开通不久，然而叫做“高峰车”——别的时间没有，只在上下班高峰出车，是雪中送炭的意思。爷爷乘坐这部公交车上班，几乎直达，可说比从前在城隍庙时更其方便，因此甚至有了天时地利之感。看起来很远的浦东，感觉上又不那么远了。



图片来自 [Silvia Fang](#) on Unsplash

比起物理距离，还是心理上的距离更见落差。从前住在城隍庙脚下，出门走不到五分钟，就被方浜中路上的人流包围，满眼的店招、横幅、扑棱棱起降的发条鸽子、繁忙进出站的公交车——那公交车看样子开不过去，但靠着驾驶员的灵活和售票员的坚忍，最后总能从人丛中找到它的去路。公交车门一开，发出像大皮球漏气般的声音，下车的人，第一眼就看到马路牙子边上积着一线污水，水里泡着一小堆一小堆香烟屁股。搬到浦东，马路上清清静静，水泥车道、人行道的方砖，都是一种干筋筋的灰白色。路边所有，无非一家小规模的新华书店、一家出售日用品的老式百货商店。早晨，居民们穿过马路，到开设在另一小区里的菜场买菜，一些熟面孔——手上提着塑料袋，或者端着一个铝锅，锅盖上还放着两袋牛奶——就站在人行道上、小区门口拉家常，讨论菜的好坏贵贱。整个街区一时有了流动，繁荣起来。而好景不长，一过八点半，各人回到自家的灶台、阳台，街面上又归于冷落。

冷落只是个序曲。随着隧道六线开通全日线、杨浦大桥全面通车，这个原本处于城市边缘的街区，似乎被逐年地往江边推去，被圈到了内环以内。本来是很宽阔的街道，多出了药房、照相馆，接着多出了卖服装、卖水果的小铺子。一些小商贩，本来只在早市和晚市的高峰时间出来，后来就整天地占着人行道，叫卖衣架、毛刷、蒸格、抹布、发卡等等几百样杂货，也有卖玉石的、卖小竹凳的、卖外贸瓷器的、卖牛角制品的，还有专门给小孩子套圈玩的。邮局门口斑驳地贴出几张大海报，卖手机充值卡，卖纪念币，收购月饼票。一家烧腊铺，开在人行道中间，一幢显见得是违规建筑的小棚子里，但因为旁边就有书报亭，竟然也显得合理了。

有一个长时期，隧道六线的始发站设在小区楼下。紧靠车站有一家卖炸货的小铺子。如果我们小辈过来探望，爷爷散步回家时，就会从那家铺子买几块炸猪排带回来。

猪排批得很薄，表面裹一层薄薄的面包粉，炸得极老，表面是琥珀色，咬开，里头是淡淡的粉红色。因为有炸猪排，大家要赶紧上桌吃饭，猪排凉起来是很快的。爷爷不等我们，自己先坐下吃起来了。奶奶发恨说：“这个老头，总是只顾自己！”

上海的各个老牌社区，这种炸货铺应该都很常见，曾经只是附近居民心目中的名物。后来有一些通过互联网走出街区，被吹得神乎其神，比如“彭浦第一炸”。其实哪里没有第一炸呢。只不过，大部分卖炸猪排的小商贩，早年都没有称王称霸的心境吧。等人家的第一炸出来，他再去跟随，叫做“洋泾第一炸”，或者“大柏树第一炸”，就显得不正宗了。

后来隧道六线延伸了，这里成为它漫长线路的中间一站，失去了那种提纲挈领的特殊性。依附始发站的炸货铺、水果铺也相继关门。只有一个修鞋的人，常年坚持在路边摆摊。据我爸说，他修鞋比别的地方便宜得多。因此我爸去探望双亲时，会特意把鞋子带出去，趁便找那个人修。

## 06. 年关

我下楼到便利店去买牙膏牙刷，顺便买了蒸汽眼罩和暖宝宝。便利店飘着关东煮的香味，一对操东北口音的夫妇，带一个高大的男孩子，正在跟店员争执，好像是怪店员的态度冷漠。又进来两三个小年轻，女孩头发漂成浅金色，买了饮料和零食，默默走了。

时间已过十点，大部分店铺已经关门。照相馆、南货店门口的儿童摇摇车没有收回去，机器猫、喜洋洋，在路灯下微笑着。一条毫无特色的街道，但充满生活的热气，白天积攒下的热闹，在隆冬的深夜也不会散尽。

这个钟点，我很少下来走动。前些年没结婚时，每年的年夜饭到奶奶家来吃。离席之后，看一会儿春节联欢晚会，一般九点多也就告辞了。菜很丰富，酒也喝了不少，推开楼下铁门，一头热地钻进晴朗的寒夜，站在隧道六线站牌下面等车，恍惚间，此时此刻，我既不是谁的女儿，也不是谁的孙女，孑然一身，是彻彻底底的我自己，通身的爽快。我现在知道，那就是年轻的感觉。

正是年关。最近几年都没上奶奶家吃年夜饭，今年，奶奶家没有年夜饭可吃。

听说新陈代谢越快，大脑感知的时间就越长，随着新陈代谢减慢，人会觉得时间越来越短。从北京回上海，在车上用手机聊会儿天，旅途已告结束。高铁似乎压缩了一整个下午，直接把人从午后送入夜晚。相较而言，过去的时间的确长，一个夜晚，就像一枚紧密缠绕的毛线团，抽了很久都抽不完的。儿时的时间更长。从早晨起床到中午，做了一百件事情。睡个午觉起来，和表妹分分合合，吵了十几架。吃过晚饭，八点多就睡下了，在睡之前，似乎还说了几大篇话，看了好几集电视剧。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二十四小时之中，竟还剩下完好无损的一个夜晚，像崭新的巧克力，外面包裹的银纸刚刚撕开，一口没咬过。

彼时每逢暑假，我和表妹两个总会到奶奶家住上好几个礼拜。上午做功课、帮着择菜。通常是剥毛豆。区区一斤毛豆，剥来剥去也剥不完。吃了午饭，在地板上铺开席子睡午觉，起来看电视、吃西瓜、吃冷饮。那阵流行俄罗斯方块，家里只有一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我们两个轮流玩。有个塑料洋娃娃，嘴巴张着，可以拿配套的奶瓶，假装给她喂奶。但我们用勺子，舀水倒入她的小嘴，立刻，水从她后脑勺流出来。晚上吃饭，大家都郑重对待，大人要喝一点酒，小孩跟着喝点饮料——这是跟着爷爷的习惯走。开饭之前，先站在玻璃柜前，想好今晚要喝什么。但是，小孩也很有节约意识，比如看到一大瓶可乐，已经打开过，还剩三分之一，哪怕这天晚上本来想喝雪碧，也会打消念头，先把可乐喝光，因为再放下去，气就跑光了。其实气已经几乎跑光了，拧开时，只会发出很微弱、很短促的“呲”的一响。为了制造一点气，打开之前，要我先抱着可乐瓶，使劲摇晃一阵。

饭桌上肯定有毛豆。毛豆炒咸菜，毛豆炒虾，毛豆炒肉丝。

人对一个地方的回忆，如果做成装饰画，便常会自动匹配一个时间的外框。回忆中的爷爷奶奶家，大部分是用夏季做框。其中我最怀念的情景，是夏季清晨，五点多钟的阳台。我一醒来，不喜欢在凉席上逗留。我带着书，坐到阳台上去读。这是一天当中最凉爽、最清净的两个小时。太阳刚刚升起，从那高楼上吹来的风，还带着夜晚的清凉。我一口气可以读完好几个章节，直到奶奶买菜回来，喊我吃早点心为止。

偶尔有塑料袋从十几二十楼的窗口飘落。趴在阳台栏杆上看，它活像有了生命，飘飘摇摇，舞蹈着飞出很远。你不错眼珠地盯着它，可是，在快要抵达树丛时，它往往忽然消失，仿佛隐入了空气。

也有个别回忆，镶上了冬季的边框。那是在“后面”的小房间。最初装修时，爷爷曾按当时流行的做法，在西墙打了一套组合柜，其中隐藏一张可以翻折起来的单人床，平时不占地方，需要时翻下来用。床的里侧则是书柜，人躺在床上一睁眼，满眼是书。这个位置，夏天不通风，冬天倒暖和。奶奶帮我把床铺好，底下垫好褥子，一床厚棉被，一床薄棉被，上头再压一条羊毛毯——在没有空调、没有地暖的上海，对冬

夜就要如此严阵以待。钻进被窝，定定心心、舒舒服服地，把眼前凡是感兴趣的书，都抽出来翻一翻。夜里睡觉之前，清晨醒来之后，一点也不冷，无须带上半指手套，就可以看书。群众出版社出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是在这个书柜里找到的。还有好几本《故事会》年度合集，我也翻来覆去地看。《我的前半生》、《桃花扇》、《西厢记》、《包公案》、《兔子，跑吧！》……这柜子实在五花八门。

自己家里也有不少的书，但爷爷的书是爷爷的书。长大之后，有时上别人家做客，在梳妆台上看到一排人家的化妆品，也会有这种新奇的感觉——什么都想拿起来看一看。

印象中，一直到我念大学，爷爷的书橱里还不时会出现陌生的书脊。后来渐渐就不再有了。爷爷变成只看报纸。再后来，报纸也不看了。

房子经历了一次重新装修。阳台封起来，跟大房间打通，翻折的单人床拆除了。

奶奶走在冬天，爷爷走在夏季。记得当年去社区医院探望爷爷，发现医院的床垫太硬，他睡得不会舒服。于是我们开车把家里他睡的那个特制床垫搬到病房。大家把床垫换下来，抱腰托脚，把他移上去。他温驯地任我们摆布。这样的温驯，也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曾有一度，尽管他身体不好挪动，脸上、口吻里，还总流露出不耐烦——“你们又在跟我说什么听不懂的话？”“你们又想要我做什么我办不到的事？”大约是这种情绪。随着时间推移，他连不耐烦都忘记了。

床垫换好，我们想，他总算能舒服一点了吧。一夜过去，第二天清晨，他溘然长逝。想想搬床垫那时，似乎还打算着让他天长日久地在那个病房里住下去的。

从正常上下床到长期卧床，爷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为他专门购买的那张疗养床，摆在大房间原本放沙发的位置，也是从冬到夏，叫所有人都看惯了。去探望的时候，就坐在床沿上，或搬个椅子坐在窗边。屋子里没有沙发，而有张病床，上面躺着我的爷爷——既是已然如此，似乎就长远下去都会如此的。

爷爷过世，床撤走了，沙发又照老样子放回去。很快我们也习以为常，譬如沙发从来就在这里，不曾搬开过的。爷爷，在病重前很久就不再理会别人，总是沉默地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打盹，或睁着眼睛打盹。因此屋里虽然没有了他的形，却好像并未损失他的存在。

人真正的衰老，应该是开始变得稀薄。小孩子是很浓厚的，一个很小的孩子，哪怕还不会说话，哪怕还不会走路，他在那里，他就发出气味，发出声音，发出孩子的柔光，捕捉你的注意力。长大一点，他简直缠绕着你，灌满了你，让你无法忽视。上了年纪的人，可能给家人带来一些麻烦，却不能吸引注意。人们会习惯性、下意识地，让注意力从他身上滑过去。很少仔细打量他，避免认真琢磨他。他坐在他的椅子上，渐渐融入椅子的纹理，看不大出来了。

但是，他这稀薄的存在，又是不能抹去的。奶奶不在了，家却还是属于奶奶。厨房、餐桌、床铺、冰箱，都是属于她的。阳台上面，朝南供着她请的观音，用有机玻璃做了一座小小的佛龛。她可能是下楼一趟，去买点馄饨皮吧。

小孩子是浓厚的一小点，老年人是稀薄的一大片，越摊越薄，最后均匀覆盖在使用了好几十年的墙壁、地板、家具的表面。

## 07. 引桥

夜晚的小区，一如三十年前刚搬来时那样安静。不同之处，在于道路的拥挤。凡可占之处，尽数被车辆占满。一般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小区，如今都有这类困扰。逢到我们开车来时，奶奶往往会派出一人，例如姑父、姑姑，甚或邻居某某，预先到楼下占好一个车位。称之为车位，其实只是小区门口吃食铺旁的一块空地。排挡白天不出摊，停辆车不算碍事。但是须得注意，傍晚五点之前要把车开走，不可妨碍别人做生意。

我们从家里开车过来，每次都走杨浦大桥。奶奶家正在大桥引桥底下。离开宏伟的江面，拐一个大弯，渐渐切入建筑群，钻进地面，我们就到了。

人一旦到了地上，会用毫无关联的眼光去看待立交桥——马路，给马路投下阴影的大建筑，夏季遮日头，冬季挨大风，桥下停车场，流浪汉的床铺……桥面上的光景，同桥下的所见，往往不能合到一处。上桥后亦然。但这座引桥的桥面，一度为我们全家人熟悉。

高处风大。冬季站在立交桥上，手不敢从棉衣口袋里掏出来。顺着铺满沙砾的缓坡往前走，看那水泥路延伸出去，远处只有蓝天，衬出水泥桥面的白亮。扑面的风推着我们，像一个看守。下去！下去！它吼道。但我们不理它。

阻止我们挺进的不是它，是高度。路面一直在升高，不知不觉，我们所站的地方，距离地面已有好几层楼了。我们指着远处奶奶家所在的六层小楼，大喊：这里现在比它还高！我们到了这么高的地方啦！路面宽阔，两边镶着锈色的、竖立排列的钢筋花边。

1992年，黄浦江上尚只有一座通车的桥梁——南浦大桥。这年冬天，在江面上，杨浦大桥的双塔已经立了起来，但桥面还在建造。在距离江心两三公里处，奶奶的家门口，就是杨浦大桥引桥延伸所到之处。

事实上，爷爷奶奶刚迁到这里时，附近还是一片农田。很快的，农民房动迁，桥体在废墟中建起来了。大家都很振奋，因为这会把此处跟繁华的浦西拉近。足可见新生活是值得拥抱的。

家里每一个人，都曾特意爬上在建的引桥，拍照留念。毕竟，当时的路边没什么值得一逛的去处。在公交车的终点站、城市的边缘，出门散步不如往更远的东边走，走到桥上去。姑且算此处居民所占的好处吧。

以现在的眼光看，会很诧异，为何如此重要的工程，当时竟没有隔离措施。记忆中应该是春节前后，工人回家过年，空旷的工地确实无人值守。翻过几座小土坡，我们就上桥了。

若是站在奶奶家的阳台上看，所见无非是往远处延伸的桥体。走上桥面，却感受到意料之外的宽阔，不像在桥上，而是在马路上了。其实说它是马路，也不为过。因此哪怕走到高处，也毫不自危。四外无人，更无高楼，风把我们小孩子吹得一路斜着走。我们高兴了，配合着风，不作什么抵抗。嘴里叫着：风把人吹跑啦！风也叫着：呜呜呜，呜呜呜。

在远处的雾气之中，隐隐显露出吊台、高塔的灰影——站在沙砾中远眺，知道江面就在那里，心想，如果顶住风一直走，走多久能到？

照片不好拍。迎着风，眼睛会被吹得眯起来，帽子会被吹走。背着风，头发就全部飞在空中，围绕着脑袋乱舞。最后，我们还是背风照了相。照了单人的，照了双人的，照了全家福的。忍着冷，尽量挺直了身体。



许佳

作家，三明治写作学院联合创始人。著有长篇小说《我爱阳光》《最有意义的生活》《青春雨》，小说集《只在梅雨天爱你》等作品八部。译有《傲慢与偏见》。

## 到上海去

在我小时候，住在上海郊区的人，管进城叫“到上海去”。今天，当我回顾过去，我发现，自己一直在重复这个“到上海去”的过程。



图片来自 [Loren Gu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2005，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

Christopher St. Cavish | 局外人

撑一年没问题。上海是个现代大都市。对吧？

我没打算待这么久。打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来。这是一个意外。没错，说起本人家族的渊源，我与中国的关联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但当时的我一无所知。没错，那么多年前，我还曾天真地以为自己不会卷入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大潮，那时的我只是个在香港找工作的年轻厨师。

甚至等我来上海后也这么想，那时正赶上 2005 年夏天的一场台风，我以为自己大概会待一年，也许更短。一年过去，第一份合同到期续约——我不想续约，也没签字——我满心以为自己会潇洒地离开，骑着那辆挎斗摩托车，从中国的一个角落移动到另一个角落，然后回到迈阿密，管它哪家店，总有一个厨房会留用我。

那都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可我还在那里，在上海：一个住了这么久仍在尽力融入的长住客，在上海本地人看来是个外国人，只要我还在这儿住下去，我就是个外来人口。

我叫克里斯（Christopher St. Cavish）。当了十年专业厨师之后，现在的我还是个美国作家，写作是我的第二份职业。我用英语写作，内容大部分都关于西餐厅和中餐厅、食物和人。如果你听说过我，肯定是因为《上海小笼包索引》，那是我 2015 年和一个艺术家朋友 Aladi 合作的伪科学项目。

以前从来没有人拿着卡尺和数字秤去小笼包店，也没有人创建出一个数学公式来评估小笼包的构造。我想我是第一人。

2015 年春天《索引》面世时，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

本世纪初，我以年轻行厨的身份游历了东南亚，还顺便去香港探望了我姐姐，她在时尚行业做事，当时去香港是出差。我很快就爱上了香港及其“第三种文化”的特质——既不完全是西方文化，也不完全是中国文化，而是两种文化融合再创造出的新气象。

我决心留下来。当时我 24 岁，还是个顽固的小混蛋，对美食怀有一本正经的虚荣心。我只想在半岛酒店工作，因为半岛是香港酒店业界的老牌女王。别家都没用。那时，我已在时髦的高级餐厅里开拓了半壁江山——只要敲开厨房的后门，主动提出免费工作就好。厨房总是缺人手的，这个办法屡试屡爽。等他们意识到我是个好厨师（我

确实是）时就会雇用我了。简单的战术。我在香港举目无亲。但我总不能人在迈阿密、敲开香港的厨房后门吧。

2005 年，我卖掉了我的汽车、摩托车和我在迈阿密的大部分家当。我根本不知道在香港生活是什么样子——这和去香港旅游完全不是一回事。我的钱少得可怜。只收拾了一只行李箱就动身了。我可以搞定这件事。

当然，并没有。

半岛酒店的后门并不通向厨房，而是酒店数百名员工的入口。那个后门设有闭路摄像头监控。还没走到门边，我的战术就滑铁卢了。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我必须另辟蹊径去和主厨大人谈谈。

我先试了电话公关，但分机是一个秘书接的，这种设置精准屏蔽了外部来电，好让我这样的家伙无法联络到忙碌的行政主厨。

有天晚上，我住在酒店隔壁的青年旅馆，特意要了一个 X 街对面、能看到酒店后门的房间。那是个四人间，我早早醒来，蹲守窗边好几个小时，总算搞清楚了主厨什么时候上班。我打算先摸清他的时间表，然后在街上堵他。到最后，我恍然大悟，这种行径的学名叫“跟踪”。

于是，我改变策略，开始撒谎。

“嗨，我是新的供应商。”我假装用奇怪的伊比利亚口音对厨师的秘书说，“我是卖葡萄牙红酒的，想问问，能不能和主厨谈谈，带样品给你们看看？”她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承诺会给我回电。但过了好几天都没有回电，我又试了一次。

“你好，”这一次我假装用蹩脚的英伦腔说道，“我是一家不列颠奶酪供应商，有一些新款奶酪想让主厨品鉴。”

那也没用。你肯定猜得到，我已经有点绝望了。我飞遍全世界，敲过各个地方的后门，只想得到和他短暂面谈的片刻，当然，这个片刻会让我在香港最好的酒店里获得一份有所回报、美妙的工作，并最终在亚洲享有盛名。我不会说粤语，也不会说普通话，但别管那么多，反正根据香港就业法，我其实根本不能在香港工作。

我很沮丧，但很顽固，我决定改变战术。如果我不能见到厨房里的决策者，那也许是时候换个战场了。

当职业厨师就要接受隧道式的狭窄世界——糟糕的工作时间，除了在午夜下班时和其他厨师一起喝得烂醉如泥之外，没有任何社交生活——这是必需的，但在我心深处，总有一点不爽。

我喜欢当厨师。自从我能在我妈的炉灶边站直后，这就是我唯一的梦想。

我讨厌当厨师。因为厨师没有生活。

我要尝试一些新鲜事。

第一站是复印店。我设计了一张大胆的传单，顶端用粗黑体写上“创意人士自荐求职”。我很笨，但我有足够的胆量，为了宣传自己，站在中环的路中央，把这些明黄色的传单散出去，我在传单上这样写道：我也会这样推广你的生意。

一连几个下午，我站在国际金融中心外面，看到身穿商务正装的人就把传单递过去。我印了 1000 份。我希望它们能落在伯乐的手中。

当然，并没有。

我再一次陷于沮丧，住在湾仔一个 10 平方米的套间里，还有几百张传单没发完，我放弃了。我买了一张去曼谷的机票，我要在那儿想一想该怎么办，而我的钱也会花得更多更快。命运女神就在这个节骨眼出手了：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的男人刚好是个加拿大厨师。他说，是的，他认识香港人。他说，好的，他会帮我联系。

我回到了香港。飞机上偶遇的厨师给我安排了一个面试，在港岛的香格里拉。那是我第一次进五星级酒店——我出身于一个平凡的小康之家——结果，我是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进去的。我只有那么一身行头。坐在大厅里等候时，我感到自己和周遭格格不入。

有个高大、优雅的欧洲男人穿着量身定做的灰色西装轻松地走过大厅。他的西装口袋里有一枚金色胸针闪闪发光。他就是餐饮总监。他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是的，他谨慎地说，也许，他能给我找一些事做。接着他又动摇了，也许，他甚至可以找时间让我和主厨谈谈。但我得帮他一个忙，我们站起来要告别时，他对我说，“下次过来之前，先把自己收拾一下。”

那天下午，我花光了剩下的积蓄，买了一套 Calvin Klein 西装，又去连卡佛买了一双意大利皮鞋。最后把钱包里剩下的现金给了一位昂贵的理发师。

一个星期后，我又回来了，这次是在主厨面前，那是一位老派的酒店餐饮业老将，瑞士裔德国人，六十多岁，在国外待了一辈子，快退休了。

他问我，所以你想在亚洲工作？

是的，主厨先生。

去过印度吗？

没有，主厨先生。

去过中国吗？

只来过香港，主厨先生。

我的抱负让他哑然失笑。当时我很年轻，傻乎乎的，但我有点胆量。他开玩笑说，上海有个新项目，也许他们能给我找个位置。他会和上海的主厨说一声。这需要几天的时间。我得等消息。

保罗 (Paul Pairet)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不记得了，也不记得他的最后一句话，实际上，从头到尾任何一句话都不记得了。他的法国南部口音很重，有点难懂，但他的意思很明白：他会留用我。

他要把餐厅的旗舰店开在香格里拉酒店集团陆家嘴旗舰店的顶楼，就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对面。

翡翠 36 将是一家法式分子料理餐厅，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主厨保罗全权在握，要确保这家餐厅惊艳上海。

我将作为助理副厨，比普通厨师高一级，但本质上就是个头衔好听一点的小管理人员。我没钱了，不想回美国，而且，管他呢，我不如听从那个瑞士裔德国老头儿的建议：去中国大陆闯荡一番。

撑一年没问题。上海是个现代大都市。对吧？

我搭乘的夜机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上海潮湿的空气闷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走出机场，迈上酒店派来接我的车。

我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对本地语言一无所知，对大部分事物都一无所知，真的，从机场开车过来的那一路上，我几乎也是一无所见。

夜很黑，高速路边和我们下了高速后开的小路两边都没什么灯光。

十五分钟后，我想明白了：机场不在市区附近。

三十分钟后，我开始紧张地检索自己所知的稀少信息，关于这个城市，基本上能归结为一句话：上海有一条河，还有很多灯火通明的建筑。

车行四十五分钟后，经过了一些小城镇和房屋，我已开始慌乱，怀疑自己是不是刚刚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在荒郊野外接了一份工作。

我估摸着自己总归能撑下去的，哪怕是在这个被称为上海的中国小城——这里显然没有超过五层楼的高楼，也没有晚上开灯的理由。那时的浦东还没有如今的水泥森林和密集的住宅区。

最后，我们拐了个弯，驶入陆家嘴的高楼群。我差点儿哭出来。那是一座城市。有河。有灯光。这里将是我的家。

第二年，我就是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 36 楼的翡翠 36 的厨房里度过的。身为厨师，保罗实在是个天才。后来，他的概念餐厅 Ultraviolet 摘得了米其林三星，还因在电视上露面而在欧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但回到 2005 年，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四十多岁的厨师，刚出道，但得到了良机。他有很多才能，要向全世界证明自己。

厨房就像一只高压锅。统共几十名员工，却没有一个人能用他希望的方式去烹饪，用数字温度计、超低温冰箱和凝胶，用完全陌生和未知的方式制作经典的法式酱料。厨房是个实验室，但我们都不是科学家。学习任务太艰巨，很难很快掌握。我们没时间去学。我们只能去做，失败，被骂，然后努力别再失败，不被再骂。你想象一下那种压力吧——他未来的事业成败在此一举，就在这间厨房里，但他的声誉岌岌可危，他要做的美食掌握在一群分子料理纯小白新手的手中……

这不是我尊重的烹饪方式，也不想为此每周工作 60 小时。更何况还要被人骂，被人羞辱，实在太过分了。六个月后我就辞职了。

我对保罗坦言了自己对他、以及他的臭脾气的看法。他说服我再干半年，帮他找到新人来替代我。

从那天起，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站在他面前时，我赢得了一份尊重。十年半过去了，我们至今仍是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我的导师。而且，众所周知，随着他在国际上声名鹊起，他已经没有臭脾气了。

我不能说自己在这件事上做出了某些有益的贡献——我是职位最低的助理副厨，与

其说是他成名的助因，还不如说是他身边的刺儿头——但我在那里。如今，保罗·派雷特是上海最著名的厨师。我曾负责整理他的食品储藏室。那应该是我作为厨师真正工作过的最后一个厨房。



Christopher St. Cavish

美国作家，2005 年移居上海。  
他写美食，也写作作为一名“局外人”的生活。

译者：于是

局外人

Christopher St. Cavish 以前是个厨师，他也是这样开始他在中国的生活的。但后来他变成了作家、编辑或者随便怎么称呼那些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他与他感兴趣的人交谈，写下自己的见闻和思考，也写下了这个剧变中的国家不少变迁故事——直到他自己发现自己和中国的更多关联。



图片来自 [Loren Gu on Unsplash](#)

# 非虚构 东京歌舞伎町 最后的“妈妈桑专用”发廊

吉井忍 | 吉井忍的二次会

一样是喝酒，却有不一样的人生。

位于东京都新宿区的歌舞伎町（Kabukichō）是被号称为“亚洲最大”的红灯区，这块0.3平方公里的繁华街拥有三千家的店铺，如酒吧、餐厅或KTV，还有三百多家会所（包括高级俱乐部和酒吧俱乐部）和超过两百家的男公关俱乐部（或称牛郎店），在这里每天进进出出的人数也相当可观。



歌舞伎町风景（摄于 2020 年 9 月）

当夜幕降临时从四面八方涌入进来的女性，无疑是最能为歌舞伎町添加色彩的主角。乍看之下她们穿着很有体面，但胸前开口的宽松度、蕾丝之下的白皙皮肤或裙子的长度，都在发出暧昧的信号，她们的化妆或指甲彩绘风格也和其他女性上班族有些差异。更明显的差别在于头发，她们头部的装饰和发型看似自然，但若仔细观察就能看出，都不是一个人对着镜子能轻松做出来的。

这就是今天的采访焦点：在红灯区做头发的发廊。战后的日本养成一些特殊的



AZ 的中心人物：長尾久美子（左）、中田小百合（中）和中西紀美子。店里设有带灯大理石镜，一共十五个位子。

文化，其中“陪酒”也发展成了一门可观的产业，而发廊就是和在这行业里工作的女性离得最近的产业链之一。从事这行业的女性有个习惯，每天上班之前都在固定的发廊做头发（造型），不管是银座、六本木、赤坂或新宿，这个习惯如出一辙，所以一个繁华街都不可缺少针对性强的发廊和美发师。本次笔者到一家发廊，在歌舞伎町经营四十年的“Backstage.AZ”（以下为“AZ”），与美发师们聊到发廊和红灯区的关系、以陪酒为谋生的女性们生活中的另一个面貌，以及歌舞伎町的岁月变迁。

## 01

### “争分夺秒”的客人们

从日本铁道（JR）新宿站东口出来，经新宿三丁目越过“靖国通”就是歌舞伎町，AZ 在沿着“区役所通”的歌舞伎町二丁目，从车站步行大约七八分钟即可到达。“区役所通”的周围属于治安比较好的地区，在歌舞伎町著名的高级俱乐部集中在这里，AZ 所在地又是一家饭店的第二层、而并不像其他美发店驻进杂居楼里。这也是 AZ 的客户——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妈妈桑”们——喜爱这家发廊的原因之一。AZ 对疫情采取的举措比一般商店比较严，门口铺设消毒地毯并对鞋底进行消毒，再来逐一测体温并为手部消毒方可进入店内。

“不好意思哦”，在前台的长尾久美子（Nagao Kumiko）一边给笔者量体温，一边笑眯眯地跟笔者道。问了 Backstage.AZ 的来历，她回道，其前身为“Beauty Salon AZ”，由一位高级俱乐部的老板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创办，是专为在歌舞伎町上班的妈妈桑和女公关做头发的发廊。“当时的歌舞伎町可有活力呀，年轻人喜欢跳迪斯科舞，年纪大的男人带着长相出众的妈妈桑趾高气扬，就是那种时代。我是在一家高级俱乐部看前台的，人手不够的时候偶尔会陪酒，后来老板娘让我到 AZ 上班，说是她自己开的发廊，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来了呢。”

她温柔爱笑、和蔼可亲，被问及在 AZ 的职务时挥挥手说道：“也就在前台跟客人打招呼而已。偶尔帮人家跑腿买烟，也会端茶倒水”。而实际上，她在这里被其他两位美发师倚重的重要人物，二十多年以来她在 AZ 当掌柜，记住每一位顾客的名字就不用提，做账、出纳管理等财务也一手包办，若小姐们想送东西给夜店的客人，还能随口说出几种洋酒的名字给她们做个参考。

刚和长尾女士开始聊天没多久，时间在周五下午五点多，有一位客人乘扶梯到二楼，长尾女士透过玻璃门一看见就把客人的名字告诉了美发师，负责这位客人的美发师立刻站在离门口最近的镜头前。几秒后，大约在四十出头的女性快步走了进来，留着黑色长发，一身穿着彰显品质感的连衣裙，其颜色是领先于季节的淡咖啡色。她微微点头向前台的长尾女士打招呼，同时把三张钞票放在柜台上，长尾女士也快速把零钱和发票递给了她，上面已经写好了对方的名字、日期和使用金额 2200 日元。客人一坐下来，美发师轻声地对她说了几句就开始做头发，没过十分钟，客人便站起来又急如星火地溜出去了。

“在歌舞伎町，时间很重要。”美发师中田小百合（Nakata Sayuri）边收拾道具边说。据她介绍，刚才的客人是她的常客之一，已经来了十多年，也是要求动作最快的客人。

中田女士原来在另外一家发廊上班二十年，就在 AZ 的斜对面，当时这两家互相之间视为竞争对手。两年前因整栋楼的改装这家发廊关门大吉，她才跳槽到 AZ，还带着十几位她原来的客户。“我是毕业学校后辗转几家发廊才来歌舞伎町的。第一家发廊在银座，客人都是当地经营高级俱乐部的妈妈桑，还有她们店里的女公关们，这家发廊就给她们做头发，以吹花或盘花等造型为主。现在回忆起来九十年代的景气还是挺好的，那时候在银座上班的女性们很会为自己争气、不甘落后，对美发师的眼光也比现在尖锐许多。当时我年纪还轻，面对那些老江湖的妈妈桑会紧张得很，给客人造型的时候手一滑，把卷发用的卡子刺到客人的头皮了，就这样被骂过几次（笑）”。

“大家上班的时间都差不多，有的人喝多了或睡过头了，总之每个人都赶时间，不然会迟到了。迟到就被扣款，所以她们对做头时的第一个需求就是要快。我们按照每个人喜欢的风格和当天的服装，边做头发边想发型，在十分钟内必须做出好看的头发。有的妈妈桑在家里先洗个澡，头发都还没干，带着上班用的衣服打出租车到我们的店里，穿好衣服、上了妆，再做头发就去上班，她进门来的时候和上班时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你肯定不会相信是同一个人。这些妈妈桑和女公关们每天上班之前都要来发廊，所以我们的收费标准也不能太高，做一次头发顶多三千多日元（约合人民币 180 元）”。

币两百元）。一般美发店一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动作没那么快，二是因为无法照顾傍晚集中进来的客人，所以把做头发的价位拉高，一次要收六千日元左右。就这样，在银座也好新宿也好，为妈妈桑和女公关们做头发的专业发廊都快速发展起来了。”

“这种专为妈妈桑做头发的发廊一般不提供剪发或烫发项目，我后来还是想学多一些技术，所以换到一家很普通的美发店。美发行业就是这样，我们毕业专门学校（笔者注：类似于中国的技校）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因为学校教你的仅仅是知识，洗剪吹、烫发或染发都不是可以收费的水平。所以毕业后还得在美发店当个实习生磨练磨练。我在那家美发店上了大概一年的班，学会了一套技术，然后来到歌舞伎町。”至于最后选了歌舞伎町的原因，她想了一会回道，“就感兴趣嘛。歌舞伎町的人多、美发师也多，当时想在这个大环境里试一试”。

## 02

### 一样喝酒，两个不同世界

中田女士提到的“大环境”，在这几十年间有了明显的变化。

日本的“陪酒”场所大致可分为两种，一个是比较传统的高级クラブ（kökyū kurabu=高级俱乐部、夜总会）和目标客户年龄稍低的キャバクラ（kyabakura=酒吧俱乐部[1]），这两种从招待行为来看差别不大，都是女性坐在客人身边，帮忙倒酒助兴、聊天，店铺必须取得根据《风俗营业等规制及业务适正化等相关法律》的“营业许可 1 号”方可合法经营，营业时间规定为到深夜零点或一点为止。

高级俱乐部和酒吧俱乐部，这两者的主要差别于收费标准和“指名制度”，简单一句话来说就是“档次”的不同。日剧《黑色皮革手册》出现的夜总会就属于高级俱乐部，必有一位穿和服的（注：也有例外）“妈妈桑”，她管理全场的同时会指导其他女招待员（“ホステス /hostess=女公关”），新的客人须有人介绍方可进门，而每位客人有固定的女公关来招待，这是所谓的“永久指名制度”，除非女公关退休或跳槽到别家，客人在同一家里必须和固定的一位女性喝酒（但也可以请来店里其他女公关到自己的桌子，凑热闹）。女公关的收入来源一开始是日薪，有了自己的指定客户之后他的消费会被反映到自己的薪水上。客人的消费[2]方面，“第一套餐”（约 10000 日元）和坐席费（约 5000 日元）是最基本的，一瓶酒约需 20000 日元，再来附加超时费（超过一小时后，约 5000 日元 / 时）、杂务费（端盘的服务生用、约 3000 日元）或服务费（总额的 25% 左右）等其他项目，一次消费不会低于十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6500 元），有能力常去这种场所的恐怕只有社长、干部或著名艺人等高收入人群，客人平均年龄自然会高一些。

酒吧俱乐部的收费标准没有前者高，陪酒女的收入也主要靠时薪和奖励金。这里的收费按时间来算、每时 5000 日元左右，这还包括客人的饮料，哪怕加上指名费（约 3000 日元）、陪酒女用的饮料（约 1000 日元 / 杯）或服务费（总额的 15~25%）等其他项目，花两三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2000 元）即可开心玩一次，二三十岁的年轻男子客人也负担得起。

中田女士介绍，“歌舞伎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不少高级俱乐部，从数量和质量来看，都不会逊于银座。每个地区做头发的风格也不一样，比如歌舞伎町的妈妈桑刘海翘起的角度，一般都比银座的高一些，还有人说刘海的高度就是女人的尊严。我之前工作的（在歌舞伎町另外一家）发廊，三十平米的店里就有五六个美发师，每天接待的客人有一百多，都是高级俱乐部上班的女性。每逢过年、情人节或圣诞节那些日子就忙得不可开交，店里的衣架挂着清一色的高端皮毛一体大衣，客人都排队到店门外。AZ 的情况也差不多，店面比较大，客人也更多，最多的时候这里每天迎接两百位客人。”



高级俱乐部的妈妈桑或女公关用的“和发”

（图片由 AZ 提供）

不少妈妈桑穿和服，适合和服的发型叫做‘和发 (wagami)’；头发扎起来扎高，部分塞进假发团等流程稍微多一点（中田女士称：“但还是必须在十分钟内做出来”）。不过西装用的发型也并不单纯，和造型风格比较被格式化、变化不大的“和发”相比，西装用的发型更自由一些、客人也有个别的要求和标准，客人和美发师之间需要一种默契和配合方可做出完美的模样。

## 03

### “头发”告诉你的事

发型能够体现出每个人的性格、关系到整体形象，也会反映出时代思潮和社会的更替。作为美发师，中田女士在职业生涯中很敏锐地感觉到日本社会根底的变化：

“大概在九十年代后半吧，有的客人做头的时候说要比以前低调一点，意思是刘海不要翘得太高、卷发也不用做得太华丽。这不是因为我们客人（妈妈桑或女公关）的喜好产生了变化，而是因为她们的客人（男性）要求那样。在泡沫经济时代，男人带着漂亮的女公关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后来这种土豪风格的炫耀方式跟不上时代了，男人开始喜欢更加微妙或低调的风格，他们喜欢的女性，也从华美艳丽的美女，换到自然而然不造作、有种品味的佳人。所以妈妈桑们为客人‘同伴’[3]时也被要求穿得自然一点，像以前一看就是小姐那样的风格已经不受男人的欢迎了。”

“接下来是长期的经济萧条来袭，整个新宿的高级俱乐部都少了许多，反而多起来的是酒吧俱乐部，是给年轻人玩的地方。在酒吧俱乐部上班的女孩子们，一般都不会



两年前 AZ 换了老板，新老板旗下有另外一家美发店“Backstage”、专为年轻陪酒女们和牛郎们做头发。图为 Backstage 店内风景。



摄于 Backstage。晚上六点前牛郎们的来店时间早一些。“因为牛郎们上班之前要进行店里的打扫，陪酒女们不用做这些。这是一种行业里的潜规则吧”，该店工作人员解释道。

来我们 AZ 这种店，她们会去另外一种发廊，也是专门给陪酒女们做头发的，她们所需造型流程不会太复杂，但就是要好看、时髦，造型师也以年轻人居多，发廊的收费标准一般都在 2000 日元以下。而且现在市场上美发 DIY 工具也多起来了，养发、卷发、直发都可以自己弄，现在已经有很多女孩子在家里用卷发棒自己会做头发了。”

高级俱乐部和酒吧俱乐部的差异，面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也影响到了 AZ 的经营。中田女士透露，疫情来袭之前每天都有三十多位客人来做头发，现在七八个月过去了，客流却停留在之前的三分之一以下。

“我看疫情给高级俱乐部的打击比较大，因为客人都是企业的社长、干部或名人，他们有面子，哪怕客人自己想来玩玩，但公司不允许，万一有事就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形象。今年到六月份左右，疫情不是稍微缓过来了吗，然后小池桑（注：指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又呼吁大家不要出入夜晚的街区（注：指夜间营业的酒吧等场所）；还把歌舞伎町直接指出来，我真心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因为这里很多酒吧都在进行防范措施，已经非常用心呢。反正官方和媒体这么一说，大龄男性又不敢出来玩了，连百货公司或大卖场都不去。反观，酒吧俱乐部的客流恢复得快一些，因为客人比较年轻，喜欢刺激、敢玩。”

说到这里，中田女士把笔者带到 AZ 的店里一个角落，那里的柜子里藏着好几个盒子，上面写有常客的名字。打开其中一个盒子，里面都是如焰火般灿烂的各种发饰。

“这都是我们客人的发饰，她们做头发时用。每一个发饰都是妈妈桑精心挑选的，为的是给客人看看更好看的自己，也为了给自己打气、鼓励。疫情爆发之后有的妈妈桑没法来这里做头发，因为那些高级俱乐部的房租每月就要几十万（日元），虽然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些补助金，但算是杯水车薪，她们能省就省，想办法熬过这段难关。这点，她们和外国人还有点差别。歌舞伎町有不少外国人开的酒吧和俱乐部，最多的还是中国人吧，人家在疫情最开始的时候马上停止营业，把店铺都转让出去，我估计他们疫情彻底结束后才回来。其实这也是很聪明的做法，再说目前日本的疫情终点迟迟没有到来，现在开着店等于是亏钱。但日本的妈妈桑都选择了坚持，因为她们看重历史和人情，说客人就等待再会的一天，怎么能轻易关门大吉。AZ 的客人当中，确实也没有一家关了门的俱乐部。所以，现在我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但还是想在坚持一段时间，我们也想念我们的客人呢，这并不仅仅是钱。”

在 AZ 工作三十年的中西纪美子（Nakanishi Kimiko）也点头表示同感。“我们这个行业和其他美发店的不同，就在于和每位客人的关系。在一般的美发店，再爱美的女性，她们来店的次数不会超过每月两次吧，而我们的客人是每天都会来的，见面频率特别高。我也不知道这种感情应该怎么称呼，反正就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从客人学到的事情也挺多的，因为她们也从事服务业的，她们感觉灵敏、眼光尖锐，吹发时怎么摸头发都要跟我说几句。也有的客人不喜欢我做的头发，当场把它解开掉，还要求换人再做一次。我们也就这样在一次次经历中努力前行、不断地努力。”

石川县金泽市出身的中西女士，还没到二十岁来到东京，先在荒川区（东京都东部）的美发店实习并考取了美发师职业资格证，然后透过朋友的关系在府中市（东京都西部）的美发店就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来转到歌舞伎町。“当时我二十七八岁吧，老家的父母拼命催我回家结婚，我也有这个打算，只是先想在歌舞伎町学点做头发的技术，这样回到老家之后比较好找工作。我刚来的时候‘区役所通’这条街道上，几

乎每一栋楼都有高级俱乐部，鳞次栉比，很是壮观。AZ 这家发廊技术方面有水平，装修风格按当时的标准来看还挺高档的，故此得到妈妈桑们的青睐，当时很多年轻的女公关对 AZ 有一种憧憬，在她们心中 AZ 就是成为妈妈桑之后才被允许天天光顾的地方。能够在这种地方工作也是一种乐趣，本来工作两三年就回去家乡，一转眼已经三十三年就过去了。”

三十三年，说起来很简单，但这一路也应该有过风波辛苦。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她留在歌舞伎町呢？对此笔者的提问，中西女士沉默一时，慢慢回道：

“还是因为客人吧。这份工作做久就会有自己的客人，是指定我做头发的顾客，我现在就有十多个人吧。我还是会想念她们的。给她们做头发，这等于是每天接触到她们身体的某一部分，你懂么，这也是她们对我来说比家人还特别的存在原因之一。做头的时候她们也偶然透露一些心底话，比如她个人的、或她的家里的事，那些肯



美发师们使用的工具

定不会给同事或朋友听的，有些很私人的事情并不适合跟亲朋好友说，反而给不认识的人说一说比较安全，因为不会被传开嘛。那么她们把那一两句给我听，是不是因为她们很信任我呢，还是因为她们以为我这个大妈不在乎客人说的话，我也并不太清楚，但这些小事情的累积，确实变得让我和这份工作分不开。”

刚好又来了另外一位客人，笔者到此结束了采访，与三位受访者告辞后回到歌舞伎町的街道上。天色已变黑，这个街区该最有活力的夜晚来了。也许是因为刚听到的人生种种经历，笔者对擦身而过的小姐们或牛郎们也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与他们的距离仿佛稍微近一些。

能为妈妈桑们做头的发廊，在歌舞伎町就只有 AZ 一家了。这次访谈告诉我们，所谓传统并不只存在于工艺、艺术或表演等领域，在我们身边、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的地方也藏有着值得关注的传统、技术和历史。歌舞伎町也一样，只要我们用心聆听当地人的故事，去掉“红灯区”、“诈骗”或“色情”等刻板印象，它会为你展现出不一样的、更加丰富的面貌。

[1] キヤバクラ /kyabakura：法文的“cabaret（歌厅）”和 club 拼合来的日语新词义。

[2] 本文中的收费标准只供参考。

[3] 同伴（dōhan）：指女公关（或妈妈桑、陪酒女）在上班之前和客人一起吃饭的行为，吃完饭便一起到店里喝酒。以‘同伴’形式来店时，她们可以获取额外的分数并反映到月薪上。



吉井忍（Yoshii Shinobu）

日籍华文作家。著有《四季便当》、《四季便当 II》、《东京本屋》等。作品获 2016 诚品书店阅读职人大奖。

#### 吉井忍的二次会

二次会是上班族大家一起去喝酒、喝完第一家后自由参加的第二轮聚会，大家谈得更加舒坦的场合。这个系列采访的是接地气、尘满面的日本普通民众。



图片来自 [Dubhe Zhang](#)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想象了一片沙漠

潘尼克 | 昨日世界

任何界线在我们真正触及并引起反弹之前，都是不存在的。

2013年7月，我发现自己被关到了一个小房间里，丧失行动自由，甚至要有专人押解和监视才能去上厕所。这跟我们想象的旅行颇有出入。一般而言，我们想象雪山，想象海滩，想象串烧鸡肉玛莎拉，想象朋友圈里的365个赞；想象城堡，想象美酒，想象天旋地转的星空，想象吧台右边身穿黑色露背装的女郎。可以说，所有的出发与远行都基于想象，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便是如此。而想象又基于我们持有的知识和信息。归根结底，我们只能想象已知，无法想象未知，都灵的马可·波罗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总之，没有人会想象一个阴暗简陋的小房间，除了一副老旧的桌椅以外空无一物。而我之所以被困在这里，是因为我想象了一片沙漠。

沙漠位于印度古杰拉特邦西北部的Kutch地区，北边毗邻巴基斯坦的信德省，西边则紧靠着阿拉伯海。印度人把这片沙漠称为Rann，在当地语言里是盐泽的意思。因为每年雨季，海水漫延上来，将大部分的沙漠浸泡其中，又随着雨季一同退却。年复一年的这般来往，海水在沙漠上冲积出厚厚一层银白色的海盐，白茫茫的一片，有如神赐。至少在网络图片和孤独星球的描述里是这样。

沙漠不算偏远，距离古杰拉特邦的首府艾哈迈达巴德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当时希望走得更远，于是先坐火车去到Kutch地区的行政中心Bhuj，再转乘乡村小巴，深入到国境边缘的小镇Lakhpat，倒也不算麻烦。唯一的问题是小镇上没有任何旅馆，异国的旅人通常投宿在当地的一座锡克寺庙里。不管在哪里也不分种族信仰，锡克寺庙通常都会提供免费的住宿和伙食——这样一来，连饭钱都省了。小镇不大，寺庙更小，放眼望去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轻的小伙子，腼腆老实，从眉目和深棕的肤色看来应该是本地人；另一个就是掌管寺庙的师父了，五六十岁的模样，全身上下布满典型旁遮普锡克人的特征，估计是被委派过来驻寺的。我的辨别能力在这种锡克人面前总会失灵，他们一旦上了年纪，蓄起浓密的胡子裹着大大的头巾，我就分不清谁是谁了。于是我也索性直接叫他辛格先生，因为理论上所有男性锡克教徒都姓辛格。辛格先生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式英语，他见到我并不像沿途遇的乡民般感到惊奇，兴许在此地已经接待过不少外国旅人。他从容地领我到我将要下榻的房间，又把我带回门口，让我登记一下个人信息。等一切落实完毕，他又特地叮嘱我说，出去之前最好先跟他交流一下，因为这里靠近印巴国界，有军人驻扎在附近，有些地方是不能进去的。我左耳进右耳出。

Lakhpat在历史上有过有限而短暂的光荣与梦想。印度河昔日流经此地，小镇借此成为连接古杰拉特和信德地区的重要贸易站，人口一度达到15000人。然而在1819

年，一场大地震撼动了整片Kutch地区，1500多人不幸遇难，印度河也因此改道，从更北边的信德地区汇入阿拉伯海。Kutch地区向来干旱少雨，失去印度河的Lakhpat迅速被海水和荒漠侵蚀，从此一蹶不振。如今小镇只剩下不到600人，许多无人居住的房屋正在或已经变成断壁残垣，剩下有人居住的那些也简陋破败。仅有的生机来自时不时从门缝墙头探出头来的当地小孩，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出现非但不觉惊惧，反而总以笑容相迎，眼神充满好奇。

村头就是我想一睹为快的盐泽沙漠。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荒芜，放眼望去，仍有成片的梭梭草在这莽莽荒野上顽强生长着，陪伴坚持留守此地的乡民。沙地上的盐分也远远算不上绵密，撒在四周一块一块的并不均匀，更像是造物主给大地婴儿扑的爽身粉。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没选对地方，但仍未死心，抬起脚步继续往沙漠深处走。随着我越走越远，植被越来越稀疏，盐分也越来越密集，后来终于把目光所及之处全都覆盖，尽管尺寸依然不厚。有些地块依旧湿软，显然雨季刚刚过去；时不时可以看到破碎的小木船和其他不明物件埋藏在地里，不知被废弃了多久。这时候天气也越来越热，周围越来越安静，仿佛能听见热浪涌动的声音。我顿时觉得索然，挑了一片白得彻底一些的盐泽在上面划了几个字，试图创造一点仪式感，但收效甚微。我继续漫无目的地走，不知道走向哪里，周围的景观也没有明显变化。中间迎面遇到两个穿着便装的军人，用蹩脚的英文问我从哪里来，来这里做什么，我一一回答，便各自往相反的方向走去。我很快就厌倦了这片沙漠，预示着想象到达了终点——这也是想象的缺陷，它一旦到达终点，想要继续延展下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不知道走了多久，没有想到的是，其中一个前面遇到的士兵居然追了回来，说我闯入了军事禁区，要跟他走一趟。我立下也没多想，那就走一趟呗。我一边走一边寻思这个事情，突然一阵恐慌袭来，此前各处听闻的关于印度的各种负面传闻开始在我脑海里一一浮现。一个中国人莫名其妙活动在印巴边境区域，是不是引起了极大的怀疑？他们会特意刁难我找我麻烦，尤其向我索取一大笔贿赂？如果不给这个钱，会不会被关到条件极其恶劣的牢里不知过多久才能放出来？

我停下脚步跟他说我不去了我要回住的地方。他岂能轻易放我走，一把拽住我的手腕把我拉过去。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竟然试图挣扎，也被我突然这样激烈的反应惊得愣了一下，马上加大力气抓紧。我立马清醒过来，一个北京东三环写字楼里的普通打工人，有什么资格跟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硬碰硬。只好垂头丧气，老老实实地被他牵着走。



小镇边缘房屋的基柱，似乎刚搭建到这一步就被废弃

他要带我去的军营其实不远，我们大概走了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但这一路我走得度日如年，而他抓住我手腕的手完全没有松懈丝毫。到军营之后，他让我蹲在一棵光秃秃的树干旁边，招来同僚看守，自己过去跟上级汇报。四周一下子围满了士兵，与其说是看守，毋宁说是围观。我心情苦闷，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加上我本来就讨厌蹲着，又被一群语言不通的人包围，更加浑身不自在。我还想抽根烟压压惊，刚掏出来就被喝止，只好又放回去，眼前一片灰暗。

很快，那个士兵领来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他一边上下打量我，一边跟周围的人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他居高临下地问我叫什么名字，来自什么国家，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是中国人来这里旅游的，然后我能站起来吗蹲着真的好累。他露出一副恍然的表情，说当然可以，好像自己也很奇怪其他为什么要让我蹲着。他让我先站在这里等一下，一会儿他再过来。然后一挥手让周围的人该干嘛干嘛不要再围在这里，只留下押送我过来的那个士兵继续看管我。

一会儿之后军官没过来，而是派人把我领到办公室里面去。这个人看上去只是个基层士兵，但明显上了年纪，我都可以叫他伯伯了。一边走他一边重复着说：“你有大麻烦了！”搞得我更加心神不宁。

进去之后，军官坐在唯一一张办公桌后头，看到我进来，示意让我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房间里除了他和伯伯之外，还坐着一个同样军官模样的中年男子，看上去比面前的那位要斯文一些，目测如果军官是这个军营的一把手，那这个人应该次之。就像电视剧里一样，我们没有废话，直接进入了紧张刺激但其实很琐碎无聊而且经常循环往复的审问环节。我是什么人，来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的目的是什么，在印度又待了多久，具体去了哪些地方，在那些地方又做了什么。当然还有我在中国做什么工作。我哪敢坦白我之前是媒体老师，便坚称自己是学生（而且还是研究生），这会儿正好放暑假出来玩。此前为了买景点学生票而办的假学生证此时发挥了超值

100 倍的作用。

一个比较印度特色的问题是我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说我没有信仰，在一般印度人眼里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军官老大看来也是一样，因为他变着方式反复确认了好几次。

“那你是无神论者吗？”

“算是吧。”我不想浪费时间跟他辩解，毕竟眼下还有比神是否存在更重要的问题。

“所以你是共产主义者？”

“……也不是。”

“你们无神论者不都是共产主义者吗？”

这是在给我挖坑吧！我说这个不一定的呀，就像一个印度人未必信的也是印度教一样嘛。这个类比一点都不恰当，但是居然似乎在他那边说得通，反正他没有再继续纠结下去。



Lakhpur 小镇边缘的一座印度教庙宇

也有可能是因为新的问题出现了。他一边审问我的同时还在一边翻看我的护照，终于看到了我最担心被他们看到的东西——巴基斯坦签证，还是两个。一个跟巴基斯坦有联系的中国人活动在毫不起眼的印巴边境，我不可疑谁可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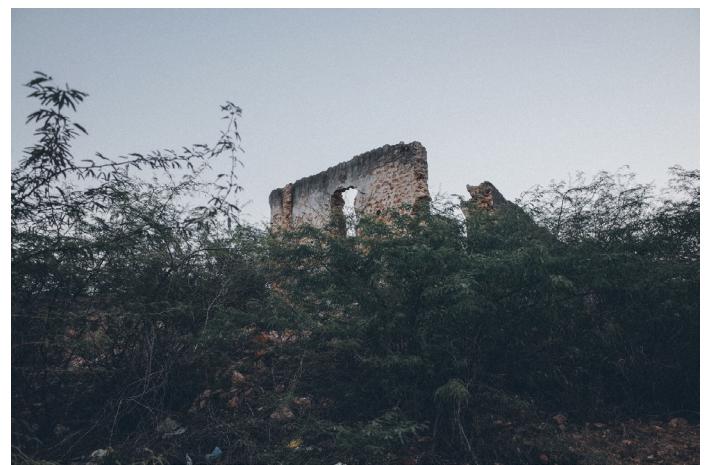
老大的神色一下子变得如临大敌，马上抛出一连串关于巴基斯坦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对我造成不了什么困扰，我本来在那里只是走马观花过一圈，又即将再去走马观花一圈，既无关任何特殊任务，也提供不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但为了尽快脱敏，我极力把巴基斯坦描绘得充满惊奇和趣味，表明自己只是一个名正言顺的游客。再说，我护照上又不只有巴基斯坦的签证。来来去去审问了半天，老大也没发现什么蹊跷，而且很明显他对巴基斯坦几乎一无所知，更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他似乎一时拿不定主意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便吩咐旁边站着的伯伯，把我领了出去。伯伯把我带到大约 10 米外的一个小房间让我乖乖呆在里头，关门之前还不忘再来一句：“你有大麻烦了！”

但是我猜测事态也许并没有之前猜想的那么严重，因为他们居然连我的手机都没有没收。而且军营里面还收得到手机信号，我赶紧发信息把我现在的情况知会几个相熟的朋友，让他们留个心眼，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除了手机之外，我正好还随身带着 Kindle，中间有士兵给我送来一杯水。我觉得我可以在这小房间里的一桌一椅上安然度过一整天。

假如我当时没有选择继续深入，而是满足于失望扭头就走，是不是就不会踏入所谓的军事禁区，也就不会落入眼下的困境？我很快就否决了这种可能性。任何界线在我们真正触及并引起反弹之前，都是不存在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假如我在中途折返，那么界线就在我折返的位置划定，迷雾和敌意就在对面凝聚和形成。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走呢？直到一不小心撞翻那个囚禁小猫的盒子。

除了上厕所之外，我真正走出这个小房间是大概两个小时之后。他们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又问了我一遍之前问过的问题。这次是由老二来问，可能补充了一些更细节的问题，不过我觉得都差不多。他要我把在印度每段行程的具体日期都交代清楚，我说有些地方可能不是很记得，要查一下手机才知道。于是我就当着他们的面查看手机里住宿交通的预订信息，竟然没有任何不妥。这一轮审问结束之后，他们派人开起一辆军用皮卡带我回到之前下榻的锡克寺庙去取行李。不知道是事先已经收到通知还是早已经历过类似情形，辛格先生看到这番阵仗也依然面不改色，只是淡淡地说道：“我正在做礼拜呢，你突然给我搞这些。”然后轻轻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我提醒过你不要乱跑，去什么地方之前提前问一下我。你看现在惹麻烦了吧。”我简直无地自容，内心暗暗决定之后到阿姆利则的金庙一定要多捐点钱。

回到军营办公室，他们吩咐一个年轻士兵把我的东西从背包里一件件拿出来仔细检查，老二则在一旁用纸笔一一记录备案，包括我本来随身携带的物品，就连我钱包里装了多少钱也清点得一清二楚。完后老二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你自己再好好检查一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我们肯定不会拿，但你最好检查一下。”我心里一凛，因为我不曾跟他们提起过半点自己此前对他们的想象和顾虑。而整个检查过程我在一旁尽收眼底，也无需再多费力气。待我重新装包完毕，老大又问了我一轮之前的问题。“你们之前不是都问过好几遍了吗？”我谨慎地抱怨了一下，马上就惊讶自己竟然已经松



被野生矮树丛吞没的废弃民居

弛了下来。老大也不以为忤，说这就是流程，我也只能奉陪到底。但他自己估计也捉襟见肘，最后连我上次从巴基斯坦回国走的喀喇昆仑公路是几车道这种问题都出来了。中间他让之前押送我到这里的那个士兵给我们送了两杯水过来，我俩相视了一下，一句话没说，但我至今依然清晰记得他满脸大写的不爽。

走完这一轮流程，老二亲自把我送回之前的小房间。路上他问我是不是吓坏了，其实当时我已经差不多缓过来，不再认为自己身处险境，但还是把一开始自己的忧虑告诉了他。他马上摆出同样郑重其事的表情跟我说：“你完全不用担心。你确实闯入了军事禁区，但我们只是尽我们的责任了解清楚情况而已，你在这里安全得很，我们也不会对你怎么样。”这时候老大正好走过来，老二转头就对他说：“他吓坏了。”老大听了便慷慨地笑着说：“放心吧，你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客人。”

既然你们这么开心，“那我什么时候能走呢？”

“我也不知道，”老大摊手耸肩，“这个要等上级进一步的指示。”

后面老二又双叒叕和我过了一遍那些问题，“我要做个详细的笔录。”我已经滚瓜烂熟得甚至都可以亲自来做这个事情。这次没有任何新的问题，倒是在重复到我学什么专业的时候，老二突然说：“我大学读的是哲学。”我表示我只读过一点点斯宾诺莎和尼采。“我以前研究的是斯宾塞，但最喜欢的还是尼采。”他说。我们大致展开聊了一下，他来自印度相对贫穷的北方邦，出身平庸，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读的又是哲学，这样的背景之下，从军可能是最实际的选择。“你们是不是都很不喜欢中国人？”我突然问他。他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看了我一下，回答说：“并没有。首先我们都是人类，然后才有国家、种族和宗教信仰之分。”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被这种高度政治正确的废话打动。

这次出来之后，他们就不再特意让我回到小房间里去了。虽然不能在军营里四处走动，但至少可以在办公室和小房间之间来回。期间他们给我安排了一顿简单的餐食，大概是印度人日常吃的素食咖喱和面饼，足以解决口腹之急。时间一点点流逝，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降临。我的恐慌早已被烦躁取代，只是如果眼下就看上级的指示，



陷入盐泽里的废船，周围是海水留下的盐分

既然他们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我也不便一再过问。我只希望至少可以再回到小镇上的锡克寺庙，好好地跟辛格先生道个歉。

不过，我身上的怨气可能已经形成一个幽幽发亮的光晕，就连泰然如老大也无法视而不见。他走近前来跟我招了招手，说：“你不是来旅游的吗？走，我带你去看点东西。”我便跟着他一起向办公室背后的荒地走去。路上我问他老家在哪里。“一个你这次没有去到的地方，比哈尔邦。”他回答道。我想了想，说：“我去过的。菩提伽耶不就是在比哈尔邦嘛。”他哈哈笑了一下，说：“对哦没错。看来你对印度比我还了解嘛。”我也微笑了一下不置可否，以免节外生枝。

一会儿我们就走到了营地的边缘。营地建在沙漠边一个小山丘上，可以俯瞰方圆数

公里的动静，但此时夜色已深，周围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唯有一个不知方位的远处坐落着一片突兀的灯火通明，将两边的地平线都照亮。“就是这里了。那是一座化工厂。”老大指着那片耀眼的灯火说，“这周围全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就只有那座化工厂，每天创造着大量的财富。”我不由得想到自己在 Lakhpat 看到的破败，猜想老大可能话里有话。但我最终没有过多追问。老大也觉得差不多，便又带着我回到了营地。

我的意外出现一定给他们单调乏味的军旅生活增添了不少生机和乐趣吧，我心想。我从未如此清醒认识到自己对社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许他们早就确定我只不过是一个没头没脑的游客，但因为太寂寞了才把我留在这里这么久！两位军官可能是整个军营里仅有可以说流利英语的人，所以我们能够一起谈笑风生。至于普通士兵那边，他们私下也一定对我评头论足了九九八十一遍，从我的肤色长相到随身行李，每一个细节都是新鲜的话题。幸好我来印度这么久，已经习惯被谈论被观赏。反过来看，我自己也不一直在观赏他们，一直不停地榨取着他们身上的异域风情？

不知又过了多久，老大突然快步从办公室里走过来跟我说：“好了你可以走了。我会派车送你离开这里。”终于！我迫不及待地转头提起背包就背了起来，仿佛感觉不到任何重量。老大和老二一同和我握了握手，说：“很高兴见到你。不过你以后注意点，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谢谢你们。”我看着他们的眼睛说，并不完全是客套。出乎我意料之外，营地里几乎所有的士兵也都聚集了过来，相继跟我握手，包括那位“大麻烦”伯伯。除了一开始拽我到军营的那位士兵，此刻不知道在哪里坚守自己最后的倔强。



从墙头探出头来的本地小孩，友善又羞涩

还是同一辆军用皮卡载着我再一次驶离营地，士兵们也四散走开，办公室外的平地很快空无一人，不久之后，这里也要融入盐泽沙漠的沉寂。坐在车里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10 点出头的样子，距离我被带到这个地方已经过去了将近 8 个小时。

从 Kutch 地区离开之后，我继续北上，穿过拉贾斯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共享的五河平原逗留了一段时日，又沿着普什图人占据的西北边境一路行走，穿过开伯尔山口，到达阿富汗。我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沿途荒凉又布满历史的碎片，混杂在 21 世纪的枪声之间，仿佛还能听见旧日商队的驼铃。

那时候我尽管已经不是学生，但也刚离开校园不久。我有幸从事了一份相对自由的职业，没有追赶上早高峰的劳顿，但仍然很快开始想象海岛、丝绸之路，想象亚欧大陆上被收入名录与否的历史遗迹，想象街道蜿蜒曲折的古老城市。我和当时一同在外的旅人并无不同，说到底，我们也和所有厌倦打卡、职称，厌倦地铁、写字楼和快乐周五夜，厌倦申请贷款和偿还贷款的人并无不同。

纳博科夫曾经说，想象，是不朽和不成熟的人的极顶快乐，应该受到限制。为了能够享受生活，我们不应过多地享受想象的快乐。总会有一个时刻，我们会怀念起自己的语言，习以为常的眼神，熟悉的言行习惯和道德标准时，然后恍然惊觉自己已经距离家乡几万公里远。原来不管自己走得有多远，这些东西都像行李一样被我们随身携带着。我们当时都觉得这样的旅程是一期一会。直至最后跨过红海看见开罗的金字塔，我仍然没有意识到日后自己将会不断想象，不断远行。

时至今日，我也仍然会回想起那片沙漠，那个营地和两位军官。可能是被斯德哥尔摩了吧。我甚至还会天真地假想，如果我再回到 Lakhpat，回到那个营地，是不是还能够再遇见他们。问题是我要怎样才能又回到那里呢。

\* 本文图片由作者潘尼克拍摄



潘尼克

曾供职于北京数家媒体，业余写作者、当天来回徒步爱好者，擅长休闲式穷游及半糖水纪实摄影。目前在重庆某洞子酒吧打工，尚无任何著作出版。

## 昨日世界

会有一个时刻，我们会怀念起自己的语言，习以为常的眼神，熟悉的言行习惯和道德标准时，然后恍然惊觉自己已经距离家乡几万公里远。



Copyright © Refik Anadol

## 非虚构 纯真物件 帕慕克 | 先睹为快

我相信，小说和博物馆是同时诞生的。

### 前言

#### 奥斯曼末代王孙逸事

1982 年，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次家庭聚会上，我邂逅了阿里·瓦什比王子殿下，正是在那时，我心里萌生了建造博物馆的念头。王子贵为苏丹穆拉德五世的曾孙，本该登基即位，延续苏丹王位和奥斯曼王权。但这位耄耋老人自从 1924 年奥斯曼帝国垮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便被迫去国离乡，近来才获准以游客身份归国，而且拿的还是外国护照。其实无论王位还是政权，他都不在意，他唯一的愿望是能永远留在自己祖辈统治六世纪之久的这片国土。他住在亚历山大城，夏天则待在葡萄牙。在那里他呼朋引伴，与欧洲及中东那些被废黜的王孙贵胄一道消磨时光。（只有他能向我透露，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为何与其发妻法齐娅离异。）他的回忆录由其子奥斯曼·瑟拉赫丁·奥斯曼奥卢编订，2004 年在他去世后才出版，名为《一个王子的回忆录：我在国内与流亡中的见闻》，书中披露了王子一生为生活窘困而忧心不已。他曾多年靠当检票员为生，后来成为亚历山大城的安东尼奥迪斯王宫及博物馆的馆长。“我负责王宫的管理和清洁，看管宫内所有物品。银器、水晶，还有家具，我可是重任在肩。”他大声说。我在《黑书》里写过一个奥斯曼末代王子，对这个话题自然是倍感兴趣。觥筹交错中，我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位老王子于是分享了许多逸闻趣事，其中就有关于法鲁克国王的偷窃癖。

有一次，法鲁克参观安东尼奥迪斯王宫及博物馆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开了一个陈列室橱柜，顺走了一件他早看上的古董盘子，放到他自己在开罗的宫殿里。王子还谈起王室被逐出伊斯坦布尔之前的那段时光，那时候他住在厄赫拉穆尔王宫。从加拉塔萨雷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位于哈比的军校，阿塔图尔克也曾在那学习过。我童年也在那里生活过，不过那已是大约四十年之后了。在脑海里，我依稀能看到那些荒废的王宫侯门，那条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尼相塔什老街，也看到一个王子在上数学课。

王子正在找一份有薪酬的工作，好让他在半生流亡之后能在土耳其永久安定下来。但他抱怨说，没人愿意帮他。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主要是因为土耳其的特工部门想阻止这个可能是最后一个奥斯曼苏丹的人成为一种政治象征。但众所周知，年迈的王子根本就无此野心，所以在餐桌上有人建议，阿里·瓦什比·埃芬迪或许可以在厄赫拉穆尔王宫谋到一份博物馆导游的差事，毕竟他在那里度过了那么长的童年时光。他对王宫生活了若指掌，也知道如何掌管一个博物馆，这难道不是解决他生计问题的一个理想方案吗？

有了这主意，王子和餐桌上所有其他人当即开始想象——是完全认真的，并无丝毫的讽刺意味——阿里·瓦什比·埃芬迪怎样向游客们介绍他小时候休息和学习的房间。我还记得，我后来以一个年轻小说家特有的标新立异的热情构建了这些想象：“这里，先生们，”王子以他惯常的极为优雅的方式说道，“是我七十年前在侍从陪同下坐着学习数学的地方！”他会从那些攥着门票的观众身边走开，跨过参观者的禁行线——老式的天鹅绒绳索悬挂在黄铜台座之间，和我们博物馆顶楼房间里的一样——在他年轻时用过的桌子旁再一次坐下。他拿着同样的铅笔、尺子、橡皮擦还有书本，再次演示他那时是如何学习的，而且他就从座位上向那些参观者打招呼：“尊敬的客人们，过去我就是这么学数学的。”带着这种念头，我立即开始浮想联翩了，同时充当某个博物馆的导游和展品本身可谓其乐无穷，就像凯末尔一样，而在时移世易之后，向后世参观者细细描述一个人的一生，又是何等令人兴奋啊。这便是纯真博物馆真正的缘起，它既是一部小说——它的主人公凯末尔就体会到了这种乐趣——同时也一个地点。我相信，小说和博物馆是同时诞生的。

### 小说，博物馆，目录

我的王子不会是真的。但因为他会展示和讲述博物馆里的真实物品，参观者很快便会信以为真，就像他们惊愕地意识到凯末尔是一个真实的人一样。我想在一个博物馆里收集并展览来自虚构小说的“真实”物品，并写一部关于这些物品的小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博物馆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我的小说会采取何种形式。但我觉得，聚焦物品并通过它们来讲故事，能让我作品中的主人公迥异于西方小说中的人物——更真实，也更能体现伊斯坦布尔的精髓。我脑子里设想的是某种百科全书词典，里面的主题词不仅仅是物品（一个收音机、一个壁钟、一个打火机）和地点（一座公寓楼、塔克西姆广场、佩鲁尔饭店），同时也可以是概念（爱、焦躁、恐慌）。正如多年后在我的博物馆里我会探讨、描绘并阐明“焦躁”和“嫉妒”这样的概念，在这部词典里我也经常考虑如何阐明、解释并探讨这些概念。我身上那个作为画家的我，在二十三岁时就被我扼杀了，但仅仅十五年后，他就又试图从我灵魂深处冒出来，落到桌上，栖身纸间。

从七岁到二十三岁，我一直在画画，后来我决定成为一个小说家。我扔掉了自己的颜料和画笔，把画室也关了，那还是我利用母亲一间堆放旧物的废弃房间改装成的。这种转变让我把自己内在的画家的创造能量转移到写作上来，但它并没有完全消除我画画的欲望。甚至在写完《我的名字叫红》之后，我还设想创作以画家为主要角色的小说。在《纯真博物馆》之后，我仍梦想着写出以画家，更重要的是以他们的绘画作品为内容的小说。

1980 年代，当我写《黑书》时，我脑子里经常有百科全书式小说的念头。1980 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后，我的很多朋友失去了在大学的工作。也正是在那时，土耳其的百科全书出版出现了复苏和繁荣，一些朋友通过撰写百科全书条目和给出版商打工来糊口。在那个年代，新闻报纸通过优惠券兑换来分发百科全书，每个人都在分期收集百科全书。朋友们对我说：“奥尔罕，你应该写一部百科全书式小说，它肯定卖得好。”作为一个决心在小说写作中搞些形式实验的年轻作者，我对这些半开玩笑的建议是很当真的，而且在脑海里有过设想。

在最初的版本中，《纯真博物馆》就是一部类似于百科全书的小说——有编排好的一系列条目——关于爱，关于家庭，围绕凯斯金家庭和美颂的物品构建叙事。1990 年代中期，甚至当我在写《我的名字叫红》时，我就已经开始从伊斯坦布尔的古



Copyright © Refik Anadol

董店里搜罗凯斯金家会用到的物品——比如木梨刨子，它是 66 号展盒里唯一的物品——我喜欢遐想越积越多的物品有朝一日在某个博物馆被人欣赏时有多么美妙。当初我一定就是因此而想到，我能以博物馆目录的形式把这一切聚拢到一部小说里来，而且这个目录附有长长的细节丰富的注释。正如博物馆目录里提供注释一样，我会向读者描绘某个物品，就好像我在向一个博物馆访客介绍它一样，我还要向他描述这个物品在我的主人公心头激起的回忆。头一件物品将是美颂在与凯末尔做爱

时遗落的耳环。我想在博物馆展示这只耳环，还要在小说化的目录里讲述这只耳环的故事。

2002年《雪》出版之后，我立即开始写《纯真博物馆》。带注释的目录的想法成为构建这部小说的理由，我已经把我整个生活和写作艺术都投入进去了，这是个痛苦的过程，我不能再干这样的事了。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我以带注释的目录那样写，我就不能充分探索或表达凯末尔和芙颂罗曼史的全部内涵，也不能通过物品来呈现整个时代的文化面貌。因此，我打算盖一座博物馆，小说将讲述博物馆展品以及博物馆如何诞生的所有故事。而带注释的博物馆目录的形式则不再有很大必要了。这时我想以传统小说的形式来写芙颂和凯末尔的故事。

我决定不再以分列条目的形式写这部小说，这多少解释了诸位现在看到的这份导览册子为何会存在。但正如所有亲临楚库尔主麻街参观博物馆的人所知，《纯真物件》之所以有必要的真正原因是，我认为博物馆在完工之日时就拥有了自己的精神，它独立于小说而存在。

当然，小说和博物馆之间有一个强大的纽带：两者都是我想象的产物，都是我通过一字一句、一草一木、一步一步漫长年累月幻化而成的。这或许也是小说和博物馆各自讲述同一个故事的缘由。博物馆里展示的物品同时也在小说里得到描述。尽管如此，词语是一回事，物品是另一回事；词语在我脑海里创造的形象是一回事，而一件经年的老古董所唤起的回忆是另一回事。但想象与记忆之间毕竟有一种强烈的亲密关系，而这也是小说与博物馆之间密切关系的基础。

此外，正如人们即便不参观博物馆也能完全理解小说一样，博物馆也是这样一个按自己的方式被人参观和体验的地方。博物馆不是小说的图示，而小说也并不是博物馆的说明。

## 芙颂的房子 ——博物馆的位置

为博物馆收集的物品越多，我脑子里的故事就越清晰。在熟人的房子里，或是在我母亲存放废弃锅碗瓢盆的老橱柜里——那儿还有她的瓷器、糖果碗以及用来做摆设的小玩意儿——我有时能看上一个中意的茶杯。有一天我会拿走它的，但用不着告诉世人它的归宿就是博物馆。我开始大肆搜罗1990年代以来的这些东西，好建造一个物件的世界来填充我的博物馆和小说。

起先，无论谁问我打算拿这些收来的物品干什么时，我都无言以对。“我想建个博物馆，而它的目录将是一部小说”，这样的回答似乎太过自负。但是，我给出的回答跟自己书里描绘的那个心碎的伊斯坦布尔收藏家是一样的：我要说，我是真的喜欢这个茶杯，但我会装作我并不知道会拿它们来干什么。这似乎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怪癖。

事实上，我确实不知道拿这些越积越多的藏品怎么办。我相当固执，甚至像着魔似的去构筑关于一个博物馆和一本小说的幻想，但它的匪夷所思、稀奇古怪以及实现难度都让我感到惊骇。我知道，如果我把自己的梦想透露给家人、亲戚和朋友，他们会不依不饶竭力劝阻我，当初我下定决心成为一个小说家时，他们就是这么干的。他们会觉得我疯了，告诫我不要浪费精力，在土耳其从来没人会去博物馆的（毕竟我们生活在1990年代），而且无论如何，我并没有多少钱，靠自己的书赚的钱远远不够。他们或许是对的，但我仍旧对自己的小说和博物馆念念不忘；我继续乐此不疲地购买物品，存放在我的房子里，不告诉任何人缘由。

一旦我们卸下重担，不再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梦想并让他们相信这些梦想的价值，艺术和文学的创造力便会立刻跃至兴奋的顶峰。对我而言，许多我敬重的作家和艺术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离群索居，而不是因为他们脾性恶劣、喜好争讼。这也是为什么新思想往往不是萌发于文艺中心，而多从边缘地带出现。

在能够着手以所藏物品为基础写一部博物馆目录式的小说之前，我已经决定了凯斯金家位于何处，因为那所房子将是凯末尔和芙颂多年来的幽会之地，而且正如小说最后披露的那样，他会把它改建成一个博物馆。决定它的位置也就意味着决定了博物馆的位置。

事实上，为了说服自己相信博物馆计划和小说一样重要，我不得不买下房子。当然，在那种爱逛博物馆的、愿意满足自己文化热情的受教育人群的居住区，我买不起一座独栋的大房子。即便我能找到买得起的房子，我有足够的勇气为了最终要把它改造成一个博物馆而买下它吗？我对我的博物馆有足够的信念以至于要为这个计划买下整个房子吗？

那时候，我的收入还不足以在尼相塔什买房子，那里是我的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也是凯末尔和我的许多作品人物生活的地方。但在离市中心和主干商业街相当近的后街，那里的房价还不太贵。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大约有一百来万，到1990年代中期，已增至九百万了，地价和房价也随之攀升。但在我的老伊斯坦布尔，仍然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是高攀的房价无暇顾及的。

所以我开始在吉汗吉尔和贝伊奥卢之间、从独立大街到托普哈内和加拉塔石塔附近的街区寻找出售的房子。到2012年春博物馆开馆时，这些街道繁荣起来了；旅游业的兴盛、国际购物连锁店的入驻以及老建筑的翻新，让它们焕然一新，给它们换上

了新装和新面孔。但在1990年代它们仍旧像我儿时那样贫穷、破败和杂乱。其中有些街道依旧是用石板铺就的，因为所有街道在中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就已存在了。毗邻加拉塔石塔、从托普哈内到杜乃尔那些拔地而起的山上，仍然有许多制作塑料或铝制家庭用品和厨房餐具的作坊，机器和铁锤的喧响，从那些破败建筑的地下室里、从奥斯曼时期的遗迹里沿街流淌出来，在那里工匠们制作孩子们玩的红蓝相间的塑料足球以及各式各样的塑料盆子，芙颂家洗衣和洗碗时用的就是这种盆子。沿着加拉塔石塔到托普哈内，在那些街巷和咖啡馆里，聚居着吉卜赛人、因躲避安纳托利亚东部战火而沦为无业游民的人、库尔德人、穷人、非洲移民，他们过着动物一般局促的日子。我在这个街区寻觅公寓或是独栋房子。我的想法是，在那些奥斯曼帝国没落时期——那时候银行街还是整个中东地区的金融首都——建立的老公寓区里，在某个单人楼梯的顶层，找一间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公寓，就可以改建成一间博物馆了。在1990年代，我的收藏还是小规模的，我那个关于未来博物馆的梦想也还没有变得庞大起来。



Copyright © Refik Anadol

当我为博物馆和我的故事寻找房子时，我想起了一段清晰的往事，那就是加拉塔一度是一个非穆斯林地区。远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加拉塔石塔及其周边——那些现在被称为贝伊奥卢地区延伸开来的街道、楼梯间、小巷和街坊——居住的人口大部分是“非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奥斯曼统治者们用猜忌的眼光看待他们，尤其是当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奥斯曼帝国濒于瓦解的时候。加拉塔地区曾经作为热那亚的殖民地被墙围起来，在1453年向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投降，由于该地在奥斯曼帝国征服热那亚的过程中保持了中立，它被赋予一项特权，即这个地区的基督徒可以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间逐步减少。1950年代我童年时，在加拉塔这片曾拥有奥斯曼时代最好酒馆的地区，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们说的希腊方言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商店里。若干民族国家（奥斯曼帝国的遗产）的建立、土耳其与希腊的人口流动、“二战”期间强加在少数民族身上的种族特税、1955年9月国家实施的“大屠杀”、1964年强迫伊斯坦布尔希腊居民移民的行动，以及其他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措施，把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以及犹太人驱逐出了这些街区；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各处的穷人和失业者。在苏联解体之后想谋份工作的前苏联居民、逃避战火的库尔德人以及非洲移民，也都栖身于此。

从1996年到2001年，每个工作日早晨，我把女儿如梦送到她学校，然后从位于贝伊奥卢的老法国领事馆和意大利领事馆之间的校门出发，有意绕道返回我在吉汗吉尔的工作室，在那些长长的漫步中构思那时正在写的书（《我的名字叫红》与《雪》）。那些年，我的小说头一次在西方世界被翻译出版。我在欧洲许多国家展开书的旅行。在演讲和访谈之余，我参观了一些小的后街博物馆，这让我心中充满了快乐。每当我参观这些博物馆——巴黎的古斯塔夫·莫罗博物馆、巴塞罗那的弗雷德里克·马雷斯博物馆，或是伦敦的约翰·索恩爵士博物馆——我就想我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做点什么，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偏远地区建一个怪异的小博物馆。加拉塔、吉汗吉尔或是楚库尔主麻的大街上有一些上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它们往往是希腊及亚美尼亚的建筑师和工匠设计建造的。每当我看到它们，我就问自己，有一天能否把其中一间变成一座博物馆，而且我会想象我是如何让芙颂和她家人在那些老墙里生活的，凯末尔又是如何去那里拜访他们的。

在我开办博物馆十到十五年前，这些地区贫困、破败和杂乱的样子常让我心情沮丧。它们还是我儿时那样，大部分道路需要经常维修，到处是没封好的洞穴，经常向街面喷吐泥浆。沿着老宅子和苔藓覆盖的花园墙，垃圾在那些空房子前成天到晚堆积着。无人理睬每个角落的标识——禁止倾倒垃圾，倾倒垃圾者是蠢货——人行道的暗处全被堆积的垃圾给占领了。一到晚上，街道就成了醉鬼、恶棍、强盗和流浪狗的家园。另外一件让我想到在这个地区开一间博物馆有多么困难的事是，自从1964年希腊人被驱逐出伊斯坦布尔之后，他们被抛弃的家园现在都被各种非法窃居者占领了，基督教布道所荒弃的房子变得阴森恐怖，这些房子的管理者遭到各种合法手段的恐吓和胁迫。除了这些状况，我也很清楚，在欧洲去小博物馆的人寥寥无几，但这些都没有让我的博物馆计划变得更加困难或不切实际；恰恰相反，后街博物馆的诗意点燃了我的梦想。如果我想在这些脏乱差地区建一个博物馆，展示能描画出伊斯坦

布尔日常生活的物品，那么我不会介意访客的稀少，反而只会对空旷博物馆带给四周的诗意气息感到满足。

更重要的是，我对托普哈内、楚库尔主麻以及吉汗吉尔那些街道怀有的依恋之情日益增长，而且我不仅渴望保护它们，也多多少少想要参与这些地方的日常生活。我延长了从女儿学校返回工作室的路线，探索那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街道。闻着面包房里飘散出来的芝麻面包和酥皮点心的香味、在一大早开业的街边店买份报纸、从食品杂货商那里买块水果以犒劳一天的工作、看着学校的孩子们四处疯跑——所有这些都让我快乐。在那些走着老路的日子里，我心情愉悦地看着同样的办公室职员和店主在同样的时间去上班，这让我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下午我返回时，这些街道到处是玩球的孩子们、流动商贩（废品经销商，土豆和洋葱贩子，肉丸和肝脏售卖者）、在家门口站着或坐着打发日子的女人，还有猫。但在早晨，这些街道阒寂无声。商店橱窗里展示的物品（包装好的肥皂、洗涤剂、短袜、家庭主妇用的针织线、苏打瓶子、油酥点心以及瓶装泡菜）在初生的晨光中看起来非常可人，唤醒了我去触摸这些物品、去感受它们的纯真无邪的欲望。

我一度异想天开，想在我每天的行走线上买一家街角小店，前后两条街上都有店门敞开，在那里我可以展示想象的“真实”物品，并在一部小说里讲述它们的故事。我对这个地方及街道的依恋，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与一种画家的冲动混合在一起，这种冲动曾经试图从我的灵魂和我在欧洲博物馆里感受到的情感深处再度出现。这种感受控制了我，就像诗人们被诗歌所占据而无法说清他们是如何写作的一样。

1999年夏天，在大地震过去六个月后，我在著名的楚库尔主麻大澡堂往下五十米远的地方买了一个房子。我带女儿每天去上学，途中步行经过它时，就看上了这座优雅但破败的建筑。我从一个经纪人那里知道它正在出售，而他知道我正在找房子。房主是一个在伊斯坦布尔有很多建筑工程的建筑承包商。他通过拍卖买下这房子，由于还不确定拿它干什么，暂时把它作为工人的宿舍。当我查看这座房子脏乱的房间时，一个意外出事的工人正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承包商告诉我，像这个地区许多希腊人的老宅一样，房子常被用来储物或是由单身汉居住。我喜欢它通风的楼梯，朝向前后两条街道的外墙，甚至还有它的狭小，虽然在后来几年中我对这一点不无抱怨。但无论如何，我高兴自己找到了一个配得上美颂的优雅房子。是的，美颂肯定就住这儿。我对这一点确信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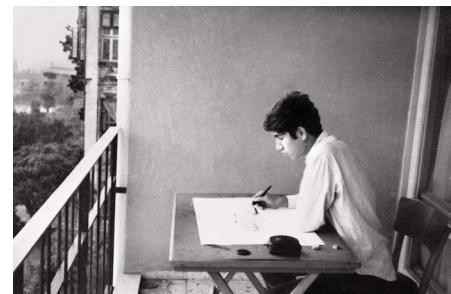
1990年代之前，楚库尔主麻跳蚤市场最早有一些商店，它们的里间和临时储物间里堆满了非穆斯林（尤其是希腊人）1950年代被迫迁出伊斯坦布尔时留下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的古老律书和史书、照片、旧身份证件、银行表单、烟灰缸、眼镜、小装饰品、过期护照，以及这些街区的基督徒们留下的其他一些古怪玩意儿——对这个时期逐渐出现的土耳其新中产阶级和收藏者来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像那些收藏豪车的印度王侯一样，这批最早的收藏者关注的不是旧时纪念物，而是一些与过去无关的东西，比如美国香烟盒和外国明信片。

不仅仅是对非穆斯林的遗产，西化的中产阶级对伊斯坦布尔的过去以及在这个城市街巷里生活过的人们的一切，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漠视。相对世俗的新一代，作为共和国的产物，他们对奥斯曼文化、它的物品以及所有用阿拉伯字母——一种古老的文字体系——或奥斯曼土耳其语书写或印刷的东西，也同样漠不关心。他们既不知道也没兴趣去知道这种古老的语言和这些古老的物品。1950年至1980年间，这个城市变得更加富有，更加现代，奥斯曼时期和非穆斯林居民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印刷品，品质极好的摄影设备，大量报纸、家具、书籍、旧钞，以及塞满这个城市旧书店、古玩店和跳蚤市场的各种小玩意儿——被大量焚毁，化成纸浆，或者以其他方式毁灭。在这场大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是那些看起来有用或是可爱的，能在伊斯坦布尔不断增长的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中觅得一席之地的物品，比如烟灰缸、水壶、胡桃钳子、咖啡研磨机以及旋转木马。这次破坏留下了一种可怕的真空，类似于1950年代兴起的焚烧城市木宅所造成的后果，或者是1960年代中期我在楚库尔主麻和加拉塔的街区看到的景象。

某种意义上，这种真空是必要的，正是因为有了它，对城市历史感兴趣的新一代收藏者才得以出现。我人生中的一段插曲就解释了这种真空对精神造成的影响，尽管此后四十多年来人群令人吃惊地涌入吉汗吉尔—楚库尔主麻—加拉塔地区，但我仍能感受到这种真空。

1973年，我把当画家的梦想抛诸脑后，建筑专业的学习也半途而废。在我姨妈的丈夫、保守的诗人谢夫凯特·拉多的帮助下，我开始去跟随一位老先生上书法课。他属于最后一代奥斯曼书法家。每周一次，我穿过金角湾前往韦兹涅西雷后街的一间老宅，和少数几个学生在一起，他们像我一样热情洋溢，但却比我更顺从、更有天分，也更有耐心。在这里，我通过手上的芦苇笔和面前的墨水瓶，努力去解开奥斯曼书法的奥秘，同时也驯服自己的双手和精神。在奥斯曼帝国覆灭、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代替之后的五十年间，那些在今天成为博物馆珍稀藏品的书法范本当时却很容易找到。但是，除了一两个像我姨父那样的本地热心人，以及那些也许一个月才碰一次面的末代书法家，没有谁对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从焚烧中幸存下来的木宅里曾发现一些无与伦比的书法板，但有时在收藏者赶到之前，它们就已被毁掉了。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书法课我去得少了。我开始意识到，这种艺术极大依赖于对权威、规矩、机械学习以及匠人手艺的顺从，它不适合我。多年后，只要我想起自己学书法的那段短暂经历，内心就充满了罪责、后悔乃至一种奇怪的愤怒。我错过了洞悉



Copyright © Şükür Pamuk

书法奥秘、与这个行将消亡但依然伟大的传统产生联结的机会。但是，从这件事上我体会到的不单单是罪责和愤怒。从我妹妹和那些书法家所讲的故事里，我了解到，不仅仅是那些书法板被以草纸的价格论公斤卖给了废品收购商，然后被捣成浆用来做购物袋，整个高雅的奥斯曼传统的残存部分都正在逐步遭到毁坏。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系统地收集了奥斯曼时期的硬币，并为它们写书——他是一个奇人。他说那些两三百年前的奥斯曼硬币只要一落入卡帕勒恰舍的珠宝商之手，立马就会被他们熔成银块。

听着这样的故事，我感受到一种古怪的羞愧。我既没有能力也不知道如何去停止这种暴殄天物的浪潮；更重要的是，就像我那些热衷于阅读写作并对文艺感兴趣的朋友一样，我倾向于用另一种方式去看待一切，我更关注西方文学艺术的典范，也更愿意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

时至今日，我感到，有抱负的作家和画家与在文化真空中开展收藏的前卫收藏家们，在观点上很大程度是一致的。尽管第一代收藏者们一谈起历史和记忆就会有许多高谈阔论，但他们并不打算去保护往昔生活的痕迹，而是为自己定义一种新的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未来。

#### 本文摘自《纯真物件》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 Orhan Pamuk  
邓金明 译  
中文版将由世纪文景出版



奥尔罕·帕慕克 (1952- )

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已经被译为40多种语言出版。

#### 先睹为快

这里是尚未上市的新书。我们选摘部分章节，但一本书是不可割裂的领土，希望这些章节能引领你们读完全书。



来自 [Jéan Beller](#) on Unsplash

## 非虚构 上海快线 保罗·索鲁 | 发现经典

### 为什么他们永远都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上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临江城市，远远望去是灰褐色的，看起来就像纽约的布鲁克林。川流不息的人群，时尚的街头生活，让本就习惯热闹的中国人爱上这里。中国成功的时尚设计师大都在上海工作，如果你鹦鹉学舌似的发出“YifuShengLuolang”这样的声音，上海人立刻会明白你说的就是“伊夫·圣罗兰”(YvesSaint-Laurent)这个品牌。我来到这里时，正好遇上法国杂志《世界时装之苑》(Elle)的一名编辑在街头巷尾徘徊，她打算以“时尚革命”为题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正在寻找素材。后来我还见到了与她同行的中国男人，他告诉我，这位法国女士对上海女人的着装品味印象非常深刻。她拦住她们，给她们拍照，问她们从哪里买衣服。大部分人都说是在街边自由市场买的，或者是按照在西方杂志上看到的图样自己在家缝制的。即使在“文革”时期，妇女们去工厂上班时，也会在松垮的蓝色工装里面穿上鲜艳的毛衫和花边衬衣。通常她们开工前会在洗手间里聚聚，相互比较藏在里面的毛衫。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见识过的外国人都要多——既包括侵略者也包括友好的访客，这座城市可以包容多种语言。这里曾经是政治上最为教条的地方（“反对资本主义”和“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样的革命口号曾经大行其道），也是资产阶级色彩最为浓厚的地方。每当中国要发生变革，它首先会出现在上海；每当中国面临冲突，上海也是呼声最高和最为激烈的地方。这里极具生命力，即便像我这样讨厌城市的人，也能够发现上海精神并且欣赏这里的氛围。它不像广州般世俗，却也不那么精致，而且在最炎热的月份，拥挤、嘈杂和臭烘烘的环境也会叫人喘不过气来。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嘈杂，偌大的城市整夜都不得消停，汽车喇叭声、警报声、垃圾车的轰隆声、人们的叫喊声以及垂死的喘息声此起彼伏，与纽约的背景音如出一辙。北京正在向上发展，不久后那里将会高楼林立；而上海则是建在泥地上的城市，它不断地向周边扩张，已经蔓延至浙江的湿地。他们把钢桩压进这种松软的泥土中来加固地基，这里整天都能见到打桩机在工作，我的窗外就有一台——于是我的生活节奏便被一种粗暴蛮横的噪音所主宰。中——国！中——国！我呼吸、走路和吃饭的方式都受到了影响：双脚随着它的节拍收放，勺子也随着它的节拍起落。中——国！中——国！我还按照这样的节奏吐字说话，写字时会有规律地停顿，就连刷牙时都发现牙刷在跟着打桩声摆动：砰的一声过后，还会传来半声回响，中——国！这台机器每天早上七点就开工了，直到晚上八点还在敲敲打打。这在上海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因为几乎每个街区都有机器在工作，到处都是铁砧敲击地面的锵锵声：中——国！

为了避开拥挤的交通和人群，我钻进了街边的小巷子。然后我意识到，对于这座城市充耳的噪音、无处不在的打桩机以及它亢奋的精神，如果抱怨太多就会显得不大厚道，因为第一次来上海时我觉得这里死气沉沉的，没有一点儿朝气。可是，为什么他们永远都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呢？就连街边小巷也是人头攒动，到处是临时摊位、自家房屋改造的店面，还有建在贫民窟里的集市，原本供人行走的道路上，也挤满了修鞋的、修自行车的和做木工活儿的。

我朝外滩方向走去——这是上海的一条临江步行道，沿途见到一堵围墙后有座尖顶建筑，于是我找到入口走了进去。这里是圣若瑟教堂，我看一个身着破旧短衫和拖鞋的男人，如此不讲究的装束让我起初以为他只是个门卫，谁知竟然是这里的牧师，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既虔诚又警觉，说起话来温和而不失机敏，中国的基督教徒大体都是这个样子，虽然要遵守的戒律很多，却不会用心记住多少。这座教堂曾经被毁坏，墙上涂满了各种标语口号，后来它变成了放机器的仓库，而院子则成为停车场。“圣事。”神父指着闪烁的烛光说道，然后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神圣的主，就在会幕之中。

我问他这样布置是何用意，今天有什么仪式吗？

不，他答道，然后领我去了教堂后头，那里摆放着一具贴有白色纸质十字架的棺材。他说，明天将会有场葬礼。

“我觉得你很忙——来教堂的人非常多。”

“噢，是的，上海有五所教堂，周日基本都挤满了。”

他邀请我去参加弥撒，出于礼貌我答应了。但我知道我不会去的。作为一个异教徒，我没有理由去那。有的西方人在自己国家从不去教堂，到了中国却喜欢往教堂跑，以此来表明自己与众不同，实在让人气愤。所以我在中国不进教堂，但有时如果看见草地上有只鸟，我会跪下来，惊奇地望着它在那里抽搐。

几天之后，有次散步时我来到了人民公园。那天是周日，我决定去看看在北京听说的事情是真是假。据说在北京的北海公园和上海的人民公园，会专门有一块地方留给想要说英语的人。这事看来不假。他们管那地方叫英语角，占地有半英亩，树下有很多中国人在用英语交谈。最初是几个还说着革命前时代英语的老人（他们上过教会学校），每逢周日就聚在公园里相互交谈，为的是不让自己的英语退步。后来他们发现自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一些想学英语的中国年轻人会过来很尊敬地向他们请教。1979年时这还是一个比较随意的活动，一般只有一小时，但到了1986年就变成了每周日的固定活动，而且要持续一整天。中国人在这些事情上很容易形成惯例。并没有人颁布法令说要成立这个英语角，它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并且发展得非常正式。要知道，英语可不是新中国的官方语言。

人民公园里大概有两百个中国人，他们站立的姿势和说英语的声音让我觉得他们好像一群鹅。有的人是来练口语的，有的人是来交友的，但我发现其中许多人其实是来寻求建议的，这些人不是想找英语方面的工作，就是想申请说英语的大学。在上海，讲英语的人已经构成了一种亚文化群体，这在中国的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在这里认识了二十四岁的勒罗伊 (Leroy)，他就是在人民公园学的英语，已经坚持来这里五年了。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1981年，当时有个男的问我‘What’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我答不上来，那时候完全不会说英语。我感到非常挫败，于是决定学英语。后来我买了一些书，每周日都会过来。”他英语说得很好，但我还是有个问题：他的英文名是怎么来的？他叫勒罗伊多久了？

其实这很好解释。英语刚进步没多久，这个名叫李仁的年轻人就开始叫自己勒罗伊。他告诉我，在毛泽东时代，英文名是资产阶级的表现，但随着英语的普及，现在它又重新流行起来。他们选名字的理由显而易见：一个名叫甄丽的女孩可能会选珍妮 (Jenny)，朱兰和朱利安 (Julian) 的发音相近，而一个姓陈的人可能会叫约翰 (John)。勒罗伊有个朋友名叫李兵，他选了宾利 (Bingley) 做自己的英文名，这听上去像是英国国会中某个托利党 [1] 成员的名字。有个复旦大学的学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兰博 (Rambo)[2]，接下来几个月我遇到了好几个塞尔达 (Zelda)，还有一个林戈 (Ringo)。我不禁得出结论，这些中国年轻人正通过这样的方式远离自己的文化。在几年前，要是你戴着滑稽的帽子和墨镜招摇过市，跟人说自己叫比尔 (Bill)，别人会以为你正在接受惩罚。然而，在英语角却经常能见到这样的人。

勒罗伊是大学生，在一家纺织厂当工程师，每个月赚80元钱，但他的目标却是去新开张的喜来登酒店当培训生——做什么都行，这家酒店位于上海市郊的华亭镇。上海有31家大型酒店，但华亭喜来登被认为是最佳之选。

“你被录用的机会大吗？”

“我已经得到一个职位了，总共有400人申请，他们从中选了20个。但你知道的，在中国辞职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获得批准才可以离职或者调动岗位。我在喜来登每个月能赚250元，但领导不会放我走的。”

“那太糟糕了。难道你就不能为此做点什么吗？”

“唉，他说他儿媳妇需要一份工作。他知道我的父亲是个工头，如果我父亲能帮她找到工作，那么领导就会放我走了。要是不行，我就只能待下去。”

他今天来英语角就是为了这个问题，想听听朋友们的意见。所以这里不但是英语角，还有点儿“麻烦角”的意味。

他同所有自学成才的人一样有着专注的精力，并且还在不断学习。他说他对非洲很感兴趣。我很好奇他有多了解非洲的最新情况，于是问他上沃尔特[3]的新名字叫什么。

“布基纳法索。”他回答。

“它的首都是哪里？”

“瓦加杜古。”

“太棒了！”

他说自己落下了许多东西，需要迎头赶上，因为在“文革”期间花费了太多时间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我请他具体讲讲。

“多数时候学校是停课的，但有时也开一些课。我们会去学校批斗这个，批斗那个。我们批孔子，批老子，还批老师。如果老师不好，我们就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让他们写悔过书。干完这些我们就回家了，那就是在浪费时间，但我并没把这当一回事。”我试图想象一间教室里如何挤满戴红帽子的小野兽，以及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孩怎样恐吓他们的老师。当然，汉语中“批斗”这个词，可以委婉地表达很多意思。有位来自复旦大学英文系的女士，由于被红卫兵批斗过，现在需要依靠拐杖才能走路——她当时提倡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但那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于是他们便对她拳打脚踢。然而时代已经变了，在1986年春天举办的上海莎士比亚戏剧节上，她刚作为指导老师和学生一起排演了《无事生非》。

对中国人来说，学英语的好处就是可以找到新的渠道，来接触到许多官方禁止的出版物。很多书籍中文版虽然被禁止，但英文版却可以获取。勒罗伊说他读过《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我表示很惊讶，因为董教授告诉我，奥威尔的书是“内刊”，仅供内部传阅。但勒罗伊并不知道这个，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些书被翻译成了中文，因为这些译本是禁止流通的。他对《金瓶梅》这本书的艳情小说也有所了解，但他并不知道学者是可以读到这本书的，或者说实际上这本书已经传阅开了。在他看来，这本书是口头文学传统的一部分，里面有许多在人们低声窃语中流传的淫秽故事。

我问他，上海哪些变化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他回答说，着装方式的改变是最显著的，但人们的观念也变了很多——不论是对自身的思考，还是对未来的预期。他说我应该去自由市场看看，尤其是现在有些工作能让人们在家就赚到钱，比如裁缝、修锅和补脸盆什么的。此外，还有人在家开课，教人学习英语、音乐或者服装制作。你花20元钱就能跟一位老裁缝学做衣服，每周上两次课，总共要学两个月左右。要在以前，可是一点学裁缝的理由都找不到，因为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就是工厂生产的那种蓝色棉布套装。

“但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现在都有工作了。以前你要是没有工作，就得待在家里。政府什么也不给你，你只能找父母要钱。现在每个人都能找点事情做，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在祝福他能够顺利去喜来登上班后，我继续往前走，想看看他刚才说的在家工作的事是不是真的。大部分人的的确确都在忙忙碌碌地做些什么，或者说是在赚外快——缝衣服、补锅、修鞋、修伞、卖自制的衣服。在1980年代以前，这种自由职业是闻所未闻的。与此同时，自由市场也非常活跃，沿街有各种小商贩兜售蔬菜、鸡蛋、宠物食品、时钟、旧手表、旧眼镜以及他们捕到的各种小鸟。

此时上海正在演一部血腥的复仇电影，片名叫做《无腿先生》。宣传海报上，轮椅上的男主角无腿先生正用步枪朝着仇人的脑袋射去。中国人都在四处乱转地抢票，他们说票很难买。在中国，所有的电影都很受欢迎，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动作片——《第一滴血》最近上映时，中国所有的影院几乎都场场爆满。

有个戴红袖章的老头正在人行道上责骂某个人，我走近一打听，才发现原来这人是“反吐痰小队”的成员，当时反吐痰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我很支持这样的运动，但中国人吐痰却远不及他们清嗓子那样让人难受：他们猛咳一下，500码之外都能听见，跟雨季时下水道排水的声音如出一辙，而吐痰只是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煞风景的结果而已。

公园英语角的后方充满了节日的俱乐部氛围，我在那里认识了秦医生，他说自己是一名精神病医生。

我对他说，在我印象里中国是没有精神病医生的——当然也没有大学设立心理学系。这里有精神病医院吗？“五年前批准设立了精神科的学位，我就是那个开始学的，”秦医生说道，“在那以前没有精神疾病专科。如果有相关症状的病人被送过来，一般会用针灸治疗。”

“你们能用针灸治疗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吗？”

“不能，而且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在上海医学中心实习，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但现在我们有一套非常好的医疗体系，中国现在也有了很多知名的精神病学家。他们都是老先生，从德国和美国留学回来的。”

“你们一般怎么治疗病人呢？”

“我们用药呀，给他们吃药，还跟他们交谈。发生暴力的情况不多，但我们有很多抑郁症患者。我们百分之七十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那些工厂里的医生会把病人转送过来，给我们治疗。”

我问他有没有遇到过妄想症患者。“不是很多，这在中国不常见，我在诊所只听说过三个这样的病例。”“美国的幻觉症患者老觉得自己是乔治·华盛顿，而其他地方的患

者则总是自称希特勒或者拿破仑。要是中国人得了这种病，会说自己是哪个伟人呢？”“皇帝、毛主席，或者玉皇大帝。”在我同秦医生说话的时候，一位先生走过来问我：“你说德语吗？”

“Ja wohl[4]。”我答道，为了让他高兴，我还跟他胡扯了一会儿。他德语讲得很好，他说自己1930年代曾在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当过信差，德语就是那时候学的。

此时有一小群人把我们围住了。“说英语！”有个人要求道，而另一个很困惑的中国人则问道：“你们在说什么语啊——是法语吗？”没过多久，那里就聚集了二十来人听这位老先生说德语。

“如果你们想留在这，就必须说英语。”有个一本正经的中国男人说道，还抓着老先生不放手。

为了息事宁人，我开始用英语问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姓曾，让我猜猜他的年纪。我说：“大概七十岁吧。”

“我是1906年出生的，”曾先生说道，“我记得我老爹讲，当时皇上还在位。他还给我讲那个老太婆的故事，就是她在背后控制皇上，”——他说的是慈禧太后——“那真是个老妖婆呀。”

“曾先生，您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

“很简单的呀。我老爹告诉我‘不要抽鸦片’，所以我从来没抽过。那时候每个人都抽的呀，然后他们就病恹恹的。但我却很壮实，心肺特别好。他用胸腔吸了口气，然后呼了出来，“还有一个蛮不错的理由，如果我抽鸦片，我老爹会把我的腰打断的。”

我说道：“您老几乎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那您觉得什么时候最好？”

“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候老好的啦，每个人都蛮开心的，世界终于和平了。”

“就是这个原因吗，仅仅是因为和平？”

“不光是这个。我有两个女儿，解放前大家都觉得女孩子没用，人人都想要儿子。但是解放以后我就不用担心了，两个女儿也不用再因为这个难为情了。我给你讲讲我太太吧。”

“讲吧。”我回答道。曾先生说起话来像个老顽童，身旁的这群中国听众个个都探身向前，想听听他究竟在讲些什么。

“在我一岁左右，父母就给我定了娃娃亲，是同村的一个小姑娘。二十三岁时，我终于跟她结婚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太太，最会做好吃的了。她会做面条，会做鱼丸，最会做的是饺子。我现在还记得那些饺子的味道，真香呀。”他舔了舔嘴唇，围观的中国人都大笑起来。他注意到自己已经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但并没有失去镇定：“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要不要看看她的照片？”

我表示想看看，然后曾先生就把手伸进他随身的塑料袋里摸来摸去——那里面有一瓶中国米酒和一堆饼干、一把梳子、一些药丸、一根发黑的香蕉和一份脏兮兮的报纸。他找照片的时候，那群围观者都把头伸了过来。

当曾先生掏出照片，人群中传来一阵猛烈的倒吸气声和嫌恶的嘘叹声。他挥舞着手中的照片，上面是一具躺在棺材里的女尸，苍白的小脑袋从缎袍的花边领口上露出来。此外还有一些枯萎的花朵、一个香炉，以及一张印有死者枯槁面容的遗像。

“她是个好妻子。”曾先生骄傲地说，然后他对着照片笑笑。当他四处展示照片时，那些中国人扮着鬼脸纷纷离开了。

关于生男生女是否一样的问题，我在上海遇到的其他人也有所争论，而且很明显中国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超生的人会受到处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是倾向于要男孩。你总能听见有人窃窃私语，说有许多刚出生的女婴就像没人要的小猫那样被丢弃。更有可能的是，人们在婴儿出生前就查出了性别，从而导致堕胎率上升——我没能成功获得关于堕胎的统计数据，但这些数字是相当庞大的。任何一个妇女随时随地都可以堕胎，这被视作一种对于国家的责任。我敢打赌，被打掉的胎儿中，女性数量肯定多于男性。我把这样的看法告诉了一些在上海遇到的中国人，他们也承认非常有可能。

\*\*\*

桑晔是《北京人》的合著者之一，在北京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到了上海一定要去郊外的闵行工业区看看，那里离市区大概有十五英里。

“作为一个旅行者，你会有新发现的，”他说道，“在闵行，乡下来的农民已经变成了工厂的工人。他们过去住棚屋，现在都住高层公寓了。问题是他们的习惯还没变，不习惯用抽水马桶，还在房间里养鸡养鸭。”

他的描述让我想起了多帕奇[5]居民楼里的景象：厕所臭气熏天，楼道里满是牲畜，干草叉立在墙边，一群猪慢悠悠地上上下下。

“他们还保留着乡下人的一些其他习惯，”他说道，“每到晚饭的时候，住在村子里的人都喜欢到处转转，看看亲戚们都吃些什么。在公寓楼里这样做就很不方便。人们进电梯以后要一层一层地停下去拜访他们的亲戚，为此电梯工每天都觉得很困扰。”

最后他说：“闵行虽然乱糟糟的，但是很有意思，还没有游客去过那。”

就算只为了这一个理由，我也要去看看：我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些猪群和鸡群，还有难以描述的厕所。于是我找了一天去闵行，但见到的一栋栋楼房却让我感到失望。

那里没有一栋六层以上的楼房，而中国有法律规定，只有六层以上的楼房才必须安装电梯，这样的规定简直没有道理。闵行就是一个没什么特色的大型乡镇，大概有三万人居住，有一家发电厂、一些工厂和商店，还有一个小型市场。可是去哪里找那些猪和鸭子呢？

我徘徊在楼房后那些普通的道路上，什么特别的也没看见。有人骑车，也有人走路；有上下班的工人，也有进出学校的学生；有买东西的人，也有在楼梯上气喘吁吁的老人；当然肯定还有人在想：这个老外在看什么呢？

我遇到的一个男人说，这里正在建一家合营玩具厂，主要生产“火柴盒汽车”。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很有趣。他说还要建一家化妆品工厂，百事可乐也在考虑来这里开一家瓶装工厂，我试着控制自己不要打哈欠。

我说：“听说这里的公寓有点与众不同。”

他似乎不大明白我的话，但他说，如果我想看的话，可以去他家看看。中国人历来都是如此好客。旅途中我很早就发现，他们总是那么友好，没有半点戒心。偏远地方的人则更是如此：他们渴望与人交谈，为自己的家人感到骄傲，好奇我如何看待中国发生的变化，并且非常坦诚直率。他们甚至完全不知道我是谁。

“请进。”他对我说道。

这是个两居室，屋里弥漫着蔬菜的气味。除了卧室，还有一个大客厅、一个洗手间和一间厨房。五个大人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里。这些人都来自我前不久坐火车刚经过的无锡，到1959年闵行建区时才迁过来。

他们就在当地工作一两男三女都有自己的工作。每个房间都放着两张床、几个五斗柜、几张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房间很整洁，窗台上还摆着一些盆栽，但是一本书也没有。

见到我评论电视，他们就把它打开了，此时在放一部牛仔电影——格里高利·派克[6]和奥丽维亚·德哈维兰[7]主演的，有中文配音。我们看了一会儿电影，他们给我泡了茶，然后我们聊了聊闵行。

“有人跟我说现在闵行还有人养鸡养鸭。”

“没有了，我们现在不养鸡，也不养鸭。”

其中一位女士对我说：“那你们在美国还骑马呢。”

“只是骑着玩儿的。”我答道。他们不是很相信我。他们觉得美国到处都是牛仔，而我则暗自以为他们在闵行还养猪养鸭。

“所以你不会‘马上走’咯。”

他们在跟我玩笑，中文里的“马上”，是“快点”或者“着急”的意思。

“我现在得马上走了。”我答道。

就这样，我离开了闵行。这个地方有些无趣，但却相当体面——是桑晔错了。可是，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肮脏不堪比整洁有序更有意思呢？

\*\*\*

有一天我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姓王的人，他很时髦，看上去挺年轻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是同一年出生的一对属蛇（但小王用的词是“小龙”，这是中国人对蛇的别称）。他非常友好，肚子里装满了故事，所以我老去找他，通常是一起在锦江饭店吃午饭。他有着敏感的灵魂，但又有讽刺挖苦的本事。他说他去过美国，觉得没有比走在旧金山的街道上更开心的事了——他暗示自己很渴望移民美国，但并没有对此喋喋不休，也没有向我请求帮助。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他的穿着打扮也是与众不同的：淡黄色法式夹克配浅蓝休闲裤，手上有一块金表，脖子上绕着一圈链子，还戴着一副昂贵的太阳镜。

“我喜欢鲜艳的衣服。”他说道。

“‘文革’的时候你能这么穿吗？”

他笑了笑，说：“当时真是一团糟！”

“你有没有被批斗？”

“我被抓起来了，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抽烟的。我发现，抽烟能为争取时间。他们把我关进一个房间。可是只要我点着一根烟，一口接一口地抽，我就有时间想想应该怎么回应他们。”

“后来你怎么说的？”

“说了不正确的话！然后他们叫我写文章，自我批评！”

“讲讲那些文章吧。”

“他们给我定好了题目。比如《我为什么喜欢查尔斯·狄更斯》《我为什么喜欢莎士比亚》。”“我觉得，他们是想让你写为什么不喜欢他们。”

“他们才不相信，”他说道，“他们把我划成了反动派。所以，我得写我为什么喜欢他们。这太可怕了，每天从单位回来，晚上还要写六页纸，然后他们还要说，‘你写的是狗屎，再去写六页’。”

“你那时候做什么工作？”

“给文宣队拉小提琴，拉来拉去都是一样的，什么《东方红》《毛泽东思想万岁》，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都是这种，而且下雨了还要拉。我说：‘不能拉，小提琴会散架的。’他们不知道小提琴是用胶粘成的。于是我就在雨中拉啊拉，然后它就散

架了。但是他们又给了我一架，‘除四害’的时候命令我去树底下拉，为的是赶走停在树上的麻雀。”

除了麻雀，其他“三害”指的是蚊子、苍蝇和老鼠。

“真荒唐。”我说道。

“我们还在淮海路上刷油漆，这更荒唐。”小王说道。

“你们是怎么刷一条街的？”我问道——淮海路是上海的主干道之一。

“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我们都刷成了红色，”小王说道，“是不是很荒唐？”

“最后刷了多少？”

“三英里半，”他回答道，此时他想起一些别的事情，笑了起来，“可是，还有更荒唐的事。去单位上班的时候，我们经常要给大门口的毛主席肖像请安。我们手里拿着红宝书，大声念着‘毛主席万岁’，向他敬礼。回到家也要做同样的事情。人们还会做一些东西来表达对毛主席的敬意，比如织个毛主席徽章，或者绣个五角星，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单位的特别纪念室里——那个房间也被漆成了红色。那都是为毛主席做的。如果他们想证明自己非常忠诚，还会佩戴毛主席像章，连别针都要别进肉里。”

“红卫兵们一定忘不了这个吧。”我说道。

“不光是红卫兵——虽然每个人都谴责红卫兵，但每个人又都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现在这么尴尬，因为他们意识到，为了崇拜毛主席，自己也做过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荒唐的事。我知道有个银行家被派去抓苍蝇，他必须把苍蝇打死，然后把那些小尸体装在一个火柴盒里。每天下午都有人过来数那些死苍蝇，他们会对说：‘才117只，还不够好，明天必须有125只。’然后第二天他们的要求又会提高，你明白吧？政府那时候说，要打仗了。敌人就要来了——要做好准备。”

“哪个敌人？”

“帝国主义——苏联、印度、美国，是谁都没关系，他们要来打我们，”小王说着转了转他的眼珠，“所以为了备战，我们不得不造砖头。每人每月要造90块砖，可是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得帮他们做。我从单位回来以后，要先写《我为什么喜欢西方音乐》这样的文章，然后再造砖头，每个月得交出270块砖，而且他们还不停地问我的洞挖得怎样了。”

“你的洞？”

“就是关于‘深挖洞’的指示，也是为了备战。如果发生战争，每个人都该有一个防空洞用来避难。所以红卫兵时不时就来敲门，问我们：‘洞挖在哪里了？’”他说上海到处是防空洞（“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当然它们从来没有派上过用场。我叫他找一个带我去看。在南京西路1157号，我们找到了这个位于地下的拱顶室，它就像一个废弃的地铁站，现在变成了一家冰激凌茶座。最吸引我的一点在于，这里显然已经成为当地青年男女约会的好地方。放眼望去全是一对对的中国小年轻，一方单手托着另一方的后脑勺在深情地拥吻。讽刺的是，这个由狂热偏执的红卫兵于1960年代修建的地方，如今不仅成为了这些孩子约会和亲热的场所，还得了“同昌咖啡馆”的名字，由政府所有和经营。

有一天，我跟小王说起路过苏联的经历，提到那边生活资料如何匮乏，导致他们经常对外国人纠缠不休，要买他们的牛仔裤、T恤、运动鞋等。

“在中国从来不会这样。”我说道。

“是呀，”小王说，“但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大概三年前，我在上海一家饭店里遇到个苏联芭蕾舞演员。我去看他的演出，跳得太棒了！这个舞蹈演员很帅，我认出他了，他对我笑了笑。然后他指了指我的运动鞋，又指了指他自己。他想要那双鞋，我知道他是这个意思。那双鞋很贵，耐克牌的，花了我五十元呢。但我不是那么在乎钱的，后来我们就站在一起比了比脚的大小，正好合适。我一句俄语都不会说，但我能看出来他真的想要那双鞋。”

“你卖给他了吗？”

“我送给他了，”小王说，因为这件事情的琐碎，他皱起了眉头，“我很同情他，他只是想要一双鞋而已。在自己的国家连这样的鞋都买不到，我感到很悲哀。我脱下鞋给了他，然后自己赤脚走去了办公室！他真的很高兴！我心想：回到苏联之后，他肯定会经常想起这件事。他会说：‘有次我去中国，遇到一个中国人，我想要他的鞋子，然后他就送给我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在中国，你想要什么都能买到。食物、衣服、鞋子、自行车、摩托车、电视机、收音机、古董……”

“还可以看时装表演。”

“电视上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放时装表演，”小王说道，“上海就是以这个著称的。”

我问我老人们怎样看待这些发展——就在几年前，这个国家还在批判外国的腐朽堕落，人人都还穿着松垮的蓝套装，可如今高级时尚已经可以在这里展示。

“老人们喜欢中国现在的生活，”小王说道，“他们真的为此感到很兴奋。几乎没人不喜欢，以前让他们觉得太压抑了。”

几天以后，我正好有个机会来看看他说的是否属实。我收到邀请，要去一位刚退休的政府官员家里做客——中国人一般用来自法语的“干部”一词称呼这些官员。这个人名叫宁柏洛（音译），今年已经六十七岁了。他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是从新四军队伍中的一名普通士兵成长起来的。1940年到1949年期间，他在队伍中负责组织政治活动以及为军队筹集粮食和资金，先是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又参加了解放战争。

他记忆中最遥远的事情之一，就是有次在上海，因为深夜错过了横渡黄浦江的小轮，被一个日本兵用棍棒毒打，说他那么晚了还待在外面。之后不久他便加入了抗日组织，后来又从了军。

“这些经历难道不会让你痛恨日本人吗？”

“不会，”他回答，“我们恨的只是他们的头头。”

中国人的谴责永远只针对高层领导：下属总是无辜的。“文革”之后，他们正是凭借这样的方式克服了深重的罪恶感。这一阵跨越十年的恐怖之风，曾经波及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与乡镇，而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称为“四人帮”的四个恶魔。对于任何恐怖行为，没有哪个红卫兵被要求以个人名义负责——没人审判他们，而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叫嚷之外，我也从未听过任何人揭露他们的丑行。

宁同志（我认为应该这样叫他）瘦骨嶙峋，有着一张酷似鲍嘉[8]的脸，两颊刻着长长的皱纹，他说话时舌头会不时地抵住牙齿，吐字模模糊糊的，这点也和鲍嘉一样。很容易看出来他是个强硬派，就是那种既严厉又刻板的官员，他了解1930年代的穷困，也知道这个国家此前经历了怎样的阶段才有了现在的繁荣。而且，他还在穿蓝色套装。

他简直是跟我谈论发展问题的最佳人选。尽管他本人有一副苦行僧的外表，但按中国标准来看，他的公寓却非常大——有四间宽敞的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客厅。按照中国的惯例，每个房间都放了床。宁同志和他的太太、未出嫁的女儿、儿子、儿媳以及两个孙子都住在这里。

他太太端给我一碗炒米做的小糖块：“你会喜欢的，这可是蒙古美食。”

那东西不仅粘牙，咬起来还嘎吱作响，跟美国卖的即食脆麦片一个味道。这种麦片包装盒背面的广告一般都这么写：“好吃又好玩的甜点，孩子吃完还想要！！！”我一边剔着粘在牙上的残渣，一边跟他说，要是他参加过新四军，他肯定听过或唱过《黄桥烧饼歌》。

“我太太会唱这首歌。”宁同志说。

我告诉他们，我在北京见过这首歌的曲作者章枚，还跟他一起讨论了爱国歌曲，歌曲中日本人都被称作鬼子、淫贼、强盗和恶魔，等等。

“我个人对日本人一点也不反感，”宁同志说，“我也不反对他们来中国做生意。但是日本社会带有军国主义色彩，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除此之外，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很多共同之处。”

我跟他说自己六年前来过中国，那时候很不一样，没什么贫富差距，好像大家都一样穷。我问他：“有些人现在越来越富裕，甚至有一小部分人特别有钱，你会不会为此感到不安？”

“你听说过瓜子大王[9]吗？”

小王给我讲过瓜子大王的故事。有个农民过去一贫如洗，他知道中国人喜欢嗑西瓜子，于是就开始做些小买卖，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他雇了人，买了地，赚了好几百万；再后来他被指责剥削工人，政府向他征很重的税，最近他放弃了所有财产，又回去过农民的生活了。这个故事被当作道德寓言写成了剧本，并且在政府的支持下搬上了舞台，戏的名字叫《傻瓜的长征》。

“他就是个傻瓜，”宁同志说，“但富裕是没有问题的呀，我们的目标就是带领大家富起来。”“那么腐败的情况呢，有没有行贿受贿？”我问。中国有个词叫“走后门”，指的就是幕后交易。

“当然有，当人们过分在乎钱的时候就危险了，”他说着伸出一根瘦削的手指，“人应当控制钱，而不是受钱摆布。”

我们谈论了腐败问题。正好有个现成的例子可以说：有个中国商人因为受贿和贪污公款，被上海的一个法院定了罪。他的女共犯被判了长期徒刑，但他却被执行了死刑。“他在香港有关系。”宁同志说道，仿佛这件不光彩的事可以解释一切。

“你觉得因为偷窃就判死刑，有点过重了？”

听了我的话，宁同志大笑起来。他的牙很黄，手指甲也是，而且很久没修剪过。“如果金额超过一定数量，情节就严重了。不管是谁，贪这么多都是要判死刑的。”

“所以你觉得不应该废除死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宁同志回答，“杀人要偿命，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他犯的罪跟杀人一样重。”

如此跳跃的逻辑，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现在劳动改造这样的惩罚方式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流行了，我特别想知道宁同志对死刑怎么看。

我说：“我个人认为应该废除死刑。”

“为什么？”他问。

“因为这很野蛮，而且起不到作用。”

“几个礼拜以前恐怖分子在柏林炸舞厅的事情，你们会怎么处理？”

“如果你是想问会不会判死刑，那么是不会的，”我回答，“不管怎样，难道你们不区分政治暴力和刑事暴力吗？我们来设想一下，这些人，管他们是谁，假如是巴勒斯坦人。那就是一支解放军，不是吗？”

“我们会认为他们在柏林搞恐怖主义活动，”宁同志说道，“那是犯罪，但武装斗争，”他用了这个用来专指人民战争的词，“是另外一回事，是合法的。”

我们回到钱的话题，宁同志表示，在这个进步的新经济中，赚钱效应非常明显，不大可能出现经济困难的问题。政府管理劳动力，保护工人，向富人征税，在总体上对所有商业行为实施监管。他说物价上涨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有时候“通货膨胀率(inflation)”达到了两位数——他居然用了个英文术语。然而，大家的工资也在不断上涨。他太太在老家无锡认识一位搞制图工作的女士，每个月可以赚300元。这算很高的工资了，但其中大部分来自奖金，因为她非常高产。

“所以，宁同志，你是个乐观主义者。”

“当然！”

“你难道一点危险的趋势都看不到吗？”

“是有一些，但我们正在想办法应对。政府已经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计划。看看那些标语和宣传画，苏州河附近有一张大字报……”

改革开放以后，各项限制都放松了，于是开始出现各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精神文明建设”计划正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的。它于1985年开始，“五讲四美”活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人的口号一说就是一大串。

“五讲”的内容都与日常行为有关，包括讲礼貌、讲文明、讲道德、讲秩序和讲卫生，目的是纠正一些已经滋生的陋习。对于“五讲”无法纠正的陋习，可能需要靠宣传“四美”来改善，具体指的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和环境美。

向我介绍“精神文明建设”计划的人是宁同志。我挺喜欢他的，对他印象很深。他了解国际动态，对陌生人也很友好。他之所以对我如此宽容，显然是出自一种姑妄听之的心态——内心深处他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但他没有贪婪或嫉妒之心，一点都不爱慕虚荣。他也没有盛气凌人，虽然同我有争论，但我却因此而敬重他。

然而，后来我听见宁太太跟他吵得很厉害，之前她一直在听我们说话。

她对他说：“如果对现在的政策有什么批评或疑问，我们自己说说就行了，不要跟老外提这个。”

[1] 托利党(Tory)是活跃于17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政党，是保守党的前身，现今保守党有时仍被称作托利党。

[2] 兰博(Rambo)是史泰龙电影《第一滴血》(First Blood)中的主角，该片曾在1980年代风靡一时。

[3] 上沃尔特(Upper Volta)，一个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缘的内陆国家，1984年时改名为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首都是瓦加杜古(Ouagadougou)。

[4] 德语，意为“是的，当然”。

[5] 多帕奇(Dogpatch)，美国旧金山一个衰败的老工业区，1970年代开始被逐渐改造成为现代社区。

[6] 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 1916—2003)，美国著名演员，曾于1962年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7] 奥丽维亚·德哈维兰(Olivia De Havilland, 1916—2020)，英国著名演员，曾于1946年和1949年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8] 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 1899—1957)，美国著名演员，曾于1952年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9] 编者注：指“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1937—)，安徽省怀远县人，号称“中国第一商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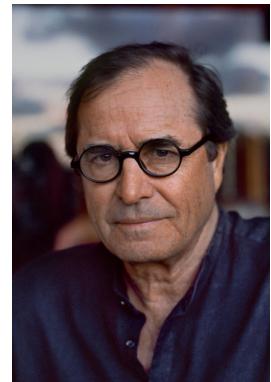
本文摘自《在中国大地上》第四章

[美]保罗·索鲁

陈媛媛译

2020年12月

后浪 |九州出版社



保罗·索鲁

美国知名旅行作家、小说家。他著作颇丰，火车旅行文学更是久负盛名。代表作有《火车大杂技》《老巴塔哥尼亚快车》《英国环岛之旅》等。



文内图片由出版社惠允；题图来自 [Dasha Urvachova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和平原子的秘密

亚当·希金博特姆 | 切尔诺贝尔的午夜

严重的设计缺陷从一开始便困扰着 RBMK 反应堆。

叙述切尔诺贝尔核泄漏事故及其辐射出来的所有问题的著作不在少数。《切尔诺贝尔的午夜》是一部最新出版的精彩作品，我们从中择若干章节发布，也许它需要你事先就对这个话题有些积累。

### 引子

1986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下午 4 点 16 分

切尔诺贝尔原子能电站，乌克兰

亚历山大·洛加乔夫上尉爱辐射，就像男人爱他们的老婆。这个高大英俊的 26 岁男子，一头剃得极短的深色头发，双眸湛蓝如冰。当年参加苏联陆军时，还不过是个大男孩。这些年，军队把他训练得很好。在莫斯科城外的军校里，教官教给他关于致命毒剂和无防护辐射的相关知识。他去过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 (Semipalatinsk) 实验基地，也到过荒无人烟的东乌拉尔放射性追踪区 (East Urals Trace) ——一场秘密核试验失败后造成的污染，至今仍荼毒着那片土地。作为训练的一部分，他甚至登上过僻处北极圈内的禁地新地岛 (Novaya Zemlya)。历史上威力最大的热核武器“沙皇炸弹” (Tsar Bomba)，就是在那试爆的。

如今，作为基辅地区民防部队第 427 红旗机械化团的辐射侦察指挥官，洛加乔夫深知如何保护自己和三名下属免受神经性毒剂、生物武器、γ 射线和强放射性粒子的危害：照着教科书上的指示按部就班，信赖自己的放射量测定设备，在必要时求助于存放在装甲车驾驶座下的核生化防护包。但他也坚信，最好的保护还是来自心理上的保护。那些对辐射心怀恐惧的人是最危险的。而爱上辐射、接受辐射的广泛存在、理解辐射复杂多变的那些人，则能够在经历最猛烈的 γ 射线暴击后全身而归，健康如常。

那天早上，一列由 30 多辆车组成的车队，快速穿过基辅市郊。春风拂过装甲巡逻车的车窗，带着草木的清香。被召往切尔诺贝尔核电站处理紧急情况的洛加乔夫坐在头车中，感觉一切都尽在掌握。他的手下前晚刚刚在每月例行的检阅仪式上列队走过阅兵场，各个都训练有素。在他脚下，摆着一排放射性物质检测装置，其中一台新装的灵敏度相当于老型号两倍的电子设备，正发出轻柔的杂音，显示周围一切并无异常。

但他们当日上午晚些时候终于接近核电站时，很明显，一些不同寻常的事确实发生了。穿过标志着核电站外围的混凝土路标时，放射量测定仪第一次发出了警报声。洛加乔夫上尉下令停车，记下了上面的读数：51 伦琴每小时。如果他们在那里再等上 60 分钟，所有人吸收的辐射量，将相当于苏联军队在战争期间允许吸收量的最大值。于是他们沿着从远方的核电站一路延伸而来的高压输电塔继续往前开。放射量测定仪上的读数再度升高，但随即又降了下来。

装甲车轰隆隆地经过核电站冷却水河道的混凝土堤岸，切尔诺贝尔核电站 4 号机组的轮廓终于出现在眼前。洛加乔夫和他的手下沉默地注视着那里。20 层楼高的建筑物，屋顶已经被掀开，整个上半部一片焦黑，分崩离析。落入眼帘的，是七零八碎的钢筋混凝土楼板和石墨砌块，以及从核反应堆芯抛射而出的亮闪闪的燃料组件金属封装。一团蒸汽云从废墟上袅袅升起，飘散入万里晴空。

然而，他们受命而来，要对核电站进行全面侦察。于是，装甲车开始以 10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逆时针绕着电厂综合体缓慢行驶。中士弗拉斯金大声报出新设备上的辐射读数，洛加乔夫随手标记在一张用圆珠笔和彩笔手绘的仿羊皮纸地图上：1 伦琴每小时，2 伦琴每小时，3 伦琴每小时。他们向左转了个弯，读数开始急速上升：10，30，50，100。

“250 伦琴每小时！”中士喊道，双目圆睁。

“上尉同志——”他开口说道，手指向辐射测量仪。

洛加乔夫低头看向数字仪表盘，立时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2080 伦琴每小时。一个根本不可能的数字。

洛加乔夫努力保持冷静，努力回忆教科书上的内容，努力克服自己的恐惧。但他接受的所有训练，此刻都跑到了九霄云外。上尉听见自己在恐慌中对着司机高声尖叫，担心装甲车会就此停驶：“你干嘛往这边走？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的脑子有病吗？”他吼道，“如果这玩意儿不动了，不出一刻钟咱们全都得死翘翘！”

### IV

#### 和平原子的秘密

1966 年 9 月 26 日，莫斯科的苏联部长会议 (the Soviet Council of Ministers) 签署命令，批准建造第一台新一代巨型水—石墨核反应堆，后来被以 RBMK 指代，全称是压力管式石墨慢化沸水反应堆 (reaktor bolshoy moschnosti kanalnyy)，或高功率通道型反应堆 (high-power channel-type reactor)。它由中型机械制造部的军用产钚发电两用反应堆“伊万 2 号”发展而来，是试验性的和平原子 1 号反应堆的直系后代，只不过规模放大了好几个量级而已。

直径 12 米、高 7 米的 RBMK 反应堆堆芯，是一个比两层楼还高的巨型圆柱体。构成它的，是由 1700 余吨起慢化作用的石墨砌块堆成的 2488 根彼此独立的柱子，每根柱子内部都有一个上下贯通的圆形通道。装在这些通道中的，是 1600 多根耐热锆合金压力管，每根压力管中都装着一对金属组件，其中封装着燃料棒：190 吨浓缩二氧化铀，被分别压缩进每个直径只有男性尾指大小的陶瓷芯块中。一旦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铀开始升温变热，释放出核裂变的能量，燃料组件便会从下方泵入堆芯的水所冷却。在巨大的压力下——69 个大气压，或 1000 磅 / 平方英寸——水会迅速升温到 280 摄氏度，转化为水和超高温水蒸气的混合物，然后从反应堆上部通过管道输送至巨型汽水分离汽锅。它们会将蒸汽输送至涡轮发电机发电，而剩下的水则回到冷却循环的起点，再一次流经堆芯。

反应堆的功率由 211 根注入碳化硼的控制棒来调控。这些控制棒大多数长约 5 米，可以被升高或插入反应堆堆芯，增加或降低核链式反应的速率，从而控制反应堆产生的热量和能量。为了保护电厂和员工不受辐射危害，反应堆的堆芯——“活性区域”——被一个巨大的环形水罐包围起来，外面又包有一层钢制外壳并以盛满了沙子的巨箱围住。所有这些，进一步被封装于深达 8 层楼的混凝土坑穴中，以排成王冠形状的填充了铁粒和蛇纹岩（一种能令中子减速的矿物质）的金属箱覆于其上。此外，还有一个直径 17 米、厚 3 米的生物屏障，这个被称为 E 结构——或昵称“叶连娜” (Elena)——的不锈钢鼓形结构，像一个巨大的盖子，牢牢地盖在坑穴上面。装满了鹅卵石、蛇纹岩和氮气的叶连娜，重约 2000 吨，相当于 6 架满载的大型客机，几乎完全靠重力作用保持在原位。从叶连娜体内穿过的，是作为燃料通道的管道，而在它的上面，则覆盖着上百根窄窄的管子，蒸汽和水从中流走。加盖在立式燃料通道之上的 2000 块可移动的钢包混凝土砌块，不仅藏住了叶连娜，也充当了反应堆大厅的地面。这个形如棋盘的金属圆圈，是昼夜运转不息的反应堆露在外面的脸，电厂的员工把它叫作“猪鼻子” (pyatachok) ——5 戈比硬币的昵称。

RBMK 反应堆是苏联式好大喜功的一个胜利，宣示着它的缔造者对于规模经济的不懈追求：它的体量是西方反应堆的 20 倍，可以制造出 3200 兆瓦的热能，或者说 1000 兆瓦的电量，足以让半数基辅居民家中灯火长明。苏联科学家宣称，它是苏联的“国家”反应堆，不仅使用独特的技术，而且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反应堆。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的光头所长亚历山德罗夫把 RBMK 反应堆的设计归功于自己名下，并向苏联专利局提交了保密发明的申请。在苏联，RBMK 反应堆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简称为 VVER、工程复杂度较高的水—水反应堆，因为它和美国人偏爱的压水反应堆十分相似，所以会被唱衰者贬称为“美式反应堆”。与 VVER 不同，RBMK 反应堆的部件可以在现有工厂中制造，不需要任何专门工具。它的模块化建造方式——

由数百个石墨砌块砌成石墨柱——也意味着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现场完成组装，并在必要时扩大规模增加功率。



年过八旬的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正在做讲座，照片中是他帮设计发明的核动力破冰船。亚历山德罗夫生在苏联大力发展核电，并且将 RBMK 反应堆的发明归于自己名下

通过免去安全壳建筑（containment building），亚历山德罗夫还省了不少钱。在西方几乎每一座反应堆四周，都会用厚厚的混凝土筑起一个半圆球体的安全壳，用于防范严重事故时放射性污染逸出电厂。但因为 RBMK 的体量十分庞大，建造安全壳的费用将会加倍。作为成本较低的解决方案，反应堆被分成了 1600 个压力管，在各自薄薄的金属外壳中容纳一对燃料组件。这一方案的发明者宣称，这是一种可以和拜占庭文明的排水管道系统相媲美的技术胜利，让发生严重事故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他们还设计了一个事故抑制系统，可以在一到两根压力管同时破裂的情形下安全应对局势，让释放出的高压放射性蒸汽——通过一系列阀门——安全地排放到地下室中的巨型水箱中冷却并安全地封阻起来。

压力管破裂是设计师们预想中 RBMK 反应堆有可能遇到的最严重的事故之一，也即所谓的设计基准事故（maximum design-basis accident）。这类事故还包括其他一些可能发生的灾难，比如地震和飞机撞上电厂，或是反应堆冷却回路中的大口径水管之一完全破裂，从而令堆芯供水中断，触发堆芯熔毁。为了防止最后一种情形出现，设计师们设计了一个由压缩氮气供能的紧急冷却系统，而核电工业从上到下每一级的每一个反应堆操作员，都要反复演练，以确保不惜任何代价保证堆芯持续供水。

当然，更糟糕的事故在理论上也可能发生：工程计算表明，如果 1600 个压力管中超过 2 根——哪怕只是 3 到 4 根——压力管同时破裂的话，瞬间释放出的高压蒸汽就可能将 2000 吨的叶连娜和“猪鼻子”掀离原位，切断剩下的每一根蒸汽管和压力管，导致一场破坏力惊人的爆炸。然而，设计师们觉得没有必要为这种情况做出准备，在他们看来，那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以外的事。不过，他们还是为这种情况起了个名字，超设计基准事故（beyond design-basis accident）。

中型机械制造部下令，由列宁格勒一家同时也制造坦克和拖拉机的重型机械制造厂来起草 RBMK 反应堆的第一份草图。但收到项目蓝图后，中型机械制造部却以技术不过关为由拒绝了它们。一位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科学家警告说，这个设计太危险了，不能用于民用。另一位科学家则意识到，正空泡效应的风险会令新的反应堆本质上极易爆炸，尽管他的上级试图因为他的不同看法而将其赶出研究所，但他仍然到处写信反映问题。这些信件最后均送到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那里。

然而那时，仍坚持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不可动摇的苏联政府，已经下令开始建造 4 座新型大规模反应堆。于是，能源技术科学研究所与设计院（NIKIEI）的设计师仓促之下只好全面修订 RBMK 的图纸，将它从一个战争狂人式的既可产钚又能发电的两用反应堆，改为性格温驯的为民用电网发电的反应堆。将这些修改一一化为现实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所需时间远远超出预期——还处于原始状态的苏联计算机技术，令估算反应堆预期表现的工作耗费了大量人力，而得到的结果也相当不可靠。直到 1968 年，如今被命名为 RBMK-1000 的新反应堆设计才最终完成。因此，为了节约时间，中型机械制造部决定彻底略过原型阶段：想要知道新的反应堆在工业发电中的表现如何，最快捷的办法就是让它们直接投入大规模生产。

1970 年，在列宁格勒郊外，中型机械制造部位于芬兰湾（Gulf of Finland）的一处设施之上，全苏联第一座 RBMK 反应堆开始动工兴建。与此同时，基辅的两家技术和经济研究所也开始为乌克兰境内的第一座核电站选址，并迅速将范围缩小到了两个地方。提议的第一个站址后来被用于建造化石燃料电厂，乌克兰部长会议随即下令，乌克兰共和国全新的 2000 兆瓦原子能电站，将在另一处建造：基辅地区科帕奇（Kopachi）村旁边的一大片沙堤，离切尔诺贝利镇只有 14 公里。

列宁格勒电站的第一个 RBMK 机组于 1973 年 12 月 21 日正式启动，正好赶在全苏

联“电力人”（energetiki）欢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全国性节日“电力工程师日”的前一天。两位自豪的 RBMK-1000 之父，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亚历山德罗夫和能源技术科学研究所与设计院的尼古拉·罗列扎利，都在现场目睹着机组开始运转。这时候，列宁格勒的第二个 RBMK 机组也在建造过程中，切尔诺贝利和库尔斯克的建筑工人们也已经开始为建造 RBMK 核电站破土动工。但第一座列宁格勒反应堆还未开足马力之前，一个事实便已经变得很明显：RBMK 设计师们将项目迅速上马、投入全面生产的决心，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严重的设计缺陷从一开始便困扰着 RBMK 反应堆。许多问题迅速浮现，而另一些问题过了许久才暴露出来。

第一个问题源自正空泡效应。这个缺陷令苏联的石墨—水反应堆极易在冷却剂流失的情况下发生链式反应失控，而在 RBMK 反应堆中，降低反应堆运行成本的那些举措，令问题进一步恶化。为了让 RBMK 反应堆同化石燃料电站相比更有竞争力，它被刻意设计为令铀燃料燃烧产生的电力输出最大化。在列宁格勒一号机组启动后，设计师们发现，当更多的燃料参与燃烧时，正空泡效应会恶化，而运行的时间越长，反应堆就越难以控制。在 3 年的运行周期即将结束、需要停堆进行预防性的机组维护之时，RBMK 反应堆将处于最不可预测的状态下。设计师们做了修正，但这种不稳定性依然存在。然而，亚历山德罗夫和多列扎利都不打算对这些问题刨根问底，甚至并不完全理解这些问题，因此，在反应堆的操作手册中，并没有提供任何与空泡效应有关的安全分析。在列宁格勒进行的试验，结果已经很明显：理论上预计的反应堆运行表现，与实际中的情况有很大差异。但设计师们决定不过分追究这些结果。即便在投入全面商业运转后，依然没有人知道，在发生大型事故时，RBMK 反应堆会如何反应。

反应堆的第二个弱点，源自它的庞大体量。RBMK 反应堆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堆芯某个区域的反应性经常与另一个区域的反应性仅有松散的联系。操作人员在控制反应堆时，不得不视其为几个合在一起的单独反应堆，而不是一个整体。一位专家将它比作一栋巨大的公寓楼，某一家或许正在热热闹闹地欢庆婚礼，隔壁那家却在为葬礼守夜。孤立的反应性热点可能会深藏在堆芯底部，很难被察觉。这个问题在反应堆启动和停堆期间尤为显著，当反应堆以低功率运行时，检测堆芯内部反应性的系统会变得不那么可靠。在这些关键时期，那些在控制室值守的工程师几乎对发生在活性区域中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不得不凭借着“经验和直觉”估测堆芯的活跃程度，而无法依赖设备上的显示数字。这使得启动和停堆成为 RBMK 操作中最考验能力也最危险重重的阶段。

第三个缺陷，存在于作为预防事故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反应堆紧急保护系统之中。如果操作人员遇到需要紧急停堆的状况，比如重大冷却剂泄露事故或反应堆失控，他们可以按下“紧急停堆”按钮，激活该机组俄文缩写为 AZ-5 的五级快速降功率系统的最终阶段。按下这个按钮，会将专门的一组 24 根吸收中子的碳化硼控制棒，以及当时处于抽出状态的余下 187 根手动或自动控制的控制棒，全部同时插入反应堆堆芯，全面终止整个反应堆的所有链式反应。然而，按照设计，这个 AZ-5 应急机制并不是要让反应堆骤然紧急停堆。多列扎利和能源技术科学研究所与设计院的技术人员认为，突然切断反应堆产生的电力，对于苏联电网的运行具有破坏性。此外，他们也认为，只有在对电厂的外部供电完全中断——这种极其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此种即时停堆才有必要。因此，他们设计了只会缓慢将反应堆功率降至零的 AZ-5 系统。为这个系统提供动力的，并非专门的紧急发动机，而是与手动控制的反应堆控制棒共享同一套电动伺服系统。在反应堆正常运作期间，操作人员使用这些手动控制的控制棒调整反应堆的功率。要将这些 AZ-5 控制棒从反应堆上方完全抽出的位置彻底插入堆芯，需要 18—21 秒的时间。设计师们希望，控制棒缓慢的插入速度可以通过其庞大数量予以弥补。但在中子物理中，18 秒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在一个处于高度正空泡效应下的核反应堆里，这几乎相当于永恒。

除了这一连串令人不安的重大设计缺陷，反应堆的建造也受到了苏联工业蔓延成风的偷工减料和粗制滥造的负面影响。列宁格勒一号反应堆的燃料组件卡在了燃料通道中，不得不送回莫斯科反复测试，反应堆的全面启动因此推迟了将近一年。在其他的 RBMK 反应堆中，本应用于调节 1600 余个充铀燃料通道的关键供水的阀门和流量计，被证明极其不可靠，控制室中的操作人员经常完全不知道反应堆到底被冷却到了何种程度，或者究竟有没有冷却。事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1975 年 11 月 30 日夜里，就在列宁格勒核电厂一号机组投入全面运行一年，定期维护后重新运行发电入网时，它开始失去控制。AZ-5 紧急保护系统启动了停堆，但在链式反应停下来之前，便已发生了堆芯部分熔毁，32 个燃料组件全部或部分受损，辐射物质释放到了芬兰湾上空的大气中。这是与 RBMK 反应堆有关的第一起重大事故，为此中型机械制造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其后，官方统一口径宣称，是一个制造缺陷导致某个燃料通道受损。但委员会了解的真相却完全不同：这起事故是反应堆固有设计缺陷的结果，罪魁祸首正是蒸汽空泡效应不受控制的急速增加。

中型机械制造部把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压了下来，并掩盖了事故真相。其他 RBMK 核电厂的操作人员，从来没有被告知过这起事故的真实原因。然而，委员会还是给所有的 RBMK-1000 反应堆提出了一些重要改进建议：研发新的安全管理机制，在冷却剂流失时对其进行保护；对堆芯蒸汽急速增加时的事态发展进行分析；设计一个反应速度更快的紧急保护系统。尽管这从表面上看起来郑重其事，但反应堆的设计师们却没有对任何一个改进建议做出实际回应，而随后，莫斯科还下令建造更多的反应堆——就在列宁格勒堆芯熔毁事件发生第二天，苏联部长会议最终批准在切尔

诺贝尔建造第二对 RBMK-1000 机组，并将这座核电站的预计发电能力增加到惊人的 4000 兆瓦。

1977 年 8 月 1 日，已经比预计工期晚了两年的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一号反应堆，终于进入临界状态。这时，离维克托·布留哈诺夫见证第一根奠基桩打进普里皮亚季旁冰雪覆盖的大地中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 7 年多。为乌克兰共和国第一座核电站并网发电进行准备工作的年轻的核电厂操作人员，一个个都自豪极了。在第一批燃料组件被装载，反应堆缓缓开足马力，并最终连接上变压器的那段时间，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以继夜，加班加点。9 月 27 日晚上 8 点 10 分，乌克兰第一批核电流入 110 千瓦和 330 千瓦的电线，随后汇入整个苏联电网，库尔恰托夫研究所、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的科学家和设计师以及电厂的专家一道引吭高歌：“就在今朝，就在今朝，来自 RBMK 的电流奔涌如潮！”

然而，切尔诺贝尔的操作员很快发现，让他们竭尽心力的这座反应堆，是一个朝秦暮楚、说翻脸就翻脸的小情人。RBMK 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令其极难驾驭，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的工作不仅需要动脑，还相当耗费体力。每分钟要做出几十次调整，他们几乎一直脚不停步，经常像挖沟的工人一样汗流浃背。有传言说，在列宁格勒，值守控制台的中型机械制造部的反应堆工程师人数增加了一倍，以“双人舞”的方式应付这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反应堆操作人员需要用力地在控制板上进行操作，因此控制棒的开关很快就会磨损，必须经常更换。一位前核潜艇军官第一次坐在切尔诺贝尔一号机组的操控台前时，他完全被反应堆的庞大体量和操作手段的原始落后惊呆了。

“你们怎么可能控制得了这么一大坨屎一样的东西？”他问道，“这玩意儿怎么会用于民用？”

第一次维护停堆时，切尔诺贝尔的操作人员发现，反应堆中像蛇一样往复盘绕的管道，满是各种缺陷：水—蒸汽冷却剂管道锈蚀了，燃料通道上的锆—钢接头松开了，而且设计师没能建造任何可以防范反应堆给水系统故障的安全系统，最后，切尔诺贝尔的工程师们不得不自行设计并组装了一个凑合用。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反应堆设计师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继续发现了更多恼人的缺陷。

1980 年，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完成了一项保密研究，列出了可能损害 RBMK 反应堆安全性的 9 项重大设计缺陷和热工水力学不稳定性现象。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事故不仅会在罕见和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发生，就是在日常操作中也有可能出现。然而，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重新设计反应堆的行动，或是对电厂员工发出可能发生危险的警告。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没有设计建造新的安全系统，只是简单地修改了一下 RBMK-1000 反应堆的操作指令集。在军用反应堆运作几十年无事故的情况下，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和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大佬们显然认为，一套精心编写的操作手册足以确保核安全。设计师们认为，只要严格遵循新的操作指令集，人可以和电厂中的机电安全系统一样，做出及时且可靠的反应。

然而，面对日益加码的生产指标和经常性机械故障或设备短缺，同时被要求对官僚体制的瞎指挥和乱命令永远唯命是从，苏联核电厂的员工们早就已经习惯了，或是无视那些规章制度，或是蒙混过关，只求完成工作。而且，他们从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那里拿到的更新过的指令集，既不清晰明了，也缺乏解释。其中一个新指令要求，某个最低限额的控制棒应当一直处于堆芯内部——但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并没有强调，对这个简称 ORM 的运行反应性裕量 (Operational Reactivity Margin) 的最低限额，是旨在防止重大事故发生的关键安全预防措施。因为不知道这些规定到底为什么如此重要，操作人员继续像往常那样工作，无视违反规定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与此同时，在苏联境内每一座核电站发生的每一起事故，都继续被当成国家机密，甚至连事故发生地的专家们都被蒙在鼓里。

1982 年 9 月 9 日傍晚，尼古拉·施泰因贝格尔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的办公室位于切尔诺贝尔一号机组和二号机组之间的 3 层楼上，可以俯瞰两个反应堆共用的通风烟囱。35 岁的施泰因贝格尔，留着短短的山羊胡，颇为帅气迷人，从 1971 年便开始在切尔诺贝尔工作，那时候，他刚刚从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 (Moscow Power Engineering Institute) 的核热工水力学专业毕业，是新一代满怀热情、雄心勃勃的“原子人”(atomshchiki) 之一。在第一批 RBMK 反应堆建成之前，他已经在大学里花了两年多专门学习相关知识。他亲眼看着切尔诺贝尔电厂的头两个机组拔地而起，如今则在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的涡轮发电机部门担任负责人。当施泰因贝格尔看见蒸汽从通风烟囱顶部冒出来时，他知道，麻烦来了：至少有一根反应堆内部的管道破裂了，肯定发生了辐射释放。他拿起了电话。

但他接通一号机组控制室，警告那里的操作人员停闭反应堆时，当班的主管却完全不当一回事。虽然施泰因贝格尔一再坚持，但这位主管却挂断了他的电话。随后，施泰因贝格尔召集了自己的手下，等待响应紧急情况。但一直没有电话打过来。几乎等了 6 个小时后，临近午夜时分，他和手下员工才坐上车回到普里皮亚季的家中。第二天早上回工厂上班，施泰因贝格尔才听说，一号机组的确出了问题，然而，尽管他职位颇高也富有经验，却无法再知道更多详情。布留哈诺夫厂长和电厂的总工程师开始时坚称，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反正没有导致任何放射性元素释放。当地的克格勃官员采取了措施，“防止制造恐慌、散布谣言和其他负面影响”。事实上，

放射性污染先是被风吹走，接着随着雨一道落下，不仅波及普里皮亚季城，甚至散到距离电厂 14 公里远的地方。这些放射性元素包括碘 131、二氧化铀燃料碎片和含有锌 65 和锆—铌 95 的热粒子，预示反应堆堆芯发生了部分损毁。在距离核电站 5 公里远的克里斯托加罗夫斯卡 (Chistogalovka)，辐射水平比正常情况高出了数百倍。但苏联核工业联合会 (Soyuzatomenergo) ——苏联原子能权威机构——派来的小组不同意这些发现。电厂附近的污染区域被马上放水冲洗，再用土壤和落叶掩盖起来。在普里皮亚季，污染清理车在街上遍洒泡沫，列宁大道上也不动声色地重铺了一层沥青。

后续调查显示，一号机组发生了堆芯部分熔毁。反应堆在维护后重新并网发电时，一个气动冷却阀仍然处于关闭状态，燃料通道中的铀燃料过热，于是发生了断裂。没有人在事故中死亡，但造成的损坏却花了 8 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修复。工人们用桶把反应堆石墨砌块一桶一桶地运走，这令他们暴露在相当大剂量的辐射之下。电厂总工程师承担了责任，被降级调往保加利亚任职。这一事件被划为绝密，直接牵涉其中的人被克格勃勒令签署封口协议。要到很多年之后，尼古拉·施泰因贝格尔才了解到事实的真相。

之后几年中，苏联其他地方的核电厂可能还发生过更严重的事情，但所有这些都被掩盖起来了。1982 年 10 月，亚美尼亚梅查莫尔 (Metsamor) 核电厂一号反应堆的一个发电机爆炸，涡轮大厅被烧塌，官方不得不从 3000 多公里外、位于北极圈内的科拉半岛 (Kola Peninsula) 空运一个应急小组来帮忙保住堆芯。不到 3 年后，在俄罗斯巴拉科沃 (Balakovo) 核电厂第一座反应堆的启动过程中，一个泄压阀爆开，300 摄氏度的超热蒸汽逸入反应堆并周围的环形腔室，14 个人被活活烫死。两起事故都秘而不宣，其他核电站的操作人员只能从原子内部流传的小道消息和《真理报》(Pravda) 上的闪烁其词中猜出一二。

然而，在所有这些危险重重的隐瞒机制中，最严重的一例，再次来自位于莫斯科的苏联核设计中枢——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RBMK-1000 的孕育之地。1983 年，在这种反应堆投入运行后已经浮现出来的一系列缺陷之外，反应堆设计师们又得知了一个新问题：AZ-5 紧急保护系统的控制棒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设计缺陷。那一年年底，在两座最新的 RBMK 反应堆，立陶宛的伊格纳利纳 (Ignalina) 核电厂一号机组和切尔诺贝尔的四号机组，开始物理启动、向苏联电网输电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首个确凿证据出现了。

在两座反应堆投入正常运转前的一系列测试中，伊格纳利纳和切尔诺贝尔负责反应堆启动的核工程师们，注意到了一个不大但很令人困惑的小故障。当他们使用 AZ-5 紧急停堆按钮停闭反应堆时，控制棒开始下沉到堆芯中。然而，这些控制棒非但没有顺顺当当地完成停堆，在开始阶段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反应堆的功率不降反升。专家们发现，这种“正紧急停堆效应”(positive scram) 的严重程度与停堆开始时反应堆的内部条件有关，尤其是标志着 211 根控制棒中有多少根被从堆芯中抽出的运行反应性裕量 (ORM)。如果紧急停堆开始时，还有超过 30 根控制棒插在堆芯中，AZ-5 机制就可以按预期发挥作用，反应堆将会快速且安全地完成停堆。但当插入控制棒的总数少于 30 根时，反应堆在停堆时的行为则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AZ-5 系统也就无法轻轻松松发挥作用。当只有 15 根控制棒插入时，技术人员发现，这对反应堆内部裂变的初始减缓作用微乎其微，需要等上 6 秒，反应性才会开始下降。而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插入控制棒少于 7 根，按下 AZ-5 按钮不但不会令反应堆停堆，还会触发失控链式反应。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启动 AZ-5 停堆后，反应堆的功率便会增加到停不下来的程度，直到整座反应堆被摧毁为止。

正紧急停堆效应的源头，是控制棒的自身设计。这是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热切渴盼“节约中子”、令反应堆运行更有效率的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和所有正常操作时用于操控反应堆的手动控制棒一样，AZ-5 紧急控制棒含有碳化硼，一种可以大口吞噬慢中子，从而减缓链式反应的中子毒物 (neutron poison)。但即便是完全从注水的控制通道中抽出，按照设计，控制棒的尖端仍会处于反应堆的活性区域中，保持待命状态。这时候，如果控制棒尖端含有碳化硼，则由此产生的中毒效果会导致电力输出轻微却持续下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控制棒的尖端有那么短短一段，由可以帮助裂变的中子慢化剂石墨制成。当启动紧急停堆、AZ-5 控制棒开始下降到控制通道中时，石墨取代了可以吸收中子的水，结果就是在开始阶段，反而会导致堆芯反应性增加。只有当较长的控制棒充硼部分继石墨尖端之后进入通道时，才会开始减缓反应性。

芯的下半部分生成局部临界，尤其是当反应堆处于低于半功率运行状态，而操作人员启动 AZ-5 系统停闭反应堆时。

出于担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核反应堆部门负责人，给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写了封信，详细列出 AZ-5 系统中的这些反常现象，表示需要对这些现象进行更密切的观察研究。他警告说，“看起来，一次更深入彻底的分析可能会揭示其他危险的情况”。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的总设计师尼古拉·多列扎利大包大揽地回复道：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已经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尽管对 AZ-5 运行机制做出的某些局部修改得到了审批，但这些修改代价巨大且相当不便，因此仅被零打碎敲地加以实施，每次仅有一座 RBMK 反应堆接受改造。切尔诺贝尔一号机组、二号机组和三号机组都逐渐通过了改造，但即将完工的四号机组要等到 1986 年 4 月首次常规维护之后，才轮得上。

与此同时，能源技术科学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通知，提醒所有 RBMK 核电厂高级管理人员注意正紧急停堆效应。然而，混杂在雪片般纷飞的官僚主义文件材料中，再加上措辞神秘、欲说还休，这些消息从来就没能传到反应堆操作人员的耳中。不管怎样，对于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和其他核工业高官来说，令人望而生畏的 RBMK-1000——苏联的国家反应堆——只不过遇到了一些暂时性的小挫折而已。1983 年的最后一天，当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在确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原子能电站四号反应堆最终完工的文件上签名时，全世界人民只知道一起核事故。而这一奇耻大辱，完全属于美国。

1979 年 3 月 28 日清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 (Harrisburg) 附近的三里岛 (Three Mile Island) 核电站，少许——比芥菜籽还细小、净水用的——树脂颗粒堵住了二号反应堆第二冷却剂回路的一个阀门。在接下来的 24 小时中，这个小小的设备故障层层放大，再加上人为失误，导致了严重的冷却剂外流，并令堆芯部分暴露。反应堆开始熔毁，数千加仑的放射性污水污染了安全壳建筑。员工们别无选择，只好将放射性气体直接排入大气。尽管没有人因为泄漏的辐射受害，泄漏出的半衰期很短惰性气体同位素全部汇集为一团云，飘向了大西洋上方，但是关于这起事故的新闻报道还是导致了普遍恐慌。13.5 万名从家中逃离的宾夕法尼亚州居民，把三州交界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曾在美国海军担任核工程师、知道核灾难为何物的吉米·卡特总统，亲自前往现场。对于在此前几十年便已逐渐积蓄力量的国际反核运动来说，要说明危险技术的脱缰之害，再没有比这更能激起民众恐惧情绪的反面典型了。在美国，核电工业的发展，本来就已经因为不断上涨的建造成本和日益增加的公众疑虑，而步履维艰，此时更是几乎一夜之间陷入停滞。

尽管这件事让美国大失颜面，但关于三里岛的新闻在苏联内部却被审查限制，因为担心可能破坏表面上完美无瑕的和平原子的记录。在公开场合中，苏联官员将事故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失败。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职位仅次于亚历山德罗夫——的二把手，瓦列里·列加索夫院士，发表了一篇文章，坚称三里岛事件与苏联的核工业无关，因为苏联的操作人员更训练有素，而且核安全标准比美国更高。私底下，苏联物理学家们开始分析原子能电站发生严重事故的可能性，对现有的核安全规章制度进行修正。但无论是中型机械制造部，还是能源技术科学研究所与设计院，都没有采取任何举措对 RBMK 反应堆进行调整，使其符合这些新的规定。

1986 年 1 月，新一期的《苏联生活》 (Soviet Life) 杂志，刊登了一篇——以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为典型的——长达 10 页的特别报道，对核能创造的奇迹大加赞颂。这本光鲜亮丽、以英文出版的杂志，看起来十足就是一本美国出版物，但它的出版方实际上是苏联驻美大使馆。特别报道中包括了对“因原子而生”的普里皮亚季城的居民的采访、电厂的彩色照片，以及微笑着的电站员工。列加索夫与人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宣称“从第一座苏联核电厂开始运行至今的 30 年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令电厂员工或附近居民严重受威胁的事故，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导致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的正常操作故障”。

在另外一次采访中，乌克兰能源与电气化部长维塔利·斯克利亚罗夫向读者打包票说，电厂发生堆芯熔毁的可能性“一万年都遇不上一次”。



本文摘自《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英] 亚当·希金博特姆 Adam Higginbotham  
鲁伊 译  
中文版将于 2021 年 3 月出版



亚当·希金博特姆

1968 年生于英国，《纽约客》《连线》《史密森尼》《纽约时报杂志》主笔。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这个栏目节选自英国著名记者亚当·希金博特姆的非虚构著作。中文版将于 2021 年 3 月出版。



1933年5月，学生在焚烧“非德意志”书籍，图片来自  
NIOD, Amsterdam (Beeldbank WO2)

## 非虚构

#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 发现经典

即使在私人生活中的避难所，  
我们也不断受到穷追猛打。

**编者按：**哈夫纳《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和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写了同一个过程：从1929年开始，纳粹就在不断地试探人性，既试探人性的软弱，也试探人性的邪恶，可悲的是在这两个维度，（普遍意义上的）人性都没有经住种种试探，于是他们可以一路向前，把列车顺利开至奥斯维辛。我们选摘的这部分，就是这辆列车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开端。

### 23.

#### 柏林高等法院的沉沦

时间已经到了1933年3月31日，可是仍看不出隔天即将出现严重的状况。人们把报纸从头到尾仔细翻阅一遍，想找出事趋和缓的蛛丝马迹，巴不得时局至少能够转圜到不那么离谱的地步。然而一切都只不过是白费功夫而已，局势不但显得更加尖锐化，而且报上有模有样地刊出了行动方针，点出了执行的细节以及个人应当采取的动作。

除此之外，凡事都跟过去相差无几。街头仍旧充满了汲汲营营的匆忙步调，一点也不像是有特殊事件正在蓄势待发的样子。犹太商店也照常开门营业，因为当天还没有不准百姓入内购物一禁令要从第二天上午八时起才会开始生效。

我依旧前往高等法院。它和往常一样灰暗冷漠，完全不受干扰地巍巍耸立于路旁的草坪和树丛之后。律师依例穿着飘动的丝质黑色长袍，就像一只又一只蝙蝠似的快步通过辽阔的长廊和大厅。他们的手臂夹着公文包，聚精会神露出严肃的面部表情。犹太律师也如期出庭辩护，仿佛那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

我带着卷宗夹进入图书馆，找了一张长长的阅览桌把资料摊开来，也表现得仿佛那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罢了。当天我不必出庭，但是必须根据那些资料撰写一份鉴定书，其来龙去脉颇不单纯，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我费尽力气把一本又一本厚厚的案例论集搬到桌上，然后坐在它们后面埋头苦干，一面翻阅法院的判例，一面仔细做笔记。巨大的阅览室与昔日相同，于宁静中传来纸张隐约的沙沙声，表示有许多人正潜心用精神来干活。当众人持笔在纸上龙飞凤舞的时候，其实就是用

无形的刨子和锉刀来精雕细琢一个法律案件，进行归纳比较，逐字推敲一份文件的用语，并试图查明相关法律条文可适用至何种程度。接着，纸上又仿佛医师动手术时划下的一刀，出现了一连串潦草的字迹。这时或有一个问题获得了澄清，或是在判断某要素时发现了眉目。那当然仍非最后的判决，而是诸如“原告……之举措似极为不妥，如今应对……详加探究”之类的句子。

这是一些非常谨慎、精确和沉默的工作。人在大厅内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处理自己的事务。连那些身兼杂役和法警的巡查人员，也在图书馆内放轻脚步，尽量让人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大厅内阒然无声，可是在此宁静之中却又弥漫着活动繁忙的极度紧张气氛，宛如一场无声的协奏曲演奏会。我非常喜欢这种气氛，因为它十分紧凑且大有裨益。比如某天，我恐怕很难在家中的书桌前面做出任何名堂来，可是在图书馆内却简单得很，而且我可以全神贯注。这里就像是座要塞，不对，这里就像是一个蒸馏器，外面的空气根本无法进入。更何况这里没有革命。

突然传来一声令人侧目的噪音，那是什么？是有人猛然把门撞开，还是口齿不清的尖锐呼叫声——有人在发号施令？在场者都在一瞬间吃惊地将头扬起，面露紧张神情想听出苗头来。大厅内依然安静无比，可是其本质出现了改变，那已经不再是工作中的宁静，而成为畏惧与惊慌所带来的死寂。

室外的走道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正有一票人马堂而皇之地从楼梯跑上来。接着，远远听得见响个不停的喧闹声、呼叫声及推门声。有几个人忍不住起身过去把门打开，探头向外张望几下之后又走了回来。也有些人步向巡佐，依旧压低了声音与他们交谈——在阅览大厅内只准轻声谈话。室外的噪音则越来越响亮。有个人发出声音打破了宁静，说道：“冲锋队。”随即另外一人以中度音量表示：“他们正准备把犹太人撵出去。”还有两三个人听了立刻大笑起来。这阵笑声比当时实际发生的事件还要来得令人震惊：它立刻令人难以置信地发现，原来连阅览大厅里面也都坐着纳粹党徒。

原本只是若有若无的骚动不安，逐渐变得越来越令人无法充耳不闻。人们纷纷打断工作站了起来，或彼此交头接耳进行讨论，或漫无目标四下走动。有一位显然是犹太人的读者不发一语合上书本，非常仔细地把它们逐一放回书架，收拾完毕自己的卷宗以后便走了出去。很快就有一个人看来像是巡查长的法警站在门口，他以审慎的语气对着室内大声喊道：“冲锋队已经冲入司法大楼，犹太裔的先生们今天最好暂时避避风头，赶紧离开此地。”

我们同时听见外面有人耀武扬威地喊道：“犹太人滚出去！”室内有个声音响应道：“早就滚了。”这时再度传来刚才那三个人喜滋滋的呵呵笑声。我瞄了一眼，这才赫然发现他们竟是和我一样的法院见习生。

此情此景令我在惊愕之余，猛然回忆起四周以前被人暴力驱散的嘉年华舞会——当时驱散的情形和现在并没有两样。许多人收拾卷宗夹匆匆离席，这又让我联想起“我并不反对你们回家”那句话。他们果真还能够顺利回家吗？今天的局面看起来已不再是那么理所当然。其他人则把自己的东西留在桌上，干脆走出去看热闹。巡查人员则表现得比以往更加让人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留下来的读者当中，有一两个人甚至大摇大摆点燃香烟——就在高等法院的图书馆里面！巡查人员完全不敢开口，所以这也是革命的一环。

后来那些“观光客们”对他们在司法大楼内的所见所闻作出了描述。没有关于暴力的报道，哦，完全没有。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平顺，只不过大多数的开庭工作显然都临时取消了。那些法官脱下了自己的长袍，低声下气地穿着便衣离开司法大楼。当他们走下阶梯时，两侧列队站立着“冲锋队员”。只有在律师休息室里面，动作才变得比较激烈。例如有一位犹太律师在那边“装腔作势”，结果被痛殴了一顿。后来我才晓得那位律师是什么人：他不但曾经在大战时负伤五次并瞎了一只眼睛，而且还因功晋升为上尉。他很可能仍然保留了军官的本能，在士兵哗变时立即加以喝止，结果便惨遭厄运。

那些闯将也来到了我们这边。他们猛烈地把门推开以后，立即涌入一群褐衣人。其中一个样子像是领队的家伙，直挺挺地以洪亮的声音吆喝道：“‘非雅利安人’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场所！”我注意到，当他使用了“非雅利安人”这个特定用语之后，接着又说出了非常不具体的“这个场所”一词。这时，显然是跟刚才同样的一个人又回应道：“早就滚了。”

我们的巡查人员只是站在那边，摆出只是要伸手把帽子扶正的动作。我的心跳不禁加快起来，现在该做什么？要怎么做才不会有失自己的尊严呢？我决定不予理睬，让自己完全不受干扰！于是又朝着我的卷宗低下头来，机械化地阅读自己写下的句子：“被告之陈述虽不正确，然亦无足深究……”反正不要理会他们就对了！

一个身穿褐色制服的家伙朝着我走来，站在我的面前劈头就问：“你是雅利安人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的。”他用检视的目光望了望我的鼻子以后就走开了。这时我的脸部涌上一股热血——我慢了半拍才领悟到，自己已经蒙受奇耻大辱并打了败仗，因为我说了“是的”！我固然是“雅利安人”无疑，所以我并没有撒谎。只不过我让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竟然对着一个无权向我问话的人，很屈辱地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表明自己是“雅利安人”（虽然我把这个名称视同草芥）。但最可耻的事情就是，我用那个答案换来现在可以继续不受打扰坐在卷宗后面！尤有甚者，当我面对第一次考验时就失败得一塌糊涂！我真想打自己一记耳光。

当我离开高等法院的时候，它仍然和往常一样灰暗冷漠，完全未受干扰地巍巍耸立于路旁公园的树丛之后。没有人看得出来，这个机构不久之前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或许也还没有人看得出来，我刚刚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那个耻辱很难洗刷。一个穿着体面的年轻人就这么安安稳稳地沿着波茨坦大街行走。马路上也看不出任何异状。一切都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不可知的事物正弥漫于空气之中，一步步向我们继续逼近……

## 29.

### 三种“置身事外”的诱惑

无论如何，“置身事外”的做法，就是当时在诱惑之下所形成的普遍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自从 1933 年以来，德国已经重复出现了千百万个精神病理学案例，而“置身事外”的现象即为此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一环。就正常人的眼光观之，大多数德国人今天若非罹患了精神疾病，至少也处于严重的歇斯底里状态。如果人们想了解为何会演变成这种局面，就必须设身处地想象一下不赞同纳粹的人——也就是居于多数的德国人——于 1933 年夏天所面临的奇特状况，以及其令人诧异的反常矛盾心理。

不赞同纳粹的德国人在 1933 年所处的境地，可说是任何人所能够碰上的最艰难遭遇。人们已经找不到出路，受到完全的钳制，各种出人意料的冲击，更带来了极度的震撼。纳粹已将吾人紧紧抓在手中，可以恣意妄为。所有的阵地均告陷落，任何集体抗拒行动都变得毫无可能，个人的抵抗更只不过形同自杀而已。即使在私人生活中的避难所，我们也不断受到穷追猛打。各个生活领域均已崩解，出现了漫无止境的溃散逃窜。同时，每天都有人向我们提出要求：并非劝我们投降，而是要我们变节。只要与魔鬼缔结一个小小的盟约，我们就不再是囚徒及被追赶的对象，反而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胜利者与加害者。

这是最简单粗浅的诱惑，许多人就此陷入其壳中。随后的发展却往往显现出来，他们未免过于低估了自己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而且根本就无法成为真正的纳粹。这



图片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成千上万的人今天就在德国来回奔波，成为良心不安的纳粹。他们佩戴着党徽，正如同当初身披君王紫袍的麦克白<sup>[1]</sup>，陷入两难而无法自拔，必须一再接受良心的谴责。他们四下张望，寻觅脱身的机会而不可得，结果只能喝喝闷酒、服用安眠药，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他们已经不再清楚，究竟应该盼望纳粹时代——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时代！一赶快结束，还是担心那个时代终将成为过去。不管怎么样，等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悔不当初。可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这些人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梦魔，再加上其道德观点及精神状态均已错乱，没有人晓得他们在倒下去以前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他们的故事其实还没有真正被写出来。

除了这个最粗浅的诱惑之外，1933 年还出现了许多种其他的诱惑形式。其中的任何一种皆足以使身陷其中的人变得疯狂，或者罹患精神疾病。这是因为魔鬼拥有许多不同的网：网格粗的拿来捕捞大而化之者，网格小的则用来对付心思细密的人。

谁要是拒绝当纳粹，就必须准备面对凄苦的前景：他将山穷水尽，只能坐以待毙；他必须每天忍气吞声，承受各式各样的奇耻大辱；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令人发指的事物不断上演；他将流离失所，受尽漫无边际的折磨。可是，这种恐怖的状况居然能够产生诱惑力——在自我安慰与自我麻醉的外衣之下，已经暗藏了魔鬼的各式圈套。

较年长的人比较容易落入第一种圈套，那就是逃避到幻想世界。他们喜欢自命不凡，把自己幻想成高人一等。凡是落入这个圈套的人，眼中只见纳粹于掌权之初所呈现

的半吊子和不专业作风。他们每天借此向自己和别人提出证明，表示一切都不可能照着这个样子长久进行下去。他们摆出一副比别人更有概念、等着看好戏的姿态。他们对纳粹妖魔般的行为视而不见，只是把目光集中在儿戏和瞎胡闹的部分。他们自我欺骗，刻意表现得趾高气扬、袖手旁观，借此来掩饰自己的全然束手无策。每当他们有新的闹剧或《泰晤士报》上面的报道可供引述时，便觉得信心十足，更加沾沾自喜。

这一种人起初心平气和、志得意满，接着就极力自我陶醉，月复一月地预言纳粹政权不可避免的覆亡。可是，等到那个政府显然已经站稳脚跟，而且开始获得成功以后，这才发现情况的确不妙——他们可没有对此作好准备。这群人正是纳粹在随后几年内运用巧妙的心理策略，以各种自我吹嘘的统计数字来主攻猛打的对象。1935 年至 1938 年间许许多多的归顺者，主要也就来自他们那边。自从被视为不可能的成就一再出现以后，他们再也无法摆出洋洋得意的姿态，只得承认失败而集体投降。此后他们即力不从心，无法再认清纳粹的那些成就实为最恐怖之处。像我在 1938 年便听过如此的对话：“他<sup>[2]</sup>就是有办法解决别人束手无策的问题。”“可是，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像你这种人反正只会吹毛求疵。”

其中某些人至今仍然高举战旗，并没有因为各种失败挫折而放弃希望，月复一月，或至少也是年复一年，预言该政权必将出现的崩溃。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表现出某种大义凛然的气概，可是这种态度也有一点稀奇古怪。最奇特的地方就是，有朝一日或许会证明他们是对的，可是他们在此之前必须先经历不少令人沮丧的残酷现实。我可以想象出来，它们会在纳粹垮台以后到处告诉别人，自己打从一开始就不断预言此事。可是在那一天来临之前，它们只会是一场悲剧里面的堂吉诃德角色。“理直气壮”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中的一种相当不光彩，只会帮助敌人争取到得之有愧的荣耀。我们只需要看看路易十八<sup>[3]</sup>便不难明了此点。

第二个危险是变得愤世嫉俗，像受虐狂一般陷入了仇恨、忧伤和无止境的悲观主义。这几乎称得上是德国人失败以后的自然反应。而每个德国人处于逆境时——无论是在个人或国家的生活领域之内——都逃不出这个诱惑的折磨：完全放弃一切，以一种意气消沉的无所谓态度，把自己和世界拱手交给魔鬼。同时，它们更以执迷不悟的乖戾态度来进行道德上的自杀：

我开始对阳光感觉厌烦。  
啊，寰宇即将全面崩塌！

这看起来颇具悲剧英雄色彩：它们拒绝一切的安慰，可是没有注意到，这种拒绝态度的本身却隐含着毒性最强、危险最深和最令人堕落的安慰剂。

人们于是对自暴自弃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快感，演变成瓦格纳式对死亡与毁灭的热爱。这正是那些缺乏勇气面对自己失败的人，广泛出现的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我安慰形式。

我可以在此作一个大胆的预测：这也将是德国人在纳粹战败之后的基本态度，就像一个倔强的小孩在自己的洋娃娃被夺走之后，好像整个世界已经毁灭一样而号啕大哭（德国人在 1918 年以后的态度大致也就如此）。在 1933 年的时候，虽然大多数德国人遭到击败，但他们心中的这种念头并未充分展现于所谓的“公众”态度。因为按照官方的讲法，并没有任何人被击败。表面上只有欢呼、兴盛、“解放”、“拯救”、万岁和令人痴狂的团结一致，以致苦难毫无置喙的余地。尽管如此，我在 1933 年以后已亲眼看见许多个案，可以充分展现出这种典型德国失败者的态度。我相信其总人数应高达数百万之多。

我们很难以概括的方式，说出这种潜藏于内心的态度，对外在的现实造成了何种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其结局就是自杀。不过，有更多人选择迁就现实来苟全性命，也就是说，他们扭曲了自己的脸孔。只可惜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正是今天在德国还看得见的“反对势力”之代表性人物。难怪乎这种“反对势力”从来就没有目标、方法与计划，自然不可能会有前途。这些“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到处发表“煽动性的言论”。每天出现的恐怖事件，逐渐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它们沉迷于对各种恶形恶状的描绘，因为这是唯一能够让他们苦中作乐的方法。与他们交谈的时候，便很难不绕着这些话题打转。假如那些恐怖现象不复存在的话，它们当中的许多人反而会怅然若失。对其中某些人来说，这种悲观下的绝望甚至可以让人乐此不疲。

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也意味着“过日子是很危险的事情”，会让人肝火上升，甚至会让人进了疗养院，到头来有些人就真的精神分裂。除此之外，这里面还有一条小径，又殊途同归将人导入纳粹的怀抱：既然凡事都已经无关紧要、一切均已沦丧殆尽、万物皆已妖魔化，何不干脆奉行最可悲和最猖狂的犬儒主义，让自己与魔鬼同行？何不一面在心中自我解嘲，一面跟着干出同样的勾当？这也是不时可见的现象。

我也不能不谈第三种诱惑的形式。这就是我自己采取的方式，而且我同样并非唯一这么做的人。其出发点正来自对上一点的认知：绝不可让自己被仇恨与苦难所腐化，而且务必要保持品行端正、心平气和、和蔼可亲及“不拘形式”。可是，令人激愤与受折磨的事件日复一日迎面袭来，该怎么做才有办法避开仇恨与苦难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淡然置之、把目光移开、把耳朵捂住，并设法避世绝俗。但这只会使人柔弱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最后也产生一种类似精神疾病的症状：完全与现实脱节。为了简单起见，就以我自己为例来说明。但我们绝不可忘记，在我这个单一案例的后面必须加上六至七个零。

我不是容易记恨的人；而且我一向认为，如果过分涉入与不听规劝者的论战及争吵，只会造成对丑恶行为的仇恨，结果反而摧毁了自己心中难以重建的有价值事物。于是，我表示拒绝的姿态就是退避，而非攻击。

在我看来，当人们恨透了一个对手的时候，同时就很清楚地表达出某种敬意。可是，纳粹显然并不配得到这种敬意。我避免与纳粹分子密切往来，因为光是他们的样子即足以令人心生恨意。他们虽然一味纠缠，硬是要逼人跟他们狼狈为奸，但我并不认为那是他们对我作出的最大侮辱。真正的奇耻大辱来自始料未及之处——他们每天借着让自己令人无法视而不见，强迫我对他们产生仇恨与厌恶，以致从我这边获得原本不配享有的待遇！

当人们立场够坚定的时候，是无法被强迫作出任何表现来的。仇恨心与厌恶感不也包括在内吗？纵使外在的生活已被斫丧殆尽，甚至完全遭到破坏，本来不也可以安之若素，以视若无睹的方式来轻忽一切吗？

我刚好那个时候，读到司汤达[4]一个既危险诱人又具有双重意义的说法。他借此



图片来自 Mert Kahveci, on Unsplash

提纲挈领地表达出自己对时局的观感，认为 1814 年以后展开的复辟时代让人“一头跌进污秽”（这正是我对 1933 年初以来各种发展趋势的观感）。司汤达写道：现在唯一值得努力一试的做法，就是要“让自我维持神圣与纯净”。

神圣与纯净！这也就是说，除了不让自己成为共犯之外，也要避免痛苦所带来的伤害，以及仇恨所造成性格扭曲。简而言之，必须躲开外来的影响，以免出现任何反应。纵使自己不喜欢，也要规避一切的接触，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掉头就走，不惜退居弹丸之地。这么做的先决条件，是要让毒性十足的空气无法侵袭过来。而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一样东西，使之不受损害并维护其自古以来即神学意味十足的美名——不可磨灭的心灵。

我直到今天都还认为这个出发点有其正确之处，而且不会加以否认。但是，当初我自以为可行的做法一视而不见并躲入象牙塔——却完全行不通。我感谢上帝让这个尝试立刻彻底失败，因为我所认得的其他人往往并没有马上受到挫折，以致误以为有时为了挽救心灵上的宁静，就必须牺牲这种宁静。最后，他们必须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这种置身事外的方法与前两种不同，于随后几年内在德国公开表现了出来，其表达形式即为汗牛充栋的田园文艺作品。不过，就连文艺界人士也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个现象。德国在 1934 年至 1938 年间出版了大量儿时回忆、以家庭为背景的小说、风景图册、大自然抒情作品，以及许多柔情万种的小玩意儿。这是前所未见的现象。除了刻板的纳粹宣传文学之外，德国能够获准发行的书籍几乎完全来自那些范畴。

大约从两年前开始，这个趋势就已经不断退潮。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不管再怎么挖空心思，也越来越无法营造出那种不痛不痒的氛围。不过，在此之前的状况只能令人摇头叹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描绘雪片莲和雏菊花、稚子放长假时的欢乐、初恋时光、童话情景、烤苹果和圣诞树。这种文学充满了赤子之心和缺乏时代背景的色彩，仿佛有约在先一般，在游行队伍、集中营、军火工厂和“冲锋队”募捐铁罐的环绕之下纷纷出炉。如果有谁曾经像本书作者一样，于偶然之下必须大量阅读此类书籍的话，便会逐渐发现，它们在乖巧、平静和温柔的叙述背后，正在字里行间不断发出呐喊：“你难道没注意到，我们不受时间影响，回归于内心世界了吗？你难道没注意到，并没有任何事情对我们造成伤害吗？你难道没注意到，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注意到吗？请记住这一点，请务必记住这一点，我们向你提出恳求！”

我认识那些作家当中的某些人。对他们每一个人，或至少大多数人而言，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发生的许多事件已经令他们无法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方说，他们的亲朋好友已经有人被捕，要不然就发生了类似事件。童年时代的回忆已无法再提供保护伞。不少人因之而崩溃，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将来我会找时间叙述其中的一些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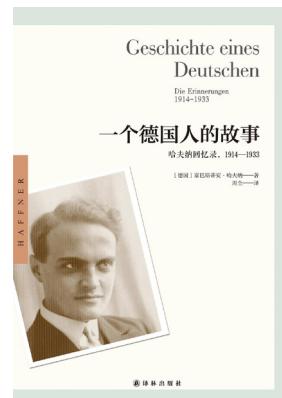
以上就是德国人在 1933 年夏天所面对的矛盾。那看起来就仿佛是，必须从几种让心灵死亡的不同方式之中作出选择。我们可以说，于正常环境下过惯日子的人，在这里会感觉自己若非进了疯人院，就是待在一一所精神病研究所里面。可是又能怎么办呢？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无力回天。此外，那个时候还算是比较无害的阶段，接着还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1] 麦克白为弑君自立的苏格兰国王（1040—1057），以及莎士比亚一出同名悲剧的主角。麦克白及其妻均野心勃勃，但同时也因为自己所造成的杀戮及破坏而厌恶自我，生活于幻觉与疯狂之中。

[2] 即指希特勒。

[3] 路易十八为路易十六之弟及法国国王（1814—1815，1815—1824）。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必须以公爵之尊逃亡国外，虽然在 1795 年已自称“路易十八”，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革命及拿破仑获得成功。1814 年拿破仑下台后，他终于正式即位，过了几个月又因拿破仑重返巴黎而流亡国外。拿破仑惨遭滑铁卢后，路易十八再度登基，成为开明君主，但于 1820 年又走回专制。路易十八驾崩六年以后，法国即爆发 1830 年的“七月革命”。

[4] “司汤达”原名马里·亨利·贝勒（Marie-Henri Beyle，1783—1842），法国小说家及文学评论家，在作品中反映出一个动荡的时代及其本人强烈的个人主义。“司汤达”年轻时曾在拿破仑麾下担任龙骑兵军官，战后成为外交官并同时进行写作。其成名作为《红与黑》（1830）及《巴马修道院》（1839）。



本文摘自《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

[德国]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Sebastian Haffner  
周全 译  
2017 年 9 月  
译林出版社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1938 年移居英国担任记者。1954 年返回德国后，曾先后为《世界报》及《明星周刊》撰稿，被公认为 20 世纪德国历史最重要的时代见证者之一。

####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 Barry Wilkinson, 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 档案

# 在万豪后面

伊险峰 | 废墟与纪念碑

赵医生和罗医生都来自城市另一端，  
那是沈阳还叫盛京时的老城。

这一组讲述两个工人子弟阶层跃迁故事的文章。他们出生在 1970 年代，出生于工人家庭，和很多人一样，他们完成阶层跃迁的三十几年时间，恰好也是这个社会发生剧变的时间。

在万豪后面。

这个万豪在世纪交替那十几年里，一直是沈阳最豪华的酒店。从桃仙机场进入沈阳，过了广阔的正在开发中的浑南，还没到浑河大桥的时候，闪闪亮的金顶就已经招摇地在对岸路口翘首以待了。万豪对面是沈阳最早的高级住宅区，河畔花园。1991 年 7 月就已经开始在当地报纸上打广告了。那时候的广告是这样的：

中外合资 金牌工程  
沈阳首座外商住宅区  
沈阳华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加坡温兄弟有限公司，沈阳房产实业公司合资组建）

价钱是 3000 多块钱一平方米，差不多是工薪阶层两年工资。举凡有头有脸的人都应该在河畔置一套房产，大佬都住在那里，赵本山始终是传说中的住户。快 30 年了，小区看起来老旧了很多，大佬们起起落落换了几茬，现在看起来衰落了不少。与对面金光灿灿的万豪不可同日而语了。

往北一点点，有几个卖奢侈品的大商场。同样是千禧年前后，中国的奢侈品半壁江山号称都由东北人掌握的时候，它们都是中国零售业绩数得上的大店。现在店和消费者都不景气，但富人区的架子还在，餐馆高档而且洋气，豪华酒店还是依着惯性在这里扎堆开业，尽管万豪的合作早就终止了。

但它还是固执地叫自己万豪。大家也已经习惯于用万豪来指称它，并当它为地标。罗医生在这假万豪里开了半天会。把我们约在万豪后面的一个日式风格的海鲜火锅店里。我和他有 5 个月没有见面，在 5 个月之前有 30 年没有见面。5 个月前是我们都参加毕业 30 年的同学聚会。

这一天很紧凑。

上午，我们到了沈阳。天冷。选择直接到陆军总院的机场大巴，等了一个小时，司机中间拿过来一桶热水放在驾驶位边上，看起来是提供热气。那趟大巴本来要开

到龙之梦，但走到总院人就全下去了。司机也意外，“你们都走了啊？”还有点依依不舍。下了车，发现陆军总院的名字改过了，现在叫北部战区总医院，人们还是习惯于叫它陆总，或者总院，过去它的全称应该是沈阳军区陆军总医院。

在楼下等了一会儿，通了电话，赵医生穿始祖鸟羽绒服，从病房里楼出来。穿过整个总院，到另一个大门外的一方广场里找了个餐馆吃饭。

赵医生和罗医生都是我们的主角。

我们跟他解释了我们想做的事。大意是，我们想写一本书，事关一代人的阶层跃迁，想找几个专业人士为主人公，想来想去觉得你挺合适。

赵医生，赵晓刚，工人子弟，有一兄一妹，他考上四军医大，最后在三〇一医院念完了博士，如今是总院脑神经外科副主任。

他认真地听。讲他关注的一些大事。比如，中年人的翻盘机会。前半生不顺还好办，你看罗平——就是罗医生——刚工作时不顺，现在顺了；后半生不顺就比较麻烦，没有翻盘机会了。

他这不是拿自己当对照组。在之后一年多多次谈话里，他从来没有不顺的任何暗示。不过，那天他说，他应该做一些更烧脑的工作。

这不属于不顺的范畴。这是人生的大方向上的问题。

就像深思熟虑过，他说，你这事我全力配合。说得很诚恳。

罗医生在火锅店里表情严肃。

罗平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主任比他大一岁，成立这科的时候挑中了罗平来一起做事。罗医生表示对名利很淡泊，但很在意一家“好大夫”网站上的评价。“全国 20 万医生，请 300 人到北京去开会，有我一个”，“机酒都不用掏钱，怎么也得四星级，照顾得都很好”，“果断把双人间升级为单人间”。

罗医生说现在爱忘事，眼睛花。吃饭的时候突然到处找起了手机，想起来有医药公司应该会派个人把机器送过来，但手机放在口袋里振动听不见。

“你看容易忘事。”

联系上了，对强生公司的这个设备，很不满意，一直埋怨为什么不配个手提箱。70 来万的东西，就这么端着，没有大公司的样子。

我们说，可能会有一些外围采访，没准会有一些——比如可能说他不好的话。他想了想，应该不会有他找来的人说他的坏话。他说他在原来诊室不是一个合群的人。做我自己的事。

罗医生讲了家里的情况。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女儿，正准备考育才的高中。太太毕业于北京的政法大学，与他同届，现在在沈阳公证处。罗医生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妹妹还在二〇四那边住。妹夫在沈海热电厂。妹妹被他参谋着提前退休了，这样可以更好照顾妈妈。

母亲今年肾上长了个肿瘤，全家人吓得不轻。“做了一夜陪护，想起小时候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张床上的日子，找到了感觉，这是家。”

罗医生说，由此意识到自己生活的重心在哪里。什么东西重要。

说到了他的女儿，青春期，小粉红，经常指责他思想反动。你怎么不爱国呢？他爱他的女儿。觉得必须要安顿好她的前程。“留学钱？那才几个钱。这么说吧，如果她要觉得上海好，那至少得给买一个房子吧，1000 万够不？”

——也够，但如果要你市中心的话，差点。

“房子得有。不能在这家工作不开心了，连职都不敢辞，成天担心自己交不起房租。委屈着自个迫不得已撅着屁股还得干下去。不能。”

撅着屁股干，是个罗医生经常说的词。他用来反问自己，质疑别人，包括我们。“你们撅着屁股干，累死累活的，图啥？”

罗医生吃过饭回中山公园。现在他的重心在中山公园这一带。中山公园在日据时期叫春日公园，他所工作的中国医科大学，那时叫满洲医科大学，他之所以搬到这里住，并非是因为医大，而是女儿的学校育才初中部就在这里。育才以前叫千代田小学。

这些都曾经是满铁附属地里的机构，现在叫和平区，是沈阳的好地界。

赵医生和罗医生都来自城市的另一端，那是沈阳还是叫盛京的时候的老城。

2018 年的年末，往前数 36 年，老城的大东门外，我和这两位主角的人生开始有了交集。

\*\*\*

大东门外这个“沈阳市第六中学”精致美丽。

三排房子。我们的教室和老师办公室都在最北面一排。房子是青砖砌的，两层，有青瓦的顶。木制楼梯和门廊都在外面，刷红漆，咚咚咚我们跑过，一颤一颤，经常会被老师呵斥。

按说，这学校历史悠久根深叶茂，我奶奶和爸爸都从这里毕业，赵医生的父亲和二叔也在这里上学，从概率上讲应该不愁生源。而且那是在 1982 年，生育高峰之后的就学高峰正在来临，学校应该供不应求，人满为患。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学校看起来病恹恹的，殊不景气。在我们初一年级的四个班入校之前，这学校就剩下初二的两个班。我们来了之后，学校终于凑了六个班，感觉上来一点人气。没有初三、四年级，那一年没招生。

9 月我们入学，学校看起来也没准备好，教室的桌椅还没有到货，我们只好拿实验桌做了课桌。这桌子很大，很宽，容得下三个人，所以我们三竖排大实验桌，一排九个人。这实验桌是新的，学校并非是唬弄我们，只是没准备好。我们桌椅来了之后，这些实验桌进了礼堂改的实验室里。那实验室在两排楼之间，绿树掩映之中，古典。

中间这栋楼是禁地。结构与我们那栋楼一样，有东边一个时而开放时而关闭的门可以连接。它与第一排平房之间构成前院，这前院肃穆而且整齐。方砖铺地。操场被征用为新教学楼的工地，所以我们做课间操都在前院这方砖地上。做操那个课间小门打开，我们蜂拥而至。1980年代初还很少见这么高级的操场。大部分还是煤渣土的操场，刮风就全是土。我们不一样，每人站在一块方砖上，就可以排出全沈阳最整齐的队列。把课间操上升为艺术。

操场朝向北的正前方并非学校通常的领操台，而是塑像，已故周恩来总理。中间这禁地，两层小楼某间教室乃一神圣所在，据称前总理曾经在此说：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最南面一排是平房。有门洞。是当年学校正门，上书“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这是个纪念馆的办公机构，与学校已经无关。托前总理的福，在沈阳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个学校。让我们可以享受这暮气与古典。如今说起来的古典或者暮气都不是我们当时所能表达的。我们当年不过12岁，于世事一无所感。

这三排房子的东侧是操场和正在盖的新教学楼，即将投入使用，风格与木制结构无任何传承性，但宽敞明亮。

赵晓刚医生出现在这里的时候，身高130公分左右，与未来还有50几公分高差。罗平在这里摆脱了婴儿肥，越发清瘦，长成一个少年。

班主任是年轻的王老师。说北京话。单凭这一点就足以鹤立鸡群。课间经常看到她双手插在裤兜里，我们称之为端着屁股走路，顾盼自雄，目空一切。

王老师从教育局争取来一个实验班的课题。据称这一年全沈阳只安排了两个实验班，一个语文一个数学。数学不知道被哪个学校抢去了，我们是唯一的一个语文。实验计划整整六年，横亘整个初中和高中。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它漫长得难以想像，当然还有兴奋。

语文实验班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就不同凡响，语文不叫语文，分为阅读和写作。这一班的同学虽然未必在阅读和写作当中建立起不同凡响的优势，但对于教材的新颖和与众不同倒是都记挂在心上，言必称，“我们实验班当初教材可都是单独设计的”。

事后理解这次不可考的实验初衷大概是源于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各行各业的改革者都在重新思考自己所处领域里的各种不合理之处。大约语文界的改革派也蠢蠢欲动，算准了我们生活中人文教育的薄弱或者缺失，想借着改革重新定义语——把工具性的“语”和人文性的“文”作了一点区隔。

阅读虽然还去不掉中心思想段落大义之类，但总是更强调从文章中阅读美以及享受文字之美。比附起来，它与隔了几十年之后，大家恍然想拾起但又不知从哪里拾起的“通识教育”有些相通之处。不管怎样，把语文拆解开来再分头仔细耕耘，在当年一窝蜂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全世界”的社会氛围之中，也是需要一点勇气。

如此算来，这个很有点人文主义精神的实验，天降大任于当年我们，算得上是一个诡异的开端。它与我们如今这本书想要探讨的这一代人的成长——知识、尊严和自我如何建构——显然也有一些隐秘的关联。

语文实验为什么选择沈阳六中，同样不可考。六中不但不景气，而且它所处的大东区，向来是工人聚集之地，人文基础薄弱。

开学没几天，几大片就很醒目。一批学生来自于遥远的东北机器制造厂，兵工厂，造枪支弹药，当年有电影叫《高山下的花环》，讲对越战争，当时文艺还可以批评，我军将士痛陈兵工厂的产品质量问题，扔一手榴弹，哑火，产品质量已经到了枉顾将士生命地步，电影院中诸位东机子弟就会齐声怪笑，出得电影院还意犹未尽：那臭子枪弹都是我们七二四生产的。七二四是他们的番号，深处郊区包围的大东区的一块飞地，每天呼朋引伴，历经一个多小时从那飞地坐早班公交车而来。

另一批学生来自于广义上的二〇四、二〇一，还包括了几个小的二〇五、二〇二家属区。听这名字当然也是一些有番号的工厂。我们的主角罗医生家住二〇四，这是黎明厂的家属区，以生产飞机发动机而知名。二〇一对应的是新光，另外几个大厂如中捷友谊厂、矿山机械厂连成一片。

剩下一批没有国企身份加持，可视为市民阶层，大部分在大东门外几个聚居区里生存了几代。赵医生即来自于此。

工人阶级与人文虽然没有矛盾，但像素大，颗粒粗，饱含人文主义精神理想的语文实验班选在这里没有什么道理。

现在揣测，王老师当仁不让，十有八九因为她不凡的背景。那是1982年，王老师恰好此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几十年后大家更容易理解，那是中国恢复高考之后第一届毕业的大学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570万考生十二年蹉跎，争取27万个入学机会。王老师是其中翘楚，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一员——文科本科120人取1，王老师是翘楚中的翘楚。凤毛麟角。

1982年的9月，探索未来人文教育之重任，落在分配至此的王老师肩上，天经地义。只是这实验进行了计划长度的十分之一不到，就结束了。它的学生中并没有因为阅读和写作的分置而有什么不一样的心得，这个最初五十几个人的班级四年之后学文科的比例也不高，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个人。

王老师起初尽心尽力，颇想有些作为，只是有点拖延症。拖延到期末考试前才把期中考试的卷子打完。比如认准了多动笔才是王道，多观察多写，写什么都行，但每天都要写，这东西叫日记。只是她要定期检查。虽然这老师拖延症症状已经显露，但日记倒是看得都很及时，隔三差五还要给我们挑出好文章来公之于众。有的时候也命题来写，比如写老鼠，忘了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罗医生那日得到褒奖。他在日记中说，从前老鼠可爱而美丽，小白蹄子小白肚子……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学好，就自甘堕落到了地下，与尘土为伴，时间久了，终于变得灰土土的，也不再好看了，更不可爱了。这是一个警世的励志故事：小朋友不学好，就会变成一个人人嫌弃的大坏蛋。那时候还没有米奇和杰瑞，老鼠是四害之首，将老鼠写成白富美的出身，需要一点想像力。

那天在万豪后面，我提起这篇日记，罗医生全然不记得，更不记得有这篇日记在大庭广众之下朗读。他偶尔会记得自己写作文也不错，但这不是他在意的东西。这个失败的实验并非因为工人阶级过于粗线条而丧失了提高人文精神水准的机会，也并非王老师的拖延症。最直接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学校黄了。

大约在1983年5月，我们的初一还没有读完。我们突然从广播里听说了撤销沈阳六中的消息。在我们离开之后，有一段时间它是沈阳幼儿师范学校，后来终于如当初撤销时所称，恢复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现在它是东北育才学校教育集团的一部分。小学部。

我们被集体划到几公里之外更工业腹地的沈阳五中。王老师似乎并没有把我们这些实验品视为私有，她不喜欢五中，就此告别了她的实验、实验班和实验品。我们也因此没记住她的名字。真遗憾。

\*\*\*

罗医生掏出一个硕大的钱包，抢着付了账。“请得起，到沈阳了你们得听我的。”罗医生抱着机器，坐上的士。“挺大一个公司，就不能给它弄个包。”他又重复了一遍。尽管我们早就想好了要写两个专业人士——医生的成长史。但我们还是准备得太不充分了，好长时间才适应，原来这机器就是手术刀。一周以后，2018年的年底，我们给赵医生和罗医生分头发了邮件。

大概生于1970年代前后的这一代人是值得记录的，也到了应该记录的时候。总的来说，这是流动性最强、人生积极、机遇完好、并且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阶层转换的一代人。

知识、专业性是决定因素。它超过了阶层和出身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相信进步带来的改变，也让这一代人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与此同时，这一代人还经历了旧企业衰落、社会剧烈转型、传统人际和社会关系的瓦解与再造。这一点上，沈阳和大东区都有特别意义。大东区除了大工业遗产和计划经济传统工人社区的起落之外，还有传统市民社会的转型（这是与铁西区不大一样的地方）。它包括了市民社会的瓦解和社会解组。

在从那天开始的采访中，就不断地有人——特别是我的同学们狐疑地看着我们：写赵晓刚？啥？写罗平？为什么写他们？这能行吗？他们不是名人。得写名人啊。马云。罗振宇。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记录有关个人成长的故事。一个人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为之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如何把握Timing。教育、家庭、学校、社会……为一个人的成长提供什么支持。希望为这一代人，在个人意义上和代际意义上获得更全面的评价以及赢得更多尊严。通过个人成长和变化，也能折射出家、家族、社区、城市的变化。

我猜想这些东西还是迷人的。作为他们的同学，在与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亲戚一次又一次地聊天过程当中，发现更多开始我们所忽略的东西。在写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东北文艺复兴。这事儿与我们的关联度并不大。但它是一个以前未曾出现的现象，而且很显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如果在音乐、小说、电影电视中都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它对我们当然是一种启发。有的时候，感觉我们正做的工作就像一个精神流浪汉小说一样，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一方面是我们莽撞地闯进这个庞大的题材，试图顺着理清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主人公在这四十余年中不断地寻找。

在那个邮件中我们详细地列出来了我们要进行对话的次数、要点和想要见到的人。半年以后，我们终于接近了我们现在的想法——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知识、尊严和自我的形成过程。这变得有野心，而且愈发显得莽撞。我们的社会学训练，不论是对社会学科的掌握和社会学方法论的了解，都过于欠缺了。

但是这承平日久一代，从贫穷中走出，从工人阶级生活中转身成为专业人士，在他们经历的这几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复杂而且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些名词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完全变为另外一个意义，专业、知识、成功、财富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重新定义。国企、单位、福利、社区每一个词仿佛都换了内涵和外延……这实在是太诱人了。

在几十年间，他们完成知识获得，赢得社会尊重，看起来功成名就。

与他们上升的同时，还有那整个锈带地区的下降。东北经济的衰落，东北文化的妖魔化，东北人和这个词的内涵。这个社会发生的变化，同样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变化。过去这些年，沈阳在中国的各种城市排名中不断下降，敏感一点的沈阳人都活在各种失落当中。这种失落有悲天悯人愁煞人之感，看到“024”这样一个电话区号都会触景生情感慨起命运无常来——三位区号表示在电信业曾经发达的时段里沈阳作为“中心局”的地位，现在一些新贵城市当年未必有这样的殊荣。因为这种三位区号或者东北局大军区总部之类的荣耀，沈阳原来还幻想过成为直辖市的机会，直到现在心里对一个叫“国家中心城市”的称号又暗暗叫劲。但是，一些跟增长有关的硬数字不留情面，还担了数据造假挤水分的名分，这个以往看起来到擒来的中心地位现在也没有任何把握。这个时候，连人口都成了个大问题，老龄化和人口外流——前者对赵晓刚这样的医生来说倒不是什么坏事——前些年计划生育的坚定和听话，让沈阳的育龄人口比例不断降低，多年的城市化，也有人认为是东欧化，让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沈阳一点一点连个大城市的规模都息了，比如湊不齐 1000 万人口，很早就想成为一个超大城市，过了这么多年，人口虽然还勉强维持着增长，但每年只有七八万人，离大目标越来越远。

沈阳四十年间发展，前十年感觉是计划经济回光返照，那时感觉硬硬的底子都在，沈阳努力努力还可以号称争一争中国第四城第五城的位置。接下来十年，完全被下岗这事打击懵掉了，一群掌握不了自身命运的省市领导，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似乎是放弃这个城市甚至是整个东北——让一个计划经济堡垒城市失守而放弃，兵溃如山倒，这些传统官僚体系里培养出来的领导心里想着，“这样下去，你总得给我点解决政策吧”，结果等着等着，就等成了一个被嘲笑的对象：人家别的地方都比着锐意进取，你这里还希望国家给政策……这多少有点委屈他们，别的地方也没有被这国家大政方针一下子打击到这个地步；而同样是下岗重灾区的上海，靠了浦东开发的财力支持和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进入完成了它的艰难转型。后二十年，眼看着再也追不上别人，贫穷也靠着过紧日子挺过了去，借着一些区位和贸易的优势，借着全中国如出一辙的房地产拉动了消费，城市里富裕还算得上富裕，以前拿重工业之类的东西说事，讲些共和国长子之类的陈年荣耀，现在居然说起自己宜居来，还是发自内心的，房价不贵，物价也便宜，烧烤之类的地方美食居然也竞争出来了一些特色。

这 30 年间，始终有两个社会交错进行。一个是赵医生与罗医生一点点试图融入进的社会，另一个是曾经社会失序，城市景气不再，有点失落，然后又失落到麻木的沈阳城。过了好久，我们终于接近了那个核心的东西。

我们希望探讨两位医生如何构建了自我——不过很快这个问题就被修改成，他们这一代的自我真的完成了建构吗？成为父辈，成为中坚，成为了不起的权威教授有担当的人，但他们在人生的刻度上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结论很有可能是一个动态的关系。关系的两端分别是“我”和“社会”。对于两位医生而言，他们所追逐的，他们背景中各色各个时间段里鲜明的标签，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都是形形色色社会的变体。

一个只会学习的学生，一个只会学习的好学生是不懂得社会的，一个书呆子如何在社会中立足，在粗砺的工人阶级文化中，他们与社会之间隔着一个又是怀疑又是嘲弄又是羡慕的鸿沟。社会险恶。

它几乎都成为他们从小到大的一个梦魇。他们要摆脱那些不信任，害怕的、担心的、一步一步走过，或者躲过。最后成为一个社会人。他们到现在也为这事焦虑着。



图片来自 [Yaopey Yong](#) on Unsplash

## 档案

# 凭 4 号商品券

伊险峰 | 废墟与纪念碑

每人供应食糖 500 克

进入 1980 年代，沈阳人的生活与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到生活质量上升通道。多年之后，这不算短的一个过程被浓缩为一个点，仿佛生活一下子就缤纷而且丰富起来。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它比想像中要漫长。

### 01

#### “公家”和豆腐

沈阳人第一次在早春吃上西瓜，大约是在 1985 年，当时个体户已经展开差异化竞争，一个叫苏尧星的人据说在海南岛采购，然后在西双版纳联系货源，用汽车将六万斤西瓜拉到昆明，再用火车运到沈阳，走了十一天，行程万里。这个出现在《沈阳日报》上的报道讲得有点凌乱，我面对地图思忖良久，也没想明白这是什么样的操作。不过，结果看起来是真实的，沈阳人阳春三月吃上西瓜。

1981 年，沈阳人在春节的时候可以吃到新鲜青菜。几大副食商店的蔬菜柜台集中投放洋葱、芹菜、菠菜、菜花、青椒、甘蓝等八九种新鲜蔬菜，而且第一次出现了用小塑料袋包装的芸豆、豇豆、黄瓜、西红柿等速冻蔬菜。

进步显而易见，但到了 1987 年年底，豆腐还不是想吃就能吃上的一种食品。沈阳市政府在 12 月决定，将原来计划供应居民的平价菜豆 4000 吨用于豆制品生产，这样今冬明春吃豆腐难局面有缓解”。副食部门还特意提醒广大市民，公家生产的大豆腐每板共 36 块，有 36 个明显的方格标志，售价每块 0.15 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题外话，豆腐当时有特殊地位。稀缺时代，蛋白属性使豆腐拥有特殊地位。萧红在 1920 年代写《呼兰河传》，有人见卖豆腐的小车经过家门口，心里一横大喊一句：“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可见其地位。

注意，副食部门提到了“公家”，虽然公家连个豆腐都生产不好，满足不了需求，但在 1987 年的时候它还是一种质量和信用的保障。“公家”是中国独有概念，有的时候它就是国家自称，“公家还能差你这点钱？”你跟副食店吵架的时候，售货员不会胆大妄为到以国家自居，但他可以自称是“公家”；有的时候它是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种存在，这是单位体制的一部分——关于“公家”，我们在后面还会有更多介绍。在此处，虽然不过是豆腐这么点事，但它所持有的意义是前者，它说的就是国

家本身。

那时候公家管的事多，计划经济和国营单位的组合，其颟顸向来天下无敌。据说苏联时期的中央计划者，有多达 2400 万种价格要去确定，“仅仅这一事实就能呈现出中央计划者所承担之任务的荒诞性”。它们为了这些它们管不好的事，制造若干管理供应再管理需求的岗位，然后再想办法管理这些体系，“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中央计划者们已经一再地失败，既有民主国家中的中央计划者，也有独裁统治下的中央计划者。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因为中央计划者不可能成为在他们控制之下的所有事情上的专家，哪怕只是胜任者也不可能”（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因为事事都管不好，所以要时时去扑火解决各种问题，所以事事都有它跑出来搏存在感，解决了你还得感恩戴德——就像这豆腐，你管不好，让大家吃不上豆腐真不如找块豆腐撞死以谢国人，但有一天你突然拆东墙补西墙地满足豆腐供应了，洋洋得意地跟你炫耀，最后你还要感谢它。

1981 年，终于吃上新鲜蔬菜的那个春节，二月份沈阳市民的粮油供应清单如下：

精粉每人 2 斤；  
标准粉每人 9 斤；  
大米每人 8 斤；  
切面每人 1 斤；  
花生每人 0.5 斤；  
葵花籽每人 0.5 斤；  
豆油每人 0.7 斤；  
香油每户 0.3 斤。

是不是感受到了浓浓的过年气氛？这则消息下面还有一篇科普小文章，名字叫《“火锅”怎样吃法》，我们的生活当中终于出现了火锅。

我还试图问过几个 1980 年后出生的人，对“精粉”是否有概念，答案是否定的。精粉就是精制面粉，求助于互联网，你会看到百度百科并不收录这样的词条，只能利用群众散落四方的经验：一种高级面粉，精细、贵。和精粉相对应的是富强粉，其来源变迁和“公家”息息相关：“富强粉是指一种比较精细、面筋含量高、杂质少、较白类似于精粉的高筋面粉。1949 年以前，中国面粉分 1、2、3、4 号粉，大宗的是 2 号粉，以各种商标行销各地。1950 年代初，逐步取消原有的牌号，统一改为一、二、三等粉，分别定名为富强牌、建设牌、生产牌，质量分别相当于原来的 2、3、4 号粉，富强粉因此得名。”这些概念如今随风远去，让人想起约翰·加迪斯在《冷战》打头写的，如今的年轻人想起冷战，觉得它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遥远。

生活比想像中的要清苦。巴特费尔德讲的票证制生活，比我记忆中存在的时间要更有生命力一些。在 1980 年代的十年间，一直是《沈阳日报》和后来创办的《沈阳晚报》不断提醒大家注意的东西。

我们不断看到的，除了买豆腐难，还有买酱难，因为公家嫌这东西利润小，麻烦，售货员都不愿意卖。公家的商店里买不到汽水，私人商贩里倒是有的，公家的饭店里也买不到紧俏的雪花啤酒，但个体饭店居然有卖，《沈阳日报》不断有愤怒的读者来信，批评投机倒把的个体户坏了市场。我相信读者来信基本上是真的，一方面是记者的事后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公家”的爱直到今天好像也没怎么变化。虽九死而不悔。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补充一句关于雪花啤酒。它不是现在的雪花啤酒，那时候沈阳人喝不起雪花，本地还生产黄牌绿牌的沈阳啤酒，或者是散装啤酒。雪花啤酒地位不凡，放在易拉罐里卖。到了华润公司收购之后，它才变成难喝的平民啤酒，并推广给全中国人的人。

## 02

### 自行车“小确幸”

稀缺会制造出因为稀缺的好运气。后来有一种台湾人叫作“小确幸”的东西，如果他们也经历过稀缺，会对“小确幸”有更深刻的了解。就像左派或者习惯于藐视这种温情脉脉的东西的人士所感受到的一样，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可津津乐道的。我们家的“小确幸”是一辆自行车。

刚搬回沈阳，没有自行车，又无处可买，我爸爸作为一个男人天天坐公交车不够男性气概，也贵。天无绝人之路，一位亲戚在沈阳自行车厂，生产著名的白山牌自行车，当时以质量差而闻名，是沈阳的轻工业的代表品牌之一。我们沈阳是生产机床以及所有重型设备的，生产这种小玩意自然不在话下，但要保证质量，可是挺难的一件事。话说中国的自行车业刚起步的时候有三个著名生产商，上海的永久，天津的飞鸽，沈阳的白山，创始人只有一个，都叫小岛和三郎，他一辈子以创业为乐，只创一个业，到哪儿都做制车所。三次创业都成功了。这是题外话。这位亲戚在自行车厂，并不是说她在自行车厂就能买到车，而是这厂子有一个福利，或者说不能简单视为福利，应视为巨大 Bonus，就是每年会有一次全厂各车间部门的抽签仪式，每个部门运气好的那个人，会得到一个不用自行车票而平价购买本厂生产白山牌自行车一辆的奖励。

弗克斯·巴特费尔德，那位《纽约时报》驻北京的首任记者，讲过自行车票的故事：

女工解释说，最后还有一种工业品票，每年元月由她厂里发给，用以购买轻工消费品。用两三张工业品票可买毛线打件毛衣；用半张可买些茶叶；要买辆自行车得花 10 张，那是个人两年半的定量。但自行车于中国人就如轿车于 20 世纪的美国人，须臾不可缺，还不能不买。然而，光有工业品票还不行，要买辆自行车，还得有特殊的自行车分配指标。厂里近 100 名职工，每年分配指标只有两辆，可见其之珍贵。

“我们把买辆自行车的机会看得太重要了，新工人一进厂，首先就是找到管生活福利的干部登记买车，有的工人早已买了自行车，一生了儿女又去登记，说是儿女长到十几岁该骑车的时候，登记的号码也该排到了。”

如果三十来年后你在北京领教过摇号摇中一个北京车牌的幸福喜悦，你就会更好把握这意味着什么。而且，我这位亲戚，是连续两年都抽中了自行车购买机会。这样我爸爸才会如此“小确幸”，否则谁会有多余的自行车呢！

那时候沈阳自行车厂已经开始琢磨为顾客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我的这位亲戚年轻貌美，责无旁贷地被指定购买了一辆“燕儿把” 26 英寸斜梁粉色框架自行车，一扫傻大黑粗之传统重工业形象。我爸爸作为中年发福男性，骑这个车招摇过市两年，我们全家都为此抬不起头。

弗克斯·巴特费尔德还提到了灯泡，我怀疑是中国人编排的民间笑话讲给他听。不过，以我多年对笑话的理解，有些东西虽然看起来太假，但它却真的是真的。

配给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买新灯泡得拿旧灯泡去调换。中国制造的灯泡上都盖有序号，工厂用的与家庭用的序号不同，北京用的与外地用的序号有别。用这种区别办法，就能防止人们以欺骗手段拿工厂或外地灯泡去换新。如果家里的灯泡的确被盗了，得到公安局开证明，才能买到新的换上。

这种短缺至少持续到 1989 年，那年已经双轨制了。但那年还是有诸多票券在指引着市民的生活。

2 月 3 日《沈阳晚报》上提醒诸位市民“不要忘记买凭票供应的节日商品”。春节临近，有的群众打电话询问今年春节期间凭票供应的商品共有些什么，为此记者从市政府商业办公室了解有关情况。

- 1) 从 1 月 11 起，凭 4 号商品券，每人供应食糖 500 克；
- 2) 从 1 月 28 日至 2 月 21 日止，凭 5 号商品券，每人供应中价鱼 500 克；
- 3) 从 2 月 3 日起，凭 6 号商品券，每人供应肥皂一条。
- 4) 从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止，凭 4 号商品券每大户供应精盐 2 袋，小户 1 袋；
- 5) 从 2 月 3 日至 2 月 7 日止，凭 5 号商品券每户供应蒜苔 1 公斤。

那一年，不但这些传统票证没有撤离，还多了一些因为双轨制、物价闯关失败而产生的新票证，比如彩电票，冰箱票。这倒是货真价实的供不应求，因为前一年通货膨胀导致的供不应求：

1988 年，每百户自行车拥有量为 225，增加 5%；电风扇 40 台，增加 22.2%；洗衣机 80 台，增加 7%；电冰箱 37 台，增加 117.6%；彩电 50 台，增加 59.6%；立体声收录机 35 台，增加 13.8%，中高档乐器 11 件，增加 37.5%。

这很容易会在统计年鉴中得出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结论。实际情况是“这种不正常增长速度，势必严重影响沈阳市的金融和人民生活水平”。另外的数据看起来就要辛酸得多：

1988 年沈阳市居民购买猪肉量比 1987 年相比下降 10.6%，鱼下降 16%，鲜菜下降 12%。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由此，稳定物价工作仍须加强，居民消费还要正确引导。

1989 年 2 月 20 日，《沈阳晚报》头版辟了个谣——彩电、冰箱要缴购买税是个谣传。文章中说市民传言 4 月 1 日起开始征收购买税。沈阳市税务局副局长李天心否认了这个说法。不过，他提到 2 月 1 日已经开始实行“对生产厂家和直接进口彩电的单位，征收消费特别税和国产化发展基金税”。这路数与如今的“辟谣”有些相像之处：4 月 1 日要加税这事是假的，我们 2 月 1 日已经加过了。我们真是从来没忘过初心。没见过这种疯狂购物阵仗的市场研究者也有点乱了阵脚，事隔不久有人预测《我国冰箱到 1990 年将饱和》：

按国家计划，1990 年电冰箱产量的规模是 650 万到 750 万台，但是现在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 1000 万台。两年以后，大量电冰箱厂将面临国内市场淤塞，国外市场又无路可通的困难。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市场容量，已经成为家用电器行业最令人担忧的矛盾。

习惯于计划经济来规范购买与生产的研究者，还不大懂得以市场眼光来看待人们的需求。适应市场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

## 03

### 八大员

“八大员”据称是中国军队讲究平等的产物。老式军人，官兵不平等，后勤人员与职业军人之间不平等，典型的比如“伙夫”，看起来就很底层。有大人物就因此提议，把“伙夫”改名为“炊事员”，吹号手改为司号员，带兵打仗的叫指挥员，直到类似于司令员。大家都是员，以示平等。

几十年之后，中国企业学国外经验，不知道从哪里听说的，说人家看大门的都不叫看大门的，人家叫保卫工程师，觉得这是人家先进之处。其实不知道，这方面做得彻底的是中国军队。再后来，听说星巴克管替你煮咖啡的叫 Partner，迪士尼乐园里打扫卫生的也叫演员……据说这样增加了荣誉感同时提高了他们在公司中的地位。效果是否如此，我觉得没有那么乐观。取决于员工地位的从来不是领导给员工取什么名字，而是他做的事能创造什么价值，不管是为他自己还是为社会。

“八大员”再度被关注，是在 1980 年代初，或者说是文革之后。这时内涵已经被替换，2006 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八集系列片《我们是光荣的八大员》。现在对“八大员”的解释基本上与这部片子记录的对象相关：售货员、服务员、理发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炊事员和售票员。八十年代他们之所以被关注，就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地位的提高。  
何止是提高。《沈阳日报》读者来信经常有些奇闻异事，挑战我们的常识。八大员系列是其中一种。

二月二十日中午，我们在太原街买完东西，来到幽兰园餐厅就餐。进门后，只见四个顾客正在退米饭，因为是凉的。其中有一个顾客买的炒两样（肝、肚）是生的，没法吃。我们买的两元五角钱一斤的饺子过了半小时上来了，先后端两次，每盘往桌子上放时，都撒到桌子上一个。我们特意要一个空盘子查了一下，按规定一斤应付六十个饺子，可只付给我们五十一个。

最糟的是该餐厅服务态度。一个顾客说，“你们服务态度太差了！服务员却反唇相讥：“服务态度不好我们能赚钱吗？除了你们，没人说我们态度不好。”（感觉很像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发言人）我们拿出工作证要找餐厅负责人，服务员说：“我们没有负责人！”

1986 年的读者梁军最后说：像幽兰园餐厅这样的小馆，该好好整顿一下了。  
此前四年，1982 年，同样是读者来信，讲的是售货员。同样霸气。

五月二日下午一时许，皇姑区辽河副食品岐山门市部肉组柜台，一女顾客嫌肉肥要求换换，年轻的女营业员不给换，发生了争吵。正在这里，一个戴眼镜的男营业员霍地窜了过来，割下一块肉，向女顾客打去，还说：“给你瘦肉！”在场的其他顾客无不气愤，纷纷指责营业员这种恶劣的作风。据周围居民反映，该门市部风气不正并非一日，希望有关部门帮助该店转变作风。

阿城《闲话闲说》里讲北京一个饭馆，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贴告示，称从今之后只卖革命食品，也就是棒子面窝窝头，买了以后自己端，吃完以后自己洗碗筷。“革命群众须遵守革命规定”。同样是这个饭馆，1986 年，贴了一个告示：本店不打骂顾客。文革的事在我有直接接触的世界之外，所以看阿城所写，就需要动用一点想像。噢，当年原来是这样的。时间上跨了代，或者年龄跨了代，活得久有的时候还能赶上跨了朝代的代，对很多事理解就要费些周折。八十年代百废待举，有好多事急三火四地往前赶，赶的过程当中难免有些动作变形，八十年代成就了许多类似这样的笑话——我们当时看了义愤填膺，唉，这服务员怎么这样啊！如今看起来，嚯，还有这种事。按喜剧定义，僵硬变形的动作往往给人以喜剧感。

大东横街——离沈阳五中不远，有一个国营或者大集体的饭馆，叫新胜饭店。这个店就很喜剧。有记者去做调查，发现这单位基本上是在胡来，“生产没有计划，花卷蒸出来没有人卖，放几天长了毛，成筐扔掉”。店里养个小毛驴，每天吃店里做的筋饼豆包。工人要求 10 点上班，12 点才到，晃一圈，吃顿饭就走，临走还要装一饭盒带走。到 12 月，亏损 5000 多元。一个月 25 天，浪费和损失就达到了 500 元。

八大员逐渐势微，直接原因是市场供应较之以前更为丰富，稀缺的问题得到缓解。接下来这种提供市场服务的国营单位也纷纷黄了或者转成民营。1982 年的新胜饭店还能混下去，到了民营饭店也起来的时候，它们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

不过，我们生来命苦，八大员不在，不断有垄断企业出现。沈阳人在这一点上虽然有些愤世嫉俗，但有可能是对的：只要这社会上有紧俏服务，都要先紧着一些有资本有背景的企业先赚一轮钱。到 1989 年的时候，我们的舆论监督已经到电话行业了。“帮安电话的中间人被查出”，副题是“市电信局重申，安电话不用走后门递好处费”。沈阳晚报的这个报道讲了两个案例，都是中间人（个体户）拿了好处费，而施工人员尚蒙在鼓里，而中间人在接到举报以后，也都退还了好处费——一笔 500，一笔 300。“沈阳市电信局有关负责人重申，安装电话勿须走后门，递好处费。如具备机线条件，用户不用多花一分钱和求人，即可顺利装上电话，如暂不具备机线条件，求多少人、花多少钱，也要等条件成熟。要警惕中间人从中作弊。”

我的采访对象赵医生的二叔是沈阳最早装电话的那一批人，他家装电话的时候还要自己额外买电线杆子。那时电话不但贵，有的时候是等有号，有的时候是等有线路，凑齐了，你这里就能装了。二叔做生意，电话是刚需，所以没有线的时候创造线路也得上，就自己架杆子。

另一个采访对象罗医生家装电话时已经不用花太多钱了，只要 2000 多。我装电话是 3300 块钱，请假等电信师傅上门，等了两天，送了两条石林烟还是红梅烟，给师傅们抽，不算坏烟。花费八九十。他们不以为意。

《沈阳日报》当年社会公信力不错。经常登些批评性的报道。有的时候也批评自己。

1982 年一篇文章标题是“电车汽车公司滥发免费送人情拉关系”。引题是：“包括本报在内的近百个单位领取了免费，按通用票价计算，三年使国家少收入二十四万元”。很多时候，舆论监督是个态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力度问题，虽然力度也很重要。“本店不打骂顾客”，现在看匪夷所思，但你要知道，可批评就好办。人人可以批评，所有事就都好办。

## 04 一个计划经济的故事

巴特费尔德讲了一个计划经济的故事，这位美国记者，把嘴张成“O”型，看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副不可理喻的样子。就如同今天的我们。隔了几十年，有一些互联网公司，觉得计划经济如今可以借着大数据卷土重来了。即便算法高超，我觉得它们也是一种恶意的媚俗。其姿态丑陋。其心可怖。我一点也不想原谅他们。

工厂的生产定额在 1980 年是 15000 辆吉普车，全厂共有 9700 名工人，平均每人年产量不到 2 辆。我问道，是否可以生产更多？他回答，可以，工厂的生产能力是每年 30000 辆。我继续追问，如果工厂在完成定额后，不停工而创造更多的汽车，利润将会更多，不是更好吗？他笑了起来。

“我们不能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我们必须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分配给我们的任务生产。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不授权工厂管理者直接插手出售吉普车，而是计委签署文件下发给各省的机器设备公司，委托它们处理、分配给工厂或人民公社。但是，买方必须亲自到北京提货，负责将汽车运回。

吉普车每辆售价相当于 9333 美元。以质量而言，按照美国、日本以及欧洲标准已是相当昂贵的了。价格不是由工厂，而是由计划委员会定下的。

他估计每辆车的生产成本是 6467 美元，可以得到 44% 的高利润。美国汽车创造厂家生产汽车所得利润仅为 15%，甚至凯迪拉克也没有超出 25%。

但是当我向他祝贺工厂得到这样高的利润时，他又嘲笑我的一无所知。作为国家所有制的一个企业，工厂必须上交利润的 95% 给国家，只能留取 5%，因此，工厂经理或工人并不在乎是否能降低成本或增加利润。

由于执行中央计划体制，小汽车工厂厂长还缺乏西方经理所当然拥有的权力。他不能雇佣或开除任何一名职工，无权提高职工的工资。他也不能决定购买新机器，也无权设计新型的吉普样式。所有这些权力都操在他之上的行政机构的领导人手里。厂方无权实际上也是低效率的原因之一。

沈阳重型机械厂的经理抱怨，为了给这个拥有 10000 名职工的单位修建一幢新宿舍，他必须得到 11 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同意，而且要盖上 24 个官方大印。在他上任的头 3 个月，他得看 518 份政府文件，参加在工厂以外的政府部门的 48 次会议。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沈阳铁路局职员，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 废墟与纪念碑

这个栏目与过去几十年间我们的生活有关。它通过采访和对过去报章和书籍的梳理而完成。

力争做到有趣。



Copyright © 鲍利辉

## 档案

# 苏童在威尼斯

王竞 | 作家笔记

## 「我像猫一样地生活」

01

谷歌地图在威尼斯完全失效。威尼斯文学节发来的邮件说，出火车站后，只需走五分钟就到他们为我订的酒店了。可我拖着箱子，足足找了一个小时，后来还是一位下了班的意大利导游把我好心地带到目的地。酒店门前就是一条小河和一座石拱桥，不浪漫都不行。进到门里，却有走错地方的感觉，古色古香的厅堂一片凌乱，沙发、茶几的堆放暗示着搬家进行中。前台经理打出一个体贴的笑容，对首次来威尼斯的客人，她大概已经做过成百上千次这样的解释：明天下雨，水会漫进房子里来的，我们要把家具搬到楼上去。

苏童早我一天到达威尼斯。此时是 2019 年 4 月初。他不仅是这届威尼斯文学节的贵宾，而且，之后还要参加一个专门为他设计的文学驻留项目。鉴于他待的日子多，组织方就把他安排到市中心一户空出的人家住下，还派了威尼斯大学汉学系的一名研究生给他当助手，比如把他从机场接到住处，随后几天对他进行保姆级别的“监护”，免得他走丢或者搞错什么，以至误了人家文学节的场子。苏童也不争辩，尽管这是他第四次来威尼斯。

威尼斯不仅有艺术双年展和电影节，诱惑全球的创意劳动者往这座水城跑，而且还有这个我不太熟悉的国际文学节，名叫“文明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在我的眼里从来都不是个安全地带，得左顾右盼好几次才敢迈腿；放到抽象层面上，还常跟人生或政治方向的抉择挂钩。威尼斯人提出文明的十字路口，是不是在警告，一步不慎，人类就有走向野蛮的危险？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别出心裁的说法，难怪麦克尤恩和帕慕克都参加过这个 2008 年才成立的年轻文学节。

我还没有见过苏童。做文化交流这么多年，不少知名的国内作家都成了我的“猎物”。在各种各样的国际文化平台上，这个论坛需要发言人，那个文学节需要作家亮相，“猎头”如我就忙着找人，再看人下菜碟儿。奇怪的是，我跟苏童没有产生过交集。我查了一下苏童在德国出版的小说，只有一本《碧奴》还在可供书目上，早年作品《妻妾成群》和《米》只剩旧书摊上找了。然后呢？没有然后。意大利对苏童的兴趣比德国浓厚得多，他在意大利出版的中短篇小说名单很长。让我不解的是他的译者阵容，居然有 12 位之多。一般情况下，一位作家在一个语种里都是被一两名译者攥在手里“专利”着。在意大利，苏童怎么成了项开放性资源？

有意思的是，有七位苏童的意大利译者要赶来威尼斯文学节聚首，跟他开一个圆桌会议。我则被邀请跟著名汉学家马可教授（Marco Ceresa）同台，在文学节的苏童主场上对他左右开弓，提什么问题都行。这是我爱干的活儿。

第二天果然下起了中雨。我到楼下吃早餐，发现酒店厅堂如期泡在了水里。所幸是石板地，有工作人员用扫帚把一汪汪的水往门外街上推。威尼斯人跟水起打交道来真是不动声色。微信里跳出苏童助手发来的消息：要取消我跟苏童约好的单独见面，因为苏童的月票还没有办好，还得带他再去办。助手建议我等他们的进度再说。早餐后又收到马可教授的邮件，他取消了我们约好的午餐，因为临时有事，他脱不开身。这么说，在出场前跟所有当事人有个商量都不可能了。换到德国，这种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果真到了意大利。

我想起德国人阿克曼，人称老阿，1987 年他在北京创办了歌德学院，从此把德国文化介绍到中国，但也没忽略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德国，我甚至觉得后者他干得更欢，汉学家出身嘛。他曾经请苏童去德国莱比锡做了三个月的文学驻留，让苏童喝遍了德国啤酒，同时在一种国内难以发生的寂寞中开始写作《河岸》。这个长篇为苏童赢得了英国国际布克奖的提名。老阿认为，我居然还不认识苏童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就请他给我补补课，告诉我他怎么看这位作家。“哎呀，”老阿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八度，“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第一次看见苏童的时候，最深的印象就是，苏童那真是……真是帅啊！”

幸亏说这话的当儿，老阿的妻子、南京艺术家靳卫红就坐在我俩中间，否则，我对老阿多年形成的认知都会发生动摇。我们三人哈哈大笑起来。老阿指着妻子小红说，“你问她呀，她比我还了解苏童。”靳卫红大大方方地说，在九十年代初，她和苏童是邻居，苏童一家住楼上，她住楼下。从 1990 年开始，就有姜文刘晓庆李少红等人经常去敲苏童的门，有时候靳卫红也跟他们一起聊聊。

“这么说，你是看着苏童长大的？”我夸张了一句。“哈，彼此彼此。”靳卫红继续爽快地介绍，苏童是苏州人，1985 年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就分到南京来工作了，先在南艺工艺美术系当辅导员，接着在《钟山》杂志当编辑，然后在作协当专职作家，现在去了北师大做教授，他的人生很顺当。他成名早，触“电”早，在他那一代作家里，苏童算是先富起来的，不缺钱，人品极好，很慷慨，对朋友特别好，“还有，”靳卫红想了想，好像要咂摸出苏童具体怎么个好法儿，接着说，“他很细腻，有审美态度，做人淡，从来不急猴猴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在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很有南京人特有的被动型感情模式。”

有一次靳卫红去上海，出门前抄起一本书带在火车上读，恰好是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她说，我以前就读过，但年轻时读情节而已。这回读得我泪流满面。要知道，苏童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才 28 岁！我都四十多岁了，才读出他写的那种人生沧桑、宿命和不幸的滋味来！靳卫红还背得出一位叫黄晓初的朋友对苏童的形容：他写小说的时候，好像上帝握着手。

我们的聊天静默下来，靳卫红似乎无意识地领着我跟她进入了一场天才膜拜。还是老阿的一句话把我们揪了回来：“《我的帝王生涯》的确也是我认为苏童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真奇怪，怎么没有德文版呢？你去威尼斯问问苏童，告诉他我很愿意翻译！”

02

走在威尼斯，要么一双脚，要么一只船。这是个没有地铁、汽车和自行车的城市。密集的店铺里摆满了充饥的和炫目的东西，比萨、提拉米苏和冰淇淋，玻璃艺术品、皮质手包和面具。面具店尤其多，走过看过一副副凝固在面具上的表情，有怪异的、妖娆的、冷漠的，都是非人类的。可以想象狂欢节里，在带腐味儿的水汽中，威尼斯有本事把所有人变成千人一面，再变回千面一人。

我打着伞，朝威尼斯大学汉学系走去。小裴教授（Nicoletta Pesaro）负责系里的中国文学翻译中心，她是个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都很强的人，正是她代表文学节，召集了苏童的译者们从意大利的四面八方赶来威尼斯。互相发过无数封邮件后，小裴和我终于在汉学系古老的教学楼里见面了。两人不约而同地省略了客套，直入正题。苏童为什么在意大利有这么多译者？我问。

小裴跟我年龄和个头相仿，深色的眼睛配深色的头发。她的一口中文带着道白感，有板有眼很好听。她说，首先，苏童跟很多中国作家不同，他有很多短篇和中篇小说，这给想做中国文学翻译的译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性。其次，意大利不仅有大出版社，也有很多小出版社。小出版社不是那么商业化，愿意出版来自异域的有个性的文学书。这两个原因加起来，就形成了苏童在意大利的翻译和出版风景。

我想起苏童在一些国内采访里经常提到的一个事实：他热爱写短篇。整个九十年代他几乎都在写短篇。他甚至说，短篇小说是写给自己的，长篇小说是写给苏童的，不过话说回来，他就是苏童。我觉得，绕回来的这句话暴露出他的狡黠，到最后，他还是假装把“自己”跟苏童抹平了。

在关于苏童的访谈里，我还读到过他的一段又自负又谦的话。他说，他有二十几篇无懈可击的短篇小说，有时候拿起来重新读一读，会叹口气：这么好的小说，真的是我写的吗？！尽管还不认识，读到自鸣得意到这种地步的话，我都恨不得给他一拳。可他在访谈里又接着说，他的长篇小说就不一样了，哪怕再好，重读的时候都能发现需要重写的地方，至今他还没写出一部自认为完美的长篇。这又让我替他

唏嘘。如果苏童听到小裴的话，还会纠结着非写长篇不可吗？

小裴说，她上次见到苏童还是在 2000 年，那时自己还读博士呢。那次苏童也认识了罗莎 (Rosa Lombardi)，罗莎今天也特意从罗马赶过来了。正说着，罗莎就从一间教室里走出来，她刚给威尼斯汉学系的学生们上了一堂苏童文学专题课。跟精力充沛的小裴不同，罗莎文静娇小，留着栗色的短发，她是罗马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和意大利的女汉学家们站在一起，仅从身高上我就特别放松，她们不像德国的女同事们那样人高马大，反倒像我在国内的一群闺蜜。罗莎告诉我，她翻译了苏童的《碎瓦》和《罂粟之家》，《罂粟之家》甚至时隔二十多年后又重新译了一遍。她还自选了一个苏童的短篇小说集，也译完出版了。她对苏童的赞誉颇高，用的却是十分简洁的中文：“苏童的语言非常文雅、有诗意，他很会讲故事，我喜欢他作品构造的气氛。他一心只做文学，在文学里做各种实验，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觉得，他是一位大师。”说完“大师”这个词，她噗嗤一笑，可能她太知道这个词的分量了，才不去管别人是否苟同。

其他的译者也陆续到了，只有一位腼腆的男士夹在其中，剩下的人，从二十多岁到六十来岁，全是清一色的女性。热情洋溢的意大利语把我一时冲到了边上。小裴对我说，他们还要筹备一下译者圆桌会议，会有很多学生来旁听，我可以先自己找个地方休息。我点点头，从包里拿出手机杀时间。微信里苏童的助手发来了消息：办好月票了，我们现在在大学旁边的一家咖啡馆休息。你愿意过来吗？

没想到，我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么快就可以被纠正了。在湿淋淋的街上桥上，我左问右问，走了几段冤枉路后，终于找到了那家咖啡馆。推门进去，一眼看见居中的小圆桌旁，两位年轻的意大利女生围坐在一位亚洲中年男人身边，他端正起咖啡杯往嘴边送。其中的一个女孩看见我，就站了起来表示欢迎。

寒暄后，我好奇地问：怎么多了一位保镖？两位女学生自我介绍说，一人是文学节派的志愿者，只陪文学节这两天；另一位是小裴教授派的研究生莎拉，也就是跟我微信联系的人，她的硕士论文是分析苏童的长篇小说《米》，兼翻译其中的部分篇章。看着她老实巴交的样子，我心想，她能搞定苏童这部被人称为黄毒暴的早期作品吗？不管怎样，小裴教授的安排可谓一箭双雕，苏童在威尼斯出行有难处就找莎拉，莎拉的论文有问题就请教苏童。

再打量苏童：成熟稳重又挺自在的一个人，面容跟文学节用的宣传照区别不大，漆黑的短发不高于头皮五毫米，人显得精神利落，黑而宽的浓眉衬托着一副黑框眼镜，眼光直率，无论微笑、大笑还是不笑，嘴角都把他的感性微妙地表达出来。下巴上是一丛故意不刮干净的胡子茬儿，属于这两年流行的男神范儿。这是谁教他的？是他的心肝宝贝女儿还是跟他青梅竹马的太太？

尽管老阿三十年前被苏童“帅倒”的场面在我这里没有重演，但我必须承认，苏童是那种让人一见就喜欢并信任的人，让人放松警惕，变得跟他无话不谈。听着他不带卷舌音的南方普通话，我忍不住向他求证一个传言：话说有一年，驻上海的美领馆邀请苏童去做一场文学活动，美国主持人用英文提问，美国口译做现场翻译。主持人：苏童先生，您的文学灵感是从哪里来的？估计这个问题苏童已经答过上千次了，这次他只简单地回了三个字：看 bao zi (报纸)。口译一脸惊愕，但出于敬业，他还是原原本本地把苏童的话翻译到英文：观察豹子。主持人对苏童立刻刮目相看。

外语再好，听懂笑话也不易，我忙给两位意大利女孩解释这里的梗，就听苏童嘟哝了一句：不记得有这个事情。小裴教授打来电话，招呼我们去参加准备就绪的苏童译者圆桌会议。我和苏童跟在两位志愿者身后，我发现，中等身材的苏童还是很壮



苏童和他的译者

实的，绝不是那类白弱型的江南小生。一路上苏童也给我讲了一个笑话。

就是 2000 年那次，受意大利文化部的邀请，莫言、余华和苏童加上王朔去参加都灵文学节，之前四人先到了威尼斯，受到热情接待，当年的博士生小裴就是陪伴他们的主力。从都灵起四人分作两组，苏童单独去米兰跟出版社谈他的小说《菩萨蛮》的出版事宜，并认识了罗莎；其他三位结伴南下去法国，坐的是跨境火车。到了意法边界，警察上来查签证。Visa please (请拿出签证)！边防官对三位中国作家说。跟莫言和余华比起来，王朔当时的英文水平最高，他听懂了 Visa 这个词，就掏出自己的 Visa 信用卡，给警察牛哄哄地递了过去。

放下王朔不表，我问苏童，国内媒体为什么至今都习惯把“莫言余华和苏童……”一

嘟噜写下来，好像他们三人是一串黏在一起掰不开的糖葫芦。媒体怎么样我不管，苏童说，这种青年时代结下的亲密感是化不掉的。只是，我们二三十岁在一起的时候，拼命聊文学，好像把文学都聊光了，到了四十岁，在一起就只聊足球了，现在五十多岁了，见面聊一堆乱七八糟的，比如美食和红酒。他说着甩了甩头，似乎要甩掉脸上的雨水。

### 03

苏童的译者圆桌会议开得有些失控。

首先，苏童跟他意大利朋友们的重逢环节严重超时，双方都有失散多年的感慨，“你还记得吗……”“是呀，那时候咱们……”这种话在空气中至少来回投掷了七八轮。小裴和罗莎两位教授容光焕发，好像往苏童身边一站，她们就穿越回了二十年前的大学生时代。

其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苏童和他的一群译者，的确有小二十年没怎么深聊了。

鸡对鸭讲是这样进行的：

“为什么你总是写女人和特别会写女人？”有译者问。

“我后来的作品就没有专门写女人了，”苏童回答，“甚至，从我现在的作品总量计算，写女人的题材占比不超过 10%。”

“你的作品以中短篇为主，你还有写长篇的打算吗？”罗莎问。

“我写了好几部长篇啊！原来你们都不知道哇……2015 年获茅奖的《黄雀记》就是我的上一个长篇。现在有一个新长篇正在写，这次还带到威尼斯来了，在这里继续写。”苏童耐心地解释。

“为什么你那么爱写过去？你也会考虑当代题材吗？”另一位译者问。

苏童乐了，“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我近几年的作品，我写当代的小说还挺多的，跟早期的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主持人小裴教授发声了：“你为什么从来不把你的新作品寄给我们？我们对你都不了解了！”

我坐在学生们当中，有些替苏童发窘。好在他倒很坦然，甚至有些嬉皮笑脸，“我知道有的作家这么做，他们一有了新作就主动寄给译者。可我不是这样的，我不会主动寄给你们的。你们如果来要，我才会寄。”

这不就是新卫红说的南京人的情感模式吗，被动的，不急猴急的，听着很美好。可坐在威尼斯这场讨论会的现场，我却觉得，苏童被南京人搞得真是误事儿啊。后来，一个女学生的提问结束了这个乱糟糟的重逢场面。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为什么要那样结尾？”

我吓了一跳，这个眼睛亮晶晶的漂亮女孩，怎么一挑就挑到了苏童写得最残忍的一篇故事？这是一个很短的短篇，只有五千来字，苏童写了三个人物，爷爷、孙子和孙女，连名字都没给起，伊索寓言式的叙事。在诗意图盎然的江南风景里，他营造了一种天真和无力的氛围：爷爷和孙子女聊一只看不见的白鹤。爷爷心里只怕一件事——死后被强制火化。他渴望像祖辈那样，入土为安，乘白鹤而去。如果没有那个结尾，这也是一篇抒情得极有节奏的散文诗。但苏童式的结尾颠覆了我们所有的想象：孙子为了帮助爷爷实现土葬的心愿，把爷爷给活埋了。爷爷留下一句很满足的话：“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我很想问这个女孩，她读的是小说还是看的是电影？就是在国内，很多人也是通过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李少红的《红粉》才听说作家苏童的。严肃文学偶尔在大众市场里光鲜一下，不外乎获奖和走影视这两个契机吧。但如果影视的呈现也是曲高和寡的闷片，事情就得有意思了。苏童 1997 年写的这个短篇，被做闷片的青年导演李睿珺拍成同名艺术电影，入选了 2012 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

李睿珺曾跟我详细聊过他是怎么做《白鹤》的。2008 年，26 岁的他刚完成自己的第二部艺术电影《老驴头》，讲的是乡村老人的生存困境。他在北大边上租了个小屋，天天去泡中关村图书大厦，坐在小板凳上写剧本。写累了，就在书架上翻翻书，典型的北漂艺术青年。一个冬日，他在一本小说集里翻到了苏童的这个短篇，先是被题目吸引，一口气读完后，李睿珺产生了一种巨浪般的冲动。他觉得这个故事跟他有关，简直就是为他写的，甚至他自己好像都参与了写作。这个故事里有他一直想表达可还没发现的东西。

这让我想起苏童的一句话，“最理想的小说与影视的结合，通常是意外，而不是必然。”人还站在书店里，李睿珺已经在脑子里把文本翻译成电影画面，一共翻译了两遍。然后他回家，向女友和几位好友激动地宣布了自己的发现。当然所有人都摁住他，拦着他不要发疯。苏童是中国最大牌的作家之一，找他的是张艺谋李少红。你是谁？谁知道你？你有钱吗？

李睿珺长得瘦瘦小小的，平时靠在电视台打工和拍婚纱照来攒钱做自己的电影，用的演员是自己的女朋友和一堆老家的亲戚。可他放不下白鹤。后来，他偶尔认识了一位喜欢《老驴头》的电影策展人，帮他给苏童递话，《老驴头》的光盘也转交给苏童鉴定。一个月后，策展人告诉他，苏童同意了。事情怎么可能如此简单？李睿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他也没敢告诉任何人，他其实已经把白鹤的电影剧本写完了，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这么快过。

2011 年 4 月，策展人带着李睿珺去南京拜访苏童。李睿珺一路上忐忑不安：万一苏童摆大师架子，提出些自己觉得不合适的创作要求，是妥协呢还是不妥协？苏童住

在郊外，招待客人们坐在院子里喝啤酒。李睿珺给苏童口述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苏童很喜欢他设想的割水草的一场戏，说，我的小说里是南方意象，你是甘肃人，放到西北去拍可能更合适。大家很快签了个字，接着喝啤酒，聊电影，好像此行的正事不是白鹤，而是专门为聊他人的电影。李睿珺记得自己喝了好多啤酒都憋着，舍不得去上厕所，生怕错过了听苏童讲话。苏童随和自然，和大家聊天就像一个正常的朋友，年龄、行业、身份和地位都不是个事儿。尤其听到苏童说喜欢罗伊·安德森的《二楼传来的歌声》，李睿珺就暗认他为知己了。苏童的电影审美品位这么高，自己拍闷片他应该不会不高兴的。

两人第二次见面是一年后在威尼斯，《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在这里全球首映。苏童是在电影节上才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的。李睿珺没让苏童前期参与，苏童也从没问过。李睿珺对此的解释是，作为创作者，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创作被他人干预。况且苏童本人在公共场合说过多次，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是远方亲戚，他懂得这是两门不同类别的艺术。

2012年在威尼斯，29岁的李睿珺跟大作家住同一家酒店，天天一起吃早餐，一起聊别人的电影，然后一起去电影节走红毯。可他还是忐忑，他不敢问苏童对这部电影的看法，人家说好说不好都不合适，就别为难苏童了。电影里，他把苏童的文本作为结尾，在苏童寓言式的文本上，他扩展了大量的内容细节，比如老人的职业、家庭构成、周边环境，给结尾安排了充分合理的发展前史。他植入了尽可能多的视觉元素，还把苏童小说里的核桃树给换成了一棵在西北生长的沙枣树。他说，沙枣树的树皮干裂干巴，没有核桃树的光滑，这种毫无生机但又还有生命迹象的状态，跟主人公爷爷的心态更接近。苏童会怎么看他做的这些扩容呢？后来，他听到苏童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说，自己的不少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但这回是第一次看片落泪。

“白鹤写的是一个埋葬的故事，”我听到苏童已经在回答学生的提问了，他的语调严肃起来，“为什么结尾是那样呢？可以说，我下笔太狠。”他沉吟片刻，又说，“中国有一个古老的观念，就是入土为安，人死入土了，大家就会认为一切还在延续。可是取消土葬后，几亿农民跟土地的关系就断了，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剧。我是用文学对悲剧做出我认为悲剧该有的表现。”

04

跟译者们开的圆桌会议就像一场回乡走亲戚，亲热中裹着混乱。文学节上的苏童主场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电视台支起了摄像机和话筒，各家媒体和文化界的头头脑脑也到场了，此外场地十分庄严。圣玛格丽特礼堂建于公元九世纪，前身是教堂，后来改为剧场，我们要登的台就是剧场的舞台。教堂留下来的古老壁画一直铺展到高耸的圆形穹顶上，圣徒和天使的目光温柔地俯视着坐在礼堂里的人们，仿佛在告诫：只要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离神圣很近。

忙碌的马可教授终于在活动开始前五分钟现身了，他达利式的胡须和质地精良的套装透着老绅士的优雅。他人也很善良，上台前的一刹那给苏童露了题，他想请苏童谈谈文学和电影的关系，以及东方主义对理解苏童的文学是否带来偏见。我不像马可教授那么好心，没给苏童备课就坐到了台上。主要是我想提的问题对苏童有所冒犯，就不要提前给他添堵了。

我们身后是块巨大的屏幕，被巩俐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填满了，发出暗红色的暧昧。我猜不透苏童此时的心情。写出《妻妾成群》时他才26岁。三十年过去了，他完成了200多个短篇、十几部中长篇，世界文坛上到处行走……可这一切似乎都不太起作用。在世人眼里，他还是张艺谋的红灯笼后面的那个作家。

苏童首先感谢了张艺谋，没有他的电影，苏童这个名字不可能在西方读者里达到现在的认知度。接着他感谢了意大利和法国的出版商，只有在这两个语种里，《妻妾成群》这本小说的题目被保留下来，没有被电影标题所取代。

我看出了眼坐在我们中间的口译茱莉，她是《碧奴》的译者，很年轻。她能理解苏童要表达的一位作家的尊严感吗？

谈到小说和电影的关系，苏童说，两者都要给读者和观众误读的权利。意大利作家艾柯不是说过嘛，文学就是野餐，作家带去了词语，读者带来了意义。至于对他的作品的偏见，苏童笑了一下，说，“很多读者都以为苏童写女人写得好。我的观点是，不要反驳读者，反驳读者是很无趣的。我知道自己在写人性，继续写下去就是了。不少汉学家的确喜欢翻译我指向过去的那部分作品，觉得容易被接受。其实，在中国也有持这种看法的人，觉得写当下不如写过去好看。还有人建议我，故事不变，只要把时间改到过去就能卖好。”

台下观众听到这里也笑了。看来，茱莉比美领馆的口译强。苏童总结道：我写作的时候是不考虑读者的，写完后才观察读者的反应。我当然要用一生的努力，撕下贴在我身上的标签，但又不要伤害我的读者，我知道这很难。

苏童的坦诚使他毫不设防，我就在这时乘虚而入，当然从简单的问题开始。苏童的小说里有很多密实的细节，真得仿佛都是他的亲身经历。他是怎么谋划写作的？“我像猫一样地生活，”苏童答道。台下的气氛刷地被台上这只“猫”吸了过去。“猫在夜里是异常警觉的，我的写作也是从夜里两三点开始，方圆几里只有一个人在掌控这段时间，这种感觉一来，我就可以动笔写小说了。我从来不准备素材，写作就是作家把自己分裂出去，像演员那样，生活经验中不可能看见的东西会从笔下出现，

人物自己开始说话。此外，还有一种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的分裂：我已经在南京生活三十多年了，也很喜欢这座城市。可是只要一动笔，我的故事就回到苏州，我的故乡。”

在公元九世纪建成的老教堂里听这番话，我又想起关于上帝握住他的手这个说法。我赶快把话题转到最实际的地方：为什么他的书在其他国家，比如德国，传播得不够广呢？

苏童的被动模式又被调出来了：“我觉得，文学不是一个那么经过设计的东西，它是一个偶遇。”说完他就瞪着我等下一个提问。

冒犯性的问题来了：昨天有英国作家在文学节上谈到步入中老年对写作的影响，请问你的体会是？你少年成名，这些年你尽管一直在勤奋地创作，可大家对你的定位多少还是那个写出《妻妾成群》的苏童。你怎么办？

苏童把目光投向半空，全场把目光投向他。他很平静，至少这个问题没有让他受伤，而他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2018年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年轻，一个人健康的时候是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的。可是，”他话锋一转，“2018年，疾病突然都来找我了，高血压、腰椎受损、胃炎……身体经受的打击还不算什么，关键是我觉得很丢脸，因为我的都是典型的老年病，衰老是明显的了。”

在欧洲，大家都不谈病，既不跟朋友谈，更不在大庭广众下谈，这是个人隐私里的隐私。苏童一脚就踢开了这个禁忌，谈得坦率。我看了眼台下，刷向他的目光里有很多敬意。“五十多岁看自己二十多岁时写的作品，还是蛮感慨的。”他继续说，“荷尔蒙力比多是可以产生艺术的，更重要的是，思考、经验和成熟的心智会催生更伟大的艺术。当我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年龄，我更加信任后一条。我还是有野心的，我看自己现在的作品比年轻时的好，未来会比年轻时和现在写得还好。”

马可教授和我从台上下来后，苏童留在原地签书。我拿手机扫了一圈礼堂里等签书排的长队，蜿蜒绵延看不到尾，又是女性居多。马可教授给了我一个吃提拉米苏的地址就告辞了。我走过去跟小裴和罗莎聊了几句，她们还在讨论苏童刚才的发言。电视台不太礼貌，把苏童从台上请下来进行采访，排签名的队伍只好干等。助手莎拉冲我尴尬地笑笑。

一小时后，所有人都被轰出了礼堂，因为下一场文学活动要准备入场了。我们一行人走在威尼斯的雨里，打算去吃一种带初恋味道的提拉米苏。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问苏童，“李睿珺给你的《老驴头》的碟你看过吗？”“没看。”“那你怎么就让他拍白鹤了？”“我很喜欢这个人，他身上有种朴素的气息。”

距那届下雨的威尼斯文学节都快过去两年了。我们生活在新冠疫情的管控下，全世界的文学节和电影节都歇菜了。我还记得苏童在威尼斯吃提拉米苏的样子，他边吃边说：“尽管威尼斯水城和我的苏州水城有这样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灵魂很相似。每天的河水看上去是旧的，其实它都是新的，它对生命生活是有暗示的。水给我们一个暗示，什么都会过去，没什么太多计较的。”

\* 文中图片由作者王竞拍摄



王竞

中西文化项目策划人 / 写作者 / 德国当代文学翻译者。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1年赴德国工作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和教育学博士。2013年至今生活在汉堡。

作家笔记

王竞是中德两国文学的游历者，她将在这个专栏中记录作家们生活和精神的种种碎屑，并让这些碎屑神奇地闪出文学的幻彩。



立陶宛的九号堡垒，苏联统治时期曾作为监狱和转送犯人的中转站，二战期间为纳粹军队的死亡集中营；来自 [Lee Fennar@flickr](#)

## 档案

# 友好边境线

切斯瓦夫·米沃什 | 发现经典

## 我不能容忍任何权威对我的思想束缚

我这里不是要写一篇戈雅<sup>[1]</sup>绘画的个人注解。事件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克制谨慎，不能感情用事，这种情况适用于语言无法充分表达的时候。单要追踪一个人的命运都会使我们陷入个人和历史盘根错节的纠葛中。真要叙述起来都能有史诗的广度，但事实是，对这个时代的全面研究还远远不够，和拿破仑发动的那场战争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谓史无前例：此外社会学和心理学目前对作家影响非常大。而如果我在这里还以纯主观视角叙述一个私人故事的话，我就等于什么也没干，因为我肯定会遗漏掉最精彩的部分。还有，我必须在这里重复一遍，这不是私人日记。我不是在按日期月份讲述我的遭遇。这样的话我就得还原某些模糊的记忆，我无法做到如此事无巨细。因此我将限制自己只选取几个镜头，好像我的工作是用剪刀对付大堆电影胶片。我剪辑的画面会尽量贴合大众的口味，避免弄出来是那种看不懂的表现主义风格。

闪电战开始时，我觉得有必要入伍参军，尽一份义务。但很难找到能主持大局，带领我们反击的人。不久我还是穿上了一件不伦不类的军服，可这期间没干任何光荣的事，而是参加撤退。灾难不断震惊着我们。对我来说，1939年9月还是一个转折点，没有经历过正常生活突然被拦腰截断的人来说，这种集体灾难是很难想象的。法国的闪电战也没有它严重。

我把自己那时的所有遭遇简化成几件事。躺在被飞机轰炸公路旁的田野里，我盯着面前的一块石头和两片草叶。听着炸弹的呼啸声，我突然明白了物质的意义：那块石头和那两片草叶组成了整个王国，组成了形状、色彩、纹理，光亮的无限。他们就是宇宙。我过去总是拒绝接受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的划分，喜欢端详树皮或鸟翼，而不是日出和日落。但现在我真切地领悟到了物质的深度。

另外一件事是当我意识到政府，官员和军队毫无作为的时候，我的内心既愤怒又有种解脱感。自暴自弃的我躲在干草堆里睡大觉。最后战争的局势已经很明朗了。漫长可怕的抵抗活动根本无用，我们从自我安慰的谎言，幻觉和欺骗中醒悟过来；真相就在眼前：只有村井，屋顶和犁是靠得住的，而不是政治家的谎言连篇的演讲。国家已经无力给它的人民提供任何保护，人们安稳的生活一去不返，好像它过去从未存在过。

我和朋友们讨论时局，但我发现只有我有东逃的念头。我和他们对未来的所见不同。那时甚至是后来的波兰，没人认为希特勒会取得最终胜利。人们骨子里都深信上帝

会亲自干预历史事件，站在公正一边，邪恶势力注定会灭亡。被这种信念蛊惑，波兰人失去很多斗争机会，把自己扔向地狱边缘，最后惊讶地看到上帝根本没帮忙，因此虔诚之心大大受到影响——但尽管这样，大家从没动摇过波兰最终会胜利的信心。我也拒绝接受未来会出现一个德国千禧年，但潜意识总是和我作对。我身上有太多摩尼教的东西，以至于不能接受上帝会改变世界自然进程的想法。

我和他们的分歧在于他们既没有意识到灾难的严重程度也没有意识到它的持久性。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法国，但去过巴黎的我知道，这份自我安慰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还有他们想要抓住的另一根救命稻草是共产主义（也包括托洛茨基主义）。但众所周知红军和德军不久前狼狈为奸，合谋瓜分了波兰领土，这使把希望放在共产主义一边的人很尴尬。当我遇见他们，我们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对目前险恶的局势心知肚明，但都素手无策。这正像头脑清醒的人看见语无伦次的酒鬼时只能怜悯地投以无奈的冷眼。但我们的清醒也是相对的。我们都还没有预见到在当时和未来灾难都不只来自德国一方，还有苏联。共产主义势力之所以不断壮大是因为它是上帝信仰的一个变种；也就是说，在对历史进程进行基本和理性判断后，没有人会去支持纳粹一边。某种程度上我承认他们观点有合理的一面，特别是当他们呼吁世界的辩证法：机智的人不会盲目和愚蠢地被武力征服。但复仇何时来临，没有人敢预言。无疑解决之道压在了苏联那边，但这个国家也同样不值得信任，有好多共产主义者从苏联逃到德区去了。我的清醒，它最开始还使我感到宽慰，但不久就麻木了，或者也是因为头脑发热，有好几个月我被国内荒诞的时局牵着走，我的意志力好像完全消失了。我不得不忽略掉那些荒唐事，因为要描述它们就要用一种和本文完全不同的语言。

如果1940年初重新来过的话，如果我发现自己再一次置身家乡，我一定会将上面的原因归咎于周围糟糕的环境和我自己的无知。就好像一位医生检查完我身患绝症的身体，知道我是死路一条时，建议最好还是回老家，和家人呆在一起为好。维尔诺，像所有波兰东部领地一样，打败后被红军占领，几周以后作为友谊的象征被交给了立陶宛。对于友谊这个词的理解，我们都知道双方并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立陶宛，作为交换，必须像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样允许苏联建军事基地。这三个小国家由于还暂且算是独立国，不得不在两个大国之间小心地周旋，尽力避免与苏联或德国任何一方发生冲突。因此一切还保持战前的模样——超市，旅馆，咖啡馆，火车等照常运营。在维尔诺，报纸以不同的语言刊印，包括波兰语，人们因此不得不和审查官斗智斗勇。我当时很难接受维尔诺的改变，这座噩梦般的城市——城墙上挂着新国旗，街道的名字和标记牌都换了。成群的波兰难民涌到这里使它变成了闹哄哄的巴别塔，虽然立陶宛害怕强国邻居报复，但它对难民们还是尽了地主之谊。当时货币兑换和护照买卖生意红火，到处是关于战争的流言蜚语，诚惶诚恐的人们挤在邮局，犹太教师，打了败仗的军官，职务到期的外交官，还有那些海外有关系的人，都纷纷往法国，英国和美国发电报。当时离境的飞机是需要在斯德哥尔摩做中转的，这条路已经越来越走了。但仍不断地有难民，铤而走险，冒着进集中营的代价出逃。事实是就算安全抵达了斯德哥尔摩，他们马上就知道了自己厄运难逃，因为出境的路线早已经被封锁了。

欧洲旅馆几乎是维尔诺的地理坐标。它位于两条繁华的街道交汇处：一条是多明我街，它有让人引以为傲的天主教堂和修道院，另一条是从中世纪以来就一直有的德国街，它通往犹太居住区。菲利克斯和他的夫人就住在这里。当时我因自己的一些遭遇心烦意乱，和他有过一段亲密的接触。我参加了他组织的聚会，所以在这里我为他做一副素描画像，是有资格的。

菲利克斯像日本人，黑头发，蜡黄脸，整个人长得像精工细雕的艺术品。他的性格无可挑剔，举止高雅，身上总能闻到香水味。他来自犹太人家，非常富有，以至于可以不去工作，尽管他早已在比利时完成了他的学术研究。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卖掉了华沙的房子，带着满塞着美元和黄金的手提箱逃走了。他也带上了他年轻迷人的妻子，还有她的皮草和珠宝。他们之间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他的妻子，自觉自己样貌身材高人一等，敢动手打他，如果他还击，她就威胁要自杀，并且立刻跑到窗口要跳下去。菲利克斯只好走掉，把自己关进卫生间——不敢看跳楼那一幕。几分钟后，朋友们（这些人经常扮演和事老的角色）会敲敲卫生间的门，然后听见他在里面小声问道：“她怎么样了？”

菲利克斯是一个老酒鬼，但他不喜欢一个人喝酒。相反，他为了取乐，经常要一群人给他讲逸闻趣事或笑话。他欣赏有才智和有教养的人，因此他对艺术家和诗人有好感，这些优点在他身上，使他被看做是，说难听一点，一个完美的奶头——也就是说他允许自己被揩油。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为了逃脱希特勒的魔掌从华沙跑出来的，菲利克斯把他们召集在自己家里，举办宴会。

喝酒经常上午十一点开始，没有人做出格的事。诗人J和S主持大局，控制节奏，这两个老酒鬼经验丰富，从未出过丑。他们的喝法是从大玻璃杯里小口抿伏特加，不停地续杯，整个白天一直到深夜不停地和人胡扯闲谈。第二天早晨酒醒后，整个过程又重新来过。我们的时间，就是这样在绝望和虚无中过去了，没有人理会外面的残酷现实；大家都是沉浸在酒精的麻醉里。

聚会狂欢可以说是垂死前的最后挣扎，这些志同道合的人知道死神就在门外，还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喜欢呆在聚会里是因为我们是清醒的，特别是有时候听见某人随口说起一个幽默段子什么的，在当时我们身处被两个超强大国联手算计的时候，听起来简直是一语中的。例如S讲他自己对希特勒的看法，说元首仅仅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装疯卖傻，白天他表演完一段撕心裂肺的演讲，晚上回到家里亟不可待地

脱下的制服之后，穿的是英国法兰绒大衣，抽的是英国雪茄，喝的是威士忌，希特勒暗地里其实崇拜外，极度蔑视德国。S 也讲些苏联和芬兰交战时的小故事，一个苏联士兵在芬兰人的木屋里看见了挂钟，他觉得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手表，于是把它偷进背包里随身携带着，挂钟很沉他不得不假装受伤弯腰走路。菲利克斯醉心地听着我们在伏特加的作用下想出的这些逸闻趣事和打油诗，以此掩盖恐惧，但实际上他恐惧的是存在本身。

我不能做到完全地放松。一个人神经极端紧张，靠酒精麻醉是起不了安慰作用的，喝得神魂颠倒或吐出五脏六腑也不能终止大脑的运转。我像是在遭受眼中所见之物的伤害，好像它们在释放灼伤皮肤的射线，因为在街上我总是脚步匆匆，很少左顾右盼，只希望快点到菲利克斯家里落座，在那，过去和未来都至少暂时被挡在门外。我不能阅读，不能写，也不能参加讨论，总觉得我们永远不能探测到真相。我只想安静一会，脑袋像植物或动物那样无意识，但很多时候都办不到。

我的同伴们用私通来回避现实，大家都觉得这是遗忘现实的良药。但有些人认为小打小闹不过瘾，必须玩些新花样。例如 J 对我说，在教堂做爱才刺激。我猜想他话里的意思是：性里必须加点邪恶的东西才好玩；如果没有禁忌，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了，那任何事情都不会使人们感兴趣了。J 不喜欢按常规做事，他拥护禁令，因为它能赋予性神秘感，这样才值得冒险。看一下他身旁的女伴，一个温柔的苗条女孩，一害羞脸红，很难想象在教堂的空旷大厅里她会对他的进攻大喊大叫，这条雌鹿没准只是羞答答放下睫毛罢了。我，坚决守身如玉，是因为我要对当时仍在华沙的朋友保持忠诚，还有就是我有点迷信地认为所有事情都是相关的，比如对性和对世界的态度上，一个人对性随便，他对世界也会抱有一样的随便态度。此外，我还坚持认为在当时的紧张环境下，从性里寻找安全感是非常可疑的，身处战争的危险之中，我们应该养精蓄锐。厄运不会因我们的自暴自弃而自动消失。第三个原因是我常常害怕性自由会带来不幸，因为它释放了我们体内压抑的能量。所以我故意让自己的神经紧绷下去，只靠伏特加稍稍缓和点。

我们中诗人 S 突然去世，这件事为我们思考自己的处境敲响了警钟，死亡可说是以对 S 生前可怕的生活逻辑的嘲笑。他三十岁。他死于性交，事情发生他和某个贵妇人兼荡妇，正在水火交融的时候。当我们到了圣雅各布教堂的太平间时，之前法医为了查明死因刚做了尸检，我们都被他的漂亮和整洁打动了，他生前脖子上凸起的甲状腺，已经完全消失了。之后所有人陪他穿过村镇，跟在浩大的送葬队伍后面去墓地。他的死讯刊登在波兰报纸上，人们为他办了一场体面的葬礼。

城市墓地大多气氛阴郁，放眼望去只是林立的墓碑，但维尔诺罗莎公墓不同，这里位于一座山坡上，到处生长着古树——我们把 S 葬在十九世纪诗人赛罗克拉旁边。圣诞节的时候，墓地上会燃起成千上万盏蜡烛和油灯，在头顶的斜坡上和脚下的山谷里可以看见他们在风中摇曳。另外，波兰战役领导人毕苏斯基也长眠此地，他的碑石是惹人注目的大块玄武岩。我们为 S 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始终觉得他的死或许并不是坏事。后来的葬礼宴上，我们特意留了把椅子给他，还有一个斟满的酒杯。

我们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群颓废者。虽然我们性格各异，只是碰巧凑在了一起。实际上我们有一套统一的行动哲学，它来源于一种心理，即认为身处困境时应静观其变而不是顶风上。菲利克斯就是个好例子，他变卖家产后把钱都花在了享乐上，比那些死守着就要泡汤的财产的守财奴要明智得多。他的嗜酒协会联盟的成员们都是乐观派，大家一致避谈未来，逃避责任。聚会实际是一场向那个年代挥手告别的欢送仪式，它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已经永远消逝了。

接着到了 1940 年的夏天，我见证了立陶宛的消失。波兰正处在战火和喧嚣中，早已自身难保；而苏联在这里做的好事可没用一枪一炮。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军占领了巴黎。在大教堂广场的咖啡馆，我懒洋洋地盯着桌面上的阳光，窗前不时有穿印花裙的女人经过；很多都是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她们是到大商场来买东西的，这里可不必排队或使用配给卡。突然行人道上一阵响亮的金属刮擦声引起了和其他人的注意，人们纷纷从桌旁起身向外看，当看到一辆巨型灰暗的坦克停在街心时，所有人都站住了，没回过神来，几个苏联军官在坦克的旋转枪架上正冲我们挥着手。大家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军事演习，而要叫我们把它看成是侵略实在是需要点高智商，想象一下，春光明媚的一天，周围报刊亭和卖花摊都在营业，还有一只小狗在菩提树下撒尿，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这时远方某位政治家一声令下就决定了立陶宛的命运。

对一个不知情的人来说，那天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到了夜晚，扩音器里滋滋响，大街上有亚洲的士兵在巡逻，他们的薄刺刀像锋利的锥头，比他们的头还高出三英尺。由于与立陶宛毗邻的几个波兰县城已经被迫加入了苏联版图，人们都觉得很气愤——除了几百个本地的共产主义信徒外。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恐惧在不断升级，它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身体的疼痛，伸手可及。

我去河边，坐在沙滩上，看见皮肤晒得黝黑的男孩们站在橡皮船上，汽艇的螺旋桨发动机嗡嗡直响，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小船，它们是只要你在船尾用一根长浆就可滑走。我对这座城市感到难过，我熟悉它的每一块石墙。我熟悉这个国家的街道，森林，湖泊和村庄，如今村庄里的人们和土地在备受蹂躏。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当希特勒进军波兰的时候，当时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不会长久。狼无疑是危险的动物，他注定就是咬别人的坏蛋，向他寻求保护没有任何帮助；但除了他毒牙和爪子之外，他还拥有别的；这就是自动化武器，要知道坦克、飞机比狼更加危险。对我来说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就是手握高科技武器的狼，国家社会主义总是假装纯洁，实际

上骨子里非常邪恶，理论上还发展出了列宁那种善和恶交织的阴谋论。当然我的观点并非全然这么冷酷。只不过是触景生情，当时我眼前是一座矗立在沙洲上的发电站，一群孩子在河岸上钓鱼的，还有河流，天空，所有这些在告诉我，目前发生一切早晚会有一场最终的审判。

从那天起我注意到过去在街上迎面碰面对我不理不睬的人，现在都点头哈腰向我示好。因为谣传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觉得我会变得有权有势，现在正是巴结的时候。没错，我应该审时度势，写些颂诗之类的东西，应该向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最近通过“大选”的方式合并到苏联版图这件事热情地赞扬一番。这些人的嘴脸给了我恶意的快感，其实预测我有权有势的人是非常没有远见。我暗中计划着要和他们开一个更大的玩笑。

政治上我亲近波兰社会主义小组这个团体，他们曾和斯德哥尔摩保持来往，里面的成员都是从前持中立态度的立陶宛人（瑞典的社会主义者曾帮忙给我们传递小册子），他们也和美国来往，思想领袖是奥斯卡·朗斯，他曾在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朗斯后来成了波兰人民共和国驻美国的第一任大使，这是那个时代见怪不怪的事情，很多公众人物会突然改变自己的政治身份以求生或寻找通往权力之路。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小组里我认识了苏菲。

苏菲大概有五十或六十岁了。她黑头发（染过的），头脑灵敏，性格激烈，抽起烟来不管不顾，为了节省她把烟撕成两半再塞进玻璃烟嘴里。作为倒卖各种文件的生意人，她在维尔诺和华沙之间已经非法越境过两次。没费什么劲我们就达成了协议，下次一起撤退，她说时间最好不要拖太久，因为这段路变得越来越难走了，封锁边境是早晚的事。

我们对地图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以寻找一条安全的路线，最后不得不佩服所有极权主义国家在边境使用钢丝网围栏的馊主意。最省事的路线就是直接到东普鲁士去；但对我们那里的地形不熟悉，还不知能不能被当作当地居民糊弄过关，万一败露的话很可能就成了纳粹的猎物。唯一可行的是先前往夹在立陶宛和东普鲁士间的一个波兰小县城，那里一部分领土现在已被德国占领。如果我们设法成功穿过苏德交界地（愿老天保佑），县城的这一边就是波兰和东普鲁士的旧疆界（还有人在那里巡逻）。从那里我们将穿过东普鲁士到达西南边境，之后我们将第三次从这里越境，进入波兰的另外一个县城，那里现在也被德国占去了。最后我们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越境，最终进入德国保护区，到达华沙与克拉夫利夫；也就是进入波兰伪政府统治区。纳粹在我们这个被占领的国家设置这么多障碍，原因非常明显：就是要圈住我们这些受惊的人类动物，切断在危险时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的可能性。

如果说我去波兰是酝酿已久，精心策划后决定的，我就在撒谎。如果从一开始我就有此打算或许我就不会去了。因为我知道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越境时被抓，直接进了北部监狱或集中营的焚烧炉里。实际上我是由于自负或骄傲，我忍不住撇嘴：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他们能随心所欲地处置我？就因为他们手中握有权力每个人都得俯首听命吗？再说我去华沙还有私人原因，我的朋友在那，很久以前我就打算去，那么现在为什么我要听命于他们，使自己的生活受这个政权的监管，这个政权，谁说得准，也许永不会灭亡？此外我也看不惯周围卑躬屈膝的做派；在菲利克斯那里长时间无所事事之后，我再不能继续浪费生命。如果我不走，说不定哪天他们会推给我一张纸，命令我：“要么写一篇政治颂歌，要么蹲五年监狱？”但在秘密逃亡前我决不会举手投降。

准备工作耗时耗力，要暗中进行：不能泄露一点风声，还必须假装对新制度拍手欢迎。我去参加了“大选”，严肃认真地把写好的票投进了投票箱，以维护自己作为公民的自主选择权，结果——百分之九十九的票相同——还是弄虚作假了，像当初决定立陶宛是否与苏联合并的时候一样。

我没有和朋友们一一辞别，因为谣言会在半个小时内传到咖啡馆之外。我也没有和菲利克斯说再见，这里我应该提一下他随后的遭遇，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

菲利克斯非常胆小。一天晚上，菲利克斯的密友律师 X，说为了安全起见，他可以帮助他把珠宝埋在花园里，菲利克斯照做了。但第二天早晨菲利克斯觉得不安。夜里他们两人再次去了花园，但什么都没有发现。那真是非常古怪的巧合，从那个时候起，律师 X 开始花钱如流水，后来菲利克斯和他妻子逃往马沙尔时还是他的酒友们凑钱买的车票。菲利克斯的离开近乎奇迹，因为只有拥有日本通行证的人官方才允许出境，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得到这样一张通行证几乎是不可能的。

好像是一位深谋远虑的犹太拉比帮他解了围：这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在所有领事馆都还办公的时候，尽可能多地办理了去各国的签证（甚至是那些不必要的），菲利克斯的日本签证，就是请人从他的护照上复制的，花了一大笔钱。但它有个缺点：这里没人认识日本字母，因此每个复制签证的人都不知道第一个持有者姓什么。据说第五个偷渡者抵达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境内时，日本人开始采取了闭关措施。不管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或仅仅是道听途说，菲利克斯，确实是先到了上海，从那又经澳大利亚去了美国并入伍参军，再后来他在夏威夷的一场车祸中丧生。如果他真是死于意外，不是自杀的话，我会多尊敬他一分。

有一天苏菲的话激怒了我，她说两天前我们出发就好了，因为找问路向导的人要价

很高，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了，她说她另找了一个，这个人会出一份钱，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她告诉我这个人是个药剂师，因战争逃亡到了维尔诺，他想要回家和家人团聚。但问题是，我该同意吗？苏菲的语气听起来很不对劲。要么这个候选人给了她一大笔钱，两人私下交易过了，否则她应该能预见到多一个人一定会给我们带来麻烦。而且她声音里那种甜蜜的话语太不像她了。我试图反对：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通行证就等于没有，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弄一个。我已经拿到了那些德国通行证，它可以保证我俩从德国境内的苏瓦乌基小城顺利过关，再从东普鲁士进入到伪波兰政府统治区。生产这些通行证的是本地的印刷机，他们造假的功夫一流，包括纳粹的十字记号大印章——这些印章证明我们大学美术系里面都是些训练有素艺术家，但实际上有通行证也不能保证万事无忧，可总要试一试……苏菲有点担心地说途中我们要徒步越境，不是一个而是四个边境。无疑，当她说由于我们手里是假通行证危险更甚时，我也觉得如此。鉴于她的态度，当她在纸片上写下用钱的具体数目时，我只好投降了，不再反对药剂师的加入。

我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在火车站集合。站台上，苏菲打扮很利索，只背了个背包，头上裹了一块方巾，像个乡村女教师，我拎了个手提袋，但我的长相大概会暴露自己，因为我有一张立陶宛人典型的棱骨分明的脸。而药剂师（我直到那天才第一次看见他），灰圆脸，浅蓝色的小眼睛鬼鬼祟祟的，他满身赘肉，看起来像只河马，但他一点也没有河马的可爱，不过是个市侩的商人。这时我更确信苏菲和他一定私下里达成了什么交易。最可气的是他带了一个用皮绳精心捆绑的大手提箱，这无疑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一眼就能看穿我们的逃亡计划。

车窗外的风景一一向后退，一草一木我都记忆犹新，一个站名使我想起了过去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分手之痛犹在。但很快我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药剂师身上，或毋宁说，转移到了我受伤的自尊心上。在我们就一些事情交换看法后，我认定他就是一头猪，一个世故的蠢货。我很后悔，自己竟然和这种人一起出逃，在我心里我把这场行动看成是自由的宣言，而这个家伙满脑浆糊，生来只关心钱和娶妻生子。我认为他的出现完全就是为了打击羞辱我。但尽管我很气恼，仍保持着冷静，我自己说，这种人早晚会被历史淘汰，无论以什么方式，但总会有那么一天。其实当时时局已经很明朗了，在欧洲大地上只有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霸主和他们宣扬的意识形态，每个人必须做出选择，可我总是逃避，我不能容忍任何权威对我的思想束缚，不能容忍任何意识形态替我思考！然后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眼前，我想，我和他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人，如果出逃计划失败，被抓，我们将会被看做是一伙的，人们会认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同牢狱友，多么可笑。

我们的目的地是小城卡拉哈里<sup>[2]</sup>，我们希望到时下午集市最好还没结束，因为街上人多对我们有利。立陶宛语里没有卡拉哈里这个词，它大概和天主教用语有关。我们到达事先约好的地点后，当地的一个农场主接应了我们。在他家堆满货物的谷仓里，他热心地给我们分析局势，要去华沙，走X村庄是不行的，Y村庄也不行；只能试试Z村庄，院子里的马车（解套的马正在吃饲料）刚从那边回来，可以再送我们过去，但所有出口都有巡逻队在检查证件，我们必须趁没人的时候混过去，马车会在城外半公里的地方接我们。几个小时后，他给了暗号，我们偷偷溜出果园，穿过树篱，胡萝卜和卷心菜地，然后一直往前走。药剂师几分钟后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只好帮他拿手提箱，我浑身是汗，忍不住抱怨：想想在荒山野地里，不知道是不是走对了路，已经够操心的了，还带着一个该死的手提箱，它使我筋疲力尽，不能保持走私贩该有的机敏，这样一支队伍，告密者一眼就能看出端倪来。最可恨的是药剂师总是拖后腿，我和苏菲已经走到通往边境的沙土路上时，他还被落在后面很远，这时我看出了接应我们的马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谨记着农场主的话，要到城外才能坐上去。

躺在马车的干草堆上，已经是黄昏，我望着天空中的火烧云，心情平静下来，最近以来我总是精神紧张。也许是坐上马车的关系，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虽然隐隐的恐惧还在，可之前的狂躁消失了。我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相信一切自有老天保佑；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命中注定，决定坦然接受。就是在那天，我开始相信宿命论，开始观察别人是否也如此，是说着玩还是真相信。有人大概认为这种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但至少，它会在某些时刻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经过林间空地的军营时，看见贝利亚<sup>[3]</sup>手下那些恶名在外的士兵们正在队列训练，我不动声色地嚼着草叶，虽然现在想起来还对那惊险的一幕感到后怕。

马车走出平原后，后面的路变得很难走，我记得我们经过了峡谷，松树和杨树林，小山坡，在抵达村庄前，还路过果园，最后马车在一个有点破旧的房子前停下。我们从隐蔽的后门进了屋，为了安全起见，主人叫我们躲到房顶的干草仓里去。

在干草仓里的四十八小时，足以写一部精彩的剧本了，我、苏菲、药剂师，三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值得大书特书。干草仓逼仄狭窄，让人压抑，必须保持安静，不能走动，不能大声说话。没有窗户，只能从屋脊缝里往外瞧，我们知道街上到处是巡逻的苏联士兵，实际我们只能隐约瞧得见他们背上闪亮的刺刀尖。苏菲总是冲药剂师发脾气，女人在鄙视男人时表现出来的粗鲁实在可怕。药剂师的每个动作，每句话，甚至整个人都令她咬牙切齿。不过前者也的确可恨，他总是听见一点动静就大惊小怪，害得我和苏菲也跟着紧张。他不时地打开皮钱袋查钱，每次都背过身去，怕我们偷窥；他无耻地把我和苏菲看作是他的私人保镖，认为保护他宝贵的生命是我俩的责任和义务；他不知道走路，吃面包和香肠要保持安静。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事。一次苏菲蹲坐在墙角里，我藏在椽架后面。药剂师突然憋不住要小便，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他解开裤子，拿出他的玩意，一个像大象鼻子一样褶皱的东西，

完全无视我们，这期间苏菲一眼不眨，药剂师提上裤子后她才扭头说了句，“蠢货”，后来我们就一直这样叫他。

我和苏菲很少说话，但她仍然把我看成一伙的。我努力暗示，让她对蠢货尊重些，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怜悯，而是愤怒，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随时有丧命的可能：苏菲应该大度一些，尽管人们都说女人的善良往往是假象，我认为当时我们不应该相互折磨，而是要保持穴居人的美德：坚毅，团结一心，乐观。我的镇定，坚韧尽管使我赢得了苏菲的友谊，但这是因为环境使然，如果苏菲和我在另外的时间地点相见，我或许也是被她嘲笑的对象。我是个反女权主义者，早已在内心深处给她定了罪，对她的低级冲动感到不屑，或许是社会的文化和她所受的教育影响了她。后来发现我这种公正的态度总是遭到误解，只要我态度上偏向蠢货，他就得寸进尺，以为我要和他联合起来对付苏菲。最后我横下心来，任他俩胡闹。

听到下面有脚步声，这出闹剧才算落幕。原来是农场主，他清了清喉咙，从梯子爬上来，他来给我们介绍附近的情况。他的话像一张指点迷津的地图，事无巨细。这个村庄位于湿地旁的高堤上；湿地实际是一个半干涸的后冰川湖。它的另一边现在是德国地盘。他说“过去春天和秋天水位上涨，很多犹太人溺死在里面！但你们现在可以过去”，农场主用苏联人谈论德国人经常露出的轻蔑语气说：“岸边守卫的士兵很愚蠢”，他告诉我们他们每次五个人一起出去，走得很慢；士兵们不知道他们身后藏着人，到了边境那里两个偷偷回去，这样看起来还是五个人。我们要等到星期日晚上村里举办舞会。女孩们同意帮忙，她们会和士兵们聊天，分散其注意力，尤其是站在门口的最危险。

早在战前，村里的人就靠走私黑货赚钱，那时他们总能从波兰和立陶宛士兵那里蒙混过去。即使被抓到，处罚不过是没收货物或监禁一个月。当夜有两个男孩给我们做向导，看得出他们已是轻车熟路，一路上我和苏菲悄声紧跟在后面，只有蠢货例外。跑了很长时间后终于到了去谷底的路。两个向导突然停了下来，查看周围的情况，因为这里路有很多弯道，每一处都尽是些奇形怪状的石雕，也叫冰砾岩，月光下它们显得又高又大，身后还拖着长长的黑影。远看像人；走近看同样可怕，总觉得后面藏着人。虽然一路胆战心惊，不过还是顺利地走了出来。之后到了一片沼泽地，到处是隐蔽的水坑，每个人的鞋都浸湿了，但和前一段路相比，这里算是安全一些，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沼泽地到处是柳树，迷迭香和湿苔藓，使我有种置身家乡的感觉，我喜欢这里静谧的气氛。路仍很难走，一条河横在我们面前，水面光滑如镜，闪着油光，大片的枯树叶静静地漂浮着。我们不得不打破这份宁静，趟水过河，水很快没到了膝盖处，然后是大腿。蠢货使我们生气，他弄得水花四溅，把衣服刮在了灌木枝上，使我们不得不回去帮他解围。后来河水齐腰的时候，他突然跌了一跤，脖子沾满了泥水，又听见他在那里大喊大叫。我瞥了一眼，他的脸也沾满了泥浆，一副绝望的表情。苏菲则是另一种性格，从不自怨自艾。有一次她掉进了泥潭，泥水先是没过她的胸，然后是肩膀，眼看着还在往下掉，我们合力把她拽了出来。结果她全身上下只剩紧身裙，她开玩笑地说：“我里面的内裤也不见了”，我们都笑了起来。

突然向导做手势告诉我们有危险，我们紧张起来，以为有人来了，但除了自己脚下发出的嘶嘶声，好像没什么不对劲。两个男孩坚持说他们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果然不远处传来咚咚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又消失了，他们说，是野兽，可能是从东普鲁士过来的大角鹿或驼鹿。我想他们真是幸福，在他们眼里，最大的不幸多是和某个人发生点矛盾，弄得不愉快，他们从未遭受到战争之苦，也没体验到我们的忧心之痛：自己的祖国强行合并到苏联的厄运。

在沼泽地几乎走了一夜，四周漆黑，星星们在头顶也暗淡无光，直到天快亮时终于站在了希特勒的地盘上，我看见前方一片桦树林，满是树叶的沙沙声，仿佛仲夏夜之梦里的仙境，我心里觉得有些宽慰，虽然一路困难重重，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后来的情景又把我拉回到现实，就在奥布朗的号声响彻森林，提泰妮娅从魔法中醒来的神圣时刻，我们的两个向导正坐在地上，一脸俗气地数着我们付给的钱。后来把我们带到前面的村庄安顿下来后，他们就离开了。善良的主人冒着危险让我们呆在干草仓里，又一次我们像囚犯一样关在里面，但有什么关系，我们太累了，一进去就倒头大睡。

第二天继续赶路，一辆农用马车载着我们沿公路走，天空下着小雨。一路上我们由北向南经过高原，湖泊，杉树林，我战前来过，因此熟悉这里的地形。快到苏瓦尔基<sup>[4]</sup>小城时，马车没有进城，而是拐下公路，穿过田野，绕着一片菜园走，最后在一栋小木屋前停了下来。应该说人性中没有绝对的善，很少有人能无私地帮助别人，不求回报；但小木屋的主人，一位年轻的马车夫和他的妻子（两人刚有了孩子），使我意识到这是可能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收容我们，他们既心怀恐惧又觉得义不容辞。他们的心情都写在脸上，当然不是故意给我们看的，相反，对我们的照顾非常周到，这真是两个可敬的人。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自我检讨一下，我偷偷出了门去了城里，这件事险些给大家带来灾难。但在外面的半个小时里，我终于明白了纳粹政权的本质。街上人很少，我只遇见几位年老的妇女。这里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枪杀或送往集中营了，战前曾有一支军队驻守在这里，现在换成了德国人。我以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这里人口稀少的原因，但当我拜访了一家插着纳粹党旗的药店后，我才明白过来。当时一个穿白

衣服的男孩站在柜台后面，我认出他是店主的儿子，他看见我时，脸吓得铁青，并冲我做手势不要靠近他，好像我是一个鬼魂。我照办了，男孩又示意我离开。我只好推门出去，尽量让自己的脚步显得自然，镇定。原来，纳粹杀人不眨眼，不光屠杀犹太人，小城里的大多数男人都已经被遣送到某地强制劳动或是进了集中营，刚刚执行死刑的城市广场地面上，还有雨水没有洗刷干净的血迹在。我后来听说生活在此地，大我十五岁的表亲，就在这个时候被送到了奥拉宁堡—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两年后他死在了那里。

我们得冒风险坐火车去东普鲁士边境的火车站。东普鲁士的南部现在是苏联的地盘；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绕路。黎明时车夫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浑身打颤，既因为冷也因为害怕，站台上除了我们空无一人。我们下一个“落脚点”——边境村庄里的一个旅馆——算是热情好客，他们说开往普鲁士的火车上，是要检查过境文件的，如果肯花钱的话可以躲过这一劫，会有人替我们安排好这一切，于是我们就交了钱。夜晚我们爬过牧场的铁栅栏，避开牛群，去事先约定好的地点，马车接应了我们。马车夫是个波兰战犯人，惩罚是给一个叫鲍尔的德国人家里做苦役。我们上了车，之后它沿着乡间小路一直走，大约二十公里后，刚好赶上早晨的火车。

火车行驶在东普鲁士境内时，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没有说话。我在座位上想着此地房屋整齐干净，环境怡人，人们生活井然有序，没有一点战争痕迹。对这里的人们来说战火离自己很远，也不关心；他们只想赚钱，只想着从像我们一样逃生到这里越境的人身上捞点好处，并对这份生意乐此不疲。我猜得到那个波兰人，这个被迫卖身做苦力的家伙，不会对昨夜奉命帮助我们赶路有什么怨言。这里还有很多像他一样背井离乡的人，他们都是波兰战犯或是被驱逐出境的人，被政府发配到农场主家里强制劳动。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其命运完全取决于雇主。我能从几个细节里猜到，我们的马车夫之所以能够自由行动不是因为他忠心，而是源于他和这个叫鲍尔的德国人妻子的关系。他现在的身份几乎等于是她的丈夫——命运真是够讽刺的——鲍尔已经在波兰战役前线去世了。但尽管如此他心里仍然充满了仇恨，因为按规定他必须每天戴 p 字肩章，这肩章时时表明他波兰战犯的耻辱身份。他和那些常年被地主剥削的农民一样，希望有一块自己的田地，他早已经打算好，只有战争一结束，就要霸占自己看中的一个农场，他觉得局势定会如他所愿的发展。尽管当时是 1940 年的夏天，正是希特勒在战场上耀武扬威的时候。但他仍盲目而非理性地坚信，东普鲁士一定会输给波兰。

麻烦正在奥特斯堡 [5] 等着我们。苏菲心有余悸地对我说：要小心，这个地方名声一直不好，很多人上当受骗过。一路上蠢货不断叫我和苏菲拿他那超重的行李，因此当我们走进一间乌烟瘴气的下等酒吧时，绞尽脑汁叫他买了瓶啤酒。其实我们是想在酒吧里找人带我们去边境那边的村庄；由于不相信任何德国人，我们缠住了一个红鼻子的小个子男人，他是马祖里人，穿一身铁路工人才穿的那种深蓝色的制服，我们给他倒了杯白兰地。结果他什么忙也帮不上，他喝得晕晕乎乎的，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不过我还是把他看成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人物。因为他酒醉后一字一顿地反复说：看着吧，俄国佬最后会占领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酒鬼身上有种难能可贵的怀疑精神。靠着自己的观察和直觉，他不相信德国有能够常胜不败，对官方的说法不屑一顾，认为最终占领此地的霸主将是苏联而不是德国。

既然在酒吧一无所获，我决定最后去教堂试试运气，看教区牧师能否帮下忙——这个想法证明了我对天主教这个超国家机构还藕断丝连，或可看做是我作为上帝的子民不向权势低头屈服的决心。当然我也知道，此行不过是碰运气罢了，可有时候事情就需要那么一点点坚持精神。结果证明世事难料，当我进入教堂大厅，我就开始觉得自己真是愚蠢至极。那个牧师，我一眼就注意到了浆硬衣领上他那个肥胖的双下巴，一头油亮的金色头发，他问了一些教理问题，之后当我说出自已的困境，请求帮助时，他惊慌失色，在他眼里我是一个灰眉土脸，说话结巴的波兰强盗，唯恐避之不及。就在这半分钟里，教堂这个超国家机构的美好形象在我心里彻底破灭了。我关上门，吹着口哨重新来到了大街上。

我们放弃了所有努力，想要直接去坐开往温岭堡 [6] 的火车，温岭堡位于东普鲁士的南部边境上，将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在我们离开奥特斯堡之前，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证明我们在维尔诺出逃时我坚持要尽可能多地办理假通行证的想法是明智的。当时苏菲在街上闲逛，我和蠢货停下来等她，一个宪兵突然向我们要证件。我把自己的通行证给了他，而蠢货吓坏了，几乎想拔腿就跑，他为了拖延时间一直在慢吞吞地解背包带。我得说我们维尔诺艺术家的造假技艺高超，穿绿军装的高个士兵看完我的证件后，没有再纠缠蠢货，而是挥手说：走吧。

之后我们好不容易租了匹马，赶往一个名叫克莱恩·莱斯特那的偏僻村庄。一路都是森林，走了很久之后才来到一栋清冷的房子前。主人是一个叫德普杜拉的马祖里人。他没有邀请我们进去，而是叫我们呆在附近的橡树林里，说等日落后会派一个男孩引路。我们只好照办。很快黄昏就来了，树林里鸟鸣像甜美的笛声，我们听得入了迷，几乎忘了自己的处境。但后来蚊子越来越多，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蚊子上。突然周围骚动起来，接着是枪响，听声音可以判断离我们很近，几乎就在头顶，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一群穿制服的士兵就冲了过来，绑住了我的手，一把手枪顶住了胸口，我吓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在这时我看出了德普杜拉，从树林后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拿着烟斗，一脸的洋洋得意。我才明白他出卖了我们。他的小黑眼睛折磨我很多年，直到战后我仍怀恨在心。尽管这个马祖里人可能从没有离开那个村庄，很多年我都想再回去找他，给他点颜色看看，解我心头之恨。

但二战期间诸如被人告密之类的事多得数不清，人们之间充满了仇恨，1945 年秋天我住在旦泽附近的村庄里，心情极度抑郁。当时德国人战败后就是从这里撤退回国的。我听说一个叫穆尔的女人，想要保命，说自己庇护过同盟国囚犯，但没有用，最后她还是选择自杀，带着孩子跳进了维斯瓦河。差不多同一时间，我的母亲在此地死于斑疹伤寒，不久她的祖国立陶宛就被苏联强占了。

被抓后，他们吆喝我们往森林外面走。我一只手领着蠢货可恨的皮箱，另一只暗中摸进口袋，偷偷地撕碎了几张纸，我担心它们会带来麻烦。我假装咳嗽，把它们塞到嘴里，印刷品的味道令人恶心。在村庄警察局，他们没有搜身，苏菲躺在囚室满是稻草的地上，说只要他们没把盖世太保找来，就没事。

这时局长进来了。他是德国人，来自巴伐利亚州，身材略胖，他审问时一副大嗓门，使我们很紧张，但他的眼神里有种让人心安的东西。后来他坐下来很认真地听苏菲讲话，我们的苏菲很机智，装成贵妇人扮可怜，开始大谈自己的不幸（都是编造的）。我想我们大难不死还有其他原因，那里可说是战时欧洲的世外桃源，生活安逸舒适，人们的性格不那么残暴，也许是局长动了恻隐之心。第二天早晨他说他已经打电话给奥特斯堡的盖世太保了，我们要被押送到那边了。但后来他的部下却把我们送上一辆去往温岭堡的马车。途中我请那个人去酒吧喝酒，在半瓶白兰地之后，他给我看他的家庭照片，给我看战前那个逝去的年代。之后我们顺利地穿过边境的关卡，没有人阻止我们。

前面是一个个村庄，路很难走，到处是沙土，马车走得如履薄冰。经过平原时我们看见一座规模不大的集中营。犯人们刚刚劳动回来，队伍整齐地唱着歌，他们嘹亮的歌声，和他们死灰色，精疲力尽的脸反差很大，旁边是手拿步枪和鞭子的警卫，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我。倒是经过的几个村庄，当地人都很友善，他们不承认新政府，对德国恨之入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个村庄都风景宜人，建筑考究，他们说自己是贵族的后代，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姓——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为了避免混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姓前加上一个绰号。

在奥斯卡利卡小城 [7] 我又忍不住出了门，身材肥胖的旅馆女老板正在外面切肉，她打算把它们拿到黑市上去卖，她很和善，对我们也很热情。我快步来到大街上。路边有一个贴满告示的木栅栏：我被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吸引，突然陷入梦游状态，好像里面藏着人生大秘密似的。突然一个穿皮大衣的盖世太保不知从哪走过来。他劈头就开始骂我，还打了我一巴掌。我的帽子掉在了地上，我始终保持冷静，一言不发，等我把帽子捡起来，他已经走远了，但仍在骂。回去后人们告诉我：德国人规定在街上看见盖世太保必须要摘帽致敬，“算你走运”，女主人说“他要是检查证件你就会被抓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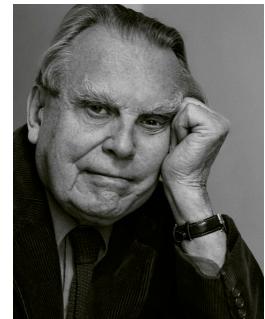
这个小城是德国的占领区，再往前走就是苏联的地盘了。我生命中从未穿过这样的“绿色地带”，尽管从年起就没少见到过。人们说最好的越境时间在中午，因为那时警卫们在吃午饭；但警卫不是傻子，他们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可这里的人仍这么干，仍选择中午的时候进松树林，每个人都是大包小罗的，都知道被人发现时要尽快藏身树后，过平地要从苔藓上爬过去，枪响时要快跑逃生。这些人都是农民，大家冒险走私食物去华沙都为了糊口赚钱。尽管我跟着大家不停地向前赶路，我仍然有心情欣赏了一下美丽的森林，心里暗想这场景倒是经常出现在谍战电影里。接下来的一幕是大家挤进车厢，笼子里母鸡咯咯乱叫，鹅的叫声像汽车喇叭，还有小猪崽在座椅下干嚎，人们谈论着价格和警察，车厢里满是廉价烟草味。就在这样的吵闹声中，我们终于到了华沙伪政府统治区。

也许有人认为我对整个过程的描述太过冷静，比如在沼泽地徒步走了一夜的奔波和劳累，我竟然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还有被盖世太保打了一巴掌后，我也没写自己红肿的脸颊如何难受。虽然我也怀疑我的超然是因为时间的流逝，它消解了我所有的肉体疼痛记忆。但内心深处我从未将它们遗忘，我所经历的精神耻辱和肉体遭遇至今仍历历在目，甚至可以说是像摄影镜头般逼真，看得见每个细节。当我身处危险，不得不在荆棘里爬行时，我会幻想自己是一根树枝或一只搬运食物的蚂蚁，如果耳边响起枪炮声，我则不由自主地想起保罗·瓦雷里的诗句：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它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

这个世界恢弘壮观又泰然自若。我爱它因为每次遭遇挫折，我都对它有新的体验和认识，它趣味横生，就如同从前过莱茵河时每经过弯道都有奇迹出现一样。我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体悟到的人生真谛，和我在这写下的这些“戏剧一样的经历”如今已是苍白的往事了，我觉得在经历过大风大浪后，我知道怎样更有意义地度过每一天，每一小时。这使我几乎看清了存在的一个确定无疑的本质：存在不是我们人类能够一眼看透的，包括未来，但尽管如此也不要灰心丧气。如果把这种存在观放到社会地位的评价机制上，就出身而论，我大概会是殖民国家里的一名黑人奴隶，没错，我认为揣着这种想法的人就是最自由的。

\*1939 年纳粹德国和苏联宣传部冠冕堂皇的提出了“友好边境线”这个词，指的是历史上著名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它划分了苏德双方在波兰的势力范围（双方在 8 月 23 日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很明显，这里是反讽。（全文均为译注）

- [1] 弗朗西斯科·戈雅 (1746 -1828)，画家，有很多讽刺拿破仑的假仁义和伪道德的画作，批判战争。
- [2] 立陶宛西南的一座城市，靠近波兰。
- [3]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899-1953)，斯大林暴政期间的前苏联秘密警察局局长 (1938-1953)。在斯大林死后的权力斗争中，贝利亚被判有阴谋罪并被处死。
- [4] 苏瓦尔基位于波兰东北部，二战时被合并到东普鲁士。
- [5] 位于波兰东北部，二战时被德国占领，改名为什奇特诺。
- [6] 波兰东北部一个小村庄。
- [7] 这座城市位于波兰东北部的纳夫雷河岸旁，1939 年被德国抢占，改名叫斯特芬维斯，同时合并到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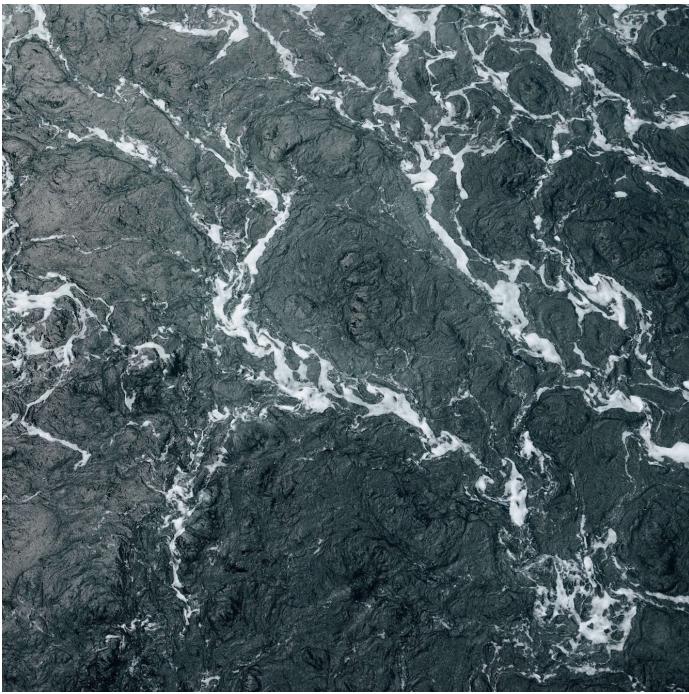


切斯瓦夫·米沃什

生于立陶宛维尔纽斯，美籍波兰诗人，1980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诗歌注重内容和感受，广阔而深邃地影射了二十世纪东欧、西欧和美国的动荡历史和命运，被视为二十世纪东欧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译者：叶美

本文译自 *Proud to Be a Mammal: Essays on War, Faith and Memory*,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Leach, Bogdana Carpenter and Madeline G. Levine。转载自戴潍娜主编的诗歌翻译 mook 《光年：世界中的世界》。



题图来自 [Paul Hanaoka](#) on Unsplash

## 诗歌

# 聆听汨罗： 我们欠屈原的那笔债

杨炼 戴潍娜 | 诗人访谈

诗歌里的真诚、冲撞现实的热血哪儿去了？

诗人杨炼与屈原心有戚戚，早在《叙事诗·历史哀歌》等诗作中就曾涉及屈原题材。2019年杨炼在柏林写出了《大夫 我是你身边一滴水》初稿。11月中旬，他应邀来到汨罗市参加汨罗国际诗歌采风，并对组诗进行了修改。2020年，毒疫封门期间，杨炼完成了蓄谋已久的研究文章——《屈原诗，隐没的源头》，此后聚焦于“流亡”一词，续以《历史的忧郁——屈原诗的“流亡”母题》。随后，幸存诗刊发起了一场堪称观念+行为艺术的马拉松研讨——《杨炼“思想之诗”创作理念网络探讨会》，从2020年10月30日到31日连续36小时不眠不休激辩讨论。至此，诗作、研究、探讨三位一体，重新激活了屈原诗开创的思想之诗传统。2020年11月15日，诗人戴潍娜应邀至汨罗采风并参加屈原祭祀大典，聆听着汨罗江水巨大的迴声，遂隔着七小时时差，开启了二人一连数日有关屈原的问答对话……引屈原之活水，浇今朝之块垒。

**戴潍娜：**第一次来到汨罗祭拜屈原，原本以为可以伴着汨罗江的呢喃如梦，没想到一直在汨罗江的耳语里失眠。失眠期间百般无聊，翻看了许多希腊神庙立柱的造型结构图，由此联想到屈原上天入地、通天贯地、又毁天灭地的文本，同样构建起了一座神庙。神庙是神的居所，也是人距离神最近的地方，但鲜少有人能走进神庙里面。整个古典时期，希腊神庙在比例大小、空间结构上固执的捍卫着基本制式，希腊人的思想也乐于在这样一个相对固定框架内舞蹈；异曲同工的是，屈原也给汉语诗人，乃至中国知识分子定下了一个命运的范式。屈子当年沉江怀抱的那块巨石，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一代代诗人始终在屈原的回响中，去试图逼近这个神庙。

屈原生活的时间，大致可划入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约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那是一个思想和智慧大井喷的时期，希腊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了犹太先知，印度有了释迦牟尼。屈原的出生时间稍微晚一点点，推算出的出生日期大概在公元前335—366年。有趣的是，希腊神庙里的爱奥尼亚柱式的成型时间大概也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为什么老把屈原和希腊神庙的柱子扯在一起？我觉得他们之间似乎有某种古老文明的连接和文明之间的相互隐喻。

希腊神庙是简单的梁柱式结构，其中有两种基本立柱：多利亚和爱奥尼亚柱式。其中

多利亚式柱子形状孔武有力，代表了多立克人斯巴达人的尚武；爱奥尼亚柱式则精致、柔情、自由，维特鲁威把这种柱子想象成一个女子。爱奥尼亚人是广泛意义上更古老的希腊人，多在东爱琴海和小亚细亚的殖民地，那里也是孕育希腊哲学的地方。

中国的文化神庙，同样是由这两股完全相悖力量支撑起来的——一种是多立亚式的“诗政合一”，明晰的“诗而优则仕”；另一种则是爱奥尼亚式的屈原所代表的隐晦的脆弱的美学，失败的美学。屈原一抬手，就把我们文化神庙的顶棚给抬高了！后人怎么看待屈原这一柱独立的文化支柱，恐怕也关乎我们中国文化压箱底的功夫吧。

**杨炼：**我要把话题拉开一点。回到中国文化之根源，因为它实在诡谲神奇。囫囵吞枣、敷衍沿用也就罢了，但倘若细思，怕真就只剩“极恐”二字。先绕开屈原诗，回到我们语言的起源，甲骨文怎么来的？按照任何进化论的说法，那个从构字到语法、以至整个观念体系无比完整的系统，还不至少得有数千年的递进过程，沿途留下无数石刻的、铜铸的、陶制的（且不提竹木和丝绢的）刻划，从最简单的符号，到逐渐复杂的语言，用一长串“足迹”，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那场艰难的跋涉？但，有吗？回答简单无比：完全没有。那十几个常被拿来说事的山东刻划符号，尽管有人借来“古彝文”揣摩其含义，可考古学不相信“孤证”，要证明甲骨文就从它“进化”而来，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物证旁证，仅凭十几个象形字符，完全不能解释以3300年前盘庚迁殷为界，之前一片空空荡荡，之后平地一声雷，像另一场宇宙大爆炸，突然迸发出甲骨文这个东西。从盘庚到武丁大帝，短短五十年左右，地下出土的甲骨，已经成千上万，迄今更总共发现了十五万片以上。屈原《天问》那劈头四问：“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堪称振聋发聩。其中，“曰”、“传”、“道”、“考”、“识”，在在都聚焦于语言本身。我能感到灵均内心的焦虑，那是一种木无根、水无源、人无祖、宇宙（存在）无据的大困惑、大茫然。他当然不知道后来有个词叫“语言哲学”，但他以一颗大巫之心，直抵根本，已在频频叩问那终极之谜。这段《天问》，直接把宇宙起源等同于语言起源，甚至把宇宙起源植入了语言起源之内，何其辉煌、何等人性！还要再提被滥用得无聊的“深刻”一词吗？

话说回来，甲骨文哪儿来的？一言蔽之，仓颉造的！这仓颉，并非神话人物，却也应该长出四目，上仿天象，下拟万物，否则如何当得起命名始祖之大任？甲骨文里，最常见的就是“贞人”一词，贞人者，占卜之人也。甲骨文的占卜内容，绝大多数是商代军国大事，而后代得以理清商王世系，也都仰仗甲骨文记载，与出土文物的双重印证。非此不算信史。另一佐证，来自我的考古学家朋友汪涛，他说，有趣的是，绝大多数甲骨文都被发现于殷墟（今安阳）附近，显然与殷作为商朝都城或曰政治中心有关。这就回到“仓颉”了，这个造字者——发明甲骨文者——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围绕在商王周围的贞人团体，强拉比喻吧，那就像一个商代的社科院，他们执掌占卜、阐释、书写大权，不仅使用文字，而且创造文字，他们的发明热情如此蓬勃，创造能力如此巨大，以至甲骨文5000余字中，今天能被识别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甲骨文起源的假说：它不是进化而来，而是发明而来，中华文明史由某些天资甚高的人所创造。那么我也能想象，商代贞人的位置，和后世楚国屈原大巫师的位置，也是一脉相承的相同或相似。看看《天问》、《离骚》、《九歌》，那每一首诗中的语言、形式、结构，一次次前无古人，又无不与“仓颉造字”的无中生有暗通款曲。自天地开创，我们体内，已涌动着一种创造基因

因此，那个夜晚，在汨罗江畔，搅扰你难以入眠的，莫非正是冥冥中一阵“天雨粟，鬼夜哭”，轻轻网住了它的当代传人？

这“悬置”的语言起源之谜，似乎已是一种暗示，在隐隐指点汉字（姑且借用这个毫无道理的名字）的抽象性质。我这样说，是相对希腊——欧洲语言的“具体”而言。在它们语法中，随着人称、时态、单复数变化，动词都有不同变格，你可以感到，语言在竭力捕捉每个动作的“此在”。反观汉字，无论上述条件怎样变化，动词永远保持原型，一动不动。一个“喝”字，谁喝？几人喝？何时喝？喝多少？在动词上毫无反映。由是，如果说欧洲语言的目标，是追求一种非此莫属的具体。则汉字恰好相反，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捕捉具体动作的可能性，而表现出一种抹去时空界限的抽象。我猜测，或许正因为这种词与物之间的断裂，以及汉字想要抓住现实时的力有不逮，极早地启示了中国人对词的不信任。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屈原的“天问”，莫不源于这里。你可以说他们比欧洲语言哲学大大超前，也不妨认为是一种缺失了缜密思考过程的空洞。“一步到位”，有时并非好事。

我很高兴你在失眠之夜，翻开了古希腊建筑图片，由此想到用建筑美学比较诗歌。有人说，古希腊人玩石头就像玩水，他们能把石头雕刻得柔顺曼妙无比，犹如丝绸轻轻贴在肌肤上。多利亚柱式或爱奥尼亚柱式，确实细部上有你提到的粗犷与柔美，但同时别忘了，它们又都是结结实实的大理石，强有力地支撑起那个大屋顶，有机参与着整体结构。我觉得，这就需要深入一层，去看语言与思维两个层次。如果细节是词汇，结构就是思维方式。古希腊思维的结实，来自其逻辑学，和由此发展出的欧洲哲学传统。它们立足于具体分析，经由严密的逻辑推论，一步步辩驳、再推论、再辩驳，直至建构起一种思想体系。在这座精神神庙里，人与神的关系，也在一个“结实”的逻辑中，找到各自的位置。

中国语言和文化则不然，那个悬置的起源，加上语法的抽象，使我们的文化在质地上有种玄学倾向。哲学像诗，诗像哲学，说好了是高超，说坏了是单薄。我曾强调“思想之诗的传统”，但也觉得，抒情诗传统一支独大，并非没有政治控制之外的缘由。那就是语言质地本身，不长于逻辑思辨，却偏重情感化的宣泄。甚至屈原诗，虽然有提问者的能量、大大扩充的空间结构、丰富得多的思想层次，也还欠缺细密的内在思想纹理，本质上，仍是一种巫传统中的形而上之舞。如果说古希腊文化更

具阳刚之气（包括那些藏进雪白大理石的美丽女神），那中国文化的特性，就是阴柔而唯美。阴柔，因为词与物的脱节，使思想缺乏物质性，甚至发展成抗拒物质性。唯美，因为想象世界是唯一能与物质世界对抗的阵地。屈原时代还好，在古代巫文化中，物质精神互相渗透。汉代以后，大一统的世俗权力，已剥夺了巫文化的神圣性，留给文人们的，便只剩了被分割的史学：一种史料记载；和抒情诗：单薄的感情宣泄。中国建筑也颇合此意，甚至早于商代，已出现了那种以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庭院式建筑。它们的土木材料，脆弱易朽，每隔几年要翻盖一次，若干次下来，唯一不朽的，正是那个中轴对称的建筑观念——权力的完美象征。

希腊神庙的框架，至今仍在西方重要建筑上清晰可见。而屈原留给中文诗人的“命运范式”（借你的词）呢？确实，就是《天问》、《离骚》的精神伟构+一块沉江的石头。可以说，比权力更威逼诗人的，正是我们语言内那个病根：高蹈、空泛、薄弱，促成历代庸俗品味的大流行。这块看不见的石头，逼着一代代有抱负的诗人，为屈原、更为自己哀叹命运。说实话，屈原投江，也算死得其时。在中国文化最辉煌的先秦时代，他尽管现实遭遇不顺，思想上却不孤独。司马迁在《史记》中“悲其志”，可他哪里知道，再后来，连产生屈原的精神基因，都被阉割了呢。“志”已无存，“悲”从何来？

由是，你的说法：“脆弱的美学，失败的美学”，确实更适合形容屈原的大作。他虽然孤独，但从未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一出手就把他之前的整个历史收入自己的诗歌场景，以一人之内美，对抗“众芳之芜秽”[1]，又如但丁做过的，用上天入地之灵游，审阅、臧否三皇五帝、古今人物。因此，他的失败，是伟大的失败。他的脆弱，见证了孤绝的坚强。而他的美学呢？从我们语言的幽谷下拔地而起，籍神巫文化之力，一举跨越中世纪式神权，迈进了现代独立人格之美。也因此，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时代，重新谈论他，探究他，摸索那个隐没在汨罗江里的精神源头。他这一柱，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换一个角度看，屈原的一柱独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又并不奇怪。想想古希腊的荷马、古罗马的维吉尔、文艺复兴的但丁、德国的歌德……等等等等，哪个不是当时自己文化的“独柱”？又哪个不是今天人类共同的瑰宝？所以，屈原诗忍受超人的孤独，乃题中之意。同样必然的，是中国文化、世界文化都将从这块沉甸甸的思想基石上，获得启示。

**戴潍娜：**《天问》从“曰”开始，一切都起源于一个语言的奇迹。

纵观上古神话史诗，皆是“杀”与“谋”的乱史。今日，当我们无限追慕古风古道时，往往一味惊慕，忽视人类初始之残酷。《天问》后半段从宇宙洪荒，转入人类社会建构；从神的没落，转入人的发迹，其中不乏权谋、征伐、欺诈、杀戮，甚至“醢”此等将人剁成肉酱的酷刑……总之种种骇人听闻。神性之外亦有兽性，唯独此兽不知缘何，突然能言——“焉有石林？何兽能言？”

能言，是礼法之源。

言语所具备的伟力，远不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离骚》“以气驭文，以情驭文”，实在是人与天地万物相交的大音。今年十二月，在汨罗江屈原祭祀大典上，两个玄衣长发老者用古楚音做法事，如一场浩浩殇殇的招魂，那片刻我真的感觉自己超脱了此生此世。

后来有同行的当地诗人和我聊起，南方瘴气重，云雾缭绕的，自然会生出很多奇异；而后人无法把握和超越的，恰是屈原诗里“咒语”的部分，是他作为大祭司吟诵出的“诡气”。忍不住要叹一声，如今太发达了，神鬼都被赶跑了。

此刻的世界，发出“天问”的方式是太空飞船，是实验室。我们迷信科技进步，迷信互联网虚无。现代人不愿笃信，一个人的内心就足以有一座太空飞船的能量去环绕宇宙。宏愿和信念的绝迹，犹如沉石，犹如异常美丽的巨型生物的灭绝。伴随屈原一起沉入汨罗江的，还有一个巫的传统：知识分子作为中介，沟通天地人神。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天的南方人将自己生生拧到北方语系为基础的普通话频道写作，损失掉了一部分先天之气。语言里的通感，色泽、微表情都被统一磨平了……而屈原辞赋中的原始音律，创造出了三维以上的语言，那是四维的，五维的，甚至十维的。咒语和巫性也深嵌入诗歌的基因……

**杨炼：**我对远古文化——特别是巫 / 萨满文化——很感兴趣，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原因：一，哲学层次；二，社会层次。

哲学层次上：远古文化思维和后来被细致划分的所谓“专业”思维大不相同，在远古，世界是一个整体。大自然、社会、人体、乃至内心活动，都彼此渗透，互相影响、不仅不可分隔，而且全方位参与。谨举被尊为经之首的《易经》为例，后来的人们，总试图给它附会一个线性线索，乾一、坤二……直到第六十四卦，但这样一来，《易经》就只剩了一个单线条的“逻辑”，一个简单化的推理过程。这太可惜了！你该做的是，闭上眼睛，默想八卦对应八种自然：天、地、雷、风、水、火、山、泽，那像不像一片中国北方的大自然风景？那儿山高水阔、风驰云飞，身外景象和你心中思绪，彼动此也动，此变彼亦变。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同时（注意这个“共时”！）与其他所有爻相连，真正是“牵一发动全身”。《易经》，建构了一个巫文化的全息式宇宙模型。它是空间的，却又包含了无穷的时间，在其内部循环不息。我曾给它一种称谓，叫做“有界无限”。六十四卦之“界”，宇宙万物纳入其中。仔细想想，这不就是我说过的屈原“空间诗学”？《离骚》恰如《易经》，也建构起一个自然象征体系，通过内心外界的无尽互动，用语言小宇宙囊括了外部大千世界。

本质上，这正是巫文化把握世界的哲学方式。

社会层次上：我从文革晚期开始写作。从1974至1977，我在农村插队。“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让我绕开了学校，直接从现实本身读中国这本大书。再后来，所谓文化反思的八十年代，因为《诺日朗》等作品，我被归入了“寻根”诗人一类。可我需要“寻根”吗？我的根，不就深深、狠狠地扎在自己身上吗？那种疼，穿透文革、穿透二十世纪、穿透把屈原压进水底的两千年、甚至更远……要说“寻”，我希望寻找一种足够强大的能源，去突破那重重社会禁锢。这才是八十年代推动我们离开城市，奔向边疆、旷野、少数民族文化的动因。我们去那里领悟，一种未被（或较少被）污染过的人性和常识。我在《屈原诗，隐没的源头》里回忆过，那次船停三峡，我一人攀上巫峡边一座高山，俯瞰脚下长江一线，身边是不知何年何月何人留下的一座废墟，荒草凄凄，乱石累累，却依稀能看出高台轮廓，莫非这就是楚王和神女幽



图片来自 Joanna Liu on Unsplash

会的云梦台？须知我们成长于最坏的政治环境，堪称最没文化的一代。思想资源空前匮乏，文学修养几乎谈不到，所以，经典的、外来的、远古的同样宝贵，都在汇入我们的精神，培养出一类杂食杂种的文化动物。我承认，这种自我教育非常重要。它让我们撒野式的挣脱了社会控制，而用自我提问——激发思想——组合知识建立起自我教育的系统。四十年来，从国内到国外，从中文到外语，这个不依附他者、自我更新的方式，令我获益匪浅。

你说到底楚音、巫语、招魂，“超脱此生此世”，我深有同感。巫文化，之所以能灵浸万物、天人合一，关键就在全身心投入，这是玩不了票的。你我都站桩、冥想，我没法告诉你，每个早晨，有多少灵感、诗句、恰到好处的词语，趁那身体里俗世水位降低的时刻汨汨流入。我们不是缺南方瘴气中的云雾和奇异，而是缺灵均内心那片沉静；不是要把握和超越屈原的“咒语”（我们不就在创造当代咒语吗？），而是要再学习聆听大自然和内心的交响。不如此，便只能望《天问》、《离骚》兴叹，感慨2300年白白逝去。

1999年，我获得了我的第一个国际诗歌奖：意大利 Flaiano 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我的授奖词，题为《提问者》，那堪称一首献给屈原的小小颂歌。其中，我把诗歌对人类自身的提问与科学对自然界的提问联系起来，并把“知识就是力量”追究进“承认无知就是力量”。写诗和科研的汇合点，可不就是这个“专业提问者”的姿态么？世界眼花缭乱地变，可又没变，提问的方程式始终如一。从老子的“知不知，上”到苏格拉底的“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中西之间，有区别么？从屈原怀石沉江，到布鲁诺被烧死，权力最惧怕的也是提问。必须注意，承认无知，决非消极的态度，它恰恰是一种主动和积极。甚至追问得更苛刻：人的外在自由，如何从争取内心自由开始？

就这样，屈原诗来自古老的巫传统，却绝不限于“古老”。把它归入“咒语”，其实大大贬低了它。它是不受时空限定的思想，在历史和人生中一以贯之。屈原诗的音律，是听得见的音乐。而听不见的音乐更重要，那是思想的音乐。只要沉吟《礼魂》，谁不是当代萨满？不在穿越生死、阴阳、幽冥？当我提到“全息式宇宙模型”，已经为屈原诗打开了无限维度——如诗歌想象一样朝所有方向敞开——这是“巫性”吗？抑或我们都有的人性，只不过潜藏在深处，等待着激活？今天就在屈原诗的传统中。能否参与它？把历时纳入共时？等于就在问：我们够真诚吗？我们全身心投入人生那首大诗了吗？如果没有，就别用时间流逝做托词吧！

**戴潍娜：**您描绘的这幅“朝向所有方向敞开”的全息图，恰如高维空间当中人性的展开。当工具理性执着于人性的一个横断面时，屈原的“空间诗学”中早早捕获了无比开放的宇宙历史纵深感。

我注意到《天问》中有一句“地方九州，则何以坟之？”“坟”在此处第一次被作为动词使用。高起来的山丘、土坡，乃至名山大川皆为坟。后世只见其郁郁葱葱，披红戴绿，如顶华盖；殊不知那华盖之下历历白骨栩栩生命，历经沧海桑田永镇山下，压为化石，蚀为炭基，销为最简易的化学元素。这是大自然神庙里的挫骨扬灰，亦是生生不息的源力，有情和无情之间的相互转换，“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如果把语言比作人类神庙中的石材砖块，音乐是粘土石灰，神思是雕刻绘画，而最终注入其神圣性的，正是屈原的生命！在写作的结尾处，他完成了一次肉身的血祭，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殉情”。只不过他殉的不是一个个体，而是“美教”——内美、美人、美政。

美是终极的神庙。

后人往往只见那虽九死犹未悔的沉痛浪漫，却不见“诗人之死”是何其沉重的一笔文化上的负债。“诗人之死”，横亘在中国诗歌的源头上。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代代诗人都活在“诗人之死”的巨大命题里。

写诗，又何尝不需要一分向死之心？

**杨炼：**我非常同意你说的，“注入其神圣性的，是屈原的生命”。这与我前面提到的“全身心投入人生那首大诗”，是同一个意思。我以为，诗歌的神圣性，并非仅仅借“神”说事，那其实是人性的尊严和高贵，令语言熠熠生辉。我以为，就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中除了相当世俗化的佛教，没有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类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并非一定是坏事。我们的语言文化，有种先天的人文性。它把人的精神超越，设定在人生、人世之内，即使屈原时代的巫文化，也是一种人鬼相通、魂灵附体的状态。肉身即超自然世界的载体。自我可以是“通灵”的形式。这里蕴含了一种理想：无需绕道神坛，即可当下成圣。我和不少西方朋友谈过，他们都对此不胜艳羡。我甚至觉得，有宗教背景的老外，对这一点更为敏感，因为他们知道落入宗教、再从中挣脱的难度。你说得对，中国古典诗歌、音乐、艺术极尽考究的形式，容易给别人“文雅”的外观，但那些还不够，如果没有人格之灵的充实，这些外在装饰只是空壳，空洞油滑不说，更易沦为马屁帮凶。附庸风雅，根本不是风雅，而是恶俗。所以，古人云：炼字炼句炼意，归根结底是炼人。“功夫在诗外”，就是以肉身献祭，一次性完成超度人、文之大美。

我老爸今年九十八岁，他生命历程中有一绝：从不追随时髦理论和口号，只关注做一件事是否有美感。踩着别人向上爬，欺骗害人捞油水，扪心自问，会感到丑陋。反之，做了好事，心安便能理得。这人性与常识之美，让人安贫乐道。我老爸资历不浅，但他六十来平米的房子，能给我世界上最温暖、最踏实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小船，穿过近一百年中国历史上最狂暴的大风大浪，竟然没翻船，且保持了大致准确的航向，秘诀就在“美感”的导航作用。所以，你说的“美是终极的神庙”，很对，但同时，别一看“神庙”二字，就非要想雅典卫城那类巨石伟构。屈原诗里的神庙，是他一再重申的“内美”——自我的内心之美。它建在每个人每刹那的生活里，可触可碰，实在无比。我甚至觉得，这种绵延一生的考验，才称得上真正极端。

我非常反感把屈原诗理解（曲解）为“浪漫”。他的内心之旅，穿过现实、历史、神话、语言层层向下，一次次体味毁灭的惨痛，又一次次从“不可能”向更黑暗处启程。这是一种形而下——形而上的双向抵达。每层地狱，都在揭开对存在的普遍认识。美的追求无限，献祭也同样无限。这就像你说的“殉情”了吧？其实，用不着汨罗江来提醒我们，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名字，恰恰以消肉身来完成杰作，确实该让我们时时刻刻感到“负债”，不止对屈原，更是对美惨遭背叛有负情感。屈原那次美艳无比、坦然无比的死，倒映出2300年来所有的怯懦、偏离、迂回、闪避——那块压沉屈原的石头，在一代代麻木中，每天变得更庞大。我们记得那石头吗？我们知道自己傻笑滥吃的日子里，也沉在阴森森的水下吗？我们写了又写、可有可无、堆积如山的“诗”，有真正意义吗？也许，我们早已“债多了不愁”，一直在混日子罢。

我想强调，提倡反思，但决不该把问题都推给“传统”。屈原之美和屈原之死，横亘在今天每个人、每首诗面前。我们是追求美的同心圆——内美、美人、美政、美道？还是落入丑的下水道——认可肮脏，忍受耻辱，阉割良知，直至玷污诗歌？没有宗教背景的文化，善恶都在自己手中！“诗人之死”的抽象命题，必须被兑换成“我之死”，眼下、即刻、实实在在，无可推脱。铭记这一点，然后写诗，可能少容忍点儿空话废话。

**戴潍娜：**哎，只恨那烈血的基因，一代代供上祭坛，一代代被铲除。而身段柔软、更善于腾挪的基因则日渐繁盛。这当然也不是我们一个民族要面对的问题，它是所有古老文明在漫长的淘洗中所产生的问题。像一种日渐麻木的慢性疾病，或者说，一种民族惰性？

杨炼：如前所述，不该把问题都推给“传统”。我不认为文化基因固定地偏向某一方面。先天的元素，其实都在后天选择中，被突出与加强。

屈原“思想之诗”给出的范式，没有获得后代诗人的积极响应（或只是口头响应，现实背叛），当然传统有责任，例如权力大一统，例如形同控制的家传式教育，例如名为“有教无类”实则筛查剔除的科举考试，例如富贵还乡树立的庸俗榜样……且不提思想之诗了，能在人为文中，多一点真诚，少一点油滑，已属难得。我很反感“劣根性”这个词，我看到的是，人性之丑，被现实文化环境刻意放大。于是，劣币淘汰良币，成了我们文化的常态。

即使我们写作的短短历程，也在验证这种退化。曾经的理想主义、忧患意识、反思激情哪儿去了？诗歌里的真诚、冲撞现实的热血哪儿去了？区区三十年变幻，是否已恍若隔世，那时的不苟且，对如今流行的实用、利益来说，显得多傻呀！如今，人老了，房子大了，钱多了，名声响了，职务爬上了，但拿过来诗读读，全是油腻腻的文字游戏，放在哪儿也不疼不痒。这种“诗”，只能在团伙里自吹自擂、自欺欺人。这种“诗人”，可能终于看透了——自己，为什么“向死而生”？向钱而生，实惠得多吧？！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精神挑战性比三十年前深刻得多。冷战终结，东西之间非

黑即白的群体思维也告结束。以前民主的口号、自由高调，能直接被富裕的物质生活证实，那是无需选择的选择。现在，全球化的权与利绞缠成一堆，“烈血的基因”在其中能占什么位置？如你所说，这不是我们一个民族面对的问题。但接下来我要补上，古老的文明，并非只在漫长的淘洗中经受考验，它们（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今天，一种巨大的价值混乱和精神真空，骤然君临全球各个文化，就像新冠病毒，无视中外，一概传染。人类凭借什么，人性凭借什么，去对抗这场灵魂侵蚀？这人类历史上首次共同面对的精神危机，有什么能让我们免疫？中国文化在历史急变中，暴露出了自己所有软肋。西方文化也不能幸免。不管你喜欢全球化与否，这挑战就摆在你面前。谁是幸存者？还未可知。

**戴潍娜：**是啊，疫情带来的精神异化，恐怕比我们预计的更深远。世界进行自身的电子化折叠，人跟人面对面的交流日渐沦于“濒危艺术”。与此同时，人类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这一代人类虽然上了太空，但生活中早已没有了魔法的空隙，即时通讯让人和人之间也没有了想象的距离，人只会越来越孤独。疫情期间，我重读了一些推理小说，感慨高智商推理只属于前现代，那时候人还没有躺在技术上睡觉，还在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智能和人性魅力。然而这些在电子化世界里都失效了。手机上就有一个人的一生，摄像头挤占了全部想象的可能。跟福尔摩斯一起失业的，还有小偷家族，谁还出门带钱包啊，以后就只剩黑客在键盘上动动手指的份儿。三次元的真实感在迅速蒸发，让位给二次元世界。魔法世界绝缘了；人和人的亲密感，泯灭得只剩下某宝商业逻辑里的“亲”；资本的疯狂逻辑渗透进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原子，内卷之后“后排人”将永远和“前排人”拉开不可逾越的差距；娱乐让人惨而不自知；手机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下“裸奔”的人群里，再不会出现无污点的圣人和圣徒，更不会有思想领域的一呼百应；每个人都在朝向机器飞快进化，变成半人半机器的虚妄所在，只不过各人进化速度不同罢了，有的人百分之三十，有的人百分之五十……诞生“神圣”和“魔鬼”的不被窥探的洞穴封死，人类无限趋近于工具。

但我还是相信文学。疫情出不了门的日子，我在家里抄写楚辞。真是很久没有抄书的冲动了。我抄书也是不求甚解，但求会心解颜。《离骚》《天问》中好多被现代汉语弃用的字，都已陌生如鬼画符。可真不由惊叹，岂止是内美、美人、美政，就连屈子用的那些个琳琅琅的字都好看！美得淋漓，怪不得古人取名讲究：“女诗经，男楚辞”。就算抛开一切意思，光是看字、听音，就够满足。管它世界多大程度上放弃了诗，诗始终没有抛弃世界。诗不是现实的追逐者，相反，从屈原的《天问》到今天，它始终以一种叫人惊叹不已的方式创造现实，完成现实，我依然在期待它会用一种隐秘之力，夺回这个日益感知枯萎的世界。

汨罗江水纪录下历代诗人形象，可说有千千万万，也可以说，只是屈原一个——此后的读书人与其说是屈原的晚辈，不如说都是屈原的分身，是他的碎片。

只要还能写出一行诗，我们就都是屈原子嗣里的幸存者。每个中国诗人都对他天然负有一笔旧债。依然在写诗的人，都在用自己的孤独去填补他2300年前挖下来巨大的孤独深洞。然如今，诗人只能用平凡的日常生活为那些历史幽灵守灵。

更惨烈的是，自屈原以后，知识分子的“遗传库”已经不断遭到污染，知识分子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在不断地加害他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徒劳无功的爱，是他们既无法自救、又无法拯救世界的无力！在知识分子精神基本无能，非暴力的消费手段已经操控了大众的思想和情感的时刻；在人类的智力没有任何增强，体力较之于原始人却大为退化的今天，诗人究竟如何不去背叛、辜负他的死亡，如何过去这徒劳的思想生活？如何对历史幽灵有一个诚实的交代？去捍卫——诗歌所捍卫的热情，所捍卫的沉默，所捍卫的自我牺牲？

**杨炼：**或归结为一问：我们够格成为屈原的碎片吗？

前不久，我为即将出版的意大利译文诗集，写了一篇序言，题为《从不可能开始》，其中有句：“八十年代，被称为中国文化反思的时代，从现实苦难追问进历史、传统、每个人自我，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原动力……”这唤起了诗友田庄一番感慨：“80年代究竟反思来了什么？反思来反思去无非是重新走向朦胧和苦难……这民族像遭了诅咒，我们每天所做的，不过是西西弗斯推着第N次滚下来的石头。”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没错，他的悲观，其实是一种真诚。首先对自己、进而对历史的真诚。因为自欺欺人不难，只要闭目塞听，相信祖国日益强大、自己天天向好，以“知足常乐”为底线。老祖宗早备下的排气阀，永远是消解愤懑的良方。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重温屈原发出历史深叹的大作，是端出来唬弄一下老外，让本民族牛一把？或玩玩自嗨，到自己的古代异国情调去旅游一趟？屈原很可能也是块西西弗斯之石，只不过它巨大而假。他的孤独、死亡、沉寂，被那么多子嗣看着，喃喃连声地“推”着，实际上谁也一动不动。这才是真悲剧。推都不推，怎么知道推它不动，或推上去还会滚下来？“负债”如隐喻，可万一我们集体赖债呢？那错的会不会是“债”本身？对许多人，屈原只是龙舟、粽子、端午的锣鼓喧天，那个“巨大的孤独深洞”，不看它就不存在。中文没有过去时态，可诡谲的是，中国的“过去”却常常取代了“传统”。它用物理性的时间流逝，掏空构成活传统的个性本质，由此推卸了个人的历史责任。屈原的幽灵（如果有），只让人们害怕。由是，田庄最后悟出了真谛：“最高的启示是：不——可——能。余生就参这几个字啦”。

我的诗《大夫 我是你身边一滴水》，写给屈原，更写给我自己。其中有句：“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我认为，屈原诗伟大，正在于它的当代性（注意，与“当下性”

有本质区别）。它就在我们之间，依然能有机参与今天的思考。你说“用平凡的日常生活为历史幽灵守灵”，我倒是觉得，对“幽灵——守灵”而言，无所谓平凡生活与历史之别。日常的就是重大的。写一行诗，就在抉择跳还是不跳这道悬崖？跳，大夫之灵就与你同在。不跳，有的是编都不必编的托词。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分一秒积累起来的，真或假，伟大或渺小，此刻就在决定。

落到实处，今天的中文诗人，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现实考验，但中文诗作里，充塞着回避、躲闪、隐藏，叛卖，无关痛痒的游戏，空洞浅薄的滥情，抄书贩子式的学术，假装超脱的玄奥，吃了一辈子“持不同 X 见”，对鼻子尖前的不公和迫害，连正视也不敢，更别提发出诅咒了。海量的分行废话，都被抽干了骨骼。这种言说的聋哑，文字的叛卖，与其说是被害，实在是一种加害。真正的受害者，就是我们整天挂在嘴上的“中国文化”。屈原一句“不忍为此态也”，概括了如今蟑螂般繁殖的丑陋共谋者。装麻木或真麻木，旁观历史倒退，忍受生命意义的消解，写作几十年，只令诗歌一词深深蒙羞。艾略特有言：小说可以虚构，诗却必须真实。这“真实”，就在诗人内心里。“良知之痛”有没有、有多深？第一骗不了自己；第二诗作暴露得清清楚楚，别人一眼就能认出。我们探究屈原，落点必须放在这里。

“诗不能阻挡坦克”，这既是真话，又是屁话。因为我们每天看到的坦克，正在诗人心里的大街上横冲直撞。你阻挡它了吗？或正暗自给它加油？今天的“诗坛”上，拉古代、扯外国，滔滔不绝。可一到现实，顾左右而言他，就成了专业。这是自取其辱。无力自救、无能救人，精神阳痿，智力颓丧，这幅诗人肖像，恰恰在反衬（反证）“诗”



图片版权 David Schroeter@flickr

之首要：挡住自我内部那辆碾压人性的坦克。一个人做到这一点，反思就有成果。这样的思想生活，决不会徒劳。良知之痛=诚实，历史=每个活人，屈原诗=任何一行诗的自我净化性质。让我们先想想，能否对自己的扪心自问有个交待吧。最后附加一句，此处褒贬，都有所指，欢迎对号入座。

**戴潍娜：**自欺欺人的文宦、文贼、文贩，再写一万年都不行。“自我净化”和“交代”，也许点到了诗歌文体的神性入口。倘若有勇气诚实的参悟历史，必然会被灌注进百代积累的悲剧的力量；哪怕是一个阳光懵懂的年轻人，也少不了染上那独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感、戏剧感（没有命运感的文字，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文字和故事的骨头缝儿里钻进一股不可操控的神秘之力。

这是屈原下的蛊。

屈原是一个文明源头上的提问者，也是反问者和质问者。他始终在展开一场直通今日，甚至直通末日的追问，“长无绝兮终古”。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所有的问题都是活水源源不断，他们孕育出崭新的问题、崭新的答案；但在封闭环境中，则会被唯一正确的答案所终结。今日，我们恐怕依旧活在柏拉图洞喻中墙壁上屈原放大的影子里。相信他那超越了三维的语言，可以跨越 2300 年，和我们当下的汉语，和我们此刻的世界彼此聆听；以他绵延不绝的天问，对此刻追问不休。如何把屈原放在一个全球语境中，去发掘它的当代性，共时性？今天恐怕还是要借其古风古韵，来到我们也许从未到达的现代？

**杨炼：**屈原诗一步到位。我这里指的是它的文本意义，包括各层次上的追问：对宇宙存在的思考；对文学意识、形式、乃至音韵的追求；以自沉为标志的人格实现。完成这个整体，使屈原获得了文明源头的资格。

时间是什么？历史是什么？我以为，不是靠朝代、纪年标志的流逝长度。我们的亲历，体悟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时间和思想间，并无必然的逻辑关联。所谓“历史”，不是不能倒退，而是经常倒退。我们认为高歌猛进时，轮迴的深渊也恰恰张开巨口。2020 年，用新冠、黑命贵、大选舞弊，给人类狠狠上了一课，谁还愚蠢到相信“进化论”的幻觉呢？此时重温屈原诗，我们会发现，提问，没有今日、末日之别，只有深刻、肤浅之分。譬如《天问》，劈头一“曰”——“都说是 / 谁说的？”既质问他人，更质问自己。古往今来的众人说，归根结底是“自己说”。历史不会行骗，借历史牟利的是人。所以屈原诗中，历史的烽烟血泪，都着落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追问

至人性，时间和历史就被聚焦，一种诗意，就永不会过去。这里最宝贵的启示是：深度裁决一切。提问的深度，能激活四面八方的资源，使之加入一个人的自觉。远古如《易经》，晚近如爱因斯坦相对论，都在用一种共时空间的思想，重新理解时间的意义，进而把握世界与人的同构。我的诗《韩退之中元节》，或从四面八方坍塌到我们头上的时光》，标题点明的，正是这个启示性极强的现实。我们该抱怨吗？抑或感谢这个机遇？

我强调“深度”，但也很担心，它会被误解为一种观念图解，甚至一种宣传。不。“深度”是思想的，同时必须是形式和语言的。离开了充分的形式追求，空喊口号毫无意义。屈原诗在此也是榜样。它的精魂，永远融在每首诗特定的形体内。《天问》的四字句，衔接了《诗经》，尤其《大雅》之灵（“流亡”一词，就源出于此）。《离骚》的双行联句体（我杜撰的名字），把楚巫文化的吟诵传统，凝聚成一唱三叹的书写形式，以此承载这首通天地、贯古今的独创大诗。《九歌》是诗剧式组诗，人物们个性鲜明，语感美轮美奂，楚味儿最足，楚声浓艳，一台神人歌舞，连演了千年。这三大类体裁的共通处，在璀璨夺目、一以贯之的形式追求。这些诗作，形体整齐，押韵精美，长诗换韵的节奏，常与内容递进吻合，永远保持着形散而神不散的整体感。通观中文古典诗歌史，屈原诗是唯一案例，不依赖现成形式，而能在每场自定规则的诗歌足球赛中，踢球、射门、进球、裁判——自圆其说地“用语言的深度印证思想的深度”。我让你迷惑了吗，这在褒奖两千年前的屈原？还是批评当代诗？离开了中文古诗的形式主义传统，今天的中文诗，一片放弃诗性要求的惨状。粗俗泛滥的大白话、只剩分行的“形式”、枯竭干涩的“乐感”，在在都与诗无关，却隐隐渗出了打到臭老九的反动基因。表面是反文学，底牌是反文化、反文明。屈原决绝的自沉，正表明了对这类“溷浊不分”之物的态度。

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谈谈我那些自创韵律的押韵诗。这类作品，以我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为代表，其中，我为每一特定部分，设计了独特的韵律形式，让诗意和音乐性自成一体。翻开我晚近的诗作，这类押韵的尝试比比皆是。我无疑是极少做这事的当代中文诗人之一（弄不好甚至是唯一呵呵）。我相信，很多人干脆把这当作我的“怪癖”，为啥这么做？谁会去花功夫阅读——更别说品味——你那些陌生古怪的韵脚？它们和摇头晃脑的古诗完全不同，不仅得去找，还得一遍遍念，琢磨这些写法和内容有什么关系？当然，最受不了这折磨的，当属我的翻译者们，译诗就够难了，还要译韵？疯了吧？！但，我想说，没有这个形式自觉，更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自己在做什么？诗歌传统，说到底是语言的音乐传统，音乐融在诗歌形式之内，标志诗意思考的最高层次，无此就免谈诗歌自觉。现代汉语仍在这个音乐传统中，而且更清晰，屈原诗才是榜样，我们不是要鹦鹉学舌，而要个人性地发明形式——包括鲜活的诗韵。这首先是为诗而做，其次是为自己而做，既然承认一个优美的血缘，我们就得让自己对得起它。

在中文诗歌资源的繁杂，与追求诗歌形式的纯粹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不仅如此，它还让我们找到一条路径，去突破汉字词、物分离的先天局限（一个缺陷）。那就是，自觉建构诗歌词形式的小宇宙，以包容外在世界的大宇宙。不流于词、物之争，而是让词与物各自独立、各有秩序，两个象征体系互相对应，同心圆——同构式的全息重合。记得艾略特说过的“客观对应物”吗？这里的对应，不是一词一物的对应，而是语言系统与世界系统之间的呼应，它们结构上的重合，正吻合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念。老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里“不言”就是不说。天地之大美，只存在、呈现，而不是“说”出来的。诗歌本质上也一样。自觉建立语言、形式、结构系统，纳言说于存在之中，这是诗歌古往今来的奥秘。不仅屈原诗活在它的形式中，你再品味一下七律，那七字八行五十六个字，与其说是诗歌结构，不如说是个多层次的动态空间，其中时间之流无尽循环。由是，建立形式，就在赋予内涵。追求呈现，远远高于诉说。词、物不会等同，却相异而合。小宇宙对应且包容大宇宙。中文诗学，于此找到自己的哲学根基。

受《天问》启发，我曾把诗人的位置，设定为一个“专业提问者”。这里，“专业”一词，极为重要。思无止境，诗无止境，它们都期待着够格的发现者。这是诗歌思想家的时代。诗歌的纯粹，被时代的“溷浊不分”反衬得格外鲜明。我们的追问，既向外更向内，现实的维度、历史的维度、中国和全球化政治经济纠缠的维度，加上人心美好或龌



图片来自 Jason An on Unsplash

蹉、欲望和想象的维度，你说那有多少维？这么多维在向周围投射？或四面八方在朝我们坍塌？诗歌能否接得住这不分青红皂白砸下来的一切？回答是：能。而且必须！噩梦与灵感，或许从来就是同一个东西。写诗，其实只有一个专业：为独特的思想发明独特的形式。我写《大海停止之处》，四个层次的结构，非如此深化不可。而长诗《同心圆》，人的共时处境，化为具体和抽象轮番递进的五章，直至用一个“诗”字找到落点。回到柏拉图的山洞比喻，语言本来就是影子，人类通过这影像，认识自身，且创造自己的存在。那么，“活在屈原的影子里”，不是活在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里吗？这也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我们接通了他的血缘，让思路、笔路一举打通古代、现代、后现代、或别管什么“代”缺乏追问的自觉，环境永远是封闭的。反之，则向创造之“我”敞开。专业提问者，一个最小也最大的公分母，把屈原和“我”抹平了差别，甚至能让屈原因“我”而增加分量。2300 年从未过去，它带着全部忧郁和美丽，成为一首新诗结实的质地。

**戴潍娜：**“历史的忧郁”，鸿美，深邃、刺痛。一个词里容纳了历史之殇与历史之熵。我们恐怕要永恒生活在这“历史的忧郁”之中吧？

**杨炼：**是的，我写作这么多年，越来越觉得“历史的忧郁”一词，凝聚了当代中文诗全部美学精髓。

首先，触目的是那个矛盾句式：“当代”和“历史”，一对逆反概念，如何衔接在一起？但再想想，为什么不能？甚至不得不？这命题，其实来自直觉。我文革中下乡插队三年，每天干活，就像翻开黄土大书（偏巧我插队的村子就叫黄土南店），那从来不是薄薄的“今天”一页，却封存着祖祖辈辈的命运。它们叠加粘连，几乎黏成了一整块，谁要想一探奥秘，必须生撕硬扯，也许五指血淋淋时，能撕开一道裂缝，窥见里面影影绰绰的鬼魂。

我最早的诗《自白——给一座废墟》，这样开头：“让这片默默无言的石头 / 为我的出生作证”。它尽管稚嫩，却已渗透了某种当代中文诗人躲不开的命运。中国留给我们的，决非一个温柔乡。它劈面压来，用历史、用现实、用被深度污染的语言，让我们懂得什么叫“绝境”？什么是“不可能”？我们刚刚新生，却又太老了。诗句还在牙牙学语，可感受中已数度沧桑。诗意的内在饱满，从开始就似乎要涨爆词句。它们纠缠、冲突、矛盾、交错推进。在时间的、生命的、文化的废墟上，诗，不得不活成残存的石柱，从地下伸出一根手臂，看不见地痉挛，一次次从不可能开始。生与死，在我们体内，互相浸透，彼此加强，浑然一体：“这遗言，变成对我诞生的诅咒”（《自白》）。

如今，黄土南店已被抹去，它连宅基地都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某个陌生的别墅小区，用水泥板死死封住几千年的历史，包括我自己插队三年的记忆。它真的存在过吗？抑或整个就是虚构？死者和生者一样，都已哑口无言。我唯一能找到的意象，只是一骨灰瓮。

但，那一簇簇黄白色的骨灰，消失了吗？它们能从我的血液里、噩梦里、诗句里，被轻易擦去吗？更恐怖的是，无数今天发生的事，一再提示我，它们就在这儿！弥漫在空气中，催化着现实的化学反应。

1982 年，我第一次漫游大西北，返回时的背囊里，记着一大堆写诗的题目。但回到家坐下，忽然感到那些词汇那么空，在轻飘飘四散，手里什么也抓不住。这困惑很可怕。它逼迫我扔掉那些自我异国情调的假货，沉静下来，浸入记忆里那片茫茫无垠的黄土。它忽然亲近了，变成我插队村子那一小块黄土的延伸，甚至成了我躯体的一部分。我能清清楚楚摸到它颗粒间、灰尘里那些死者。此时，散漫的诗思，仿佛被过滤了一般，只留下《半坡》、《敦煌》两个焦点，而两个其实是一个，《半坡》的生存层次，和《敦煌》的精神层次，组成了人类命运的结构。几千年的历史纵深，全然发生在诗歌之“我”的内部。

我写《历史的忧郁》一文，基于很简单的原因：这个如此“中国的主题，竟长久被忽略着！诗人们孜孜于贬低“宏大”，却忘了“小”诗照样可能浅薄无聊。其实，真正的诗歌问题，哪在于题材大小？它只区别于充实与否？就像我花了一点功夫，调研了屈原诗的“流亡”母题，就赫然接通了那个贯穿两千余年的精神血脉，并把屈原开创的“思想之诗”，直接转换成一个当代传统。倘若我们不做这一点功课呢？这个“流亡”母题，会不会仍然套在意识形态的紧箍咒里，被矮化成口号侏儒？但现在，它的源流如此丰沛，诗歌“从死亡开始流动”得多么自信！

我说“历史的忧郁”非常“中国”，一点不假。我们的现代转型起步甚晚，且至今被历史的阴影（阴魂）深深缠绕。这是悲哀，但孰知不是好事？古典“思想之诗传统”，断绝了两千余年。抒情诗传统一支独大，权利架构下孱弱的人格和个性，至今污染未绝。这让骤然——从历史角度看，四十年仍是“骤然”——置身于全球化语境的我们，不能不感到空前的挑战。可以说，“历史的忧郁”之一大原因，来自我们的文化（文学）环境，极度不纯。从经济变革开始，政治、社会、历史、文化、语言、心理，甚至宛如深海的潜意识，无一不在大震荡中。现实的无数大问号，缠绕着每个人内心，想躲也躲不开，更何况它们常常压根无解！由此庞杂无比的思想资源，如何提炼清晰之思？进而育成纯粹之诗？这相反的撕裂，能相成美好的张力吗？抑或只会散落废墟的废墟、碎片的碎片？几千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堆积在每个人、每首诗里，谁没感到一种被压垮的无奈？忧郁，来自这深深的困惑。但，否认它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处方，还是回到屈原诗的启示。当他一而再、再而三使用“流亡”一词，只提示了一个关键点：自觉。对流亡自觉，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在一个遍布“他者”的

世界上，做一个主动的（而非仅仅被迫的）他者，由此消解出国与否的不同。对“历史的忧郁”自觉，就是不回避历史的压力，反而尽力吸纳它、消化它，让它内在于“我”，越困惑越激发创造的能量。

读屈原诗，你会感到，他沉溺在同一历史的忧郁中。从古到今，这忧郁感从未减轻，只在加深。我得暗自承认，如果说中文诗，有某种天赐之美，那不是别的，恰是这历史深沉的忧郁感，它沉积在漫延三千年的语言里，加注进我们每个人的质量，既惨痛，又无比宝贵。它像一笔自天而降的横财，砸落到当代中文诗人头上，接不住它，纯属自己无能。而接住的方法，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我在《历史的忧郁》中写的：仅有大历史不够，仅有一个人也不够，必须让大历史成为一个人才够。那个“鸿美、深邃”、无尽咏唱着时间之殇的，恒是一个诗人。没错，永远生活在历史的忧郁中——因为正是它，让每一行自我之诗铿锵而鸣。

[1] 见《离骚》



杨炼

1955 年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迄今共出版中文诗集十三种、散文集二种、与一部文论集。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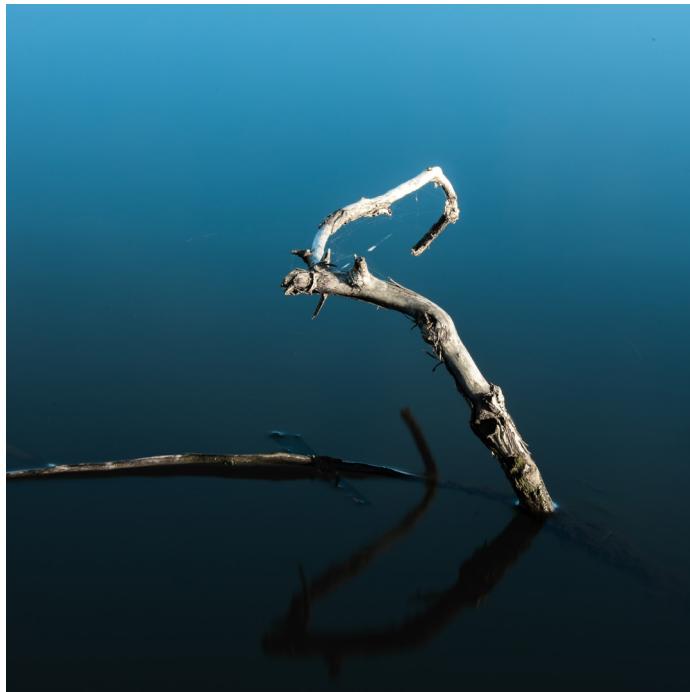


戴潍娜

诗人、学者。毕业于牛津大学。出版《灵魂体操》、《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露理士》，翻译有《天鹅绒监狱》等。2017 太平洋国际诗歌奖年度诗人；2018 海子诗歌奖提名奖。

#### 诗人访谈

这个栏目由诗人戴潍娜主持。她与诗人谈论诗歌，以及他们自己。



图片来自 [Mitchell Luo on Unsplash](#)

## 诗歌

# 鹤乡 / 潑浦美人夜歌 / 大夫， 我是你身边一滴水

杨炼 | 只有诗

他们都等在别处 而你只要夜

01

鹤乡

—

鹤在哪里？当石阶 小径 草坡  
一路向下 摸索进午夜也被午夜摸索着  
浸透了寂静也被寂静浸透着  
湖微微反光 天空幽幽漾开磷光  
树林是位阴影大师 拢着护着小小的  
木亭子 某条鹤颈慢慢吐出一点烛火  
每一夜勾勒桌上一只空瓶子的轮廓  
每一夜都像今夜 摆满长寿 苗条  
精美雕琢的造物

人在哪里？酒杯中炽热的琥珀色  
浓缩了太空信息 濡湿倾听的风景  
小柳树的剪影倚着银波粼粼的屏风  
羞涩地更衣 莺从梦见一只小船返航  
岸步入星光 睡莲雪白地盘在一只碗里  
(一幅画总刚刚挂到墙上) 今夜  
便是永夜 坐在鹤的身边也被鹤  
删除至无边 空气中实体的静 突入  
窗户 盲目行驶如桌角暗暗煽动的翅膀

就这样思念流逝也被流逝思念着  
耽溺于此刻也洞开此刻的渊薮 小小的  
木亭子 栖息在树林边 夜色边  
有只鸟毁了的降落的形状 那黑颈  
灰羽 掌舵的长腿 围绕一对查找的  
眸子 侧身划出生命的圆弧

呼应这默想 写出凄清的叫声多难呵  
一只鹤黑暗温暖的内脏 低低搂住世界  
跨过自己的腐叶 每个地点都是无尽的

二

我们从未离开灾难的家  
这一次次逼我们起飞 逼我们降落之地

被蹂躏的袖珍宇宙架在木栈桥上  
湖水折叠着光线和时间  
一本翻开的书 无须多余的辞藻  
和技巧 你站在那儿 安详的倒影  
已被多少倒影打磨过 莺叶不再颤动  
沙沙声只挽着思想颤动  
这是濒临的时刻 我们的湖  
一枚蔚蓝窸窣的落叶躺在无数落叶间  
一次即将登船的出航陷进湖底否认的  
航程间 木栈桥像把田野尽头的椅子  
从未停止守望一头死鹿跃入云朵  
空寂 印满沙地上的蹄迹

现在叫声来了  
叫声 一声像水波 一声像树荫  
含着空旷也被会哭诉的空旷含着  
一张看不见的嘴 擎起万物的形像  
叫到我们走去的道路森林就刚刚完成秋色  
叫到一根朽木 它就等在雨中青苔累累  
叫 墓碑东倒西歪 名字已还给石头  
亡灵隐在鹤体内 像衣橱里小心翼翼收藏的  
军服 蘑菇的红星 镶银的橡叶  
(茨维塔耶娃正把《山之诗》装进信封  
寄往细细血红的舌尖 她说 爱上不自由) [1]  
一声接一声的铁栅 锁着大地 锁着旅程  
谁也不曾逝去 历史的鸟儿  
历数拥挤和虚无

现在他来了  
湖在那边 旷野在这边  
一条沙石路在脚下 路牌指向  
虚拟的尽头 一股风卷起他身上露水的气息  
我们窥见一位老农搓着指缝间的泥土  
一位渔夫蹚着水收网 “每个动作  
都嵌在大地的乐谱里 每天是一片  
你站在窗前看着它旋转飘落的叶子  
金黄卷曲的忧伤 静静混入树根下拥抱的忧伤  
由是 每一声鹤鸣都发自醒来的朋友”  
既像清晨又像午后的光洒在他的衣袖上  
蜂蜜色的尘埃也在漫步 擦过白杨  
一幅画了又画的北方风景 “没有什么  
不穿越黑暗而来 给你一个梦中做客的版本  
无需独裁者 帮你拆解奴役的涵义  
迁徙的涵义 抒情诗徒劳加演着哀号  
你在你里面生长 新绿如羊齿草  
怀揣沉甸甸的轮迴 每一步踩着不可能  
每一步就这样迈出” 鹤鸣与脚步声  
沉吟森林图书馆一代代借阅的语言  
“大地的丰富教你什么是朴素  
附身于苗茎似的诗篇 一种激情全力以赴  
一种平稳全力以赴 琴键按下昼夜  
无数死的地点成交一个永生的地点  
我们要借助魔鬼吗？历史那心碎的自传  
活成（而非写成）逃不脱的戏剧 我们的山  
也变成灰色了 我们的浮士德还没爱过 [2]  
走在一行诗里 对应拒绝或忍受的一切  
朴素不是结论 只是无边无际的优雅”  
带着近乎羞涩的笑 鹤的姿影还原为一幅肖像

三

单簧管追上鹤颈 探入  
房间和一页幽咽的乐谱  
回声幻化成窗外的橡树  
羽毛金黄 伴着那囚徒

一笔一笔为时间作曲 [3]

写下末日 远超末日

卫兵的皮靴踢踏节拍器

终结 谁都得独奏一次

鸟瞰的灰烬 有袅袅轻烟  
弱 才撼人心魄 天边  
甜得发苦 围坐之蓝  
仍等着自己噩梦的首演

鹤沉浸于此 这死地 这聆听  
鹤翩翩来 无尽的亡命  
浇铸宿命 最美的凄清  
最懂得慨叹 沧桑之痛

没一只鹤 到处是鹤  
音乐咀嚼空荡荡的暮色  
一步一回头 多少哀歌  
挤进这一首 仅有的一刻

像血淋淋的倒刺 钩进  
铁摇篮里回家的孩子们  
乡愁 跨时代押刑期的韵  
鹤乡 焚一缕香 倚万重云

音符的大雪纷纷扬扬  
终结早来过 冷艳的路上  
终结还在到来 诗行  
用温暖的腋窝搓碎了光

想着一个极端没完没了继续开裂

水涌出来了 一道栏杆紧傍着那喷溅

大夫 最黑的子宫才配收藏这场狂风暴雨

注：溆浦，是屈原诗中多次提到的地点，地处当时极为偏远的楚国西南部。据传说，溆浦为屈原最终流放的目的地，但屈原走到半途上的汨罗，即沉江而死。

2020, 1, 23

### 03

大夫，我是你身边一滴水

—

大夫，我是你身边一滴水  
石块还抱在怀里 鱼腹换了又换  
江上的风总有寒意 而一滴水的落叶  
无尽辗转 飘下 紧紧依偎  
一个仍喃喃沉吟的形体 我们的相思  
穿透了彼此 一抹用不完的暮色  
早已冲决堤岸 大夫 水上水下  
你还走着 潜望一世界的浑浊幽暗  
贴近起伏 涟漪中一滴水再不会溺死  
我听见我们荷花盖顶的斗室迴声四起

二

大夫 一滴水是你我共用的辞典  
在汨罗 感到你慢慢冷透的器官  
两千三百年 还在向我们张开  
你佩过的兰蕙已融入一条河的体味儿  
你独坐的幽篁 深埋进朵朵浪花  
溆浦的远山那幢幢鬼影 像一声长叹  
步步逼近 赤豹也追不上西去的桂花香  
一个死阴阴浸湿一百万种末日的联系  
哦大夫 哪个此地不是远方？一滴水  
垂直凿穿你和我们共同的内心

三

大夫 流淌的幽灵流淌着梦呓  
在汨罗 祖屋的木缝 火塘日日端午  
水围拢你 水流进你 故国  
何曾忘你 洞庭波声声复述你的楚语  
南浦北浦目送同一位美人徘徊  
谁教你抉择流亡一词咬定自古皆然的前世  
且完成今之祭祀？大夫 秕归已没  
郢都的碎玉坠入你从容赴死的滔滔辞令  
每天一个仪式 拥挤的祖屋越沉越深  
一条河向下守着所有诗的起源

四

大夫 我是你身边一滴水  
小小的 心形的 斟满你不停刷新的命运  
一个抹掉生卒年月的人只能像鬼魂  
用每滴水再活一次 荡漾一次  
我的海边紧挨你的泽畔 湿漉漉的笔迹  
从来是足迹 一片茫茫 踩下就是空的  
而我们踩了又踩 问了又问  
大夫 没有答案的仍是那一脸憔悴  
一只鹭鸶啄起一个孤独的长句 冷酷地  
一抖 忍住的柔情继续漏下鱼鳞白的名字

五

大夫 一滴水繁衍一条吞噬的河  
它正收紧腰肢 呛进我们肺里的化学  
有你不能原谅的鱼腥 我们的水泥河岸  
像棺盖 钉死了你蹒跚跨过的小径

2020, 11, 20——2020, 11, 26

## 02

溆浦美人夜歌

他们都等在别处 而你只要夜  
只要河 一道俯瞰漆黑水面的栏杆  
扶着那腰肢 断崖下大夫为你而来  
一个约会中水声喃喃的岸 桥 灯火  
虚设千年 黑暗的激情拎着明艳的肉体  
溆浦在哪儿 美之诅咒永无尽头  
凌波步 永远不缺诗人下一次远眺  
一条河也扶着两只相思的器官上路  
站进夜色 谁不是毕生赤裸的 孤悬的？  
喃喃湿透每个孔洞 皱褶 甬道  
钩紧了蕊 你只要这虚无

他们都等在别处 一个房间饲养着  
狐狸 一张香膻的床拓宽河床  
你身上的积蓄了千年桃花的春色血色  
从来守在这里 翻开两瓣小小的泥岸  
大夫踏月而来 稳熟追寻人的缺口  
要一枚午夜裸出笋尖 被剥过千年  
仍是嫩的 要一张小嘴俯玩急急的水声  
叫谁的名字都像锻打 狐狸耀眼  
腹部白雪荧荧 骑乘黑暗的造物  
摇荡 你被吸尽的样子就像世界不顾一切  
在毁灭 逃无可逃 溆浦太远了

他们都等在别处 一首诗的大河  
漫漶而过 想娇喘就娇喘 想虎啸  
远山就卧在身边 轻轻咬你  
狠狠弄 一种不饶过肉的要命的空  
词语填不满 非长夜不可 一次耽溺  
大夫已回不去了 熏香至骨髓的名字  
不看人类 每个念头向上耸立 灵或者鬼  
今晚在无形的家园 要 溆浦那道裂缝

你亲近的芳草 你的华章 领着我的  
唯一书写下早知道的归宿  
大夫 没人认出河底泛起的缕缕血丝  
又怎样呢？两三千百年已这样过了  
两三千百年还将坍塌到我们头上  
无数祭文张牙舞爪 扑击河底铸铁的寂寞

六

大夫 满满的江潮灌注今夜  
什么也不等 因为所有时间已汇聚于此  
什么也不奢望 因为你一个春夜的  
恼怒 已签署了我们的每个春夜  
什么也不能改变诗人呛炸的肺  
奖给一千个乱世 这行涉不过江的诗  
必是最后一行 大夫 你刚刚写下的  
一个退无可退的绝地 让我抱紧沙子的  
刺痛 你影子的断崖细数古老的一跳  
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

七

大夫 我是你身边一滴水  
听着那天你喃喃自语：“就是这儿”  
汨罗 你为我们选中的故乡  
无须诞生在这里 必须返回到这里  
衔接一个吟咏的灵魂 这水草间的乡音  
谁漂泊就是谁的 这一口口呕出的韵律  
晾晒血里的盐 老冉冉之将至的天边  
只待一问 就新如一页手稿 飘落  
蛰疼的细雨 大夫 你的爱盯视我们滋长  
带着泥泞和毛茸茸的嫩绿

八

大夫 一滴水的洁癖迎向你  
裸露字里行间 一个没有时态的漩涡  
旋转一个不计消失的形式 大夫  
你在我里面 而我躺进你的呜咽  
透明的波涛过滤无数生死 给时间剩下  
我们唯一的生死 一首诗的一夜  
从不要求更多 你乌有的墓碑和我的泅渡  
同样湍急 一滴水里狂暴和静谧  
同样黑暗 已矣哉 一声轻叹无始无终  
再没有什么能溢出这同一首诗

九

大夫 水底冷吗？诗那么冷吗？  
可司马迁读懂了 奥维德读懂了  
你不认识的黑海拍打进汨罗  
最古老的石头水槽里奔涌过一行接一行的  
远眺 大夫 你的灵在水中 你的水  
一滴就足够让我们航行 毕生意味着  
无限远的脚步 杜甫读懂了 但丁读懂了  
这条风波之路是唯一的路  
这最热烈的孤独 搂住所有海岸  
每一枚被捞起的明月 荧荧照着你再生

十

大夫 我是你身边一滴水  
我能用什么语言纪念你？  
或无言 只一朵浪花 刚刚形成在心里  
荷花盖顶的斗室 迸声四起的斗室  
幽思绵绵恰如相思 从未离别的诗意  
从不哭诉乡愁 大夫 你俯下的呼吸  
漫进汨罗这一排轻浪 一个美的天文学  
水面愈漆黑 血肉间愈亮起你的光  
让我们习惯苦苦香香的想念  
一滴水追上亡魂 看着自己成为神话

附录（应《草堂》杂志之邀而作）  
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

汨罗江有多深？那几乎就在问：屈原的诗有多深？或言之，汉语诗歌能抵达什么深度？2019年11月之前，我从未去过大江，但同时，我漫游世界时，又感到从未离开过大江，谁在心里沉吟《天问》的句子：“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他就还原为诗人古往今来最根本的形象：一个提问者。从2300年前屈原踽踽独行的泽畔，到我们今天分分钟就能飞抵的万里之外，哪有一个现实的距离，能超出诗人内心的疆域？同样，只要提问的能源在，诗歌创作又怎么可能匮乏？我从不在意围着诗歌绕圈子的废话，例如题材应该宏大与否之类，诗可大可小，但绝不会肤浅藐小。尤其汉语诗歌，从古到今，整个就是我们历史命运的载体，它先天注定的宏大深邃，不随其他语境的时髦理论而改变。我明确说：我以此为荣。这条汨罗江，浩浩汤汤，无涯无岸，既含括沧桑变幻，更审视每滴水的清浊。当我说，把每首诗当作最后一首来写，在每个字上绝地反击，我在说屈原？杜甫？杨炼？抑或我们本来就是同一回事？我想到的是楚国亡国之恨？我自己经历的文革？抑或当下肆虐荼毒的病毒？人性的困境，万变又不变，把我们不停逼至同一条江边，让我认清，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它横亘面前，岂止是最后的？那根本就是绝命的！盯着它，大夫的抉择仍是我们唯一的抉择——诗人，再次决绝一跳！

杨炼  
柏林，2020年2月20日



杨炼

1955年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迄今共出版中文诗集十三种、散文集二种、与一部文论集。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外文。

只有诗

但是，我的河流与你的河流 但是，我的手与你的手  
永难相聚，亲爱的，除非 朝霞有一天赶上晚霞。



《生化危机 3 重制版》

## 专栏

# 我不做三明治

顾天鹂 | 存档点

「这些女权主义者矫枉过正了吧。他们是不是从没玩过这个系列？」

2014 年 6 月，《刺客信条：大革命》放出了播片预告，几小时后的网络反响好像走了题——这个 7 岁的经典系列被直指性别歧视。批评者指出，它的历代 3 任主角皆为男性，新作预告片里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四名刺客，而他们无一例外是男人。开发商育碧看起来从没考虑过女刺客作为可玩角色的可能性。

我当即找出了两年前的《刺客信条 3：解放》，主角艾芙琳是一位 18 世纪来自新奥尔良的混血女刺客。看，育碧之前明明设计过女主角，我猜质疑者们自己没有玩全系列就下了结论。

我当然没提《解放》只是第三部的外传作品，包括支线在内的流程只有几个小时（正传至少是其两倍时长），首发平台是 PSV（掌机）。这很难称得上是主角待遇。

但是我喜欢这个系列，所以我不爱听别人对它的质疑，尤其在这种“和游戏无关的领域”。况且育碧的自我辩护听起来相当理性——他们最开始是设想过可玩女角色的，但额外所需的资源和时间让它变得难以完成，这包括两倍的动画、配音、视觉素材和一整套个性化方案。我放心了。这纯粹是制作复杂程度的问题，工作室只是按预算和时间表正常完成工作，他们不是故意遗漏女性或是歧视女角色。

这样的理由在质疑者看来相当苍白，因为这恰恰说明开发者认为女角色不值得付出额外精力去创造。更难堪的是，这则回应发出的第二天，曾为该系列工作的动画师就指出，创作或是替换女角色动画只要“一两天的工作”。



《生化危机 4》的诸多玩家并不期待听到艾什莉的呼救

我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游戏终究只要好玩就行了，我们不必对性别那么敏感吧？你看，作为一名女玩家，我并不觉得育碧哪里做错了。

我在很长时间之后才意识到，“我是女的，我觉得还好”是任何争取平权场景下对女性的会心一击。然而当时的我却以此为荣，因为这标志着我是一名“真正的”玩家，我不过分敏感，我只在乎游戏，与核心玩家们站在同一阵营。我热爱动作、冒险、射击和生存恐怖类，而不是画风可爱玩法轻松的手游。我像他们一样在玩《生化危机 4》时嫌弃总是需要保护的无助少女艾什莉（她有个格外贴切的绰号“碍事梨”），当看到视频主播调整视角让观众得以看到她的裙底“福利”时，我的诧异情绪多于受冒犯。我想，我永远只会是一个专注于作品本身的人。

三个月后，Gamersgate 爆发了。无论人们想不想，他们都将被拖进一场以性别为核心的的文化战争。

### i 认清你的位置

快进到今年 4 月，我通关了《生化危机 3 重制版》并在一周内拿到了全部奖杯——因为它太短了，相比原版还删去了一个标志性的段落。这份潦草的“冷饭”遭到了系列忠实玩家的谴责，尤其考虑到女主角吉尔·瓦伦丁的糟糕待遇，她简直像那个被扔到替补席看饮水机的球队吉祥物。

吉尔是这个长寿系列的头号女主。她自 1996 年的第一部起就引导玩家探索洋馆、揭露保护伞阴谋、逃离浣熊市并对生化恐怖袭击。然而自 2009 年的《生化危机 5》之后，这位女英雄从生化宇宙的正向时间线上消失了。当她将近 50 岁的男搭档和其他男主角继续充当系列门面、在主游戏和 CG 电影中大展身手时，人们听不到一点她的消息。

有人说她还在重伤复原中，有人说她退居了幕后。这似乎是体面的女英雄退场。上了年纪的男人可以继续在前线战斗，这甚至让他们多了一层老兵魅力滤镜，是 daddy material（做“爸爸”的材质）。而对于不再年轻的女角色，停止担当动作戏或者回家做三明治难道不是可以理解的选择吗？就像风流潇洒的卡珊德拉终究要和天降男子生孩子一样。当我询问朋友们他们能想起来哪款游戏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年女角色，得到的答案是《龙腾世纪：起源》和《星球大战：旧共和国武士 2》——不受现实束缚的幻想题材。

今年，玩家再次得以操纵高清版的年轻吉尔（没有皱纹和白发、身材完美），在一款草草制作、重复使用大量素材的阉割版重制游戏里。在此之后，开发商卡普空立刻将精力放在了新作和第四部重制上，主角是年轻男人、老男人和重回青春的老男人。我很高兴吉尔在今天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实际上，她的待遇在女性同僚中称得上金字塔尖。作为 3A 游戏里推动主线的可操纵女主，她不是任何人的 sidekick、拥有自己的单人游戏、随着时间推移抹胸和短裙也换成了更具功能性的背心和牛仔裤。她几乎和男战友们平起平坐了。相比于落难少女（经典游戏的永久主线）、性感蛇蝎（与落难少女相对的反派）、男性玩物（玩家泄欲物品）等衣不蔽体的“传统”游戏角色，我们似乎不该奢求更多了。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核心玩家自然可以一口气列举十分钟的女角色名单以证明电子游戏内的“性别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成比例的代表和非区别对待的角色塑造。

从汽车驾驶座高低到男女厕所数量，像任何一个领域一样，男性是默认标准，一切设计围绕此展开。自 1989 年开始的一系列文献已经证实了游戏角色性别失衡的历史。这包括街机游戏里 2% 的女性角色（1989）、任天堂游戏封面上 8% 的女性人物（1991）且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她们要么是需要被暴力对待的帮派分子要么是纯情无害好女人（1993）。男女差距在 10 年之后有所减小，但在 21 世纪的头 10 年里，任一样本范围内，可玩男主角的比例都在 80% 左右，可玩女角色正在变多但从不曾到达半数，她们也更容易遭遇“超级性化”（hypersexualisation）。

和任何一种男性主导、面向男性的娱乐方式一样，女角色的超级性化很早之前就成为了游戏的标签。一项检视了 1989–2014 年间 571 位可玩女角色的研究证实了人们肉眼可见的猜想：裸露、夸张的胸部或臀部、不可思议的细腰，对女角色的物化虽然在 1995 年达到顶峰后逐渐消退，但它仍然比物化男角色（感谢卡普空）频繁得多，且她们通常落入配角、被支配角色的范畴。而即便一位女角色拥有与男性同样的能力，游戏仍倾向于强调其身体上的女性特质，这导致了英雄色彩的削弱。劳拉·克劳馥和她的造型演变便是个实例。

与《生化危机》在同年（1996）登场，《古墓丽影》也在这年开启了女英雄类型，就在辣妹组合发行了第一支单曲 Wannabe 的三个月后。考古学家劳拉很快跻身辣妹、Blur、绿洲的行列，成为新的英伦标签和“女孩力量”的代表人物。她是独立的女探险家，在现实中被英国政府任命为不列颠杰出科学大使，然而她同样在丛林和废墟中穿着过于清凉、胸部过于引人瞩目，那些在游戏营销活动里扮演她的模特中，不乏《太阳报》的三版女郎。她确实是一个性符号。

不过，这位大女主仍被视为变局者。她毕竟打破了女角色不是受害者就是反派的刻板印象，在男性主导的产业中获得了成功。“劳拉现象”还吸引了更多女玩家入局，

游戏母公司 Eidos 的数据显示，《古墓丽影》的早期玩家中有 40% 是女性。女玩家们可能会对其迎合男性凝视的、随系列进展愈加丰满的胸部翻白眼，但她到底是个具有统治力的 (dominate) 角色，这在游戏界女性中是极其稀缺的品质，一般不被认同。

和现实相同，女性通常的被支配地位 (submissive) 让她们遭受了基于性别的恶意对待，当她们是 NPC (不可玩角色) 时，这点变得更加明显。《侠盗猎车手》(GTA) 系列是个被广泛引用的案例，它对设计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角色并不在意，因为它清楚自己的目标受众是谁。

在 GTA5 (2013) 中，玩家可以在与妓女性交易后杀掉她并拿回自己的钱。巧合的是，现实中的性工作者也是遭虐待和谋杀的高危人群，你很难判断这种自发的游戏行为是一种代偿或只是男孩子们寻开心的坏品味，你也很难判定它是否会影响玩家的现实共情能力。[有研究表明](#)，游戏中的暴力厌女行为会增强男玩家的男性气质信仰，从而令其更难与女性暴力受害者共情，不过那只是个 124 人的小样本。

一种常用的辩解方法是“比烂”——男性呢？男性不是更容易在游戏中成为暴力受害者吗？我们对游戏角色做坏事并不是基于他们的性别，而在于他们都是纸片人！

我想，你和男性敌人的战斗多少更为“公平”，更像是力量比拼或者赌一把成功率，就像你在《上古卷轴》里打人前会先保存以防阴沟翻船一样，这仍然属于正常的游戏行为范畴。但是很少人会以杀死毫无抵抗能力的男性角色并对准他们裸露的身体部位截屏为乐。当我看到一位我崇拜已久的技术流玩家在《耻辱》里屠杀了一个妓院的女人（他正在玩需要杀人的高混乱模式，他只是在炫技！）、将镜头聚焦于尸体岔开的双腿和裙底并得到了评论区的赞扬时，我再也无法替他们辩护了。

所以，怎么会变成这样的？这个令人兴奋的媒介和它最固执的拥护者为何要区别对待一半人口？这究竟是基于怎样的动机？

## ii 消失的女孩

女人不重要，无论在游戏里还是现实中。

一个事实是，女性被踢出大名单在技术领域是正常操作。当隔绝、无视和失踪成为习惯，它带来的是半个世纪的话语权压制、技术差距和恶性循环。

1946 年，美国征兵海报上出现了 ENIAC，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摩尔电气工程学院打造的第一台通用型计算机。海报上只有一名男人 (Irwin Goldstein 上尉) 在操纵机器。如果翻看半年前的新闻图片，会发现囊括了女程序员的部分遭到了剪裁。

摩尔小组有 4 名男性工程师，但是同样对 ENIAC 的诞生做出贡献的还有 6 名女程序员。男性负责硬件设计，女性负责编程。她们在占地 167 平方米、几近 30 吨的巨大机器上调试、检修、编写程序，再教会其他男人如何操作。然而她们既没被邀请去庆功宴，也没有被写进新闻，记者拍摄她们与机器的合影时以为她们只是军方请来的模特，为了让照片更好看。“没有一个女孩被官方介绍过，我们只是程序员”。



程序员们：Patsy Simmers, Gail Taylor, Milly Beck, Norma Stec  
图片版权：U.S. Army/ARL Technical Library Archives

大洋那边，英国布莱切利园的数千名女士（一度占总园区人口的 75%）于二战期间在此进行行政工作和密码破译。她们或是拥有语言、数学和工程学位，或是极其擅长填字游戏，横向思考能力出众。这些操作着炸弹机 (Bombe) 和巨人计算机 (Colossus) 破译德军恩尼格玛密文的女人，一度被男性部门领导质疑“无法胜任如此高智商的工作”。她们证明了这种偏见的错误，在各个岗位上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而因为男人都去参战了，她们也得以获取了接受 STEM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教育的宝贵机会。

战时的人手欠缺让女人们走上了本该分配给男性的岗位。然而战后“正常”秩序恢复，男人们回来了，女人们理应为他们让位。回归家庭的呼声再起，虽然证明了自己完全能胜任“男性岗位”，她们仍被舆论要求待在家里做饭吸尘带孩子。[即便步入职场，等待她们也只是低薪水的次等工作。](#)

步入 70 年代后，情况似乎有所改善，随着第四代计算机的出炉，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女性数量在健康地爬升。[在美国持有计算机科学本科学位的毕业生中，女生占比从 1974 年的 20% 升至 1984 年的 37%](#)，1:1 的男女比似乎近在眼前。然而 1984 年后，情势急转直下，之后的 30 年见证了这个数字一路降至 2016 年的 18%。女性的 STEM 热情好像一直没能恢复。

80 年代初发生了什么？个人计算机、电子游戏和围绕它们的营销。

80 年代的家用计算机，在营销中已经把自己定位为面向男性。[苹果 1985 年个人电脑广告](#)只聚焦于“布莱恩思想成为一个宇航员”。广告中，是小男孩布莱恩在认真学习电脑课程，并为邻座姑娘解难。当年的数据显示，73% 的男人每周都用电脑，女人则是 45%。

更确切地说，[它们通常将自己包装成男性专属的电子游戏系统](#)。南安普顿大学的霍尔教授肯定了“男性极客”刻板印象的作用。“女人们在 80 年代关闭了电脑学习兴趣。因为电脑被当作男孩玩具售卖。不知为何，这样的文化污点在西方就这么存在了下去，我们怎么擦都擦不掉，（性别）技术差距越来越大。”

当时常见的做法是，如果一家有一部电脑或是游戏机，它多半放在男孩子的房间。而父子往往基于电脑和游戏培养出了特别的感情，这种事通常不会发生在女儿身上。游戏产业也很快确定了自己的核心受众。在 1983 年北美游戏市场因大量第三方同类低质产品而遭遇大崩溃之后，试图重建行业的开发商、发行商和营销方，自然更愿意巩固已有的受众——男性，而男性持续消费游戏，也是因为自己被针对性地营销。一种循环诞生了，男玩家和游戏产业为彼此而存在，他们比任何时候都紧密。1989 年，任天堂的一款掌机诞生并风靡世界，开启了又一个世代，它的名字叫 Game Boy (游戏男孩) 大约并不是巧合。同年，[女性游戏从业人员的占比是 3%](#)。

长久以来稀缺的女开发人员导致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包括游戏女角色诡异的胸部动画。一篇讲述[乳房物理引擎](#)的文章提到，如果工作环境中存在女同事，动画师至少会知道正常的乳房比例和它们晃动起来是什么样。而一旦女同事并不存在，他们又没办法说服上级为逼真的效果增加预算，那么玩家目见的就是恐怖谷式的别扭效果。当然，这加深了“游戏开发者没接触过女人”的又一重刻板印象。

即便如此，坚持针对男性营销，让营销方始终将尽可能裸露的女性胸部当作营销至宝，这个传统直到 2010 年还持续存在。[一项针对 2005–2010 年间 399 个评分相近的游戏封面艺术的研究发现](#)，处于非中心地位的性感女角色封面与销量积极相关。不过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女角色占据了封面中心（无论是性感还是普通）或是封面上只有女没有男，销量将受到负面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进行期间，数字游戏还未占据主流，销量大头仍然来自于游戏实体店，所以盒装封面确实在指导选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它传达出的信息再明显不过：性感带货，前提是性感的女人不是主角。或者说，真正刺激销量的是边缘化女角色——要么不存在，要么作为性幻想对象存在，要么作为挂件存在。

只要能持续盈利，管它呢。你看，我们不是故意歧视女性，这一切只是基于纯粹商业考量。[“Women don't sell \(女主角卖不出去\)”](#)，《刺客信条：奥德赛》(2018) 的创意总监 Serge Hascoët 说，他拒绝了开发团队将卡珊德拉作为唯一女主的设想。2020 年，在行业记者 Jason Schreier 曝光了经年累月针对他行为不当的指控后，一向对投诉免疫的 Hascoët 终于离职了。

所以长时间以来我们仍然陷在那个循环里。你不能指望由男性主导、面向男性受众的产业会自找麻烦主动做出改变。有潜力的专业、高薪的技术类职位因历史污点而不会对女人敞开友善之门，因此她们一开始就失去了创作话语权，导致产品愈加向男性倾斜。当人们发现将女性拒之门外看起来不会有太糟的后果时，自然不会在意行业内女性的缺失，以及这个充满了男声的回音室有多么不自然。直到有人撕开真相，将被消失的女性拉进讨论场。

## iii “你们到底想怎样”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女权主义者到底有什么诉求，好像什么都不能让你们满意。”

我不止一次听到来自男玩家的困惑。他们中的一部分难以理解为什么自己享受了十几年和几十年的清净空间突然被大声嚷嚷的女权主义者破坏了。她们拆解了此前无人质疑的桥段、指控了人人都爱的经典作品、提出了明确的比例要求，你甚至不能确定她们是不是真玩家！“政治正确在毁掉游戏乐趣”这样的论调在 Gamersgate 期间达到了顶峰。

这起可能是近十年来最著名的游戏产业事件暴露了游戏圈最恶劣的一面。2014 年 8 月，独立制作人 Zoe Quinn 的前男友发表博文痛斥女方出轨游戏媒体 Kotaku 记者，以此换取版面资源宣传自己的作品，一部以抑郁症为主题的多选项游戏 Depression Quest。虽然 Kotaku 的调查没有发现该记者的任何失职，这起情感纠纷好像也不至于闹出圈，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这位前男友公布了 Quinn 的私人信息，她因私

生活和“根本不是游戏”的游戏而遭到网络霸凌，一度不得不逃出家门。

同样被卷入仇恨攻击的，还有恰好发布了新视频的 Anita Sarkeesian。这位一直以来从事媒体批评的女权主义者，在 Gamersgate 期间照例发布了评析游戏女角色的视频系列《Tropes VS. Women》，因而招致了更甚于往常的仇恨言论和死亡威胁，甚至有人制作了暴揍她的小游戏。另外两位为女性同僚发声的游戏记者 Jenn Frank 和 Mattie Brice 也在霸凌下宣布退出游戏媒体。

一场初衷是“推动游戏媒体检视新闻伦理”的运动，逐渐演化成基于性别的战争。搁置已久的议题被摆上了台面：游戏产业是否应该正视长久以来结构性的性别歧视（“等等！它们真的存在吗？”）、所有人该如何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值得花精力解决吗？游戏的定义和产业趋势会发生改变吗？它的未来因此将变成什么样？——毕竟，女人们显然会制作并喜欢上“称不上游戏”的游戏，比如步行模拟器《消失的家》（Gone Home）。

回头看，Gamersgate 是另一场漫长的、更复杂更艰苦的拉锯战缩影。其中音量最高的一些群体在之后几年壮大声势、活跃于更主流的舞台——Alt-right（另类右翼）、Incel（非自愿禁欲者）和厌女文化的其他忠实拥军。游戏这个极具潜力的互动媒介，只是双方交战的前线之一。

极端人士的信念（认为游戏就应该是不受打扰的男孩娱乐室）似已无法被改变。但是游戏社群的大部分玩家大约愿意倾听，只要人们以合理的方式陈述经历与诉求。这些经历在持续涌现，直到 2020 年，它包括 [Twitch](#)、[育碧](#)、[Riot](#) 在内多家公司内部的性别歧视与性骚扰控诉；游戏女主播所要面对的恶意环境；[女记者在 E3 上被好心建议“要不我来替你玩吧”；数不清的女玩家在多人游戏中遭遇骚扰而选择隐藏性别或放弃游戏等等](#)。如果你恰好认识在国内游戏行业工作的女性，她们的经历可能会令你大开眼界。

女性的诉求其实并不复杂：主流的倾听、开放文明的讨论以及相应改变——可以从对角色和现实女性的一视同仁开始。

\*\*\*

想要让游戏社群主流接受性别歧视的存在本身就是个挑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你可以理解他们的挫败。游戏是个遭受污名化的媒体，保守派家长和政客一向擅长将青少年问题和犯罪猖獗归结于暴力游戏，玩家们并不想看到它被扣上又一口锅、为扎根于现实的根源性问题埋单。当备受喜爱的作品没有得到赞扬反而遭到女权视角的无情解构，这让人感觉充满乐趣的小天地遭到了破坏，就像我那时为《大革命》受到的指控而不满一样。这里本来没有任何问题，有人把它们指了出来，现在我们都无法忽视房间里的大象了。



在《瘟疫传说》里，玩家扮演女主角阿米西亚，保护弟弟免受宗教裁判所的围捕

如果这些问题由一名男性提出，效果会出人意料得好，因为男人被认为代表着理性之声。[当 Sarkeesian 的男合伙人 Jonathan McIntosh 指出了男玩家享受的 25 条隐形福利时](#)（比如从来不会认为游戏不是为自己设计的、在网络游戏中无需掩饰自己的性别、基本不用担忧性骚扰和跟踪、无需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游戏技术或“我真的属于这里”、几乎永远可以扮演男性角色因为这是默认设定等），收到的几百个回复基本是在和平讨论。他自己指出，这里没有一点是女性未曾提过的，但如果他的名字是乔安娜，他一定会被指责失了智。“我没见过，所以它不存在是一个常见视角……我很吃惊我的很多男性朋友仍处于否认之中”。

也许这与意图变革者们斗争性的语言有关。而将任何人推到对立的立场上大概是无助于进步的。人们并不享受自己在一夜之间被打入了非正义阵营、突然需要接受检视和审判。同样，任何极端反应和断章取义都让合理的批评淹没在口水之中，游戏被剥夺了像书影音一样接受严肃探讨的机会，可它早已证明自己配得上深刻的审视。

我们更应该认同的是，关心游戏产业的人拥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见证它变得越来越有趣、不断推动创新和艺术的边界。正视存在的问题并讨论如何能提高作品质量，与保留和延续乐趣并不冲突——GTA 是个超好玩的游戏，这应该得到承认和赞赏，如果它对女角色不那么差劲就更好了；Sarkeesian 批评的《生化奇兵：无限》也超好玩，她说伊丽莎白只是个会扔给你子弹的开门工具。什么？那要怎么做？6 年后我们拥有了《瘟疫传说》，现在我们可以扮演独当一面的女主角保护小男孩了。

“政治正确”和它带来的多元角色不会毁掉乐趣。恰恰相反，它替产业避免了单一化设计和无聊剧本。Bioware 蒙特利尔工作室（以性别平等标杆《质量效应》和《龙腾世纪》系列闻名）的 Manveer Heir 在 2014 年的 [GDC](#) 上发言道，开发者并不是保守的老恐龙，他们一贯的设计思路只是结构性性别歧视的延续，以及长期处于该环境下导致的脱敏与冷淡。如此基于刻板印象的设计只会导向无趣和重复，在更高的层面上引向“产业创新的凝滞”。

Gamersgate 这样的极端事件和由此引发的讨论唤醒了不少自动巡航的玩家和从业人员。当人们审视女玩家市场、[发现她们早已接近半数](#)；当没人愿意放弃移动市场、庞大的休闲玩家群体成为焦点；当厂商意识到衣着正常的女主角可以很卖座，只要游戏本身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别忘了，《古墓丽影》的初始玩家有 40% 是女性），我们便拥有了《地狱之刃》、《地平线：零之曙光》、《古墓丽影》重启（一个更贴近现实的劳拉）、《半衰期：Alex》、《看门狗：军团》（老奶奶当街揍人）和默认角色性别可选的 3A 游戏，其中包括《刺客信条》（虽然我们如今知晓育碧内部的某些人员并不情愿）。一个曾经致力于满足男孩幻想的产业，当下也许正试着逐步满足所有人的幻想。

[Sarkeesian 的年度 E3 报告](#)似乎显示了肉眼可见的进步：2020 年的线上 E3 是男女角色比最平衡的一届，在已公布的游戏里，女主占比 18%，男主是 23%，54% 的游戏提供多重选项。而在此之前的 6 届中，女主比例从未超过 10%。然而也很难说今年是一锤子买卖，还是转折点真已出现。

我们不希望这个代表了更多可能性和更广视野的进程暂停或倒退，它显然具备巨大的进步空间——虽然女玩家已占半数，[世界范围内的女从业人员堪堪占据 20%](#)，一个落后于其他科技领域的数字，而正在学习游戏课程的学生中男性占 88%。另一个并不让人吃惊的数据是，[东亚大型游戏公司的高层中（网易、腾讯、任天堂、万代南梦宫、索尼）无一女性](#)。它们因而被非盈利组织 Women in Games 判定为“沉睡”状态。正如 Heir 所说，这种失衡终将导致创新停滞。

#### iv 不做三明治

我为什么要像个坏掉的复读机一样重申这一切？

数月前，一个优秀的国产游戏 demo 刷屏了所有人的首页。然而这款潜在的国产之光很快卷入争议，人们发现了工作室曾发布的招聘海报，那确实是一则无法吸引任何女应聘者的广告，充满了初中男孩式的性暗示，符合所有人对男性主导产业和有毒男性气质的印象。不少女玩家因此打消了对游戏的兴趣，尤其在一些男玩家指出“反正你们不买也无所谓”之后。

它发生在 2020 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女玩家仍然被认为并不存在，或者她们不属于核心玩家圈、因而不需要被看见（虽然[分析机构 Niko Partners 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女性玩家占比达到了 48%）。她们的诉求，比如一个公开道歉，遭到无视，参与讨论时需要不断强调“我也玩这样的游戏”。理性的声音被紧张又过激的驳斥盖过，仿佛有小朋友担心自己的玩具被抢走。一个极其复古的“[回到厨房给我做个三明治](#)”（Make me a sandwich）式情境。

这是 2020 年，Gamersgate 的 6 年之后。而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次世代主机发布，PlayStation 中文公众号发布文章《想迈入次世代，如何说服她？》，预设游戏圈外的女朋友们一定会限制男友经费、阻止他们买新主机，给出的攻略包括买口红、送包包、假装 PS5 是加湿器和路由器。这是 2020 年。

无疑，这是更深层社会疾病在游戏领域体现的症状。对症下药可能是展开治疗的第一步。它需要更为耐心、冷静的公开讨论，关于怎样的治疗方案可以平等对待两性，并为作品开启更有趣的世界。前提是所有人都认可治疗的必要性。

为什么呢？在《大革命》之后，我们已经得到了扮演女刺客的机会，如果中年吉尔也能够回归前线，那就再好不过了。



来自游戏《11-11：复述记忆》

## 专栏

# 方向盘后面有人

顾天鹂 | 存档点

战场模拟越来越逼真，  
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模糊。

Home, it's becoming a killing field  
家园变成了屠宰场  
There's a crosshair locked on my head  
准心锁定在我头上  
With no recourse  
没有追索权  
And there's no one behind the wheel  
没人在方向盘后面  
Hellfire, you're wiping me out killed by  
地狱火将我焚尽  
Drones  
我被你的无人机杀死  
——Reapers, Muse

“记住，不准讲俄语。”

电梯门打开，阿列克谢·布洛丁跟随四名同伴进入了莫斯科扎卡耶夫国际机场。枪声骤起，等待安检的乘客来不及反应就倒在了血泊之中。进入闸机，路过免税店，踏上电梯步入候机区，所有人的逃跑和抵抗都是徒劳，充斥着尖叫和哭泣和弹药炸响的机场很快被寂静所笼罩。以最悠闲的姿态，恐怖分子完成了一场对平民的屠杀。布洛丁的真实身份是卧底的中情局特工约瑟夫·艾伦。他实际上拥有两个选择，要么将反派角色贯彻到底，端起枪对平民扫射，要么浑水摸鱼假装参与了恐袭。虽然结果并不会改变，人人都会死，而后者只能突破第四面墙给予玩家良心上的少许安慰。来自于《使命召唤：现代战争 2》(COD 6)，这便是游戏历史上最受争议的关卡之一“不准讲俄语”(No Russian)。在后续剧情中，俄罗斯恐怖分子将把袭击事件栽赃给美国，由此引爆全球战争。

该关卡在 2009 年 10 月先于游戏被泄露，其史无前例的大胆设计和与 2008 年孟买恐怖袭击的相似度引发了业界和主流媒体的震荡，迫使发行商动视做出声明：该段落不能代表游戏的全部流程体验，它旨在让玩家意识到恐怖主义的残暴行径，玩家也会被给予完全跳过该段的选项。

无疑，《使命召唤》系列在自己擅长的第一人称射击领域堪称业界顶尖，不过当它无意识地邀请人们对自己的故事和设计决策做出评判时，严肃尖刻的批评在所难免。COD 6 正式发售后，BBC 评论员质疑该段完全没必要囊括在游戏中，“它只是为了制造争议而制造争议”；游戏媒体 Rock Paper Shotgun 则评价它写作糟糕，“往好了说像喜剧，往坏了说只是剥削玩家感情的塑料……一个美国组织明知道一场袭击会让俄罗斯平民死伤惨重，却不发出警告反而派一个人参与袭击”；更多思考跟随其后，“一部分的我认为整个段落甚至整个游戏，其实都在描述盲目的服从命令会导致世界的毁灭。但是开发商并没有大声清晰地说出来，这里缺失的是明确的态度，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廉价的冲击”。

它留下的遗产不止局限于游戏内。2011 年，俄罗斯国有电视台 RT 在报道多莫杰多沃机场自杀性爆炸事件时，播放了“不准讲俄语”的流程视频，主播援引福克斯新闻网专家 Walid Phares 称，电子游戏可能被恐怖分子当作训练工具；同年，极右翼分子布雷维克策动挪威恐袭案，造成 77 人死亡，他承认自己确实将 COD 6 作为模拟训练。两年后，一名试图发动校园袭击的美国高中生被捕，他的计划包括在袭击时用“不准讲俄语”中的主题曲作为背景音乐。

在游戏范畴之外，没有哪些可怕的效应来自开发者的本意。但是一管混合了战争、肾上腺素、玩家自主性、娱乐与道德感的药剂衍生出怎样的讨论，激发出何种对个体的影响似乎都在情理之中。如果说《使命召唤》们前期只是致力于让玩家以主视角体验经典战役，那么当它们开始讲述现代和未来战役，覆盖并非黑白分明的秘密行动和正在进行时的反恐战争，当它们的视野在市场所迫下不得不延展至超越纯粹娱乐的领域，开始运用非传统的叙事方式和英雄之外的视角，游戏作为互动媒介的新价值、其无意识传递的信息、它与现实进程的互相映射迟早会被拽进更深刻的审视。实际上，审视也许早就应当开始。逃避主义的电子享乐自诞生之初就与最极端的暴力行为——战争——密不可分，它们的并进构建了 20 世纪至今的人类文明史。

01

红 VS 蓝

人们并不愿意过多想象娱乐与战争的关系。然而追根溯源，电子游戏无疑是军事行动、政治事件和相关学术研究的副产品。

破译德军恩尼格玛密码让二战提早结束，首席功臣艾伦·图灵提出的图灵测试，假想了“思考的机器”，以及机器与人类展开对话而无法被识别出的可能性，人机关系的概念、如何完善人工智能的设计因而贯穿了计算机科学和其他衍生领域；1952 年，图灵写了一个国际象棋程序，它此后被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在早期计算机 MANIAC I 上还原，即第一个使用计算机程序运作的象棋游戏：洛斯阿拉莫斯象棋。从此直到 IBM 深蓝战胜人类棋手的年代、直到今天，人 - 机对峙——包括人与代码生成的敌人的对峙，以及游戏角色与人工智能反派的对峙，成为了电子游戏的永恒主题。



1958 年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展览的 Tennis For Two, [By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Public Domain, [Wikimedia](#)

同样是在二战余烬中，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于 1947 年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国家能源部前身）在长岛牵头成立，它致力于和平时期对原子能的研究。在之后的日子里，二战后美国的首个核反应堆会在此投入使用，AGS 粒子加速器将导向中微子、粲夸克和 CP 不守恒的发现，国家同步辐射光源 (NSLS) 会带来另外两项诺贝尔化学奖。一连串杰出的科学成就之余，一个意想不到的贡献在 1958 年诞生了。

这年，在例行的三天公共开放日期间，人群在一台示波器前排起了长队。简单的线条在显示屏上勾勒出网球场的边线视角，两名参与者通过各自铝制控制器上的把手和按钮击打屏幕上的网球。因为备受欢迎，这个名为 Tennis For Two 的程序在一年后的开放日里被展示在更大的示波器上，还能够模拟不同的重力水平。

此时，人们还无法为之准确命名，直到 1970 年代一起“电子游戏”专利案才让人意识

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制作出了最早的电子游戏：不为学术目的也不为商业营销，Tennis For Two 是一款纯粹的娱乐产品，在模拟计算机上设计、最早使用图像显示、参与者 / 玩家操纵着“手柄”根据公认的规则一决胜负。

它的开发者是美国物理学家 William Higinbotham。开发用的 Donner Model 30 模拟计算机原本用于计算弹道导弹轨迹。

铁幕落下后，中远程弹道导弹的使用通常意味着末日时针指向零点。植根于毁灭性武器承载的技术，旨在带来乐趣的电子游戏降生于冷战秩序。

接下来长达 40 余年的对峙局面激活了科技界。大笔资金被投入学术领域，处于前沿的计算机科学炙手可热。军备竞赛和太空竞赛反应在计算机文化领域，形成了延续至今的、独特的战时口味。

9% 的美国家庭在 1950 年拥有电视，这个数字在十年后达到了 90%，肯尼迪总统在 1961 年颇具野心的登月誓言因而顺利传递至美国上下。从发射人造卫星到载人航天，美苏在太空领域的你来我往已经持续 10 年，双方都抱有极大的热忱和胜负心，所以，当一台 PDP-1 小型机被装载到麻省理工电子工程系的教室里时，包括史蒂夫·拉塞尔在内的几个学生想用它展示宇宙飞船的运行就丝毫不奇怪了。

这就是 Spacewar！的出生故事。它关于两架宇宙飞船 the needle 和 the wedge 在太空中的缠斗。屏幕中央是一颗星球，它产生的引力将把飞船拖向自己，每艘船装载有限的能源和弹药，被对方弹药击中、栽入星球或相撞都会导致游戏结束。

它很快风靡于校园和其他程序员社群，在原初代码公开后被移植至不同的计算机系统，直接影响了后续一系列流行游戏，并导向了街机类别的诞生——1971 年，基于它的 Computer Space 成为首款商业性质的电子游戏，同时也宣告了街机的正式面世和商业游戏时代的到来。其开发者 Nolan Bushnell 和 Ted Dabney 将跻身电子游戏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之列，他们会在次年成立雅达利，凭借 Pong 等卖座游戏成为游戏产业的早期霸主。

70 年代的游戏业充满了登月和太空科幻片激励下的幻想，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还包括 1978 年的 Space Invaders、1979 年的 Asteroids 和 Lunar Lander 等等。时至今日，太空主题游戏更是数不胜数，从《质量效应》系列到《无人深空》，其宇宙奥德赛的畅想内核不变。

与浪漫主义的太空幻想并行的，是全体人类对零点的恐惧。人们用计算导弹轨道的机器设计出 Tennis For Two，带来了名为电子游戏的惊喜，然而此后的几十年间，导弹、核威慑、一触即发的热战主题渗透了电子娱乐，让它看起来不是那么全然轻松。1983 年的电影《战争游戏》可以很好地概括此间的流行文化：主角大卫·莱特曼和 80 年代大多数死宅主角一样，是位黑客高手。他误打误撞进入了北美空防司令部网络，玩起了模拟世界大战的“全球热核战争”游戏，却导致 AI 系统准备自动发射核弹。他需要用自己的黑客技术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电子游戏，黑客，核战争，人工智能与潜在的世界毁灭。科技浪漫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人类隐藏的自毁倾向（对战后末世的假想）和现实存在的对机器与核威慑的实际担忧，构成了冷战期间绚烂的赛博狂想与审判日恐惧交织而成的矛盾心态。让我们不要忘记，世界距离毁灭曾经仅有一步之遥，全靠苏联士兵彼得·洛夫面对假预警时的良心判断得以幸存，其间诞生的种种基于核打击的游戏因而多出了几分现实主义的严肃。

1980 年雅达利的 Missile Command，要求玩家利用反弹道导弹系统保卫 6 座城市，它们正在遭遇无止境的导弹袭击；1984 年的 Raid Over Moscow 中，玩家是美军飞行员，需要深入莫斯科捣毁三座核设施以阻止它们对北美发动攻势，芬兰议会对“它该不该上市”的辩论让它登上了本土畅销榜；1985 年 Mac 系统上的 Balance of Power 则要求玩家扮演美国总统或苏联将军，面对突发事件采取各种方式提升国家地位，鲁莽的举动将导致核战和游戏结束；1987 年，世嘉直接以 SDI（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战略防御先制，又名“星球大战”计划）为名发行游戏，玩家将控制 SDI 系统中的卫星摧毁敌军导弹和卫星。

红色成为了危险信号。敌人的面目并不模糊。

而即便是在苏联垮台、世界格局剧变后，电子娱乐产业仍然对冷战主题及其衍生效应着迷。

2006 年的策略游戏《核战危机》（DEFCON）以《战争游戏》为灵感开发。玩家需要在保护本国人口的同时歼灭敌国人口，然而贸然的攻击会导致己方基地、潜艇和轰炸机位置的暴露，使人不得不承受全面反击；玩家还需要尽一切所能成立战术联盟，但又要提防盟友的背叛，就此“绝妙地带出了冷战期间的紧张、偏执和猜疑”。

2015 年的独立游戏《请勿乱动》（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则另辟蹊径地聚焦于一个令人后怕的设定：你的同事去上厕所了，留给你一个大大的红色按钮。你想按吗？你知道按下去的后果吗？

被摁下的红色按钮带给了玩家《废土》、《辐射》和《地铁》。人类在核战后的世界苟延残喘，想复兴文明却一而再再而三被卷入区域冲突甚至更彻底的毁灭，如同现实里发生的那样——柏林墙被推倒，冷战落下帷幕，可全球性的反恐战争接踵而至，敌人从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可被多重解读的抽象概念；核武器不再是唯一的威慑，它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取代；俄罗斯口音的反派逐步让位于更具异域特色的地形地貌。

唯一不变的是“对手”，是“敌人”，是 UI 上红色与蓝色的对峙，以及“我们”对战“他们”的概念。

谁是“他们”？“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基于自由意志吗？

## 02

### 电子失忆

诞生于原子能实验室，在核战阴霾中成长，与人类最极端的暴力行为纠缠不休，电子游戏迎合着人类的竞争和战斗本能。

旨在还原二战战场的硬核游戏《人间地狱》最近迎来了又一个玩家高峰，因为一部讲述中国玩家用英语指挥亚服联军的视频登上了 B 站榜首。在这个交战双方各 50 人的游戏中，扮演指挥官的玩家仅仅靠一张地图就指挥了几乎陌生的队友们完成了一场钳形攻势，最终赢得作战。

电子游戏赋予了玩家“远见”的能力，这令古今将领都羡慕不已。视觉文化概念的创建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在《如何观看世界》里写道，战争自古以来便被认为是一种艺术，它需要特殊的、全新的视觉技能，即“可视化”。将军的任务便是让战场整体“可视化”，虽然他看不见战场全貌，却能将想象力、洞察力和直觉融入所有他及其实部下能够看见的事物中。他应当具备从空中观看战场的能力。

绘图技艺因此贯穿了战争史，从搭配电线的热气球到航拍照片，从卫星图像到无人机于空中辨识目标并实时传回画面，俯瞰全局的能力从少数将军的专属特权转移至了平民手中，甚至逐渐成为了普通消费品；过往私人的、机密的画面向公众开放，后者如今可以体验之前无法想象的经历，比如，使用这种技术赋予的远见能力参与一场战争，虚拟的，或是现实的，两者皆可轻易获得全局图像，及其带来的掌控感和征服欲。

类似的新技术在军工复合体的紧密合作中被打磨成熟、彻底挖掘应用。当 1972 年雅达利把公司选址定在洛克希德·马丁导弹基地附近时，一位评论家好奇，到底是雅达利把洛克希德·马丁作为测试场，还是反过来。

不久之后，美军就和雅达利合作，把 1980 年的街机游戏 Battlezone 改造成了坦克导航员的训练工具；在 90 年代，不少曾经为军事建模和仿真项目工作的开发人员（包括前洛克希德·马丁员工）投身于游戏设计，他们的职业经验很快在开发 3D 游戏时派上了用场；当《毁灭战士》之类的 3D 游戏流行起来后，海军陆战队使用它们训练，并和科技公司 MÄK Technologies 签下开发仿真训练的合约；进入 21 世纪，这个工具更新为游戏 Full Spectrum Warrior，只是这回，游戏由美军下属的创意科技机构 ICT 开发，一个版本面向消费者市场，另一个拥有更真实物理引擎的版本面向军队。ICT 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娱乐产业、军队和学术界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目的在于创造具有极强说服力的综合体验，以至于参与者会表现出面对现实的反应”。Atomic Games，一家专精军事类动作游戏的公司，便是其现实合作伙伴。

战场模拟越来越逼真，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模糊。它似乎在逐渐削弱战争自带的严肃性。真实士兵觉得自己仿佛游戏玩家，他们间或会冒出“我拿到杀敌数了，我这就下来”（I've got my kills, I'm coming down）、“为什么你们（友军）可以做这么好玩的任务，就像电子游戏一样”的评论。游戏玩家则在越来越逼真的虚拟战役情境中获取了自己是真战士、真将领的幻想，从模拟排兵布阵的《全面战争》系列到结合历史与时事的《战地》和《使命召唤》，游戏在为我们不遗余力地编织战争梦。

这样的战争梦尽管在努力向写实逼近，但是它们的现实主义是具备选择性的——往往很干净，且透过了十层美化滤镜。为了玩家体验和游戏乐趣，它通常制造颇为纯粹而理想的环境，要么将玩家角色当成英雄塑造，要么只保留过瘾的情节，强调战术和细节还原，尽量避免争议和痛苦画面。比起刻画战场，更像是让人亲自出演好莱坞主流战争片的高光部分。

没人会质疑开发商力图让体验更加美好的决策，但是这些游戏有时并不限于流程乐趣，它们中的一部分带着明确的目的面世，另一部分则在潜意识里加深了未必正确的印象。学术界主导的计算机技术、硅谷主导的电子娱乐与国家机器相结合，滚动成更具影响力的宣传工具。

1999 年，美军的新兵招募数出现了近 30 年来的新低，这让国会开始考虑更加“激进、创新的招募手段”，其中便包括海军研究生院 MOVES（建模、虚拟环境与模拟）机构耗资 700 万美元开发的一款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它拥有一个十分直白的标题《美国军队》（America's Army）。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使用游戏作为征兵手段。

它作为免费游戏在 2002 年 7 月 4 日发行，被形容为策略性公关物料，允许玩家自由探索军队以确定自己是否适合参军——完全的美国视角，暗示只有军事行动才能让一切冲突迎刃而解。它在 Metacritics 上获得了一个不错的 82 分，好评包括“没什么能比得上亲自去看看军队在干什么了，而且你还不需要真的去做”、“最为逼真的体验，武器听起来太真了”。五年后，世界范围内有将近 800 万人成为了注册玩家，比它更成功的征兵广告大概只有二战期间“我需要你”的海报。

《游戏结束：电子游戏中的性别、种族与暴力》一书的作者 Nina Huntemann 指出了宣传手段从“为什么”至“怎么样”的变化：

《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是二战期间美国战争部委托弗兰克·卡普拉拍

摄的一系列战争纪录片。这个由 7 部短片构成的系列，是对里芬斯泰尔的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的直接回应，意在说服一个不愿参战的国度加入盟军。类似的政治宣传在今天会变得更加隐秘而自然，如同《美国军队》一样，“如今聚焦于战争和军事的游戏与《我们为何而战》相似，只是它们变成了‘我们怎样作战’（How We Fight），拿走了很多关于‘为什么’的问题，以及与之关联的道德困境。”

频繁出现在相关学术讨论里的一个游戏系列是 Kuma\War (2004)，它以紧跟时事还原标志性战役（比如猎杀本·拉登）闻名。官方网站辟出专区让玩家留言支持身在伊拉克的美军，还会邀请现实中的士兵上传自己遭遇的枪战、埋伏和营救，以此为基础设计未来任务，“这里还原了我军 100 多个英雄故事”。

Kuma CEO Keith Halpern 并不将自己的公司视为任天堂之类的游戏公司，而是高度互动版的 CNN。“我们不会把自己定义为严格意义上做游戏的，我们只是利用游戏技术，制造新的新闻传播手段，讲述美国士兵的故事。对于我们的大多数消费者而言，玩游戏本来就是他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手段。”

这让输出价值观和立场变得更加简单。作为承载和传播文化霸权的智慧手段，一种新东方主义 (neo-orientalism) 从这些后 911 时代的娱乐产品中显现。[东方主义](#)原指西方视角主导和重构东方，实现对东方的权威压制。地缘政治意识渗透了艺术、学界、经济、社会结构和哲学文本等各个领域。数字时代的东方主义则以更为含蓄的方式复兴了这样的信条。

体现在产品中，就是设计师选择搭建幻想视角的异域场景（这在近年来几乎都是中东），用标志性的视觉元素强化玩家对东方的既有印象；或者在动作游戏中将阿拉伯裔角色设定为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在击杀玩家后会发出嘲弄的笑声。和其他媒介一样，电子游戏被认为加深了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将敌人非人化。他们的语言你听不懂，他们的文化其实没人在乎。

美国和世界公民拥有了购买一种军事身份的能力，但他们参与的体验透过了一层东方主义的滤镜，战争的本质隐约显得可以接受——玩家在获得娱乐活动的同时，以一种便捷的方式了解了那些对祖国并不友好的异国势力和陌生文化，作战变成了正当防卫。一种说法是，只要华盛顿确定一个新的 “rogue nation”（危险而不受控的国家或地区），那么一部新的动作游戏就会随之而来，给予玩家对付其武装力量的机会。当然，政治宣传并非西方专属。美国国防部专员 Dan Devlin 在 2006 年警告国会，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在篡改电子游戏进行反美宣传。基地组织的技术人员采用 MOD 扭转了这些战争游戏的叙事，使美军成为了游戏反派，被改动的作品包括 EA 最受欢迎的产品《战地 2》。

无论这些战争游戏隶属哪一方、为谁服务，它们所拥有的共同点远多于不同点。[二篇分析了 160 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研究](#)，或者说，分析了 160 个游戏中的“对手”的研究指出，游戏到底反应的是当下人们所关注的社会威胁。它旨在提供一种对付这种威胁的手段。

通过去除敌方人性和复杂度，玩家得以明确自己的目标，抛弃道德疑虑，将所面临的潜在重大议题转化为“我们 VS 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玩家获得了控制感和自我感，战胜了焦虑，并且能说服自己“我在试图让世界变得更好”；在这样的作品里，人们会将军事冲突视为纯粹的战术和力量对决，而政治、道德、历史、意识形态、人道主义等因素难以挤入这样的娱乐空间。一种担忧是，从游戏中汲取知识的一代在真正面朝复杂的政治维度时将无所适从。

那些完全不同于现实战争的游戏[谎言](#)（独狼可以赢得战争、秘密探员拯救世界、深入敌后很简单、敌人是笨蛋、敌人是邪恶的我们是正义的、菜鸟才在乎国际法等等）加深了这种体验。通过提供英雄叙事、简化相关背景、让战场浪漫化或变得更加干净、让战役变得只为玩家胜利而存在、为玩家提供绝对安全可以反复来过的处境，游戏制造了短暂的电子失忆。[“在这里，文化历史的简化本身即是一种暴力”](#)。

### 03

#### 方向盘后面的人

现代战场也许不再需要人亲自奋战、浴血杀敌，然而参与者仍然是参与者，战争的本质不会改变，即便是精准打击目标的无人机也会造成难以忽视的“附带伤害”——一种平民死亡的公关性说法。英国乐队 Muse 《无人机》专辑里唱道，“没有追索权，没人在方向盘后面”，但是终究有人远程操纵着摇杆。这种像极了游戏任务的操作导向了明显的问题：对个体伤亡的脱敏，以及相应责任感的剥离。

同样，在虚拟战场上，手持键鼠与手柄的开发者和玩家对现实的选择性无视也引起了类似的担忧。

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三篇报告](#)曾详细地描述了这些问题。2009 年 TRIAL (Track Impunity Always 穷追未受审判者) 的报告《按规则玩》通过 IHRL (国际人权法) 和 IHL (国际人道法) 的视角分析了电子游戏中的暴力；两年后，国际红十字会发布《武装冲突法》，在推广它的问答中指出，游戏越来越逼真地模拟现实情境，但是其中的玩家并不受 IHL 的约束。2012 年，红十字会的《使命召唤之外》出炉，它聚焦于

电子游戏描绘的现代冲突，担忧 IHL 的缺失会传递出“违反规则可以被接受”的印象，这包括白磷弹、喷火器、集束炸弹的使用（这甚至会弹出一些成就）、审讯虐待战俘等等。

它们无意审查游戏，但是希望开发者能够考虑现实战争的规则，并且不无故对规则的违反进行美化；它们要传达的信息并非玩游戏会导致暴力和违法行为甚至引爆战争，只是在暗示重复性的、被肯定的越线行为可能会对玩家的道德伦理观产生影响。

由此引发的问题包括现实法律是否有必要被电子娱乐所覆盖到？游戏能够合理化玩家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吗？在涉及到黑水公司这样的 PMC 时，它该如何处理才合适？你可以想象到游戏社群对此的愤慨，没人希望自己的爱好和在虚拟世界里的行为被评判；为什么不管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战事而是将一群基本无害的玩家作为批评目标呢？

不可否认，电子游戏本来可以做到更多，比如提供杀戮之外的选项、奖励用和平手段完成游戏的玩家（《合金装备》系列）；抛开模糊的立场，用主打生存的机制和基于平民的叙事传达清晰的反战信息（《这是我的战争》）；相对提高难度，中弹不会奇迹般地自动恢复血量，需要医疗兵及时介入（《人间地狱》）等等。这起码不至于让一个类别落入千篇一律的无聊。

相比于书影音，含有互动元素的游戏似乎更加具备令人共情的特质，仅仅把这种感染力用于制造激发肾上腺素的刺激，可能有点浪费。那么游戏，基于其娱乐性质，能够负责任地描述战争吗？

[一种直白的说法是](#)，“基本上所有的战争游戏都被局限于‘荣誉，光荣，英雄’的宣传语，这大概属于点头致意，但它们并不会尝试做到尊重’或者像电影《拆弹部队》那样反战。”《战舰世界》的开发者称，他们并不聚焦于人类伤亡，因而避免了美化暴力与战争，他们尊重题材的方式是细节上尽善尽美；一战叙事冒险游戏《11-11：复述回忆》的制作人说，这还取决于游戏的表现方式，“如果你执着地想还原每一个按钮和每一件制服，记得同时表现士兵们遭遇了怎样的严寒和饥饿，别只是选择表现你‘需要’的部分”；二战策略游戏 Through the Darkest of Time 的设计师则认为，对于一款二战游戏，也许提及大屠杀比每一辆坦克的细节搞对更重要。

人们都隐约知道看起来最正确的做法：表现战争的所有方面。这包括英雄故事，也包括可怕的细节；在无脑射击之外，它最好也能体现年轻战士和战火中的家庭遭受的影响。饥荒，污染，死亡，PTSD。

当然，这也许会影响一些游戏体验，毕竟玩家寻求的往往不是战争，而是对战场上个人高光的美好幻想，与现实战争的晦暗和焦灼和丑陋恰恰相反。

但是扩大视野和改变视角并不是坏事。脱离“我们”与“他们”、“红色”与“蓝色”的划分，更多的故事戏剧性和批判性思考将随之而来。

在《使命召唤》的最新一部作品《黑色行动：冷战》中，玩家会遇到一道改变结局的选择题，相比于步入机场的约瑟夫·艾伦的被动，本作的主角贝尔有足够的空间考虑立场、选择敌友，或者在面临两种不正义时选择放弃。这是个和“不准讲俄语”一样大胆的情境，但少了一些刻意，没有了固定立场和英雄叙事，多了讽刺、自主权和一丝自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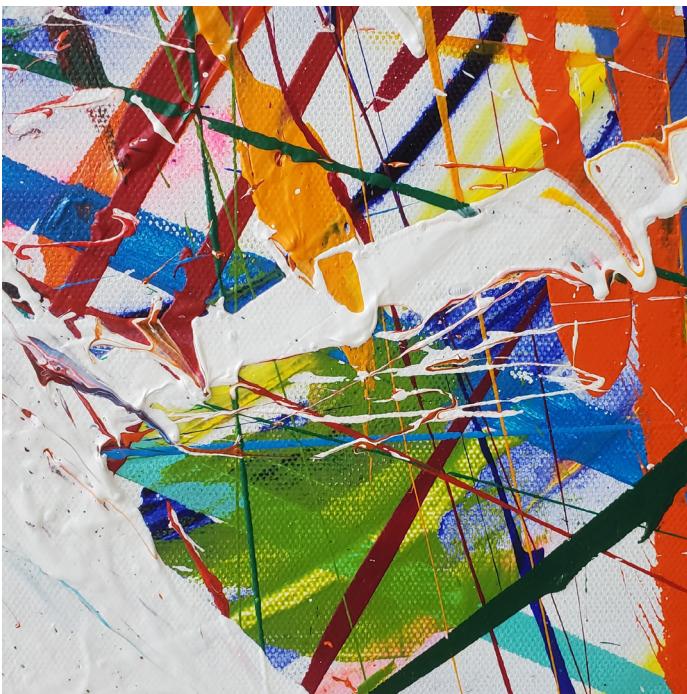


顾天鹂

不要恐慌，好些人我也不认识。莉雅说我是恶作剧型写手。谢谢莉雅，我很喜欢。

#### 存档点

看起来像在聊游戏的地方。也许这里的文字能解答你“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游戏”的疑问。



图片来自 Jené Stephanuk on Unsplash

## 专栏

# 展览的展览，和数字 10

## 唐克扬 | 展览十书

### 我所见证的艺术、空间与世界

\*\*\*

经历了好多盛大的“开幕式”，有哪几次策划艺术展览的过程是比较特别的经历？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次伴随着剧烈的牙痛的意大利之旅。

那次我特地准备了一个给婴儿喂食的“焖烧杯”，足够填饱几天肚子的方便面，因为不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在不方便就医的异国他乡，我要至少呆满三天，这是一次目标不甚明确的旅行，投资展览的人，赞助展览的人，甚至可能参加展览的人，对于展览究竟要干什么都还是一个谜团。唯一明确的对象，是一座有着三百年历史的建筑，米兰的克莱瑞奇别墅（Villa Clerici），它是在 1722 到 1733 年，也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到雍正十一年间建成的，别的我一无所知。在不算短的十个小时后我抵达米兰，几乎没吃什么东西，飞机上，一位专事采访田径比赛的意大利记者和我坐在一起。我记得，他问我，我知道那幢房子，可是你去那里干嘛？

受一位非常知名的艺术教育家的委托，我的此行，就是为了实践一种新的策展模式，我们找到有趣的空间，然后在里面策划有趣的活动，至于干什么，那是现场再决定的事情。因为他公务繁忙，所以，我应该先尽可能地摸清楚情况，不是仓促做出决定，而是先了解我们到底能干什么。从模糊的照片来看，这是一幢我们习惯上称作“古建筑”的房子，兼有室内室外——我喜欢这种展览场地，因为它带有时间的痕迹，随着城市的活动显著地改变，这样一个展览就在时间和空间两头接上了“文脉”。我一直觉得，不同空间的展览实际上也改变了作品本身，所以展品并不比空间本身来得更重要，甚至有些艺术作品未必是我这样的人所喜爱的，但是如果它们能够在展览的语境中产生某种对话，我们所做的努力也是值得的。

可是。到达不久我的牙就出了状况，即使不吃任何硬质的食物，只用开水焖烧方便面，牙神经的剧痛也让我说不出话来——后来和我的“地陪”见了面，我很快就发现了我不说话其实也无关紧要，因为尽管我示意对方可以和我直接表达他们的意思，他们还只是哈哈大笑着，咕噜咕噜冒出一长串我听不懂的意大利语……

“您说英语吗？”这几乎是我当时唯一可以表达的意思了。

“We love China……”这几乎也是他们唯一能说的答案了。

他们就仿佛听懂了，于是喜笑颜开。当时，这是一种很流行的国际展览“合作”方式，在意大利，中国艺术家甚至也可以站在他们以前只能仰望的文艺复兴大师旁边，来个合影，甚至“自拍”。意大利人的英语是不大的，但是在这种场合里，他们会千

篇一律地回复：“We love China……”

从建筑而言，克莱瑞奇别墅在意大利不能算是什么珍宝级的遗产。但是它依然具备了一个标准西方美术馆的气场。别墅现在是一个公益组织的办公地点，建筑本身也有一些陈设，墙上也挂了我说不上来历的油画作品，但是大部分墙面都是素净的，可以成为美术作品陈列的背景，或者，就算有些装饰，“当代艺术”和传统也天然形成鲜明的性格反差。更不必说，别墅还带了一个雅静的小花园，喜欢做雕塑和装置的艺术家们看见了，眼睛大概会放光了……

可是，当我问到作品陈列的技术问题的时候，我的牙痛突然剧烈地发作了……

大多数世界上的事情都有其复杂而现实的“缘起”，艺术不过是其中的操作形式和表达方式之一种。在这本书里，我尽可能地多描述其中“技术”层面的东西，那也是我可以理解的，在故事里也是实际发生的。但是，你不回到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图景里，就不会理解专业的来源。在这本书里，我也反复引用了我最喜欢的建筑师路易斯·康的一段话，他说：

“我喜欢（大卫·休谟的）《英国史》，但是我只读过第一卷，即使第一章我也只读了四章里的前三章，我的目的是读第零卷，它还没写呢。想入非非的念头使人想入非非。一旦有所作为，你就会思考思想本身的起源。”

艺术的天性总是想入非非，但是想入非非本身也会有个具体的起源。“艺术展览”这件事情古已有之，它们历史最为悠久的起源地之一就在意大利。但是在那个语境之中并没有“中国人”，不同文明的碰撞，恰恰暴露出一些看似当然之事背后的不寻常之处。比如，他们那么珍爱的历史遗产为什么舍得让我们来使用？我们使用为什么不能按照我们爱好的方式？

仅仅只有三百年历史的克莱瑞奇别墅也不允许钉进一颗 21 世纪的钉子，这样没有一幅中国人的画可以挂上去。说来也别扭，中国艺术家将要送来的画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水墨画，但是它们的装裱方式和米兰画廊里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传统中国绘画，大部分只有几十厘米那么高，并没有一面高大笔直雪白的墙用来悬挂，即使有这样大的画配得上如此宏大的建筑，它脆弱的物质属性和这样的西方建筑也不是那么相称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到这里，以这种方式展出呢？要知道乌菲齐的文艺复兴艺术家送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也还是他熟悉的西方美术馆的展览环境。

在我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意大利人挤了挤眼睛，向上瞧着他们引以为豪的建筑保护的成果。是的，它做得可真不赖，你不仔细看，都不知道那些优雅的射灯是怎么脚不沾地地连接到天花板上去的。通过仅仅一根钢索，几乎看不见的电线既承担了灯的重量，同时还构成了建筑另外一重的形象——既古朴又现代的建筑的室内。

\*\*\*

另外一次难忘的展览策划，发生在意大利的反面——我不清楚在印度打个洞是否正好可以穿越到意大利，但是看起来，那里发生的事情恰好是克莱瑞奇别墅的反面。在去之前，我所合作的美国教授告诉我，CIMA 画廊是印度数一数二的当代艺术机构——我至今也没有怀疑这一点，因为它的老板，持有印度知名的报纸《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可是，当我真的被汽车拉到加尔各答的一座不大起眼的小房子面前停下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怀疑我走错地方了。

当然，那是我第一次去印度，也是这个画廊第一次举办与中国有关的展览。

他们告诉我，CIMA 位于加尔各答“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我必须承认，它更新了我对于“中产阶级”这个词的定义。在画廊的前面，一群小朋友正在开心地当街踢着足球，似乎不大担心坑坑洼洼的路面会硌着他们的脚。即使画廊内部“天然旧”的陈设，也和米兰、那不勒斯那些由旧空间改造的展览场所大相径庭。在意大利，纷繁的旧物质和闪亮的新物质之间，毕竟还是有着那么一种看不见的界限，让你知道那些是值钱不能触碰的，哪些只是纯然的垃圾，而在印度，你有时真的分不清，哪些是会被送出门外堆在路旁，而哪些又只是不太讲究的室内装修罢了。

其实，加尔各答和我的童年距离并不远。我必须承认，“艺术展览”这几个字不仅是从未成为我儿时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就没有在我那时的意识中存在过。在中国至今还存在的对于“秀”——西方博物馆人对于展览的口语化称呼——的一种天然排斥，



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琐碎的“日常生活”，而不仅仅是印度，才是被旅游目的地化的意大利的反面。展览的对象为什么必须和展览的环境人为地分离？为什么展厅之中有些东西沐浴着神圣的光环，而有些只是黑暗中的一角？难道真的只是金钱的力量，会让一个人对于一张价值几千万的纸肃然起敬？

在印度，这一切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地发生。于是，我们就在一个看似家庭厨房的几十平米空间里，忙活开了我的展览。我的美国合作教授，因为之前来过好多次，对于眼前的一切似乎见怪不怪——没有几个协助布展的工作人员，我们甚至也用不着画框，艺术品提前在纽约打印出来，装在卷筒里带到现场，就直接用大头针固定在墙上，展览的标题，似乎是空间里唯一讲究一点的东西，甚至展厅的地面和墙壁，也没有为了展览特意粉刷和打扫……看着她坐在地板上做手工活的样子，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

直到那个时刻为止，我依然对展览的性质抱着一定程度的疑虑——它真的会成为这座城市里的一次重要文化活动，为人所关注吗？还是我们只是在某个“居委会”里，完成了一次社区的“文化下乡”？要知道，我们的题目“三角洲计划”特地选择了中国、美国和印度的对话，之所以这个展览发生在加尔各答，我们在杭州开了展前会，是因为三个城市都是世界上大河的出海口，美国人感兴趣密西西比河的景观，在印度我们想说说有关恒河的影像呢。



踢足球的孩子们散去了，门外，甚至都没有几辆车通过这个街区。夜幕降临时，展览按照中国艺术家习惯的模式发生了，这是我见过的最为率意随性的展览开场白了：也有简单的开幕式，策展人的讲话，随之而来的鼓掌，拍照、红酒和甜点——当然，后者一定是印度当地的味道，就连盛放它们的容器也是。

大家闲聊着，说笑着，向我提问题的人中间，真的有一个“社区大叔”，我记得，关于对话他是较真的，他问了我关于景观变迁的问题，连熟悉恒河的美国教授也答不上来。此情此景中，真的会有人愿意“垂询”这些细枝末节，只有本地人才知根知底？我想起无论在美国大学的博物馆，还是在北京的798闹市，总有热心的“朝阳群众”，只是奔着展览之后招待的甜点而来……对于这个展览的幕后故事，刚刚落地没有24小时的我真的是一无所知。

就在这时，有一个人向我走过来，他打消了我的某种疑虑：

“策展人你好，我是美国领事馆的文化参赞……”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不是这个人堆里完全不起眼的文化参赞。而是玻璃门上好多双窥视的眼睛。就在我疑惑的时候，展览招待的末了，工作人员笑着端起盘子向门外走去。

是那些踢足球的孩子，他们笑着，闹着，把甜点一扫而空。

\*\*\*

有位读者朋友问我，“展览十书”为什么非要凑够十？过去我写的《美术馆十讲》和《美术馆指南》都是十章。“十全十美”这是佛家所喜爱的事情，《华严经》中大量出现“十”的数字，比如“十行”、“十住”、“十明”、“十地”、“十忍”、“十回向”、“十五尽藏”等等，更有甚者，“十”是一个“变数”，表达着完美和谐，世界万物都是基于“十”的圆满演绎。所以2014年在北京中间美术馆所做的那个关于策展心得的展览，“展览的展览”，也就顺理成章叫做“十个展览”。

展览有什么可说的？有的艺术家爱说“艺术是我的生命……”，对我来讲，艺术展览和展览策划人，展览设计师的身份，其实不过是一种机缘，见证着我过去十年的生活网络的发展——就像一场牙痛伴随着我第一次去了克莱瑞奇别墅，碰巧赶上了米兰世博会，世博会的所见催生了我一个主要的建筑设计思路，这个思路又让我频繁地去往一座此前从未涉足的中国西南小城。从2004年在哈佛大学为一群中国动画艺术家所做的第一个学生展览开始，为了各种各样的“展览因缘”覆盖了我能理解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倒过来——人生的种种就一定得需要艺术展览。

所以这里的“十”有其偶然性。大多数的展览策划之旅其实没有什么结果，米兰的克莱瑞奇别墅之旅并没有带来可见的结果，它甚至没有被我计入“十”之中，可是象征着“变数”的数字“十”，总意味着偶然性又和那些不断重复的东西有关。我在《美术馆十讲》这本书里反复讲到语境(context)的意义，其实艺术和展览都绝没有什么“法式”，“兵法之妙，存乎一心”。现实生活中的质料填充充满了各种偶然的机缘，久而久之，就有了变化无穷的棋局，每一盘都是不大重复的。我们不仅要关心棋子和棋手，而是要对弈中寻找破局的乐趣。你需要某种意义的总结，但是又不是划分一个只有人工智能才懂的棋盘格子。

2014年，我就是这样，决心对自己所经历的艺术棋局做个总结，也许那时只有自己才能充分看懂。故事发生在中国建筑界的第一人，崔恺院士设计的中间美术馆。我很喜欢这个不大但很“好用”的展览空间，虽然偏在北京西郊的一边，却是少见的教科书式的美术馆，里面设施一应俱全。但是即使这样一个空间，对我想说的太多的话而言，对于十年的生活经验而言，也过于“标准”了。

事实上，最终面对展览空间本身的策略，就说明了所有和展览相关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我希望尽量让图片反映的空间细节本身说话，而不过多地引入展览主题的玄思。这恰如其分地是一本“关于展览”的书，而不是关于“展览所关于的东西”的著作。它关于展览是如何发生的，展览又是如何寻找到它的容器——我又想起了印度的甜点——以及展览是如何在技术意义上得以可能。其实，这些也就足以说明了艺术展览这样事物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我相信丰富的生活本身创造了当代文化，而不是倒过来，从生活中抽象出干巴巴的原则。写作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唯一有点不确定的是我的经历是否足以涵盖如此多彩的当代生活，它们本该属于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间喜剧”的时代：

“我的目的是读第零章，它还没写呢。想入非非的念头使人想入非非。一旦有所作为，你就会思考思想本身的起源……”

这本书里的相关空间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者是充当策展人，或者是设计师，展览的编辑，书和文章的作者，或者干脆就是参加展览的艺术家。对于那些不大了解这个行当的人而言，我或者是导演，或者也愿意当个扛摄像机的，写剧本的，甚至临时充当演员。不管是哪个工种，不知多少次，我都会收到一张“场地”的平面图。《佛不思议法品》由三十个“十种法”组成；《离世间品》由二百多个“十种法”组成。《华严经》强调宇宙万物在无限差别的同时，又具圆满的统一性。《阿僧只品》又说：“……不可量转不可量转为一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为一不可说转；不可说转不可说转为一不可说不可说；此又不可说不可说为一不可说不可说转……”

数字10。世界之大。

\* 本文图片由作者唐克扬拍摄



唐克扬

佛大学设计学博士，曾修习工程，文学与艺术史。有研究和创作作品如《从废园到燕园》《长安的烟火》等多种著作刊行。

#### 展览十书

独立策展人、建筑师唐克扬会谈及他亲身经历的各种空间：无论是作为策展人、设计师、编辑还是参展艺术家。空间不是作秀，是一种日常生活。



电影《海上花》(1998)剧照

## 专栏

# 爱去夜总会的中年男人坏不到哪去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淮河版的塞纳河左岸和右岸

现在的中年男子们从上到下，都越来越不体面了，2017年贾跃亭跑到美国洛杉矶去开会，说下周回国，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马云跟马斯克对话，除了抖机灵，没有一丝可以与之抗衡的企业家精神，当国外的企业家正一步步把梦想变成现实，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却现实得很，蚕食着底层的梦想，打着科技创新的名义盯着的是穷人家里的三瓜俩枣；接化发之父、闪电五连鞭创始人马保国被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一拳揍成乌眼青，直勾勾地躺倒在地，中年男人们的形象轰然倒塌，而事后的“年轻人不讲武德”和“耗子尾汁”，又给中年男人们可悲的形象添上了不堪的一笔；刚刚出狱已到中年的芮成钢，穿再高级的西装套装，也改变不了“正如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的……”、“我想我可以代表亚洲”等言论给自己烙上的凡尔赛教父标签。这些中年男子的形象是不堪的，我想他们一定没去过什么正经夜总会，经过夜总会熏陶教育的中年男子不会这么差，就像那些年经过青楼洗礼的男人们个个都是才俊栋梁。

优秀的中年男子是对当下有干劲，对未来有盼头，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们最快乐的事大概就是老婆出差了，约上好哥们儿，抽着烟，讲着黄段子，一起去找心仪的技师，或者是去夜总会找那些给弟弟攒学费的好姐姐们献爱心。当然，他们去这些地方一定不是为了别的，纯粹就是对将要发生的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对未知的幸福未来的憧憬，简而言之，他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古代优质的中年男子们也是喜欢这样的生活，他们也是趁老婆出差或者回娘家时约上三五好友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比如说明代的袁凯老师还专门写日记记录了此事，《马益之邀陈子山应奉秦景容县尹江上看花二公》：“黄家渡西多好春，黄家渡上酒能醉。看花吃酒唱歌去，如此风流有几人。”何谓黄家渡，大概就是今天杭州的花都和凯乐会吧。北宋苏轼人到中年，官运不济心情不好，便约好友陈季常出来喝酒，还喊了几个不知是吴姬还是胡姬的妹子助兴喝起了花酒，结果被陈季常的老婆发现，接受了一番棍棒教育，于是苏轼写下了《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可见中年男子的心是多么脆弱。

中年男人们是惧怕孤独的，林语堂说“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有孩童，有瓜果，有走兽，有飞虫，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口，人情味十足。稚儿擎瓜柳棚下，细犬逐蝶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惟我空余两鬓风。孩童走兽飞虫自然热闹，可

那都和你无关，这就叫孤独。”很多中年男子都有这样的孤独，所以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去城里最热闹的地方，挑选对的人，谈文学谈电影谈比特币谈产品运营谈痛仰乐队谈生命的空旷……然而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个行业堕落了，现在的夜总会变得直截了当简单粗暴了，大部分的水平停留在“王哥，天冷了注意保暖，今晚还有包厢”，高级的也不过“房事如钻木取火，妙龄邀您共御寒冬”，早就没了当年那种“当垆少妇知留客，不动朱唇动翠眉”的情感交流和内敛含蓄。以前在夜总会还能相拥一起探讨生命的价值，或是社会某个领域的发展现状，现在只能抱在一起探索身体的价格，或者倒在一处大力发展生产力，除了能谈价格，有价值的东西基本谈不到了，中年男子的社会大学堂轰然倒塌，人生失去了方向和进步的殿堂。

我的中年男子朋友许知远老师就曾指出过夜总会堕落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个男人为了获得与某个女人的快乐，他可能要煞费苦心地安排一次旅行，要通过豪华的游艇与精心的旅行路线来达到目的。一项原本单纯的快乐，变得困难重重，其中充满了不合人性的制度化。”虽然快乐是短暂的，但是对这种愉悦的追求，却可以使中年男子发挥更大的能动性，不论是彼此间的学习、交流、协作，都能促进社会发展。正是因为夜总会准入门槛越来越低，从业人员素养也越来越差，从以前的文化交流、思想交流、身体交流圣地，变成了纯粹的金钱交易场所，致使夜总会的社会功能开始单一化甚至逐步丧失原有的功能，导致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从源头上被污染，举个悲惨的案例就是京东的中年男子大强子为了追寻短暂的愉悦，在美国作出了违背女性意志的事情，影响了民族电子商业公司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秦楼楚馆夜总会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对于中年男子们有着难以名状的孵化作用。去年日本人吉野彰成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据采访说，25年前老子就和常去的夜总会的妈妈桑说自己会得诺贝尔奖，我不禁想起了另外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海明威，他说他最喜欢妓院的清晨，是那么宁静那么适合写作。我又不禁想起了唐朝诗人才子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我更不禁想起了北宋词人柳永，“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郎；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他们都是秦楼楚馆夜总会培养出的优秀男子。可见，一个没有正经的秦楼楚馆夜总会的社会是多么可悲和绝望，就像一个没有爱人的单身中年男子，卡夫卡老师曾说过，“我在妓院门口走过，就像在一个心爱女子的家门口走过”。

都说女人像本书，那么秦楼楚馆夜总会无疑就是图书馆，有文化需求的中年男子爱去图书馆读书，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写过“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徐志摩，在写给老婆陆小曼的信中说：“说起我此来，舞不曾跳，窑子倒是去过一次，是老邓硬拉去的。再不去了，你放心。”叫老婆放心几个月以后，他又在给老婆陆小曼的信中坦白了：“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不是中年男子爱读书，实在是图书馆里的书太丰富了，八大胡同里的从业人员教育水平太高了，小凤仙可以教你琵琶、二胡、唱京剧，赛金花可以教你外交礼仪、外交辞令，再加上德俄荷奥四国语言，碾压战狼外交，谢蝶仙教你鉴赏《巴黎茶花女遗事》，顺便再教你如何烹饪时鲜鲫鱼……。

一个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跟这个社会的审美水准密切相关，审美标准是由商业文明决定的，又具体体现在娱乐文化行业的服务水准上。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社会发达文不文明，以前是看它的青楼，现在是看它的夜总会。它们的社会地位如此重要，主要是由消费阶层决定的，它们的消费群体可以称之为所对应社会的中流砥柱。当年的青楼，不是有钱就可以进，“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你还得有文化，得过了旗楼赛诗打茶围的关口，要是能写出“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样的诗句，还可以免收服务费，要是能写出“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这样的诗句，那就可以长期包房免费住上了。而青楼的从业人员也不是丰乳肥臀长腿细腰就行了，她必须要琴棋书画诗酒花样样精通，最好还能做上两道拿手小菜。青楼尚且如此，社会安能不进步。

相较之下，可以说现在的夜总会是非常的堕落了。有钱有势就能进，从最早的港商台商，到江浙商人，从房地产商到第一波互联网新贵，从煤老板到电商从业者，从创业精英到区块链到互联网金融……这些群体，包含他们背后各色大佬以及权贵，几乎都是不学无术的人，审美标准极次，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夜总会从业者的质量低下，虽然胸脯高耸但胸无点墨，整过容的脸也都是同一个廉价套餐。当年那股丰唇开眼角、做欧式双眼皮、隆鼻削骨、光子嫩肤、做卧蚕垫下巴的风潮，就是从夜总会行业开始进入高潮的，而后才形成社会氛围普及到良家妇女市场。一时间，东北扒蒜白貂老妹儿、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的小白领和杭州夜总会的姑娘们同呼吸共命运，同一个中国同一款整容套餐同一张整容脸，同事相见不相识，笑问姑娘从哪个场子来。从当年青楼的文化价值决定论，到如今夜总会的肉体价格决定论，凸显的是整个社会软硬实力的发展状况，前者是稳步向前，后者是一泻千里。当年青楼的从业者及其客群的审美，代表着当时社会的自由风气和繁荣的民营经济以及文化内核发展的高度，而现在夜总会从业者和其客群的审美，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恰好站在了文化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对立面。

宋取代唐后，唐的宵禁制度也被取消，夜经济和夜文化开始茁壮发展，宋的知识分子们也开始深入青楼采风进行文艺创作，比如柳永、欧阳修、周邦彦、苏轼、晏殊、秦观各个都有他们青楼里的好妹妹和好作品，比如周邦彦的“一夜情浓似酒。香汗渍皎绡，几番微透……从此后、纤腰为郎管瘦”，比如柳永的“世间尤物意中人。轻细好腰身。香肺睡起，发妆酒醉，红脸杏花春。”在没有经纪文化公司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们担任起了青楼网红推手的工作，哪位姑娘要是被词人们写进作品里了，身价

倍增，与此同时，姑娘们也成了诗词推广大使，经过她们的吟唱传播，很多人的作品要么广为流传，要么本人被达官贵人赏识。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柳永）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那么问题来了，该材料反映了什么：A 文人生腐朽化、B 文学作品世俗化、C 文人缺少核心价值观指引、D 法治社会不健全。

宋被灭以后，青楼文化就日趋没落，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也开始走下坡路。明代文学家张岱，写过一本书叫《陶庵梦忆》，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扬州瘦马》，写的就是当时女性在娱乐行业里遭受的苦难。客人挑选心仪对象的方式倒是跟现在夜总会比较相近，“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姑娘往上去。’‘姑娘转身。’‘姑娘借手瞧瞧。’‘姑娘瞧瞧相公。’‘姑娘几岁？’……没相中的话，客人就要高喊‘换一批’。这批客人就是当年扬州的盐商，他们借助与权力的勾结，垄断了全国的盐运业，腰缠万贯、富甲天下，相当于现在的煤老板，他们的审美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当男女双方不再处于平等的地位时，特别是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性是一群文化属性很低的人时，阶层之间的流动互通就停滞了，社会开始板结僵化，腐败堕落滋生蔓延。好在，女性们还是继承了传统，掌握了琴棋书画女红剪裁等文艺技能，甚至还升级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商业技能，比如记账管事辅助商人，扛起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大旗。

夜总会并非一直如此堕落，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的时候文化氛围还是很浓郁的，那时候社会上掀起过一阵热爱文化的浪潮，很多暴发户也意识到了文化的作用，不是他们喜欢文化，而是权力喜欢文化了，官商可以在文化里相遇苟合。于是暴发户们白天聚在各种商学院，晚上就到夜总会找女大学生。于是，夜总会的姑娘们开始注重文化修养了，一开始人手一本两百块钱办的各类大学学生证，后来又开始专注于文学领域，据说当年上海滩夜总会小妹们的坤包里都装着一本《文化苦旅》，包里有《文化苦旅》的小费比没有的要高出很多，文化的价值第一次在夜总会里通过小费的价格得到了体现和尊重。

商业的发展与娱乐文化的发展共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以十里秦淮为例，秦淮河南岸是青楼旧院，北岸是江南贡院。这里成为文化汇集的中心，不论是富商大贾还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考生，从四面八方而来，既带来了各类信息又带来了满腹才气，而教坊名伎则成了文化传播和各类信息分发的中心，她们从一个恩客那听来的消息，传给了另外一个恩客，“原来还有这回事？”；她们从一个诗人那听到的诗，背给另外一个诗人听，“卧槽，这诗牛逼，我要向他看齐”，甚至有些时候她们还把从富商那得来的银子，资助给了穷书生，这里既有信息汇总和传播，又有文学比较，还有财富流动资源再分配，它拥有了一个社会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她们就是信息集合和分发处理中心，在金融机构尚未出现时，她们就是小额贷款助学中心，她们就是蚂蚁金服，画舫花船是一座移动的湖畔大学，章台青楼是岿然不动的长江商学院，富商大贾、文人墨客、科举考生在这里成长、交融，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指引。这不就是秦淮河版的塞纳河左岸和右岸吗？左岸是文化是浪漫是主义和思潮，右岸是商业是财富是理性和竞争，两岸则通过服务行业的姑娘建立连接。

不论是南北两岸，还是左右两岸，都是互为依托，互相滋养的关系，两相互动，才能达成“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这是相对宏大的论述，放到微小的个体身上也同样适用，服务行业的女子也能促成个体的成功，比如说《醒世恒言》里的卖油郎秦重，秦重初见花魁王美娘时，就立下了人生志向，“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花魁名妓，睡一宿十两，小小卖油郎哪有这么多钱？但卖油郎立定志向，“从明日开始……一日积得一分，一年也有三两六钱之数。只消三年，这事便成。若一日积得二分，只消年半。”移动运营商的积分兑换活动就是从这学来的吧？为了跟心仪的人搂抱了睡一夜，卖油郎宁可攒上三年的钱，这比歌里唱的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还有诚意，这是《漂洋过海来睡你》。最后，卖油郎独占花魁，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既完成了人生梦想，又促进了社会商业的发展，双赢。

林语堂曾说，“中国人之所以对自然科学毫无贡献，是因为中国人连静下心来观察一条鱼的心思都没有，他们总是想象鱼在嘴里的味道……”，这倒是有点像很多中年男人，他们连静下心来跟一个女性谈心的耐心都没有，他们总是着急想象女性在床上的样子，当然，很多姑娘也是如此焦急，她们总是想象着中年男子掏出钱包的样子……在此，我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和冷静，为了社会发展，男方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女方提升服务意识以及文学修养，双方共建符合青楼遗风的现代化夜总会。请双方细细品味这首作品“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它的意思是，夜深了，对谈了很久卡尔维诺，男子起身与女子告别，女子低声问他：你要去哪住呢？现在已经是三更时分了，外面寒风凛冽、路滑霜寒，很少有人行走，不如就别走了吧。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业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图片来自 Polina Tankilevitch@Pexels

## 专栏

# 2020 留给我们的文化记忆

顾天鹏 | 18 号车间笔记

混乱成为了常态。

“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转瞬即逝的一线光明。”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回忆有生之年的时候，这是他写下的第一句话。

很多人已经从内心决绝地告别了 2020 年，至于媒体，则大多要再加上一句“滚蛋吧”“永别了”之类的话。然而要评价这一年发生的事情究竟在人类历史里扮演怎样的角色，要看我们在多长的时间范畴内评估它。对于人类而言，历史往往在当时无法获得恰当的集体叙事，所谓的集体记忆也仅仅是对于很小的局部而言，尤其是在互联网重新定义什么叫做连接、什么叫做割裂的时候，2020 本身变成了一个隐喻：一个人需要时时刻刻响应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动，即便没有亲历事件，有时也会被裹挟其中，被迫作出调整。在一个尤其需要共情的时刻，我们却更难以理解他人，争辩代替了对话，立场代替了事实，传统设置的界限在消弭，而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还在争论不休。

不过无论如何，对于个人来说——正如纳博科夫给出的意象——生存本身即是那线光明。2020 即将过去，它的发端早在这个自然年开始之前埋藏在各处，而这一年发生的诸事种种，也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塑造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愿我们都能拥有各自的光明。

### 重塑雕像

5 月 25 日，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的压制下经历了 9 分钟的窒息后死亡。6 月 7 日，[英国布里斯托的市民推倒了一座 18 世纪奴隶贩子的雕像](#)（贩卖了 8 万非洲人的爱德华·科斯顿），他们将膝盖压在雕像的脖颈处，将它拖拽过街道，投入港口的海水，并竖起自制的墓碑：“种族歧视，没人会想念你的”。#BLM 让人们重新审视雕像的意义。那些和种族压迫、奴隶贸易、殖民历史密不可分的纪念碑激起了抗议者的怒火——将声名建立于有色人种痛苦之上的压迫者为什么值得被纪念？

整个 6 月，[世界各地的雕像都在被涂抹、遮盖和推倒](#)。里士满人推翻了邦联总统杰佛逊·戴维斯，波士顿人“斩首”了邦联领导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比利时人烧毁了

若干座利奥波德二世的纪念碑（这位国王在统治刚果期间犯下暴行无数），英国人建立起“推倒种族歧视者”网站，在地图上标注了 100 多尊有问题的雕塑。

曾经无视抗议者诉求的机构们终于开始考虑雕像的雪藏、搬迁和替换。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挪走了自 1940 年起就放置于入口处的西奥多·罗斯福，他原本骑在马背上，一位原住民和一个非洲人分立两边，“[明显描绘了黑人和原住民处于从属地位、是劣等种族](#)”。

和涉及 #BLM 的多数火药味对垒不同，在这一激进的信条终于被传递出去后，围绕雕像的推倒和重塑诞生了更为多样的讨论和解法：谴责破坏公物的非法行为，赞同该问题值得公开辩论，通过正式渠道倡议对雕塑的移除，思考什么样的纪念碑最适合取代旧日的阴霾化身，同时警醒过客曾经发生了什么。最终，核心落向了反思与教育，关于正视黑历史，替它加上背景说明（[如同华纳对《乱世佳人》做的那样](#)），而不是扭过头去将纪念碑“删除”了事。

青睐在作品中表达社会议题的街头艺术家班克西给出了一张科斯顿雕塑的替代草图，“我们把它从水里拖出来，放回去，脖子上绕上绳索，被真人大小的抗议者青铜塑像包围，它们正试图将它拉倒。这样每个人都开心了。”

然而就 #BLM 提出的最大问题而言，让每个人都开心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删除代替讨论

Cancel Culture（删除文化），指当公共人物、某部作品、某一品牌表达了“冒犯性”观点时，人们将之扔出网络公共平台甚至是所属职业领域的现象，这包括抹除他们的所取成就、抵制与之相关的作品产品、试图让其在现实中被解雇等等。有的人希望借此挑战旧秩序，有的人只想寻求一场羞辱狂欢。

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让这一现象愈演愈烈。J.K. 罗琳在今年成为遭删除的公共人物中的一位，因为发表了疑似“反跨性别”言论（支持了一位坚持“性别是真实存在的”而被举报至解雇的研究员），两家哈利·波特粉丝网站与之撇清关系，不再链接她的个站、使用其照片或更新她的新闻；当她的新书上架时，# 安息吧 JKRowling 被送上了推特热搜，“她没死，但是她杀死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没人会想念她的”。

在种族问题激化、各政治阵营水火不容的 2020 年，跳过理性讨论直接删除成为常态。公共平台上的观点交锋本是互联网的一部分，但当人们可能因为发表异见而被噤声呢、甚至在现实中遭到惩罚时，潜在的言论自由危机促使人们对此警惕。

7 月，包括诺姆·乔姆斯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内的 153 名学者联名致信 Harper's Magazine。这篇[《关于正义与公开辩论》](#)，指出了对异见不宽容、公开羞辱和排斥、将复杂政治议题拆解成笃定道德观、言论范围因担心遭惩罚而窄化的危险。[它遭到了同样声量的反对](#)，被控企图破坏针对种族歧视的对话、是对跨性别群体的攻击、是反政治正确等等。12 月，当剑桥大学提议“学生和员工必须‘尊重’异见”时，剑桥学者要求将‘尊重’改为‘容忍’——‘容忍’意味着异见者不会因言论受到惩罚，‘尊重’则被认为是个模糊的概念，[“常见于黑帮枪口的威慑下”](#)。

反删除文化是否可与捍卫言论自由划等号？在诸多媒体的审视下，它最终回归了对言论自由之界限的讨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你提及“删除文化”时就已经在表达一种观点，是一种负面的暗示，是对左翼“警醒”（woke）风潮的偏见。它指出，删除文化虽然引起了大范围恐慌，但其不曾真的推倒某些庞然巨物。

### 饭圈成为政治势力

特朗普拉票首站塔尔萨的空场，#WhiteLivesMatter 话题下的爱豆视频，鼓励公民互相举报的警方 App 被迫下架——这一切都由韩国男团粉丝促成。顶着“ARMY”（军团）的头衔，以头号男团 BTS 狂热粉丝为代表的饭圈登上了政治舞台。

韩团粉丝给圈外人的印象不再只限于刷数据或是电话轰炸电台要求点播偶像歌曲，也不再是骚扰批评偶像的乐评人，比如那些称 K-pop “文化挪用”了黑人音乐的。当 BTS 成员们表现出娱乐圈罕见的气质，歌唱着社会问题，自我和解与坚持梦想，并带头为 #BLM 捐款时，[“军团”成员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对某些问题发声，这包括一系列慈善活动和政治领域的表态](#)，“因音乐而来，因信条而留下”。

所以，阴谋论团体 QAnon 成员进入对标 #BLM 的 #WLM 寻找同伴时被刷屏的韩团视频震惊了，他们被自己惯用的“关键词劫持”战术击败；数月后，特朗普竞选团队原以为座无虚席的塔尔萨站仅有 6000 人参加，约 13000 张票由人们假装预订但有计划地放了鸽子。10 月，BTS 母公司 Big Hit 上市，韩国三年来最大 IPO 占据了主流媒体商业头版。K-pop 再度成为横跨文化、政治、商业的现象级话题。因为其严密的组织性和热情，韩团粉被认为是唯一能在社交媒体上与 QAnon 抗衡的扩音器。

与此同时，深受日韩追星模式影响的内娱饭圈也进行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业——有可能是被迫而为之，有可能受到暗示和鼓励。这包括分享详细的评分网站养号攻略（因

此成为冷门图书编辑的噩梦），集资给综艺主持人送奢侈品打点关系，举报获得雨果奖的同人创作平台等等。

这大约是年轻人能够投身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公共项目，对其倾注过多的热情似乎是一种本能的释放。

## 办公室不死

远程办公（wfh）成为日常的一年，物理办公场所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在某个时刻划过了大多数人的脑子——通勤时间没了，更自在的环境似乎提高了工作效率，公司省下了运营成本，那么是不是应该……

但 wfh 衍生的种种麻烦很快让人们调整了对在家工作的预期。

[“当你和其他人在 Zoom 上时，虽然这是个工作场合，你却在允许人们进入你家。”](#)  
宠物闯入镜头引起的 aww 很快被更现实的阴影覆盖——贫富差距被摆上了台面，个人隐私时不时遭非受迫性泄露，如果你在回忆自己忘关摄像头引起的微型事故，请记得世界各地的名人政客与你同在，其中包括被[《纽约客》解雇的评论员、羞愧离职的阿根廷议员、怒骂同事却忘记静音的威尔士健康部长等。](#)

戏剧事故之外，Zoom Fatigue（视频会议疲劳）同样令人困扰。[研究表明](#)，视频对话意味着人们要更努力地辨识对方的非语言暗示（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语调），脑子在一起，身体却不在，这造成了认知失调：日常对话中的短暂沉默创造了自然的节奏，但在视频时却频添焦虑，技术导致的延迟让人们认为彼此并不友善或不够专注；同时，打开摄像头意味着站上舞台被所有人围观，这对很多人而言堪称梦魇。



Ketut Subiyanto@pexels

女性收到了更坏的消息。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显示，女性在远程办公期间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就算避开了失业潮和失学，职场女性被天然认为应该承担更多义务劳动。[“我们 25 年的努力在这一年里可能都付之一炬。”](#)

办公室的好处开始被更多人想念。人们渴望更直接自然的职场交流、工作与个人生活的明确划分、从互动中诞生的好点子（又称非正式决策）等等。也许每周允许在家办公一天会是个好主意，但是办公室之死——即便以科技公司的标准来看——也言过其实了。

## T：争议继续

在演员艾伦·佩吉宣布自己成为艾里奥特·佩吉的同一天，[凯拉·贝尔在英国最高法取得了里程碑式胜诉。](#)

“假小子”贝尔在青春期被推荐去了 NHS 下属唯一一家服务未成年人的性别身份发展诊所（GIDS）Tavistock。她 16 岁接受了试验性处方药发育阻断剂，之后便是睾酮素，这让她 20 岁时不得不进行双乳切除手术。之后，她后悔了自己的跨性别决定，也不再自我认知为男性，为了防止更多女孩在未获取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做出不可逆转且损害健康的决定，贝尔将诊所告上了法庭。

法院判决认为，在服用发育阻断剂开始转变的问题上，未成年不太可能给出知情同意，因为他们很难理解这一举动的长期风险和后果。

Tavistock 近年来所受的质疑也被媒体跟进：给低至 10 岁的儿童开阻断剂；前员工指出它未能评估病人的背景和心理状态（比如是否患有自闭症）；35 名医生在 3 年内离职，担忧年轻人的“性别认知障碍”被过度诊断了。

在一整年性别身份相关的争议中，这是少有的具备公开讨论、由法院做出清晰判决的案例。[另一起清晰判决发生在 10 月](#)，世界橄榄球协会邀请科学家、伦理学家、运动员、律师等开展调研工作后决定，跨性别女性（生理性别为男）将不再被允许参

赛，因为她们较顺性别女运动员仍具备无法忽视的身体优势，她们的骨架在转变后不会缩小，这在冲撞中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这些担忧在美国得到了验证](#)——自 2017 年以来，康涅狄格州的两名跨性别校运动员赢得了 15 个冠军，这些冠军此前由 9 个女生分享，而这两名运动员参赛时还没开始激素治疗。上述判决很轻易被《卫报》、《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媒体贴上了恐跨标签。这大约是今年最容易获得的头衔了——无论你是像 J.K. 罗琳一样试图在社媒进行相关讨论，[还是像 Suzanne Moore 一样作为一名专栏作者试图发表诚实观点](#)，或是作为 LGB 社群的一员，为“生理男性如今也可以自称女同性恋”感到困惑，你都有很大的可能遭到删除。

关于性别身份的讨论和性少数平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噪声异议并不会让进程变得轻松。

## 废物互助

简中媒体报道 985 做题家时总在强调城乡差异和小镇青年的迷惘。他们可能并没有真的使用豆瓣。

豆瓣“985 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的成员并不都是埋头做题的乡镇学生，他们中不乏留学人士和非 985 学生。实际上，自觉是废物的用户就可以进组。在几乎人人都认为或假装认为自己是废物的豆瓣，小组人数不出意外实现了暴涨。

这不是废物和做题家聚集地，而是青年们卸下职业伪装承认了自己的困惑、懒惰和“失败”的疗愈互助小组。因为没有别的地方能够容忍这样的大规模倾诉。这些话题与主流叙事导向恰恰相悖。

在这里，“内卷”是个高频词。作为今年的热门词汇，它经历了轮轮阐释，现在可以指代自我锁死在低水平上的原地踏步，或是封闭环境下的竞争与互相倾轧。后一种解读似乎更符合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内卷无处不在，从幼儿园入学卷至大学社团内斗，从毕业求职卷至 35 岁危机，它的后缀是环境压迫下的年龄焦虑，随之而来的是容错率极低、安全网几乎不存在的现实的恐慌。

好心人一再强调“成功的标准不是固定不变”、“小镇做题家不能寻求超越自我的标准答案”，鼓励青年不要怨天尤人，应该更加努力等等。

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建议可能会加重抑郁。也没有证据显示它们能帮上一点忙。人们默认“苦日子”是这个游戏的初始设定。如果你无法通关，是你自己不行。Git Gud！

## 社会性死亡

它原来有一层轻松的释义，指夜半时分令人忆起时辗转反侧的尴尬事，主角往往恨不得当场钻地缝。豆瓣社会性死亡小组成为了这样一个自曝隐私的尴尬交流区，为用户提供建立于他人痛苦之上的欢乐。但在今年下半年，这个词汇逐渐变味，用于形容当事人在民众自发的集体道德谴责下遭受的虚拟处刑。它听起来有点像删除文化，但是目标比公共人物更加广泛。人人都可能遭遇社死。

新冠确诊的成都女孩在日程曝光后被恶意称为“害人的转场皇后”，女业主被造谣出轨快递员后遭解雇，本想让学弟“社死”的清华学姐自己遭遇网暴。一系列事件拥有共同的模式：隐私曝光、信息扭曲、模糊真相、公开羞辱。

关于网络匿名性导致的无成本仇恨言论早已被探讨过无数次，但它仍然是国内外未解的难题。对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鉴定、对发布内容的审查，如果全部交给社交媒体的算法和人工审核就会导向今天的局面。已经有不少人质疑，在涉及到社会议题时，为什么要让未经选举的网络平台决定信息走向，是什么给予了它们审查和干涉 / 不干涉的资质。

这样的疑问会持续下去。网络聚焦欲望再将它放大，它反应的是用户的集体诉求。在这里，个人的社死源于群体的意愿，当有足够多的人渴望死亡发生，它便会发生。平台和执法者大概永远只能料理后事。

## 乘风破浪的幻觉

《乘风破浪的姐姐》似乎是今夏所有人都在看的综艺。这部选秀综艺召集了 30 位出生于 1990 年之前的女艺人，通过训练和考核选出 7 位成员组团。它被定义为“女团成长节目”——显然，已经在各自领域有所作为的成熟女艺人仍然需要进行唱歌跳舞的女团式选秀、接受资质成疑的评委点评才能再次收获关注度，取得他人认可的“成长”。它引发的讨论度确实表现出观众迫切期待主流文娱圈可以尊重、赞赏性格各异的成熟女性之美的诉求。人们希望审美标准可以多元化，年龄桎梏能够被打破，市场最好不要被清一色年轻制式偶像所独占。

事与愿违，姐姐们仍然被推进了工业模具，她们的特点被消磨，志气被打压，放下本行跳起了为年轻偶像量身打造的流水线女团舞，仍然被期待严格管理身体以满足

人们对逆龄美貌的需求。一个本该挑战单一审美的节目，最终成为了它们中的一个。指望一档综艺节目反对单一偶像标准、缓和施加于女性的外貌和年龄焦虑并不现实，但它至少传达了一些模糊的信息，与年底赵薇的《听见她说》汇合，形成了不可言说的暗流。

### “你背叛了工人阶级”

来自德剧《巴比伦柏林》的台词成为了反加班文化、反夸张奋斗行为、反内卷、维护劳动者个人利益的标语。“背叛”和“工人阶级”在今年延伸出了更多诠释。

“996 福报”贯穿 2019 职场叙事的一年之后，某些公司对劳动法的侵犯仍未停止甚至变本加厉。9 月，恒大在员员工爆料公司正实行“712”，即一周上班 7 天、每天 12 小时。10 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 年）》发布，其中一条“开展特殊工时管理改革试点”导向了“996 是否会合法化”的疑问，虽然人社部对此进行了辟谣，但它仍引发了些许焦虑。

绝对的弱势地位让劳动者回归了自嘲、玩梗和力所能及的微型反叛。一篇“请在职场停止努力”的倡议在微博收获了 11 万转发，它建议劳动者学会摸鱼、拒绝玩命加班、“自私起来争取合法权益”；一张真假莫测的截图风靡网络，截图显示微软员工要求晚间仍然在线加班的同事“停止阿里行为”；当字节跳动 CEO 张一鸣在公司游戏群里发现



《巴比伦柏林》剧照

员工上班时间聊《原神》而吐露不满时，他被员工怼出了群。

10 月，“打工人”跻身年度热词。它本是上班族（尤其是表面光鲜的白领阶层）认清自己真实地位后的自嘲，却很快被滥用，成为了充满正能量的自我鼓励，成为了抹去收入差和境遇差、“我们都一样”的自我催眠。

不，我们不一样。当包括娱乐圈明星在内的公共人物加入了这场与你同在的狂欢，“打工人”一词转向 / 回归了凡尔赛——一种看似自贬的内涵式炫耀。

### 年度游戏

1 月，人们以为澳洲大火会是今年最大的新闻，就像人们一直以为 7 年一次的主机大展会是游戏产业的年度话题。但是 2020 交出了更惊悚的答案。

疫情肆虐下，消费者暴涨的游戏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收入，从“重要”升级为“必须”。伴随着各地封城令流行全球的《动物之森》，陪伴玩家度过长夏的《糖豆人》，太空狼人杀《Among Us》两年后的异军突起——可爱友善的联机游戏提供了人们片刻的喘息机会；微软和索尼的次世代主机之争同样带来了一场好戏，让人得以从阴晴不定的严肃新闻中暂时抽身。

然而没什么比今年最受关注的两款游戏更能概括这一年了。

年中的生存动作游戏《最后生还者 2》（它恰好描述了后疫情世界）充满了泪水，怒火，尸体，PTSD，以及难以言喻的戏剧性，留下了一个撕裂的玩家社群，如同任何两个对立的政治阵营一样，在肉眼可见的未来都无法进行理性对话；年末的《赛博朋克 2077》看起来像是隧道尽头的光，所有人都在谈论它可能会多么出色，但当你走近才发现，这只是一个亮丽的加载页面，如同今年的许多承诺和希望一般，一碰就碎。两者背后似乎同样的问题：被榨干的加班员工与大概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 C 字头管理层——他们明白，但是愿意冒险，一旦游戏出了差错，公司声誉受损，总还是有人能全身而退。他们已经拿到奖金了。

不同于其他那些更让人绝望的领域，作为玩家，你永远可以用钱包投票。

### 我们这些电影人

7 个月的院线停摆让中国影视行业遭受重创，今年的中国电影票房预计只能达到 2019 年的 30%（已经是全球第一票仓）。截至 4 月 16 日，2200 多家影院宣布倒闭。

截至年中，13170 家影视相关公司注销，远超去年总数。同期，贾樟柯一则“请考虑影院复工复产”的呼吁登上热搜。拍摄停滞、亏损、减薪、倒闭和失业让影视从业人员大量流失，投资方更加谨慎，人们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影视类型的多样性造成打击。

线上观影和流媒体迎来了最好的机会。传统发行机制的空缺被填补，院线 VS 流媒体之战日趋白热化。年初《囧妈》的网络免费首映被认为漠视了行业规则，无视窗口期和单方面违反院线契约的行为受到电影协会的强烈抵制。

世界范围内，多地影院仍未复工，全球票房预计下跌 66%，传统规则被颠覆成为主旋律。濒临倒闭的院线发现自己最头疼的对手并非疫情——环球在 3 月直接让首映新片登陆流媒体平台，6 月和北美最大院线 AMC 达成的协议中，窗口期从 90 天缩短至 17 天；9 月，迪士尼的《花木兰》只登陆了流媒体 Disney+；12 月，华纳宣布来年 17 部院线同期在自家流媒体 HBO Max 上线，引起了最大规模的业内抗议，发声者包括坚持《信条》走院线但至今未能回本的克里斯托弗·诺兰，“我们这些电影人，头天晚上睡觉时还以为自己在为最好的电影公司工作，第二天醒来却发现自己的确在为最差劲的流媒体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防止大制片厂收购院线形成垄断的《派拉蒙法案》经历 72 年后于今年到期。当然，院线不再会陷入被收购的危险，因为制片厂正全情投资流媒体。

无论直奔流媒的应急方案是否会成为常态，应该有不少人希望逆时可以实现。

### 对男性凝视使用 Uno 反转

理塘青年丁真在一则视频里的 10 秒出镜让他成为了今年最后两个月的头号网红。他以俊秀的面容和朴素的气质打动了被投喂太多工业偶像而审美疲劳的简中网络，登上了《中国日报》和《环球时报》海外版，它们形容他的词是“Angelic”（天使般的）和“Innocent”（纯真的）。如果你阅读流行小说，会知道这两个词普遍指代（男）作者心中的理想女性特质。

丁真最终签约了理塘县文旅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收入稳定的国企员工，和之前放牛挖虫草的生活相比，他多出了更多学习任务和宣传家乡旅游的工作；理塘县的扶贫进展再度成为媒体焦点，扶贫干部称，丁真的走红带来了发展机会，打响了当地旅游的知名度；# 全国各地都在邀请丁真 则是各地文旅局在微博上的联动推介——看起来没有人不高兴。

并不是这样。丁真效应让部分男性开始重思自己对世界的误解。丁真只是一位皮肤黝黑、以常规标准来看没有文化也毫无地位的放牛青年，好像不符合任何一条人们假想中的理想男性标准。所以为什么是他？

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男性凝视被反转了。它一般指以异性恋视角描述和观察女性，通常会为了异性恋男子的愉悦将视野中的女性物化。与之相对的女性凝视，指男性凝视下的女性会想象以男性视角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陷入被男性标准操纵的处境。这是不平等社会力量的具象化，也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社会推动力，其导向的性别不平等最终服务于父权体系。丁真事件中，两性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女性主动凝视了男性，而部分男性头一回从女性而非同性的外部视角凝视和评估自己。他们发现答案和预期有差，女性并没有认可他们自主制定的理想男性标准。

嘿，你终于醒了。



图片来自 cottonbro@pexels

## 专栏

# 你知道这权利不该为任何人所有

顾天鹏 | 18 号车间笔记

关于这个世界，本月有至少 7 条笔记。

## 01 闭嘴

Parler 的消失就像有人打了个响指那么简单。一家拥有 1500 万用户的社交网站可以瞬间被所有巨头拉黑，在这个时代似乎是个不可思议事件。但它的发生好像又在意料之中。这关于越界的定义、容忍的限度，撇清关系和科技巨头攥紧的权力。

诞生于 2018 年的社交网站 Parler 堪称主流社媒流浪者收容所。当人们认为自己在主流社媒上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被越来越具偏见的网站条款所管制、被媒体的假新闻所愚弄、自己坚信的真相被遮掩或扭曲时，他们选择 Parler 作为庇护地。该网站自称坚决支持言论自由、为用户提供推特之外无偏见滤镜的信息选项。很快，其上聚集了众多特朗普死忠支持者、阴谋论者、反犹人士和右翼极端分子，那些在传统社媒平台上不受欢迎的用户。

如果不是 1 月震动世界的国会陷落，Parler 可能在抨击声中继续积攒着“虐粉提纯”后的用户，再加上主流社媒纷纷封禁了“煽动暴力和违法行为”的前总统，已经占据 App 下载榜首的它无疑会形成更大的对抗声势。但是科技公司拔插头的速度更快——苹果和谷歌将其踢出了应用商店，亚马逊宣布停止对 Parler 的服务，因为它未能妥善管理仇恨言论和煽动性内容。“大科技公司是真的想杀死竞品……所有人都抛弃了我们”，[CEO John Matze 说道](#)。

类似 Parler 的产品们早就经历过差不多的事件。在网站使用者被证实是枪杀案凶手后，右翼网站 Gab 被域名供应商 GoDaddy 切断服务，8chan 被安全服务平台 Cloudflare 中止合约，它早两年也踢过新纳粹网站 Daily Stormer，“我有一天早上心情很坏地醒来，决定有些人不该被允许存在于网络上”，Cloudflare 的 CEO Matthew Prince 解释道。

两年后，科技公司的网站审查愈加精细，理由并没有比“坏心情”具备更充足的说服力。它们在给内容和内容生产者做标记时更加果断。闭嘴，你们没有资格说话——它们的做法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这和独裁者做出的举动并无不同。争论的确导致混乱，而在没有人愿意或者有能力为混乱埋单的时候，这个世界陷入一种危险的力量制衡

之中：拥有权力的人，就是最正确的人。无论正确的指涉是什么。

不否认，一些用户被闭嘴可能令你我喜闻乐见——但与此同时你也应该意识到一些危险正在露头。被消灭的声音总会以另一种力量形态出现，只不过你不知道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而且，你知道这种权力不该为任何人所有。

## 02 谐教和邪教

在国会山沦陷并传出了最初一批照片后，人们依然很难严肃对待它。除了整起事件比最夸张的好莱坞商业片和电子游戏更加不可思议外，那些搞怪自拍、奇装异服和洋溢着笑容的到此一游照片，个个都是现成的互联网 meme 素材，差点让人忘记这是前总统煽动下的、对民主核心的攻击。有人死亡，有人被捕，第二次弹劾提上议程。主流媒体给出了时间线还原，至于它发生的直接原因，《纽约客》专栏作者猜测，[这些入侵者享受了不被严肃对待的特权](#)。国民警卫队和警察在面对 BLM 和女权主义者的抗议时往往如临大敌，通常很快就会使用催泪弹并开始逮捕；但他们（包括议员在内）面对这次的入侵者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害怕和担忧，这可能基于对“我们自己人”的了解，而 BLM 抗议者和女权主义者则不算自己人，而是“他们”。

就这样，入侵国会山的武装暴徒被不太在意地视为小丑（就像他们刻意打扮成的那样）、是撒泼耍脾气的小朋友，“这些人可能认为这个系统无法代表自己，可今天他们却证明了事实恰好相反”。

对偏执到疑似邪教的团体一笑了之的处理在很多时候都低估了对方的力量。无论面对的是阴谋论社群 QAnon、地平说支持者、反疫苗者、反 5G 者还是饭圈，对方的信仰和极端举动也许会轻易激起人好气又好笑的情绪，因而无法参与有意义的讨论。当然，这样的讨论也是徒然，因为信息茧房中的对方只会对自己的观点愈加坚信不疑。所以我们放任他们成长，甚至还期待他们干出些有趣的蠢事。可是这些蠢事多数时候让人笑不出来，还是成年人在收拾烂摊子，或彻底失败。

## 03 学术海盗

在特朗普被推特永封的同一周，学术界海盗湾 Sci-Hub 的账号亦被永封。Sci-Hub 在 2011 年由哈萨克斯坦程序员 Alexandra Elbakyan 创建，旨在为所有人提供免费访问付费墙后的学术论文的途径，“去除通向科学路上的一切障碍”，其 logo 是一只叼着钥匙的小鸟。如今它已收录了 7000 多万篇期刊论文，让需要获取资料却无力承担高额订阅费的人获益匪浅。

网站目的崇高，手段却难免涉嫌侵权。主流期刊出版商在过去几年里一直试图逼之关停，并在数个欧美国成功。最近的一次尝试发生于去年 12 月，Elsevier, Wiley 和美国化学协会向德里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印度网络供应商立刻中断对 Sci-Hub 和同为开放存取网站的 Libgen 的服务。德里法院驳回了这一请求，宣布此案为重要的公共事件，允许科学社群介入对话。而当印度学界在推特为 Sci-Hub 发声时，它的账号被永久关停了。

人们被鼓励获取知识，[但是全世界大概只有 15% 的科学知识能够被免费获取](#)，其余 8 成被五大出版商垄断，成为它们最稳定暴利的赚钱途径（Elsevier 在 2018 年净利润率达到 19%，是 Netflix 的两倍）。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之外，就连第一世界国家也一直为高额期刊订阅费头疼，[与（贪婪的）学术出版商相比，默多克简直是个社会主义者](#)。哈佛大学在 2012 年就抱怨过高达 350 万美元的订阅年费“站不住脚”；加州大学在 2019 年拒绝支付 Elsevier 1100 万美元的年费，“没有一家美国大学承担得起这种价格”，并鼓励全体学生和员工自己设法绕过付费墙。

一场反知识垄断运动正在进行时，以 Sci-Hub 为代表，越来越多的免费论文网站涌现，若干知名科学基金会组成联盟，要求所有获得他们投资的个人与机构必须将结果发表在没有付费墙的网站上；预印本网站则打开了另一条路，包括 bioRxiv 在内的数据库免费刊登未经同行评议的预印本，在疫情期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大范围的公开讨论推进了对新冠病毒的研究。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更深刻的变革。学术界的固有文化决定了学者们更愿意在知名期刊而非免费网站上发表论文，但是疫情改变了学界的工作和讨论方式。如果说两年前人们还对[“这些大出版商在未来仍能掌控科学进程的每一步吗？”](#)感到不乐观，他们如今可能会看到一些希望。这是 Sci-Hub 被永封也阻止不了的变化。

## 04 赛博奶牛

2019 年，莫斯科附近的 RusMoloko 农场用上了一项新技术。奶牛被戴上了 VR 头盔，无论它们身处何方，都能享受头盔上夏日的室外美景。据说这能帮奶牛们减轻压力，令其产奶质量更高。

一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写道，这幅景象很喜感但也很悲剧，甚至很可怕，因为它似乎预见了我们的未来。“毕竟，我们的经历又有何不同呢？我们的情绪被追踪，我们在生物信息传感器上登陆，我们自愿交出行程数据允许自己被追踪，我们还欢迎广告商一刻不停地观察自己，我们会不会也是机器操控下的奶牛呢？”

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乐观，我们中不幸的人类同胞还来不及享受 VR 美景，遭遇的命运也不限于被榨干。12 月 29 日，一名 23 岁拼多多员工的猝死再燃人们对“拼命工作”字面意思上的讨论，尤其是在拼多多官博发布“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的评论后；1 月 9 日，又一名 23 岁的拼多多员工在长沙跳楼自杀，他在自杀前刚通过试用期；1 月 10 日，[网友 @王太虚 wray 发布视频](#)，称自己因为在脉脉上传同事被救护车拉走的照片而被拼多多疾速解雇。这家热门公司 300 小时的月均工时、凌晨 2 点的下班时间和高压管理模式再次成为焦点。

遗憾的是，自“996 福报”以来，类似的讨论重复了多次，除了激起民间关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悲愤呼吁和来自平行宇宙装模作样的谴责外，它并没有改变个体的命运或是督促事件中心的公司为员工升级 VR 头盔，事情可能变得更坏了——夏日美景是不存在的，你已经看到了同胞被榨干的命运，可是你别无选择，HR 智库联盟的成立让你不敢轻易跳进黑名单；“996”确实是福报，能够 9 点准时下班一定好过凌晨 2 点猝死在下班路上；奶牛可以享受减压，你不能，因为人类会用更高效的手段对付人类，哪怕那些手段和人性化毫不相关。

拼多多们造就了物美价廉的数字美梦，为打工人画好“拼命就能赚到钱”的饼。支撑着这幅图景的是数字独裁。赛博朋克早已实现了，你环顾四周就能发现《赛博朋克 2077》里的 Crunch Plaza（“加班广场”，被怀疑是 CDPR 工作室员工在游戏里安插的吐槽），而意识到真相的我们还不如奶牛。

## 05 猎巫

猎巫，通常指 1450–1750 年间对被控使用巫术之人的大规模迫害。约 4 万~10 万人无辜承担了社会的恐慌和怒火，其中 8 成为女性，指控人则几乎都是男性。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夏娃导致了亚当的堕落，因而女性是“更弱的性别”，更容易遭受魔鬼引诱；对女巫的辨认和指控依赖于宗教和政治机构，它们基本由男性控制；猎巫通常会揪出边缘女性，比如那些不服从性别角色的女人，她们或是因为过于性感，或是因为在审判的过程中“诅咒”，或是因为表现出野心（对权力的“欲望”）、不甘成为社会期许的纯真少女和贤妻良母而受到审判，遭遇投石、沉湖或火刑。

这个词在近两年常用于 #MeToo 中遭受指控的男性及其支持者的自我辩护。让人产生 600 年后女性翻身做主的错觉。

1 月 5 日，女作者“七英俊”在微博回顾了自己在某次网络作家大会上被众多男作者开黄色玩笑的经历，并在最末加上了最具争议的一句“我不针对任何人，我针对你们所有人。你们都是垃圾”。这让感觉自己清白被侮辱的有名或者无名的男作者和感觉自己遭受地图炮的男网友心灵破碎。这个男性同盟在此后的一天里逼迫七英俊精准指控个体，却对于她稍后提出的数个问题避而不谈：

我说他们的名字会被你们指控造谣吗？你们会继续讨要录音录像人证物证吗？在我拿不出证据被对方控告诽谤时，你们众筹诉讼费吗？你们会帮我反击对方粉丝的网暴吗？在我被指责“因为对方起哄就让对方社死”后，你们帮我洗清名誉吗？关键是，“我在骂垃圾，你们共什么情”。

很快，七英俊被同行指责吃女拳饭，未谈妥的商业合作被取消。为了证明自己并未吃女拳饭，七英俊为公益项目捐出 3 万元，并在诸多“业内前辈”的指导下公开道歉。你从未见过如此窘迫的猎巫——猎人破财道歉，“巫师”全身而退，其中的多数还获得了一生一次的 5 分钟焦点时间。

600 年后的猎巫看起来颠覆了猎人与猎物的权力结构，被指控的主体轻易地被放置在受害者的席位，文明人（Men）假定系统公正、人人平等，用程序正义和“理性”思考武装自己的大脑，对猎人并不严密的叙事和过激的情绪挑刺，最终迫使猎人认识错误、放弃“诬告”、明智地选择闭嘴。

别气，至少我们认清了各自的地位。

## 06 大卫与歌利亚

一场激战正在进行。机构投资人 VS 散户，华尔街精英 VS Reddit 网友，大卫 VS 歌利亚。

没人看好 GameStop 这个古老董。这家线下的游戏零售连锁店在数字时代自然不被期待有什么光明的未来，它在 2019 年就亏损了将近 8 亿美元，考虑到疫情影响，前途似乎不能更黯淡。不过当宠物用品电商 Chewy 创始人 Ryan Cohen 大量购入 GameStop 股票、成为第二大股东、并在 1 月 11 日入驻董事会后，GameStop 开始被更多人关注。

Reddit 投资板块 r/WallStreetBets 很快察觉到它被做空得有多厉害，其 30% 的股票都由投资基金持有，堪称机构投资人的掌中玩物。这些散户自发组织起了一场反击，如今被称为“一生一次的轧空”，即大量购入 GameStop 股票令股价飙升，让指望股价下跌以回购股票赚取差价的华尔街玩家无钱可赚并血亏。截至 28 日，GameStop 报价 341.6 美元 / 股，一月涨幅达到 685%。

在这场拉锯战中，持有大量做空仓位的对冲基金和投资人损失惨重，其中包括知名做空机构香橼。他们先是在社交媒体声称 GameStop 只值 20 美元，又称散户为“愤怒的暴徒”、“牌局上的失败者”。但是民主党国会议员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指出，华尔街投资者向来都把美国的股票市场当成赌场看待，现在这些散户也只不过是仿效他们的做法。

表面上看，整起事件像是为 meme 而生，“精彩”到马斯克都转发，但它并没有看起来那么轻松。崇尚透明、公开讨论、厌恶双标的年轻人与充满秘密、手握人脉、占尽优势的华尔街建制派的冲突，以一种自发的私刑方式爆发，人们收获启示或是惊恐。[Reddit 用户总结](#)，“我从中懂得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把华尔街获取的信息给平民，他们同样可以有效地利用它，就像任何一个优秀的投资人一样……他们之所以现在在顶端，因为他们本身就很有钱。所以他们眼下才会恐慌。”

[CNN 定性其为“特朗普主义”的一次行动](#)，因为它符合前总统最受欢迎的核心信条——“精英们以为自己知道得比你多，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告诉你如何生活、相信什么，但你猜怎么着？我们人民比精英更聪明！”——它只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而存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义，没有积极的计划，“干翻精英”就是唯一的计划。“这可能让你好受点，但解决不了任何事”。

这就是马丁·古里在《公众的反抗》中所描述的场景，他认为这会导向“复仇性质的虚无主义”。人们烧掉建制派，但并没有“什么能取而代之”的清晰认识。

散户们获得了短暂的胜利并传达了他们的信条，但是权力结构并未被颠覆。包括 Robin-hood 在内的交易平台已经限制了 GameStop、AMC、黑莓等数支高价股票的散户交易。这种显而易见的区别对待再次受到 AOC、泰德·科鲁兹等人的抨击，Reddit 网友则递交了对 Robinhood 的集体诉讼。战斗还在持续，似乎也不会成为孤例。

## 07 逃离

[“《绯闻女孩》遇上《唐顿庄园》，《傲慢与偏见》，但是由黑人演员出演，这大概就是《布里奇顿》的电梯推介了。”](#)

新剧《布里奇顿》（Bridgerton）本月打破了此前由《猎魔人》保持的记录，成为 Netflix 上最受欢迎的剧集。它改编自茱莉亚·昆恩的同名小说，是很典型的摄政浪漫题材——聚焦英国摄政时期（1811–1820）上流社会的家长里短，充满快节奏的机智对话，讲述消遣、丑闻和意外爱情。



《布里奇顿》第一季剧照 x

本剧最吸引眼球之处是一个混色的卡司。虽然摄政浪漫类的主角都是白人，但剧集选择了黑人演员出演男主哈斯丁公爵，他将和富有的布里奇顿家族长女达芙妮恋爱；而“种族”的概念直到第四集才直接出现，Lady Danbury，又一名黑人贵族女性，告诉男主，“我们本是两个被颜色分开的社群，直到国王爱上我们中的一个，你看，爱战胜了一切”。是的，在这个半架空世界里，统治英国的夏洛特女王拥有黑人血统。它试图以最轻描淡写的方式弱化种族对剧情的影响。作为一部爱情剧，比起严肃探讨 19 世纪的跨种族爱情、黑人在上流社会的微妙地位、黑人女王对社会的更广泛影

响等等，主创可能更情愿专注该类别最擅长的恋爱与家庭关系，这样便避免了可能产生冒犯性的表达。

这大概有点犯规。因为不可否认，这个强调“色盲”的选角方式，[虽然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就是伦敦舞台和莎士比亚剧团的日常](#)，但是在影视剧尤其是年代剧亚类别中还算罕见。年代剧强调或假装历史精确，《唐顿庄园》的执行制片坚持认为在那样一个并不崇尚多元文化的年代，“我们不能突然把各个种族的人安插进剧里，这不正确”。而正是这种充分利用半架空世界观的大胆选角，令剧集在开播前就颇受瞩目，可当它真正展开时，观众才发现这种影响非常微弱，甚至整部剧其实还隔着层无意识的偏见滤镜。

“你不能假装种族毫无影响，尤其是这些角色生活在基于奴隶贸易构建的世界里。把黑人角色塞进背景里并不会抹除这一切。这个主题是必要的，也应该被阐述。”[Observer](#) 在剧评里指出，如果种族真的无所谓，卡司真的追求彻底“色盲”，那么应该出现同样数量的亚裔、中东、拉丁演员，可是没有；另一方面，黑人角色拿到的故事线都更加消极，家暴弃养、未婚先孕等桥段很符合社会一贯的刻板印象。“你仔细想想，《布里奇顿》真的那么进步吗？”

剧集的受欢迎程度表明了观众不是很在意这些地方。摄政浪漫类别的核心是“逃离”(escapism)，人们暂时躲进一个不用考虑任何严肃议题的世界，看好看的人谈恋爱，从中收获愉悦。

希望 2 月的你也有可以“逃”去的私人世界。



顾天鹂

不要恐慌，好些人我也不认识。莉雅说我是恶作剧型写手。谢谢莉雅，我很喜欢。

#### 18 号车间笔记

本栏目每月末更新，它记录一个月内全球文化的重要话题，以及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争论和分析。



小鸟文学出品  
卷一，2021.1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